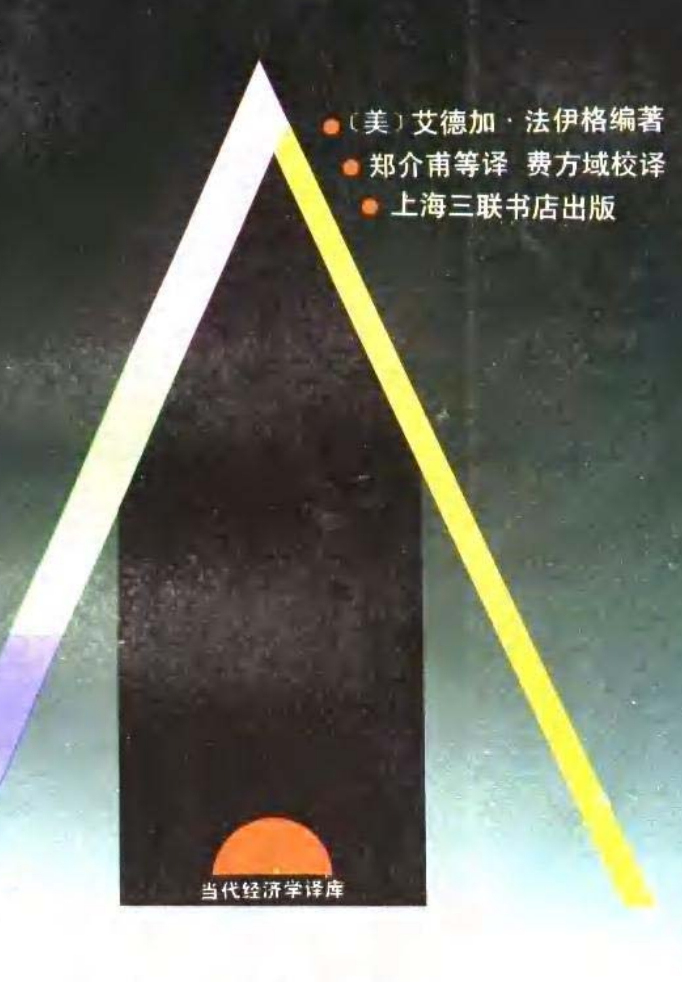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美)艾德加·法伊格编著

郑介甫等译 费方域校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地下经济学

#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社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 当代经济学文库；(2) 当代经济学译库；(3) 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 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

(沪)新登字 117 号

Edgarl L.Feige
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 TAX EVASION
AND INFORMATION DISTORTIO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特约编辑 方汝成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宋珍妮

**地 下 经 济 学**

艾德加·L·法伊格 编著

郑介甫 等译
费方域 校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250000
印数：1—2500

ISBN7-5426-0598-4/F·137

定价：17.00 元

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 译者的话

本书编者及主要作者埃德加·L·法伊格1937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经济学)学士；1963—1981任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1967—1968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客座高级讲师；1971—1972年马德里自治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1979—1982年任荷兰高级研究员，访问学者；1980—1981年任莱顿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公职：荣誉伊·利利研究员；埃尔哈特基金会研究员；联邦储备银行芝加哥研究员；现任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系统的顾问。

法伊格长期从事货币流量、工资、物价控制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教学。80年代后期，部分地转为研究地下经济，并取得独创性的成果。目前，他是公认的研究地下经济的权威。他的主要著作有《流动资产需求：暂时横断面分析》(1964)。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货币、债券、商品库存和资本的最优值》(1971)；《经济上的合理预期：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创

新与货币财政政策下的创新措施无关吗？》(1976)；《货币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时间系列分析中得出的警告》(1979)；《固定汇率下的多国通货膨胀：来自潜在变量模型的若干实际证明》(与K·辛格顿合著，1981)等。

对地下经济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次高潮；70年代前后，再度引起主要西方国家的重视。就一门专门的学科来讲，地下经济学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仍然是不完善的，甚至连对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特殊重视，在国际上已出的重要专著已经为数不少，某些著作甚至已经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来考虑地下经济问题，如戴维·C·克伦多 (David C. Colunder)所著《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与地下经济活动分析》，把地下经济活动与寻租理论上升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高度来评价。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滞胀”局面的长期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宏观经济分析理论的危机”。使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进一步加深，导致更多的职业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理论与现

实进行重新考察。地下经济学在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反思的过程中，无疑是最具有显著特点和成效最大的一支新军。

在实践方面，逃税、漏税现象和各种黑市活动等(把所有有关的未被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统称为地下经济活动)一直在困扰着市场经济国家，如何完善税收制度和国家对经济的总体了解，始终是各国政府棘手的问题。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地下经济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来研究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国理论界对地下经济的研究是近几年的事。一些经济学家评介了西方地下经济理论，如寻租理论等，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目前还尚未见到。毫无疑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必须要研究地下经济的作用、种类及特殊的表现形式，进而为我国有效地制止(或在某种情况下利用)地下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对策。

《地下经济学》是埃德加·L·法伊格、罗伯特·T·阿尔福德和里查德·D·庞特等人对地下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集。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地下经济进行了研究。就总体来看，本书在下列几方面对我国研究地下经济有重要启发。

(一) 关于地下经济的测度，本书所涉及并深入研究的几种模型和方法具有实际意

义。特别是货币流转比率分析模型、经验测估模型，它提供了对不同类型经济中地下经济活动状况定量研究的重要思路。

（二）关于地下经济这一范畴在整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法伊格等人的理论在不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被滞胀所困扰，在繁荣表象的背后，劳动生产率莫名其妙地下降了。使宏观经济理论本身难以自圆其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但基于这种关系而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现实面前似乎显得软弱无力。他们认为，应该把注意力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转移到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的关系方面来。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只有从这种关系出发来完善宏观经济学，才能解释现实中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现象。

（三）把地下经济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联系起来考察，这样就把地下经济这种从现象上来看是非法的经济现象与各济种经体制和经济自身的运行机理统一起来作为客观的过程来对待。地下经济既是对现有经济法规和管理程序的违背，但要从其二重性来研究它对低效率的配置的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效率的提起作用。从理论上确立

这种观点，有助于对地下经济采取更现实和更为可行的政策。

（四）经济周期性运动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久热不衰的问题之一。颇有意义的是（绝不能看作是一种巧合）对地下经济与经济周期的考察，更直接地解释了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减弱的原因。尽管本书的不同作者之间仍存有争论，但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如果地下经济呈反周期运动（假设地下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与税率成正比的话，这一判断就极有可能成立），经济周期的节奏越来越不明显正是地下经济日益猖獗的结果。

综上所述，《地下经济学》一书不失为一本对研究当代经济问题开拓视野的有意义的著作。它可以为我们研究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下经济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启发。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郑介甫和王学武组织。参加翻译者有郑介甫（导言、第1、2、7、13章）、王学武（第3、14、15章）、杨云彦（第5，6章）、王晓军（第9、10章）、戴炳源（第11章）、王东京（第8章）、钱耀东、张中华（第4章）、李正雪（第12章）。

# 导论

本书研究一个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但正受到广泛注意的经济活动领域——“地下经济”的性质、意义、测度和含义。一般认为它由那些防止和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的经济活动和由此获得的收入构成。这一课题涉及的是一个充满奇闻轶事的特殊领域，极少有人愿意承认卷入到这一领域之中来。地下经济这一概念通常涉及到极为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但绝不限于)走私毒品、卖淫、色情文学、赌博、未注册的就业、短工、夜工和逃税。这些互不相干的活动的共同之点在于，地下经济活动者总是千方百计逃脱政府和公众的监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地下经济活动方面来，当时实行的高税率、物价管制以及配给制刺激厂商和个人参与各式各样的黑市活动。黑市交易的典型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非现金支付，以此来消除有关的审计凭证，以免被税务机构和其他管制机构用于某些强制性目的。逃税的主要形式是向国内税务署 (IRS) 少报收入。

尽管在黑市活动、逃税过程中的千奇百怪的事实广泛存在，但是，一直到1958年，卡甘（Cagan）才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现金比率法，以获得少报收入的粗略的估计数字。他发现，在战争结束时，少报收入几乎占到上报国内税务署的调整后总收入的23%。国内税务署采用了自己的审计控制方案，以力图独立地去确定税收项目上少报的收入量。但是，荷兰德（Holland）在1959年的研究揭示出，通过国内税务署的审计程序仅能稽查到利息和股息所得中的一小部分。皮切曼（Pechman）根据这个最新证据向国会提出税制改革的报告，要求增加对利息和股息自动扣缴税款。这一改革建议被国会否决，有关逃税的争论在公众中也逐渐淡化。

1977年，奎特曼(Gutmann)应用卡甘的程序计算出一个点估计数，在1976年，“地下洞穴经济”的规模约为1750亿美元，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0%，此时，对地下经济活动的兴趣被再度唤起。随后，1979年和1980年，法伊格的计算(基于经过修改了的现金比率法和最新发展的交易法)，提出了一系列对现存的“不正当的”或“未被观察到的”经济的估计。自60年代晚期以来，其规模大大增加，远远超出了早期估计所显示的数字。尽管大家都预测到一个“非现金社会”即将出现，但货币统计数字仍表明，相对于活期存款而言，现金仍然增加了。美国每一个家庭所持有的现金超过2000美元，而且40%以上的国内现金价值是以100美元的汇票形式出现的。

这些研究提出了一种推测，即税率的提高、政府管制成本的增加以及公众对税收制度不再抱有幻想，已经扩大了违背税法的范围。不依法纳税的主要方式之一，无疑是向国内

税务署少报应税收入。与这种观点相适应，国内税务署批评了基于货币方法的估计，按他们自己的想法设计了一个对于未申报收入和相应的税收损失的基于审计的估计法。不过，根据这些初步的估计在1976年，未申报收入仍在1000亿到1300亿美元之间，由此造成的税收缺口介于190亿到250亿美元之间。

未申报收入问题的必然推论是，逃税会使政府其他部门的统计数据发生扭曲。如国民收入和产品帐户（NIPA）必须依赖于税收来源统计资料，如果税收的来源的数据发生了偏差，国家的基础宏观经济信息系统必然发生系统扭曲。顺此而论，在整个70年代，困扰职业经济学家的某些异常现象，与其用经济体系的某种冲击或宏观经济理论出了什么差错来加以说明，不如用官方统计数字的扭曲来加以解释。难道十余年的滞胀经历和莫名其妙的生产率的下滑不可以与这种不断增长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充分观察到的经济联系起来考察吗？政府统计机构的代表公开对官方统计数据的来源表示信任，从而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

尽管这样，这些问题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公众的注意力并引起他们的争论。公众称此类现象为"地下经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将地下经济描述为是他们考察过的最有兴趣和最令人困惑的课题之一。公众注意力的焦点仍集中在不断增长的违背税法的麻烦问题上。政府是否丧失了征收必要的税收以支付政府开支的能力？税法是否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以此去恢复人们遵守税法的自觉性？进而言之，国家宏观经济数据体系的精确性是否由于扭曲信息的经济激励而受到损害？

有关地下经济的大量争论集中在对其规模和增长速度的不同估计方面。现金比率法的批评者对计算程序中的假设提出了责疑，并指出所引用的一些说明地下经济出现的事实可以有别的解释。关于交易法，公认能够避免其他方法在概念上的缺陷。但由于缺少一些统计资料，所以难以全部实行。由于自我选择偏向问题和有关记载的不精确性，观察法也是不十分可靠的。审计程序法的有效性也深值怀疑。尤其是在尚未囊括的未申报收入的范围内，举证责任主要是由审计人员承担，而非纳税人承担。接着而来的讨论反映了关于对方法论方面的困难的考虑，就是说须用全部努力去测度那些个人和厂商们拼命地掩盖起来的经济行为。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不同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程序是用来测度地下经济活动的不同成分的，因此彼此不可能作直接比较。地下经济的诸方面假说还须要进一步阐明。

地下经济活动的分类须要确切地反映不同调查者的具体视角。对于劳动经济学家、犯罪学家、财政学家、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来说，地下经济似乎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地下经济的性质，在市场调节体制下可能与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大不相同，而且它还有赖于该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来还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地下经济的定义能够满足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得不根据特定地下经济活动在不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而采用各种定义。

一个分类框架被用来明确在制止非法经济活动、逃税活动与信息扭曲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为了更精确地确定地下经济的不同部分将通过不同的测度方法来测定，则需要经验方法。试图在不同的假设下对结论的有效性进行测验，和

在不同情况下进行同样的重复研究，也可能有助于解决那些尖锐的争论问题。

经济学家不可能轻易地在实验室里复制经验性实证研究，他们必须依赖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欧洲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扩展对地下经济活动研究的良好的机会。许多欧洲国家的税率高于美国，这些国家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管制的成本也是昂贵的。在许多欧洲国家经济中，都表现出促使人们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经济激励因素。同一的方法应用于不同国家，会产生同样困扰的结果吗？在不同情况下有其他测度方法可以获得吗？

向学术界和政府有关专家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们都对大西洋两岸存在的逃税、未登记的劳工以及各种被称作未观察到的、隐蔽的和影子经济所涉及的宏观经济和财政学问题具有广泛兴趣。召集对未观察到的经济的讨论会，是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国际论坛来探讨研究这些问题。要求参加者对他们各自研究的国家中的有关文献进行评估，并作出可以与已经趋于完善的美国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相补的经验性研究。同时，也鼓励他们对现有著作提出批评意见，并为这一重要课题提出在概念上和经验上都是新的方法。

不同研究者所发现的许多活动的不同性质揭示了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好抛弃那种只有单一的地下经济的观念，而代之以去判明与突出的经济问题密切相关的各种地下经济。其界限应该由调查的目的和实际调查领域的前景来限定。目的是给不同的地下经济作出有用的定义；选择恰当的专门术语去描述它们；设计、评价和实施不同的测度方法，然后确定地下经济与同期经济问题的相关性。

第一章提供了一个地下经济活动的分类方案，它反映了在美国已经发生过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一章共描述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地下经济——“非法经济”、“未申报的经济”和“未登记的经济”。这些经济的收入各自与经济犯罪、逃税和国家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美国采用的另一种估计程序将就他们坚强的概念和浓厚的经验色彩进行考察和评估。对美国的研究表明，80 年代早期，未申报的收入在 2800亿到 4200 亿美元之间，占申报过的调整后的总收入的 16%—24%。与此相应暗含的税收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令人惊奇的是，非法活动中的未申报收入估计少于未申报总收入的15%。未申报收入的时间系列估计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在过去的 20 年中逃税现象急剧增加了。

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内，未申报收入的高增长率大概要归因于那个可能会扭曲国家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未登记收入问题。未登记收入的总数估计会很大而且多变，比那些未申报收入更不可靠。现在，政府已经对未登记收入的问题有所承认并对其国民收入及产品（NIPA）的历史作了修正，以便能反映国内税务署估计的联邦所得税收入中错报部分的影响。

由阿尔福德（Alford）和法伊格所写的第 2 章阐述的是这样一个课题：社会科学信息系统是受到“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订者反馈”产生扭曲效应很大伤害的。他们认为，只要存在着行为刺激和操纵信息系统的机制，信息就必须被看作是社会体系的内生变量。他们指出，地下经济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信息是内生变量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每当社会指标用作政策启动器时，它们就失去了客观度量系统活动的功能，而成为错漏百出的东西。

麦吉（McGee）和法伊格在第三章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此去确定根据虚假信息进行主观的政策制订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他们揭示了未登记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经济不适的初始“统计幻觉”是怎样使具有良好愿望的政府政策最终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在全部经济活动（登记的加未登记的）接近经济产出能力的情况下，当官方货币机构无意识地在某一时点上刺激了可观察到的经济时，充分就业政策就会导致“滞胀”。这一模型的详细叙述非常符合在70年代盛行的情况的。换言之，政府采取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就像在1979年所做的那样，模型预测的是，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大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增大和高利率。该模型对过去20多年间的经济事件作了多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极大地依赖于经济活动中未登记部分从而也是未观察到部分的涌现。

第4章提出了关于地下经济应该有多大规模这样一个规范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称赞地下经济是高效率的企业活动的一部分，它可以作为对付由税收和管制所导制的低效率的积极缓冲措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地下经济是侵蚀社会的力量，因为它剥夺了合法组成的政府所需要的税收，而且非法地将收入从诚实居民的手中重新分配到不诚实居民的手中。布鲁诺·佛雷（Bruno Frey）考察与评估了这一两难问题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发现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对这一规范问题作出满意的解决。

本书第二部分是具体国别研究，它们提供并评估了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地下经济活动的证据。第一篇论文（第5章）由庞特（Porter）和拜尔（Bayer）所作。论文在最初并没有被收入本书，只是到了决定出版本书时才引起我对该文的注意。

他们的贡献是，对那些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地下经济进行测估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作了彻底的、富有批评精神的考察。庞特和拜尔对这些方法作了深入的评论，指出它们相对的优点和弱点。他们试图去证明，那些已经引用来作为支持地下收入假设证据的货币统计资料并不一定须要有一种地下经济的解释。他们的这一章特别强调指出了货币度量工具的局限性，而且对在其他章节里所报导的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地下经济活动的颇大的货币估计起到一种适度的平衡作用。

第 6 章是布诺斯特卉森(Broesterhuizen)关于荷兰的论文。他设计了一个灵敏的框架去分析国民帐户对扭曲的敏感度。通过对国民收入及产品帐户的详细构成所进行的解释，和对有赖于税源信息的特殊部分的范围的决定，他能够推断出向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少报收入对国民收入与产品帐户的可靠性所产生的总体影响。

在第 7 章里奥赫金斯(O'Higgins) 评论了在英国被建议用来度量地下经济的种种不同的国民收入与产品帐户方法，并找出了这些方法须要改进之处。同时他指出，不同于美国的经验。在英国，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下降，是由于减少了支票交易费用的结果。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兰格菲尔德特(Langfieldt)对德国的考察中(第 8 章)。奥赫金斯对英国论据的评论，揭示出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就会对地下经济的数量估计产生很大的差异。正如在大部分国家研究中的情况一样，货币方法产生最大的估计值。奥希金斯采用了地下经济活动增长的时间估计来确定地下经济是否呈现出一个周期性图型。如果地下经济是反周期运动的，这将会在全部经济

活动中使波动有所削弱；如果呈周期性运动，这将会加强在观察到的范围内的波动。在第一章，概念化框架曾预期地下经济活动可能是反周期的，但从英国得到的少量证据却并不能证实这一预期。

兰格菲尔德特对德国地下经济进行研究时，使用了许多在美国曾经使用过的同类方法，并取得了惊人地相似的结果。它表明，在德国未观察到的部分是规模很大的，而且在整个70年代大大地增加了。米鲁斯(Mirus)和史密斯(Smith)在第12章里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加拿大的地下经济，获得大量一致的成果。再一次证明，未观察到的部分的波动是与税率的波动相应的。

汉森(Hansson)在第9章里关于瑞典地下经济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在声称具有最高税率的那些欧洲国家中，逃税现象似乎并没有增加，但是他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从调查的信息和不同的度量中所取得的证据之上的，而这些信息和度量被认为是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的较差的指标。瑞典的税收审计信息显然与美国的发现是一致的。汉森还对逃税最佳规模的课题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从配置效率的观点来看，一定数量的逃税从社会说可能是合意的，但是逃税也有分配的结果。

伊沙切森(Ischsen)和斯特朗姆(Strom)在第11章里为研究挪威的地下经济增加了一些实证材料，依靠的是两种办法，一种是传统的货币估计法，另一种是经过改进的调查方法。后者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进行设计的，即提供与由不确定状态下逃税的正式理论给出的变量相一致的资料。由于该理论关键导数的符号的预期不十分精确，因此这种方法只

能为测估税率、可觉察的处罚率、查明的可能性、发生变动对逃税的影响提供唯一的经验基础。

意大利是被普遍认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未观察到的经济。康蒂尼(Contini)在第10章里对此作了基本说明。意大利的这种情况是很不寻常的，只是其未观察到的部分由于观察到的劳动力登记就业率令人不能置信地下降才初次被查明。在70年代中期，占全部人口不到35%的人属于登记过的劳动力。对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的调查表明，未登记就业率和国民收入帐目在两年里须向上修正约10%才能恰当地计算小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些小企业里，它们在计算过程中往往被人为地估低了。

巴塞里迈(Barthelemy)在第13章里对法国的“黑劳力”、逃税等一系列问题的经验性研究进行了定义和总结。对法国的研究，主要采用调查、审计和货币方法进行。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费尔布鲁革(Felbrugge)与甘勃(Gabor)对中央计划体制下所谓的“第二经济”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进行了难得的探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经济与官方经济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经济”的定义远比对市场经济中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的定义困难。

在第14章里，费尔布鲁格带领我们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经济王国进行了一次学者式的漫游，从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发掘了苏联第二经济的含义。从表面上来看，在指导研究未观察到的经济的概念与那些阐述第二经济的含义的概念之间似乎没有多大联系。然而，费尔布鲁格与甘勃二人所作的发人深省的论述会把这种初步印象一扫而空。把读者

注意集中到在两种不同制度下国家如何控制资源这样一个问题上来时，我们就得承认在西方违背税法的现象事实上在中央计划制度下也有它的对应物。在西方，个人获得收入后即被课以税收。在苏联和匈牙利制度下，资源从一开始就遵照中央计划指出的稀缺程度全面扣缴（税收）。费尔布鲁格指出，在苏联，对逃税并没有有效的处罚，尽管严酷的法律对那些转移现金或盗窃苏维埃社会主义财产的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是 50 年监禁直至死刑。甘勃在第 15 章里指出，在西方国家，控制是建立在法规（如税法）的基础上的。在中央计划体制下，控制却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违反法规的基础上的。国家法律体系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正常活动的行为极有可能包含着典型的犯法。正因为如此，每个居民都经历着国家作为外在的力量永远有可能对违法行为进行的揭露和处罚，国家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法律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非常微妙地鼓励第二经济活动。当经济受损于中央计划的低效率时，第二经济就作为一种政治上不满的安全阀而起作用了。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西方国家通过违背税法来增加私人部门的收入以及缓减官方经济下跌是一致的。这种“减震器”的作用就解释了官方经济与第二经济之间共生的相互交织的关系了。

在东方和西方都存在着的规模十分庞大的地下经济促成了它们所代表的制度的整个经济效益，靠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它们阻遏着由于税收和对市场机制的限制所导致的低效率。但是，这些收获是以不合意的收入重新分配和信息系统恶化为代价达到的。进一步说，由于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非法的，它们的增长永远对两种社会的社会结构起着

瓦解的作用。正是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促使两种制度下的政治家们重视基本结构的改革，以寻求既受益于地下经济活动同时又扼制其腐蚀性影响的途径。最近，美国已经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项基本改革，降低税率，填补税收中的漏洞，加强对违背税法者处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减少逃税这样的地下经济活动的收益和增加进入这种活动的成本来弥补国家税收。目前，苏联正对其经济生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改组，急切地寻找着把富有效率的第二经济纳入官方经济体系中去的途径。随着中央计划松懈配置障碍适应第二经济，所得税必须被当作政府用来控制和分配资源的一种工具。看来，地下经济活动的普遍存在和人们对其后果的日益清晰的认识，可以看作是一种促使东西方独自改革的强有力的催化剂，从而使它们更加相互接近。

# 1 地下经济的含义及其测定

如果我们相信正式公布的政府统计数字，那末7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显示了在上几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可能同时并发的多种经济病的征兆。在那个十年里，美国经济被高通货膨胀率，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失业率，低增长率，及劳动生产率下降所困扰。通货膨胀与衰退同时并存。困惑了那些经济对策专家，并加剧了所谓宏观经济分析理论的危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预测与经济生活中许多"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导致人们不得不对理论与现实重新进行考察。

早在60年代，我们的理论与经验使我们相信，经济的主要表征是稳定并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是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各种替代，可以从中选择最合乎社会需要的组合。宏观经济模型对未来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比较精确的预测。政策制订者遵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努力调整经济，力图使经济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鼓励人们相信在保持合理的价格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增加率的同时，相对低的失业率

是能够达到的。因为通货膨胀被认为只是具有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后果，充分就业政策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预算会周期性平衡，只要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以产生为不断增长的社会支出项目提供资金所需要的政府财政收入。这种美好的希望被过去 15 年的经济事实撞得粉碎。

宏观模型的预测变得越来越离谱，菲利普斯曲线开始向上和向外盘旋，现在需使用"滞胀"这个新词来描述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同时并存的现象。正如宏观经济政策在对付这种特殊的经济综合症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一样，"经济危机"这个术语比在 30 年代大萧条之后的任何时期听到的次数都更频繁。

经济学专业面临着理论世界与观察世界之间的日益增大的裂隙。理论被富有想象地修改，把"供应方面"与"理性预期"效应合为一体，以解释经济体系中的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例外。能源价格的冲击承担了通货膨胀与衰退同时并存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动态的预期理论却试图阐明它们的持久性，以及政府无法使经济恢复到稳定均衡的原因。尽管理论上有这些创新，然而，关于滞胀根源的观点中，哪怕是大致相同的意见也难以达成，就像对政府赤字的快速增长无法作出充分的说明一样。

一个弥补理论与现实的这种鸿沟的补充办法来自这样一句格言："如果事实不符合理论，那就进一步检查事实。"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经济生活中的事实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未观察到的"或"地下的"经济活动部门的增长，而被系统地扭曲了。地下收入假设（UIH）表示了重新估价经济事实真实性的努力，这些事实是由那些收集和发布关

键性经济指标的政府机构公布的。它们的信息成为理论分析与政策制订的指南。简言之，这种假设提出在经济活动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能逃避了政府机构建立来监督经济活动的复杂的度量系统。因为度量系统主要依赖于税收信息，违背税法的活动不断增加，会使形成我们对经济活动进展情况观察的信息系统发生扭曲。地下收入假设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提供一些初步的答案，这些答案可能有助于解决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一些突出的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个人、企业和政府赖以进行合理决策的信息系统的适切性。麦吉(McGee)与法伊格(Feige)(第3章)证明，不断增加的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使信息系统变得无效，能够造成与我们在70年代所经历的非常类似的滞胀症状，当时政府正在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当政府变换方法，把政策重点放在稳定价格上时，不断增加的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能造成我们正在经历的那种类型的预算赤字。

地下收入假设表明，包含在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概念结构中的某些基本分类需要扩充。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集中在私人和政府部门之间资源转移的后果上。而地下收入假设提出，同时也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源在经济体系中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部门之间转移的后果上。

当人们主要关心诸如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NIPA）所提供的那种广泛采用的经济指标时，观察到的(或有申报的)经济部门就是我们官方统计机构正常掌握其情况的那些经济活动。这类有记录的经济部门使我们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基本事实有所理解。它不但是产生经济学专业希图回答的问题的基础，而且为我们进行预测、经验检验和制订政策提供

数据。逃避了官方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统计的未申报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加，会使信息系统中记录的情形和经济中实际发生的情形之间产生系统的不一致。如果官方信息系统长期发生偏差，就会产生错误导向的问题、错误的答案，公民和政策制订者就会得到虚假的信息。

就财政学而言，观察到的经济部门指的是，在我们目前实行的自愿申报的纳税制度下，向财政当局“申报”的收入数。违背税收法规产生的“未申报”收入，就是应该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数和事实上申报数的那个差额。未申报收入的增加，会削弱财政当局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或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财政赤字。而且，由于记录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的收入依赖于向税务当局申报的数据，未申报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未记录收入的增加。总之，规模庞大和不断增加的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会在观察到和受控制的领域之外重新分配资源。它会影响我们对经济现实的认识，也会影响经济现实本身。它的配置和分配后果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税收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章的目的，在于为地下经济活动建立其定义和术语的分类框架，以探明各种地下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对度量这类躲躲闪闪现象的增长规模的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评价。下文中提出的分类框架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机构设置，经验研究则以美国用来估计未观察到经济部门的规模和短暂发展的重要方法为主。

**未观察到的经济的含义**

“地下经济学家”所写文章中创造了过多的描写未观察到

的经济部门不同方面的术语(如地下经济、洞穴经济、影子经济、非正式经济、隐蔽经济、平行经济、黑市经济、秘密经济、第二经济、家庭经济等等)。这许多的概念说明,我们这里所说的"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事实上是对形形色色的这类经济活动的一个总称。它们每一个与我们研究的关系,部分决定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虽然每一个术语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对象的特定方面,但是概念太多往往会模糊而不是澄清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发现了某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在作为经济学中经验研究基础的常规数据库中未能得到完整反映,才被提出来的。

对普遍所谓的"地下经济"的规模的各种不同的度量表明对它的规模存在多种不同的估计。这种明显的不一致,不仅仅说明对一种力图逃避调查的现象进行估计的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它们是对不同概念实体的估计数,各种度量在规模上是不可比的。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尽力对"地下收入"的不同概念作出精细而有用的概念区分,或尽力对各种各样的经验测定结果进行协调。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分类学框架,用以区分这个现象的不同方面,并在不同的理论创造物和它们的现实对应物之间提供经验联系。值得更加注意的是"经济收入"与"财政收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经常有这种情况,把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中未记录的收入错误地等同于逃税问题。

## 总经济收入

宏观经济理论中收入的定义是，在既定时期内财富存量不变的条件下能够用作消费的最大数量。原则上，这一关于总经济收入的宽泛概念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没有区别。概念上，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包括具有确定市场（Positive Market）或反映相对稀缺的影子价格的所有项目。但是，美国对经济收入的实际度量却限制在特定时期内由本国居民供应的合法生产的市场商品和劳务（由劳动、资本和财产生产）上。包含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内的常规宏观经济核算做法，必然要以牺牲概念的完整性作为代价，来减少实际度量的费用和误差。如果我们把有记录的收入解释为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统计内经济总收入的组成部分，那末，“全部未记录收入”就可以被看作是由下述三部分组成的：

1．被当地法律认为“非法的”被禁止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

2．在非市场的（以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的）合法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收入；

3．由合法市场活动（货币）产生，因种种理由逃避了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度量的收入。

一个简单的关于总经济收入的分类框架及其组成部分，如表 1.1 所示。

原则上，经济总收入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所产生的全

部收入。精确地确定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AB）的，是微观—劳动—经济学主要的具有实质性问题之一——它强调劳动力的参与率。发展经济学主要关心（AB）界限的宏观决定因素以及这个界限在一定时间里的移动速度。一些经济学家把非市场部门的产量看作“非正式经济”（斯科尔卡 Skolka，1985 年），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使用同一术语去描述市场活动（斯密斯 Smith 等人，1982）。

**表 1.1　经济收入的分类框架**

| 理论结构 | 市场分类 | 活动的法律地位 | 申报情况 | 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的组成部分 |
| --- | --- | --- | --- | --- |
| | 市场收入 | 非法活动 | 未记录收入 | 货币的未观察到的部门 |
| | | C——D | E——F | G——H |
| 总经济收入 | A——B | 合法活动 | 记录收入 | 估计的国民 |
| | 非市场收入 | A——B | A——B | 生产总值（GNP） |
| | | 合法活动 | 归算收入 | G——H |
| | | C——D | E——F | 非货币的未观察 |
| | | 非法活动 | 未记录收入 | 到的部门 |

产生收入的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还可以进一步根据各社会体现在法律地位上的社会传统划分为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法律地位的区分识别出那些根据刑法被认为是非法的产生收入的活动。产生非法收入的活动目前被排除在美国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之外，而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经济组织（UNOECD）的国民核算帐户系统中（联合国，1953 年）却没有区分合法与非法经济活动。

未观察到的经济与经济收入有关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中什么有记录和什么没有记录的问题。如表1.1所示，有记录收入① 包括了绝大部分合法的市场收入和少数特殊的合法的非市场收入部分的归算数。② 这样，全部未记录

收入就包括非法的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的收入。此外，未记录的总收入包括并非有意的逃避了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查核的那部分合法市场收入(表1.1上部CD—EF界线处)，也包括合法的非市场收入(在下部CD—EF界线处)，由于对这一部分规模度量有困难，人们习惯地把它排除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之外。

未记录的非法收入在由社会习俗认为是非法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中产生。在美国，此类商品包括毒品、色情制品；此类服务包括卖淫和放高利贷。实际上，这类非法活动并不列入核算帐户之内，除非某些非法活动的收入可能夹杂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的数据来源之中。

总经济收入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未记录的合法市场收入。合法地产生的收入之所以能逃脱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的度量，是由于后者的估算程序和数据来源存在缺陷。因为把非法收入与非市场收入排斥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之外是由于习惯而不是无意疏漏，所以我们保留"未记录收入"这个术语来指那些根据目前核算习惯应该纳入而没有纳入核算帐户的合法市场收入。

## 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由税法规定的，包括在国家税基内的那些"收入"来源定义。一方面，财政收入是比总经济收入范围更广的概念，因为它除了包括来自当前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收入

外，还包括资产增值价值的变现。另一方面，它又是比总经济收入狭窄的概念，因为经济收入所包括的某些收入种类完全不在财政范围之内。尽管家庭生产产品被合理地认为是总经济收入的一部分，但大部分非市场家庭产品却没有包括在财政收入范围内。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即财政收入也可能排除特别地列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的项目③。

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财政立法决定的，而不是由稀缺商品和劳务的当前生产的经济准则来决定的。如表1.2所示，一个国家的潜在所得税税基(包括总经济收入和实现的资本利得)可以合理地细分为应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在美国，应税收入包括非法经济活动所得的收入。

**表1.2 财政收入分类框架**(个人所得税)

| 潜在税基 | 法律分类 | 申报情况 | 有效税基 | 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关系 |
|---|---|---|---|---|
| | 不征税收入 | 合法的未申报收入 | 避税 | |
| | I——J | I——J | I——J | O——P |
| | | | 逃税 | |
| 总经济收入 | 应税收入 | 未申报收入 | M——N | |
| | | K——L | 经过调整的总收入 | 个人收入 |
| | | 申报收入 | | |
| | | | M——N | O——P |
| 资本利得及其他 | I——J | K——L | | |
| | 不征税收入 | 未申报收入 | 逃税 | |
| | | I——J | I——J | |
| | | 合法的未申报收入 | 避税 | |

表1.2中的几条IJ线规定在个人有在应税与不征税部门间转移他们经济活动的合法决定权的范围内的避税界线。合法和非法活动的应税收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申报收入和未申

报收入。从申报的应税收入部门转移到未申报的应税收入部门(跨过KL线),就构成了逃税的一种形式，即少报合法或非法的应税收入。第二种逃税根源产生于多报收入中的可减免部分。欺骗地多报收入中的这个调整部分是绝对的逃税。另一方面，由引起税收的在商品和劳务上的支出所形成的允许的税收减免，是一种合法的避税形式。这种微妙的区别，导致另一个新词汇“躲避”(Aviosion)，被用来描述对全部申报收入进行调整的值得怀疑的做法。

联邦所得税的有效的税基(在减免前)，一般认为，就是调整后的总收入(AGI)。调整后总收入是纳税申报表申报的全部应税收入减除收入调整后的总数。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未观察到的收入就是“未申报收入”，即为征收联邦所得税财政法规规定应申报的收入和实际申报收入的差额。还需要重视由于少报州和地方税收引起的未申报收入和支出的问题。由于根本就没有对州和地方税收少报数额进行研究,“未申报收入”一词经常用来指少报的联邦所得税。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未申报收入”与“逃税”不是同义语，因为逃税也包括多报税收减免。再者,未申报收入与未记录收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事实上少报联邦应税收入，而后者则是低估经济总收入的一种反映。

## 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与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当把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作为记录在像国民收入和生产核

算帐户那样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框架的全部测度的经济活动考虑时，它的主体就是产生收入的市场活动，这种活动利用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

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在生产和分配商品与劳务的过程中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市场部门；第二部分是非货币部门，在这个部门里，生产真正的商品和劳务，但它们不是由生产单位(即家庭)直接消费，就是通过易货方式作非正式交换。

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部门包括非法生产的商品与劳务的产量，因为根据核算传统，这些商品和劳务不包括在标准的核算帐户内。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部门包括范围广泛的产生合法收入的经济活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未适当地收录在社会核算系统中。这类活动包括全部获得但没有全部记录在国民收入帐户中的收入。就财政信息是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数据的重要来源而言，未向财政当局申报的收入必然同样会导致对经济收入的低估。不申报或不确切地申报收入信息的动机，可以认为包括逃税、逃避管制、逃避执行成本，或对政府的不信任。

最后，任何一个社会核算帐户系统的精确性和全面性，不管它的设计是否精巧，都有赖于申报单位的诚实与合作。不管这种合作是否被任何管理系统所固有的经济刺激所侵蚀，或被社会上日益摈弃法律和社会价值的恶习所侵蚀。遵纪守法意识不断降低的首要受害者就是社会数据库。

未观察到经济部门中非货币部门，包括那些生产真正产品的家庭、企业和自愿社团的重要经济活动。这些产品进行物物交换，由于习俗和不充分的数据，它们大多被排除在传

统的收入核算帐户之外。

不对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或非货币部分作经济分析，在社会流行但没有根据的观念中，被认为是合理的。一般以为，货币部分的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可以忽略不计。非货币部分数量虽大，但被认为在观察到的收入中是一个稳定的部分。可是，如果在观察到经济部门和未观察到经济之间周期性和长期性的转移与观察到经济部门中政府和私人经济活动之间的转移相比相当大的话，那末，它们在概念上的省略就会削弱宏观经济理论的预见能力了。

为了证明未观察到经济的潜在重要性，对一个假设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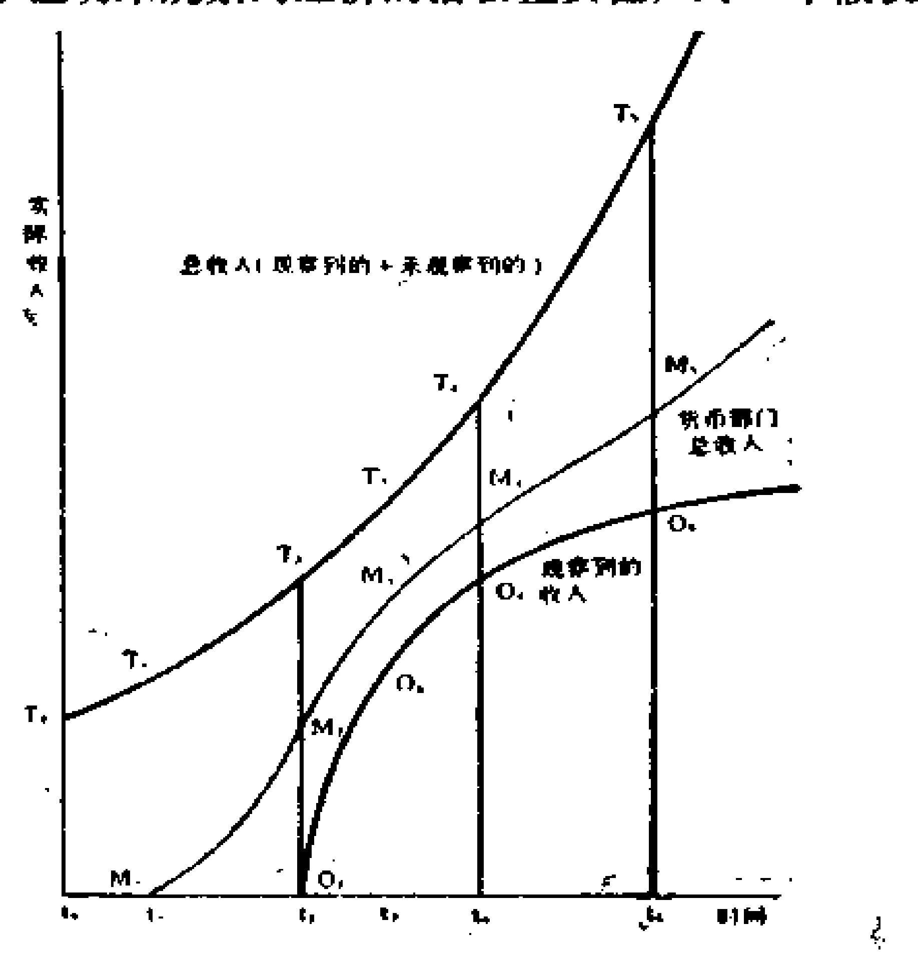



图1.1 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部门之间的假设关系

中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经济之间的，在它从自然经济发展为现代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的长期关系进行描述是有益的。为简略起见，假定私人总的实际经济收入（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在长时间内按不变的比率增加，因此暂时舍象对技术发明、自然和政治灾难（如饥荒或战争）、商业周期、反周期政策和由资源转移产生的效率提高的注意。每一个这类因素都可以引入分析，但这样做会使分析复杂化。

这个假想社会中的私人实际总收入在图1.1中用$T_0$—$T_5$来表示，它表示个人实际收入按不变的比率不受干扰地增长。这个经济以$t_0$为起点，这时，它的全部实际收入等于$T_0$。在$t_0$—$t_1$这个时期，整个经济由未观察到的非市场和非货币部门构成。在时间$t_1$，同时出现了有组织市场和货币交易媒介这两种社会新事物。假如这两个重要的社会新事物具有固有的信息和配置效率，我们可以预期资源从非货币部门到货币部门的大量转移，因此，货币部门的增长（在图1.1中用$M_1$—$M_2$来表示）会超过整个经济的增长。

在时间$t_2$上，我们引入一位社会科学家，一位懂得度量经济活动各种程序的观察家。这位观察者规定她自身的任务是去测度货币化了的合法市场部门的（$M_2$—$M_5$）。要求对$T_2$—$T_3$这个历史时期进行几次观察，以表明它的特性。我们假定已经达到特定成熟状态的货币化私人部门，开始碰到报酬减少和过去的增长速度开始变缓的问题。终于，这个部门产生诸如污染、信息超载和经济上不平等诸种外部效应，这些效应危害社会机体。就在此期间，在物质和法律基础设施、国防、教育及对收入再分配等需求的刺激下，我们可以预期政府辅助部门有更快的发展。政府部门为了满足“公共

产品"的需求和使某些私人货币部门的外部效应内在化，越来越依赖于征税和管制，将它们作为调度必需资源的工具。这样，报酬的不断减少和政府部门对资源的竞争性需要这两方面的原因，使私人货币经济初期阶段的快速增长减缓下来。

当我们用更多的资源去改进和拓宽社会测度系统时，我们可以预期"观察到的经济部门"的增长 $O_2$—$O_3$ 将超过私人货币部门和全部私人经济部门的增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可预期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通过 $O_2$—$O_3$ 与 $M_2$—$M_3$ 之间的垂直距离来测定）比较观察到的货币部门将相对地缩小。同样，未观察到的非货币部门（由 $M_2$—$M_3$ 和 $T_2$—$T_3$ 之间的垂直距离来测定）比较观察到的部门也相对缩小。相反，观察到部门比较经济中全部私人收入将相对增长。

发展经济文献把这一疾速增长的阶段称为"起飞阶段"。可是，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审慎地意识到，这种察觉的增长部分是统计方面的幻觉，它反映的是度量系统的改善，而不是整个经济的增长。

我们假设的 $t_3$—$t_4$ 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有意思，因为，在此阶段里，经济中观察到的部门与全部私人货币部门和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十分接近。观察到的部门永远不会与私人货币部门相一致，因为传统对后者不作全面测度。更有意义的是，任何完全的社会测度系统都会受系统（它必须依赖于自愿申报单位的诚实与可靠）所固有的局限性干扰。由于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由观察到的部门描绘全部经济活动的精确特征，所以在社会科学家看来，它是一个理想的观察年代。就在这个阶段，本身基于事实观察的设计巧妙的经济理论和模型，在解

释和预测经济行为方面获得了最大的机会。就本质而言，对宏观经济事件的解释和预测，将不受大量没有认识到的在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转移的影响，只要未观察到部门与观察到部门大致保持比例，以一定精确性信息信号为根据的政府决策，有最大机会达到稳定的目标。不幸的是，观察到的事实与潜在现实的偶然联系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

在随后的阶段（$t_4$—$t_5$）中，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假定增长造成了未观察到经济部门与观察到经济部门增长率之间的背离。在此阶段，高度发达社会中的观察者，将遇到发展中经济的观察者面临的问题的镜象。那就是未观察到部门比观察到部门增长。

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许多官方价格人为地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促使官方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东欧国家特征的那种短缺。许多这类国家出现价格与工资由市场决定的“第二”经济或“平行”经济，这些价格和工资比国家部门高。这种价格差距提供刺激，诱导资源流向未观察到的部门。同样，在市场主导的经济中，政府通过税收获得资源，用以供应公共消费品和财富再分配。税收导致经济活动向未观察到的部门转移。把资源转入未观察到的非货币部门，能够合法地逃避税收和管制。这里人们将期望出现“自己动手”的经济活动。人们还能期望作为“黑市”经济一部分的非法少报和不报应纳税货币收入的行为的增加。

如果许多发达经济就是在这种情况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未观察到经济部门比观察到经济部门相对扩大的时代，那么，由此引出的将是怎样一些情况呢？首先，我们的传统经济指标显示的将是经济事务实况的越来越扭曲的形象，官方统计

数字即使在全部经济仍按其正常的速度增长时，也会显示出较实际产量更慢的增长速率。

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官方价格统计将低报实际价格水平。而市场主导经济将会出现超过实际价格水平的官方价格指数。如果未观察到部门增长速度很快，使观察到部门的就业者寻找未登记的第二职业，如果低报的产出比投入的减少更快，官方度量的生产率也将下降。在有慷慨的失业者津贴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在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在未观察到部门找到了另一份工作的时候，官方的失业统计会暂时膨胀起来。

宏观经济预测往往出现有规则的偏离：过高地估计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和过低地估计价格。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和政策制订者的决策，不管如何合理，都将基于不真实的经济信号之上，结果，经济上的失调会被当作经济灾难看待。

对我们自己经济的这些推测是否贴切，完全决定于经验问题，那就是，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如果这个部门确实存在，怎样去测量它？如果它一直在增长，它会在增加过程后面留下些什么痕迹？

## 度量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方法问题

试图度量一种它的存在不愿被人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努力，必然会遇到复杂的概念上和事实上的困难。所有对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的规模和增长的估计都可能包含大量的错

误。看来，有必要建立某些方法上的准则，来衡量观察者认为合理的证据，使估计现象的误差限于可以容忍的程度内。任何研究策略都必须充分广泛，能够包含不同社会科学中可利用的实证材料。这些实证材料可能是关于性质的，或者是关于数量的，也可能是散见的事实。由于很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去度量未观察到部门的不同方面，所以估计的种种结果必须按照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调整。

研究者可以获得三种主要的信息，每一种对研究都有重要作用。第一种，大量的富有启发性的逸事信息，这些信息很难用现代数量方法的系统程序进行分析。但是这类"制度"信息非常合适作为定性的指南，来估计研究中的现象的发生频率和性质。制度逸事信息为调查提供必要的出发点。它能提出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并把研究引向有关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来源与过程。

第二种信息系统地利用收集到的微观观察资料，这些观察资料来自个人调查、纳税税率、失业登记或其他类似的信息源。微观数据方法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产生能说明分配问题的非加总信息，对征税那样的行政目标也有价值。微观估计方法，花钱不少，但往往被用以对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规模进行估计而不是对这个部门的增长作时间估计。微观方法不能追踪未观察到经济部门的时间发展，妨碍了使用这种方法去发现这类现象的时间原因和后果。微观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典型地依赖的不自愿的观察方法，可能损害收集的资料质量。被调查者竭力想隐瞒信息的动机会损害观察者和资料收集者得到信息的真实性。人们为逃避管制和税收有可能伪造业务和税收记录。调查研究过程，会碰到大量不回答问题

和自由选择偏向的干扰。

微观调查的结果还可能对用于被询问者的方法十分敏感。国内税务局（IRS，1980）对纳税人有关逃税的意见的一次调查中，使用了直接询问（保证不公开姓名）和随机反应技术，结果发现随机反应产生的逃税估计数在某些问题上要比直接询问方式高62—433%。

另外一个供选择的度量方法是依赖宏观经济资料来源。宏观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使用公布的资料来源，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与对未观察到经济的研究无关。由于这些资料是用自愿方法得到的，所以不能怀疑是被调查者有意扭曲的材料。这样的方法做起来比较省钱，而且得到的资料能提供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增长的估计数字。所有的宏观方法都依赖于货币总量，收集这些资料的目标与研究未观察到经济活动无关。宏观方法需要作出明确的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才能提供未观察到经济的估计数字。任何一种宏观方法的可靠性都依赖于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是估计程序的基础，最后决定估计数字解释其他宏观经济异常现象的能力。

如果确定未观察到经济部门数量的任何努力都具有内在困难的话，最好把测定它们的各种方法看作是相互补充的、能洞察问题不同方面的方法。

## 度量未观察到的非货币经济部门

得到经济中非货币部门（主要指家庭生产的非市场商品

和劳务)估计数字的做法上的困难，阻碍了把这个部门纳入传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有几个国家已经应用时间预算调查去确定家庭成员在不同形式家庭生产中消耗的时间。夏多(Chadeau)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调查，估计未支付家庭生产量的货币价值。这些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找到一种适当的估值方法。最广泛采用的两种估值方法是机会成本方法和市场成本方法。机会成本方法试图去测量由于在家里进行生产活动导致的市场收入的减少量；而市场成本法有以相应的市场工资率(即外界工人受雇进行那种生产活动应付的工资)来估量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这样得到的估计数字的正确性对于所使用的特定估价方法和家庭生产活动所包括的范围十分敏感。全部估计数约占有记录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50%，但是，在不同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估值方法来计算时，这一区间会大大缩小。墨菲(Murphu)(1978、1982)指出，在美国，非市场部门约占市场经济的37—51%。对家庭生产规模的短期估计，还产生与家庭生产长期趋势有关的可以确信的证据。墨菲对美国的研究揭示，在1960年和1970年之间，这个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但在1970和1976年间又上升了。

## 度量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部门

在度量所谓“地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提出过各种不同方法。当把这些不同方法的结果不加区别地堆积在一起时，

它们会使我们产生估计的区域非常宽泛这样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印象。判定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经验证据一致性的主要困难是，如何用不同方法度量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不同部分。对精确度量的东西的研究，常常是含糊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经验文献，不能清晰地确定用不同技术度量的是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哪个特定方面。一旦恰当地理解不同方法度量的是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不同部分，用不同方法产生的估计结果就会比乍一看时更加一致。某些方法试图对未记录收入进行估计，另一些估计未申报的收入，还有一些方法估计未记录的交易。有关未观察收入不同概念之间的复杂的概念和经验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卡森（Carson）（1984）、帕克（Parker）（1984）和法伊格（Feige）（1985a）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论述。

在报导的估计中出现变化的第二个原因，产生于不同估计程序所需的不同假设。由不同假设引起的变化范围，可以通过敏感度分析来检验。由于已经评述了估计未观察到货币经济活动的不同方法，所以，现在需要特别注意正在被度量的东西和为得到特定估计应使用什么样的假设。最后，各种估计间的某些差异是由于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和选择不同的时间阶段造成的。

## 差异法

差异法是一种广泛使用于估计未观察到收入的特定组成

部分的方法。不论何时，只要存在估计同一概念实体的独立手段，差异方法就都是可行的。如果一个度量特定形式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程序被认为能相对地避免那个活动导致的偏差，同时已知的另一个程序受到那个活动的影响而产生了偏差，那么这两个程序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用来度量那个未观察到活动的"净"效果。实际上，在解释差异法时必须特别谨慎。最为典型的是，它不能用来度量未观察到经济部门的规模。两种度量手段之间可观察的差异，常常反映这两种度量手段意欲估计的东西在概念上的差别。进而言之，如果两种程序受到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末差异法只能度量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别，而不能度量未观察到部门的绝对量。最普通的差异方法将分别地加以考察，以便突出说明每一种度量手段所获得的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不同方面。

## 国民核算帐差异度量：未记录收入

国民收入核算帐的收入与支出方面可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进行典型的估计。核算帐收支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是采用相对独立的方法度量的。麦卡菲（Macafee）（1980）提出，国民收入支出方面的估计数和国民收入收入方面的估计数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估计未记录经济部门的规模。如果说个人更可能谎报他们的收入而较少可能谎报他们的支出的话，那么用这样一种方法就可以获得核算帐两方面谎报数的净差距，这种差距不应解释为度量未记录收入规模的手段，因为核算

帐的两方面都可能过低报导经济活动。

有可能在核算帐两方面发现的原始差异很少公布出来。当相当大的原始差异在实际中真的出现时，通常就修正核算帐来减少这种差异(第7章)。最终的报导差异，被称为“统计差异”，它作为未记录的经济活动的估计数没有多少价值。

弗雷(Frey)和蓬梅朗(Pommerehne)(1982，第9页)展示了一份国民收入度量方法的差别未加说明的图表，他们称之为“根据国民收入估计的地下经济的规模”(第8页)，报导的估计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2.2%。低的这个估计数事实上就是由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收支两边独立估计数产生的差异。充其量，这些估计数只是未记录收入中的一小部分。高的这个估计数指的是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中的收入度量数与纳税申报表中报告的收入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未申报收入中的一个部分的估计数。没有一个报导的估计数能度量地下经济的规模，因为每一个报导的估计数度量一个不同的收入概念，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

正如下一节将阐明的，有可能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度量的个人收入与国内税务局度量的在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中宣布的应税收入，即调整后的总收入之间进行调整。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中的个人收入度量必须首先对包括在不必向税务机关申报的个人收入内的所有收入项目进行调整。它还必须对那些不包括在个人收入中但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所有项目作进一步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反映基于应该向国内税务局申报的调整后总收入估计量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内调整后总收入的估计数和向国内税务局申报的实际调整后总收入之间的差额，叫做“调整后总收入差额”(AGI gap)。

## 调整后总收入差额差异度量：未申报收入

调整后总收入差额表示试图估计未申报收入的一种审慎建立的差异度量方法。调整后总收入差额是在下列情况下对未申报财政收入的一种概念上恰当的估计。

1．个人收入(PI)被精确地度量，也就是不存在未记录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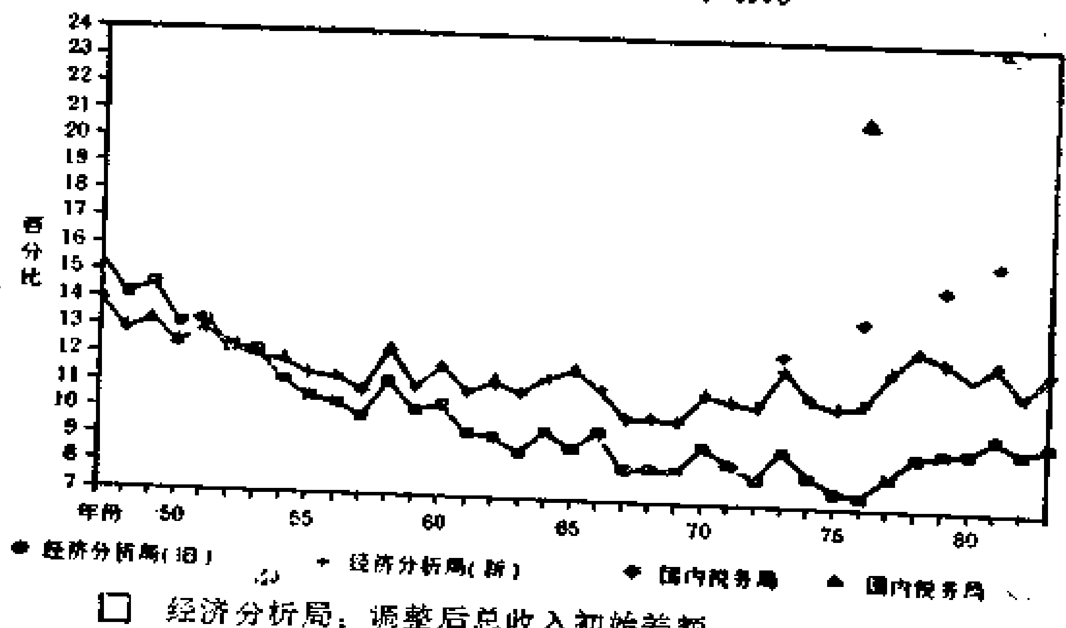
2．经济收入度量PI和财政收入度量AGI之间所有的概念差异，经过正确的调整。④

尽管调整后总收入差额(AGI gap)不大可能对未申报的财政收入作出十分精确的度量(由于使个人收入和调整后总收入做到概念上相容所需要的许多巨大调整项目很难度量)，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与以税收为基础的信息来源之间的概念上的类似与差异更加显著。这些概念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理解少报税收来源信息最终将如何影响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度量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个人收入是极端重要的。

调整后总收入差额度量法最好使用作不遵守联邦所得税申报收入的粗略度量。由于调整后总收入差额没有考虑到其他税收中的低报部分，也没有包括未申报的非法收入(因为这部分没有包括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个人收入估计数中)，所以它会低报未申报总收入。此外，由于其他未记录收入的存在，使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中对个人收入的度量总是偏低，因而调整后总收入差距也将相应地低报未申报收入。调

整后总收入差额在个人收入中包括了那些收入在申报界限以下的人的收入的范围内，可能高报未申报收入。

图1.2显示经济分析局(BEA)初始的调整后总收入差额(BEA：旧)和经过修改的调整后总收入差额(BEA：新)，它们都作为1947—1983年时期报告的调整后总收入百分率。⑤ 初始差额估计数表明，在1947—1976年之间，未申报收入所占的百分比长期下降，之后便上升。经过修正的估计数表明，未申报收入占申报收入的百分比在1947—1969年之间长期下降，而在70年代十年当中长期增加。调整后总收入差额的数量一直向上修正，50年代平均向上调4%，60年代平均上调21%，70年代平均上调36%，到1983年，调整后总收入差额已增至2356.6亿美元。这表明，那年应申报的调整后总收入中有12%或更多没有申报。




□ 经济分析局：调整后总收入初始差额

+ 经济分析局：调整后总收入经过修正后的差额

◇ 国内税务局：申报结果统计　　△ 国内税务局：更改数

**图1.2　未申报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的百分率。**

(几种不同的政府估计数)

图 1.2 也表示了最近国内税务局对未申报收入总数的估计数（IRS）和以国内税务局资料为基础，采用一套不同的假设而得到的估计数字（IRS、Alt）⑥，下文将对国内税务局所采用的方法进行探讨。

## 国内税务局采用的差异法，未申报收入

（古特曼，1977；法伊格，1979）对于公布的未观察到经济部门货币估计数；国内税务局（1979 年）对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低报的范围进行它自己的大规模调查。尽管国内税务局认为它的方法是一种“直接”的方法，可实际上它的方法却是一种差异法、调查法和不同形式的基于微观数据的归算法而成的混合方法。国内税务局为获得未申报总收入最终估计数的组成部分所采用的方法包括：

1. 确定填报者未申报的合法收入的审计研究；

2. 确定未申报者人数和未申报收入的收入归算的确切的社会保障人数对应研究；

3. 以确定未申报非法来源收入数量的犯罪统计资料；

4. 确定“非正式供应者”未申报收入的调查报告。

第一和第二个程序实质上是一种差异分析法。为了确定申报者的未报合法收入，国内税务局分析了由审计人员对抽样申报表分析确定的应申报收入的数量与事实上由纳税人申报的收入数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被经济分析局使用，

用来改进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基于税收资料而确定的估计数。

未填报人的未申报收入通过三步程序来估计。国内税务局首先尝试将目前人口调查得到的调查报告和社会保障总署的行政记录在社会保障人数对应的基础上对应起来，然后把对应研究的记录与国内税务局总申报表中的社会救济人数进行比较，对得上的记录产生一连串填报人，而对不上的记录表明调查记录属于潜在的大量未填报人，可以把这批人归类为"违法的未填报人"和"合法的未填报人"，区分他们的标志是，他们的估算收入是超过还是不到申报的界限。总的未填报人未申报收入估计数可以从违法未填报人记录的研究资料中估算出来。1972 年，国内税务局估计约有 500 万违法的未填报人，他们的未申报收入据说可以从他们的调查答案中看出来。

未申报的非法收入是以消费或销售非法商品和劳务为基础估算出来的，而非法商品和劳务又是通过各种犯罪统计资料估计的。最后，国内税务局称为"非正式供应者"的收入是从调查报告中获得的。

最早国内税务局研究（1979）的结论说，1976 年有 750 亿到 1000 亿美元的合法来源收入没有恰当列入个人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中，由此造成政府税收损失在 128 亿到 171 亿美元之间。另外还有 253 亿到 352 亿非法来源收入估计没有申报，这使税收损失增加63亿—88亿。随后国内税务局（1983）的报告说，未申报的 1976 年合法来源收入提高到 1316 亿美元，由未报合法收入产生的税收损失超过原来估计数一倍以上，达到392亿美元。另一方面，这项研究把非法来源收入的估

计数减少到134亿美元，从而把相应的税收损失估计数减少为38亿美元。国内税务局第二次研究的结论是，到1981年，联邦所得税未申报收入总数达到28.30亿美元，占已申报的调整后总收入的16%。⑦ 国内税务局第二次研究报告中较高的未申报收入估计数，要求经济分析局（1985）对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进行全面修正。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的修正结果，把1984年个人收入的估计数提高1000亿美元。这一修正反映了经济分析局使用错误的税收来源报告所引起的过去未记录收入。

国内税务局对未申报收入总数最后估计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有大量假设。国内税务局计算程序的复杂性和它们某些基本数据的保密性使得保证它们最后结果的可靠性变得十分困难。但是有理由相信，国内税务局的估计数字偏低，其最后估计结果对某些关键性的特定假设极为敏感。

国内税务局的最早研究（1979）假定由对样本申报表认真审计而获得的未申报收入数量反映了未申报合法收入的准确数量。当这一假设受到挑战时，国内税务局就审查其审计程序的可靠性，将审计人员通过特定的税收申报表查到的未申报收入同来自向国内税务局独立地填报申报报告的收入支付者的数据进行比较。这种程序说明，深入的审计平均能查到的仅占报告表揭露的每美元未申报收入的23美分。基于这些发现，国内税务局武断地把各种收入的最早审核估计数扩大3.5倍。在国内税务局的程序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是，他们假定，审计人员在审查报表所包括的未申报收入，诸如工资、薪金、利息和股息和他们在检查报表未包括的收入，如小业主和小商人的收入时，取得了同样成功。由于审

计人员仅能检查到前一组收入中的(有文件记录的)每一美元未申报收入中的23美分,所以看来合理的是,审计人员对后一组收入能检查到的比例更小,因为后一组收入中,纳税人知道,国内税务局没有作为单独核对他们申报的精确性填写的单独的资料报表。

1986年,法伊格的一项敏感性分析表明,如果国内税务局使用了它的包括在资料报表中的收入的实际审计发现,但又假定,审计人员仅能检查到未包括在资料报表中的小业主和小商人每一美元未申报收入中的10美分,那么这种假设条件的变化就会大大地增加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量。正如图表1.2所示,上文所说的另一组假设(标为IRS:Alt)将1981年估计的未申报收入,从占调整后总收入的16%提高到24%左右。

相同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国内税务局研究的其他方面。未填报者的收入用家庭调查报告估算。国内税务局(1983,第75页)承认,"那些没有向国内税务局申报收入的人,在向对他们进行家庭调查的人员申报收入时心存顾虑,这是很可能的"。可是,国内税务局继续这样假设,即在家庭调查过程中,所有收入得到了正确的申报,不管这些个人是否已向税务机关申报了他们的收入。同样,国内税务局假设,"非正式供应者"也向调查者充分地申报了他们的真实收入。

国内税务局对非法收入的估计也依赖于对下列这些事情的具体假设,如每单位的卷烟中大麻的平均含量,零售可卡因的纯度,出售给大量使用毒品的人的实际零售价格折扣等。这些假定中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就能够导致对非法来源收入最后估计数的巨大变化。

总之，国内税务局所谓的估计未申报收入的“直接”估计法，事实上是一种间接的测估方法，其中包含大量的不可靠的假设。敏感度分析发现，在某一些关键性的假设上，有可能发生的变化，会使国内税务局实际报告的估计数字翻上一番。国内税务局研究的可信度依赖其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执行有关审计估价和处罚措施的行政政策是有用的。

## 政府估计总结

图1.3是美国1981年未申报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百分比的不同度量结果的一个概要。估计数的全距占调整后国民收入的12%—24%，金额在2170亿到4220亿美元之间。高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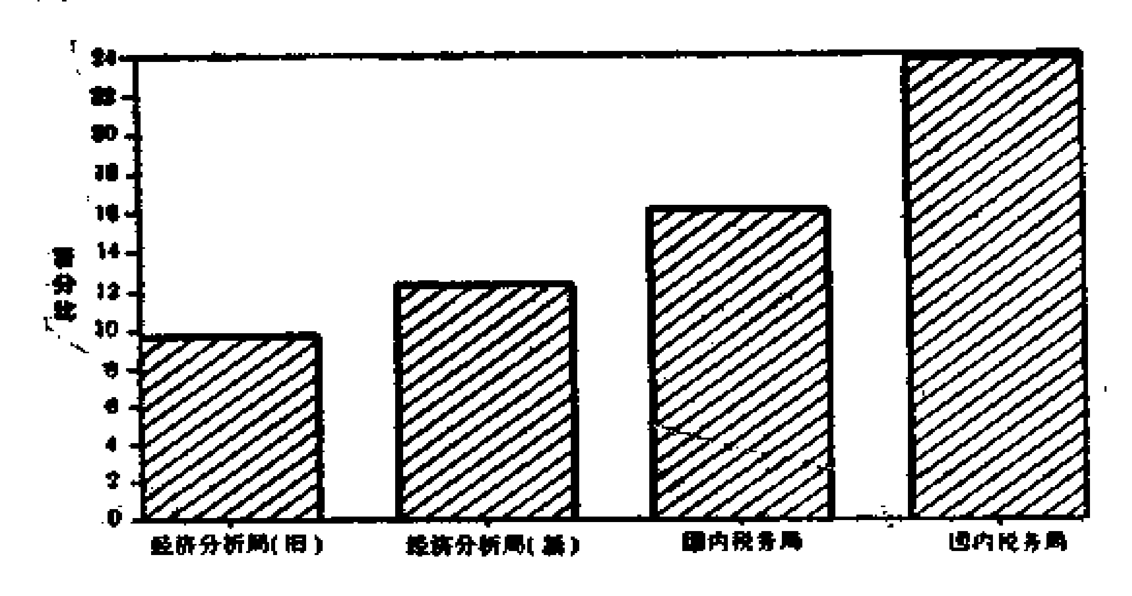



图1.3 未申报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的百分比率。
1981 年的政府估计数(不同估计数)

计数基于有关国内税务局根据审计程序决定未申报合法收入量的一套可供选择的假设条件作出。如果全部估计的未申报收入确切地向国内税务局申报，由此带来的年税收收入在700亿到135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本来可以消除该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这种结果表明，不遵守税法可能是解释发生预算赤字的主要因素。

未申报收入估计数对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的正确性关系密切。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估计有记录的收入依靠的是税收资料。对未申报收入数的较高估计，将要求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进一步向上修正。

## 现金比率度量

对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的关心最初是由与流通货币数量和它的票面结构有关的一些明显的异常情况引起的。尽管经济学家预言，信用卡和其他一些金融新手段的出现将最终带来一个"无现金社会"，但是，人均持有的现金量却在增长而不是下降，到1986年，已超过了950美元。更有甚者，国家发行价值的40%以上是票面额100美元的大钞。在过去的20年里，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也显示出了大幅度的增长。

当个人希望不让税务机关知道时，都认为使用现金购买商品与劳务比使用支票有更多的优点。因此可以把现金存量和支付的增加，看作是这些可能未向政府机构申报的交易的量的一个粗略的指示器。

最为流行的估计未观察到货币经济的一种方法是简单的现金比率法。这一方法最先由卡甘(Cagan)在1958年采用，他试图以此方法去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未申报收入。后来，1977年，卡甘的这个方法被古特曼使用，他估计1976年美国的“隐蔽经济”，几乎占该年度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个简单的现金比率方法($C/D$)现在已被许多国家应用，作为“地下经济”规模的主要近似值。下文，将对现金比率法和用这个方法得到的不同结果进行再查考。为了检验现金比率法的有效性，建立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是有帮助的，使用这个模型，可以显示出迄今使用的所有的现金比率法都属于特殊情况。设：

$C$ = 实际的现金存量

$D$ = 实际的活期存款存量

$Y_o$ = 观察到的收入

$u$ = 写在字母右下角，指未观察到部门

$O$ = 写在字母右下角，指“观察到”部门

$K_o$ = 观察到部门中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

$K_u$ = 未观察到部门中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

$V_u$ = 未观察到部门收入的周转速度

$V_o$ = 观察到部门收入的周转速度

当分析的目标在于用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去估计未申报收入时，观察到收入恰当的经验性对应物便是调整后总收入。当分析的目标在于未记录收入时，分析须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总计数为基础，因为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总计数对非货币归算值和对已经包括在已记录总帐内的归算值(它纠正由于少报的税源资料引起的疏漏)作了恰当的调整。当把国

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总计数(如国民生产总值)在上述模型中用作已申报收入的代表时，其结果不可能解释为未申报收入估计数或违背税法收入的估计数。要作这样的解释，需要对税基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复杂关系附加详细的说明。

下面报道的估计数使用现金比率法的一个变体得出未申报收入和估计数，因而它们所使用调整后总收入的估计数字作为观察到部门的经验性对应物，将调整后总收入作为收入变量来使用，就有可能在现金比率估计数和政府机构对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之间进行直接比较。

一个一般的现金比率模型包括下列条件：

$$C = C_u + C_o \tag{1}$$

$$D = D_u + D_o \tag{2}$$

$$K_o = C_o + D_o \tag{3}$$

$$K_u = C_u / D_u \tag{4}$$

$$V_o = Y_o / (C_o + D_o) \tag{5}$$

$$V_u = Y_u / (C_u + D_u) \tag{6}$$

$$\beta = V_o / V_u \tag{7}$$

(1) 式和 (2) 式实际将现金存量和活期存款⑧分解为未申报收入部分和已申报收入部分。(3) 式和 (4) 式是 $K_o$ 项和 $K_u$ 项的定义，这两项可以看作函数，也可以看作常数。同样，式 (5) 和式 (6) 定义两个部门中的收入周转速度。为求解 $Y_u$ 这一项，我们必须使用模型中观察得到的变量，$C$、$D$ 和 $Y_o$，对 (6) 式估值，经过对各项代换和重新整理，得到 $Y_u$ 的一般解：

$$Y_u = \frac{1}{\beta} Y_o \frac{(K_u + 1)(C - K_o D)}{(K_o + 1)(K_u D - C)} \tag{8}$$

等式 (8) 将未申报收入部门作为观察到的变量 $Y_o$、$C$、$D$ 和三个参数(或函数) $\beta$、$K_u$ 和 $K_o$ 的函数。

## 简单的现金比率法

简单的现金比率法应用下列限制性假设：

1. 在未申报交易中，现金是唯一的交易媒介 ($D_u \to 0$; $K_u \to \infty$)。

2. 除了由未申报收入增加引起的变化外，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保持不变 ($K_o$ 不随时间变化)。

3. 未申报部门 1 美元现金交易产生的未申报收入数量等于已申报经济中 1 美元现金交易产生的申报收入数量。

假设 1 隐含未申报交易永远不用支票支付，因此 $K_u$ 趋于无穷大。假设 2 断定 $K_o$ 在本期是固定不变的。假设 3 意指 $\beta = 1$，对等式 (8) 中显示的一般模型施加上述限定条件，导出下面这一约束形式：

$$Y_u = Y_o \frac{(C - K_o D)}{(K_o + 1) D} \tag{9}$$

这就是简单的现金比率法的数学表达式。

等式 (8) 和等式 (9) 揭示了 $C/D$ 法理论上的缺陷，该方法是作为估计未登记收入的方法而使用的。观察到的收入，如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归算收入部分(在税源数据中是未申报收入)测算上的任何改进，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未登记收入部分估计的幅度，都会遗漏未登记收入与不受这种改进影响的

登记收入的估计比率。这种差额原则上可通过减少未登记收入的金额消除掉。未登记收入可从等式 (8) 和等式 (9)[②] 两边的登记收入中归算得到。这结果就表示未登记收入的一个恰当的量度。由于在编制调整后总收入 (AGI) 数列的过程中，未申报收入中不包括归算收入部分，所以，当使用 $C/D$ 方法来估计未登记收入时，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即使对一个简单的 $C/D$ 方法进行经验性的实施，也需要对 $K_o$ 进行测估。古特曼 (Gutmann) (1977) 继卡甘 (Cagan) (1958) 之后，认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 $K_o$ 可以通过现金与活期存款的实际比率近似地估算出来。这一方法被下列事实证明是合理的：即在实行所得税之前，对未申报的交易的刺激为零。因而，这时不存在未申报经济。按此假设。根据下式 $K_o$ 大致为：

$$K_o = \left(\frac{C_o}{D_o}\right)_{1940} = \left(\frac{C}{D}\right)_{1940} \tag{10}$$

如果进一步假定，在一般时间内 $K_o$ 是固定不变的，那末，根据等式 (9) 和 (10) 及下列一组约束条件，就有可能推导出1940—1982年之间这段时间内的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

$$\begin{array}{ll} \text{(i)} & K_{ot} = K_o(1940) \quad (\text{对所有}t) \\ \text{(ii)} & K_u \longrightarrow \infty \\ \text{(iii)} & \beta = 1 \end{array} \tag{11}$$

由此得到的估计数见图 1.4 并用 $C$：40 标示。这一最简单的估计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申报收入对申报收入的比率大大上升了，上升到占申报收入的 12% 以上。此后，在战后期间，$Y_u/Y_o$ 下降了，1960 年跌至最低点，约占申报收入的 3%。这一比率在1973 年之前是逐渐上升的，之

后，又是加速增长的势头，1984 年估计达到申报收入的15.8%。

## 现金比率法的敏感度分析

由于简单的现金比率法所采用的每一个限制性假设，已受到广泛的批评，因此考察最终结果对放宽以下每一个假设的敏感度是十分有用的。

我们首先考察可供选择的假设 (11*i*)，它将1940年作为测估数 $K_o$ 的基准年。原则上讲，任何年度，只要存在一个独立的 $Y_u/Y_o$ 的估计数 $\alpha$，都可以作为现金比率法的基年。给定任一 $\alpha_t$，就可以对等式 (9) 求解 $K_{ot}$，以及采用一个新的基准年以得到一个可供选择的未申报收入的时间路线。

$$K_{ot}=\frac{C_t-\alpha_t D_t}{\alpha_t+D_t} \tag{12}$$

图1.4显示了当国内税务局将1976年$\alpha$的估计数作为基准时未申报收入估计数的时间路线 ($C$:76)。这种调整的作用是，按比例地增加了这一简单估计数，该估计数假定在1940年不存在未申报收入。

对这一基本方法的第二种修正是，取消这样的假设，即现金是未申报交易中的唯一的交换中介。斯密斯等人(1982)对非正规的"供给"作了考察，发现家庭中的修理和食物采购这些非正规购买行为只有50%是用现金支付的，估计约25—30%的其他非正规劳务是通过非现金支付形式进行的。国内

税务局（1979，p. 13）发现，低报利息和股息收入说明，"未申报收入问题已经超出用现金支付收入的范围"。现有的证据已不足以确定用现金支付的未申报收入的确切比例，但是，有理由假设，约有25—30%的支付是用支票进行的。下面的计算假定，约有75%的总未申报收入有用现金支付的，这样，$K_u \approx 3$[30]。如果现金支付仅占未申报收入的三分之二，那末$K_u \approx 2$。对$K_u$给定任何基准点和任何值，就可求解等式(8)去确定$K_{ot}$的恰当的值。得到的表达式将包括参数$\beta$。这样，未申报收入的最终估计数就取决于为这些关键参数选定的特定值。一般的现金模型就能够被用来放宽在简单模型中包含的限制性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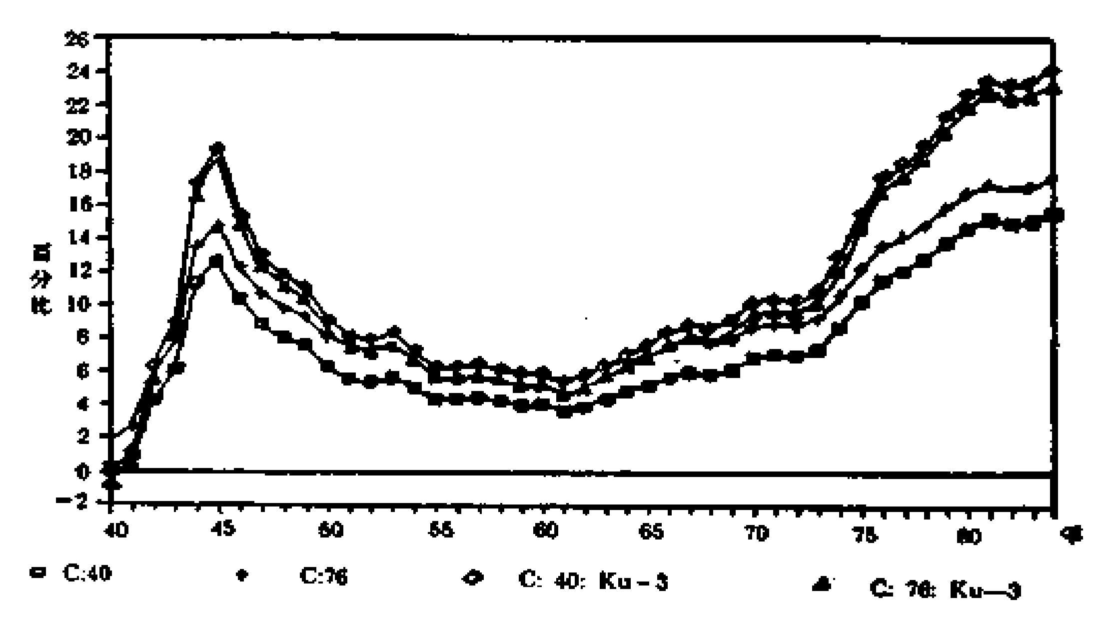



**图 1.4 简单现金比率模型测估结果**
**未申报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的百分比**

图 1.4 显示当$K_u = 3$时，针对两个基准时间即最初的1940年($C$：40，$K_u = 3$)和国内税务局定的1976年($C$：76，$K_u = 3$)得到的估计数。放松最初的时间基准假设以及现金是

唯一的交换媒介，假设事实上已使1984年估计的未申报收入几乎达到已申报收入的24%。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自从1960年以来，未申报收入的增长远远快于在更为严格的限定条件下的实证假设。

上述结果仍然保持$\beta=1$这一假设，即，已申报或未申报收入的收入周转速度是相同的，如果未申报收入大部分集中在服务性行业，这一行业就要求比较少的中介性交易，$\beta$有可能小于1。另一方面，未申报收入较低的消费倾向意味着$\beta>1$。如果$\beta<1$，上述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就过低了，如果$\beta>1$，则过高了。

在上述关于现金比率模型的模拟中假设，对$K_o$的基准估计数是固定不变的，根据卡甘1958年最初关于现金比率的研究，$K_o$也可被看作是其他经济变量的一个稳定的函数。这一函数可以通过常规的计量经济方法进行估计。坦齐(Tanzi，1982，1983)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一种变种，放宽了$K_{ot}$的约束条件，假设$K_{ot}$是不变的，但包含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现金是未申报交易的唯一交换中介，即$K_u\to 0$。根据后一种假设，观察到的$C/D$可由下式确定：

$$\frac{C}{D}=\frac{C_o}{D_o}+\frac{C_u}{D_o}=K_o+\frac{C_u}{D}+\frac{C_u}{D}$$
$$=f_1(y,r,ws)+f_2(\tau) \quad (13)$$

这里，$y=$申报收入

$r=$利息率

$ws=$工资和薪金在收入中所占份额

$\tau=$平均实际边际税率

可以通过估计等式(13)来获得关于$C/D$的预测；于是关

于 $K_0$ 的时间数列估计数也可通过设定税率等于零而获得。坦齐的研究方法依赖于如下假设：(1) 未申报收入唯一地取决于税率，并且在税率为零的情况下，需要对现金的持有量作出估计。

图 1.5 显示了坦齐关于地下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百分比的估计数，在坦齐模型中，允许 $K_0$ 一段时间内有所变化。坦齐报告的估计数大大地低于前述所有模型中所获得的数字。阿恰亚(Acharya,1984)、法伊格(Feige,1986c)、波特和拜尔(Bayer)(第 5 章)都各自对坦齐的方法提出了概念上的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相反观点。托马斯(Thomas, 1986, p. 788)总结道："坦齐就 1930—1980 年情况提出的似乎明显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其实是根据 1930—1945 年间重要的静态关系人为构造的统计上的结果，也是对 1946—1980 年间动态关系的一种无实际意义的错误的说明。"图 1.5 显示了从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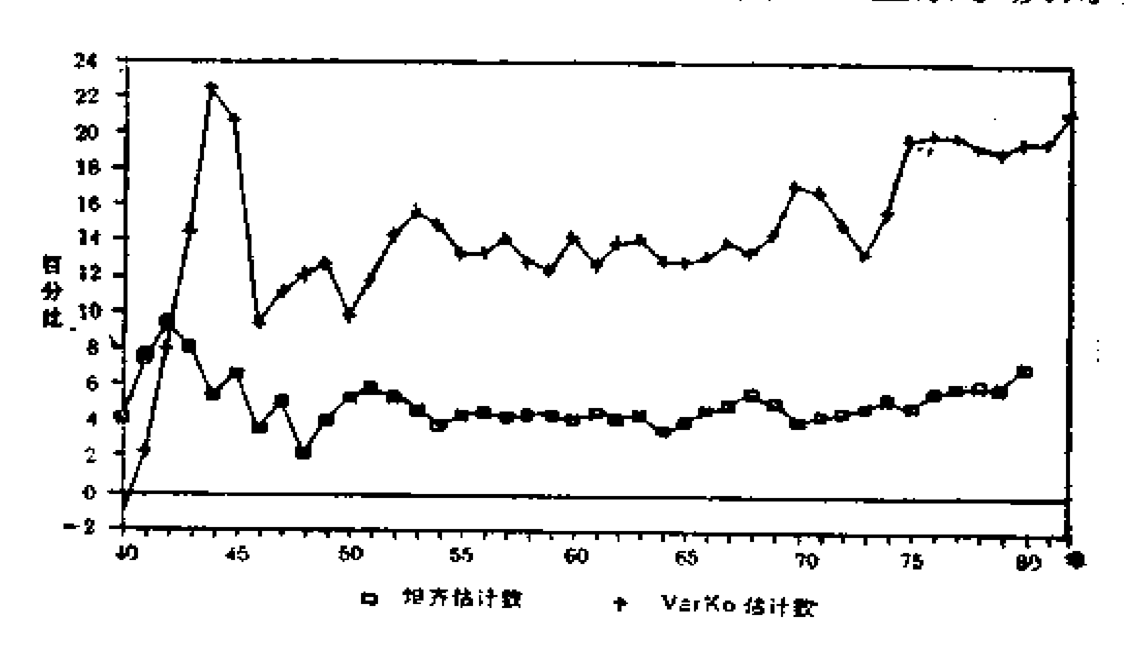



图 1.5 经济计量现金比率模型估计值：未申报收入占调整后总收入的百分比

量 $K_o$ 模型(变量 $K_o$) 的动态预测获得的不同的关于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该模型纠正了坦齐的方法中的缺点[11]。测得估计数几乎比坦齐报告的数字大 3 倍多，也展示了一个不同的短期模型。

## 不同估计数的比较

表1.3 显示了1981 年未申报收入的不同估计数的概况。此表也包含了与未申报收入估计数相联系的税收损失的一个粗略的估计数[12]。

表 1.3 揭示了由现金比率模型获得的估计数大小与政府机构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得到的估计数大小惊人地一致。排除掉经济分析局关于调整后总收入缺口的估计数和有缺陷的坦齐的估计数，未申报收入估计在 2170 亿到 4220 亿美元之间。最小约束条件下的现金比率模型估计的未申报收入在 3500 亿到 4200 亿美元之间。这一估计结果与国内税务局在采用不同假设条件下所获得的结果十分相近。这些估计数表明，调整后总收入中有20% 以上的收入未申报缴纳了联邦所得税，结果带来 1000 多亿美元的国家税收损失。

## 对未登记收入的估计

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构成宏观经济分析的经验基

础。我们理解宏观经济体系运转以及作出明智的政策判断的

**表1.3 1981年未申报收入估计数概况**

| 所采用的方法 | 代表符号 | 未申报收入（十亿美元） | 占调整后总收入百分比 | 岁入损失（十亿美元） |
|---|---|---|---|---|
| **差　　异** | | | | |
| 经济分析局：调整后总收入初始缺口 | BEA：Old | 171.00 | 9.65 | 54.51 |
| 经济分析局：调整后总收入修正后缺口 | BEA：New | 217.40 | 12.26 | 69.31 |
| 国内税务局申报的结果 | IRS | 283.88 | 16.01 | 90.50 |
| 国内税务局的不同假设 | IRS：Alt | 422.06 | 23.81 | 134.55 |
| **现金比率模型** | | | | |
| 简单模型：1940年基数＝0 | C：40 | 273.22 | 15.41 | 87.10 |
| 简单模型：1976年基数（IRS） | C：76 | 309.63 | 17.47 | 98.70 |
| 一般模型：1940年基数＝0，$K_u=3$ | C：40 $K_u=3$ | 419.70 | 23.68 | 133.80 |
| 一般模型：1976年基数（IRS）：$K_u=3$ | C：76 $K_u=3$ | 405.57 | 22.88 | 129.30 |
| 坦齐报告结果：1930—1980a | Tanzi | 117.99 | 7.31 | 37.61 |
| 一般模型：变量 $K_u$ | C：Var $K_u$ | 350.72 | 19.79 | 112.80 |

a．1980年的估计数。

能力，取决于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精确性。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NIPA）是根据各种数据来源构成的，它也许

直接或间接受到一个未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是税基来源的信息。当税收信息被扭曲时，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必然相应地作出调整以反映这种扭曲。帕克（Parker，1984）提出，税源信息与最终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总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调查未申报收入对未登记收入的影响的任务，由于概要描述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最近的数据资料也至少是在30多年前汇编的，使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再次对有关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收入的登记不足这一问题产生兴趣，这是由于，通货比率的估计数表明，未申报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日益突出的问题。1979年，经济分析局的一个代表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1979年10月9日）指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5%（60亿—100亿美元）的收入流失掉了。"经过国内税务局的研究（1983），很显然需要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进行实质性的修正，以考虑到国内税务局对未申报收入的新的估计数。1985年年末，经济分析局（1985）公布了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综合修正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修正是，改进对漏报所得税收入的调整。就1984年来说，国民生产总值（GNP）经过修正后上调1012亿美元。最新修正后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经济分析局，1985，p.2）中包括的国民收入调整总金额达到1475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总量的4.85%），个人收入1173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总量的3.77%。

这些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最新修正，完全反映了国内税务局对税源数据中未申报收入的较高的估计数。目

前还没有作出努力去测度税收和经常性的刺激手段对厂商与个人漏报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使用的信息资料和其他统计数据来源的影响。

总的未登记收入的唯一独立的估计数是应用现金比率模型获得的，该模型使用了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的收入概念。法伊格(1980)(*C/D*)关于未登记总收入的估计数得到波特和拜尔(第5章)的再次证明。使用简单的现金比率模型得到的1981年的未登记收入为4270亿美元，从这些对一般现金比率模型的模拟中看出，总的未登记收入有可能超过7500亿美元。⑬ 简言之，估计未登记总收入的现金比率方法得到的结果表明，最近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修正(这种修正只考虑到国内税务局对联邦所得税收入中漏报部分的估计)，反映的只是全部未登记收入中的一部分。

## "交易"方法

1979年，为估计未观察到的以货币计算的交易量和以货币计算的未登记收入总量，法伊格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交易方法的基本概念出自费雪(Fisher)(1911)的交易方程式。该交易方程式规定了货币支付总量(MV)和交易总量(PT)之间是相等的。从原则上讲，如果有可能获得货币支付总量和记录的交易量的独立的估计数，那么，这两种量度之间的差额就是未登记交易总额的估计数。费雪的"支付一交易总额相等说"可以作为对登记的交易量的一种检测，与

此极为相似的是，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相等说”近来已被用作对最近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总收入估计数的基本检测手段。法伊格(1985 b)应用交易方程式的基本框架估计了瑞典的未登记货币交易总量。

在缺乏总交易量(登记的和未登记的交易)估计数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支付总量(MV)的估计数，这一估计数转而又可被用来估计未登记收入的金额。设

$(py)^*$ = 总收入

$(py)_r$ = 登记收入

$(py)_u$ = 未登记收入

$C$ = 通货

$V_c$ = 现金周转速度

$D$ = 可用支票的存款

$V_d$ = 可用支票的存款的周转速度

PT = 总交易量

于是，

$$(py)^* = (py)_r + (py)_u \tag{14}$$

和

$$CV_c + DV_d = \text{PT} \tag{15}$$

假定总交易量是与总收入成比例的，那么，交易方程式就是：

$$(\text{PT})/(py)^* = K^* = (CV_c + DV_d)/(py)^* \tag{16}$$

和

$$\begin{aligned}(py)_u &= [(CV_c + DV_d)/K^*] - (py)_r \\ &= (py)^* - (py)_r \end{aligned} \tag{17}$$

当支付总量与登记收入的估计数给定时，就有可能获得给定基准参数 $K^*$ 下的未登记收入的估计数。对 $K^*$ 的估计数可以通过假定在某几个时期内全部收入得到恰当的记录而

获得，或者，在任何给定的一年里，可以从总收入中未登记部分的单独的估计数中获得。

估计未登记收入的交易方法在若干重要方面与现金比率方法不同。现金比率法依赖于相对现金存量向未观察到部门转移的变化，交易法则集中于对我们日常的会计制度中未登记的支付总额的研究。现金比率方法的含义是，流通中现金的存量与活期存款余额的存量，理所当然地代表了在实行交换中参与交易的货币量。参与交易的货币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未偿付的货币存量，二是每年使用货币存量完成支付的次数，即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交易的研究方法力图直接把各种变量的流通速度纳入分析之中。而不假设交换媒介的交易速度固定不变。

交易方法也力图避免大部分在现金比率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约束性假设条件。不要求假设在未登记收入的交易中现金是唯一使用的媒介；不要求假设固定现金的比率以检测现金在登记和未登记交易中的使用；也没有必要在登记和未登记这两个部门中假设收入流通的相对速度。最后，正如等式(17)揭示的，对登记收入的任何提高，都将在未登记收入的估计数中得到恰当的反映。这一模型需要关于 $K^*$ 的基准估计数。⑭

交易方法有一关键性的假设，就是在总收入⑮和总交易额之间存在一种比例关系。几十年来，这一假设一直被应用于货币理论。这一假设暗含了允许用收入替代交易量，把收入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中的标度变量。同时，也需要假设把交易方程式转换成货币需求理论。因此它也是在资本存量和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之间推导出货

币主义的关系的基础。尽管在传统的货币理论中，总收入与总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已被看作基本不存在问题而被长期应用，由于法伊格在应用其早期的研究方法中（1979）得到的有关未登记收入的高的令人吃惊的估计数，对这一假设在推导未登记收入估计数中的应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挑战。

尽管交易方法有其概念上的优点，但其成功地经验性地实行，却严重地受到现有数据资料的限制。主要的经验性局限在于，我们不可能轻易地构造一个包括美国经济总交易量的时间数列。其局限性主要来自资金流动帐户中所采用的会计惯例，资金流动帐户所统计的是净交易流量而不是总流量。这种数据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不是收集资料所采用的方式所固有的，因为，事实上所有数据资料登记的主要是总量而非净流量。更精确地说，这是会计惯例的结果，它旨在使资金流动帐户从概念上与目前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程序更加一致。

为获得总交易量的一个大致的估计数，我们必须依赖于从最终交换媒介的存量和周转速度的数据中获得的支付总额的估计数。而由此得到的支付总额的估计数必须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进行调整。首先，估计的支付额必须在概念上与收入变量保持一致。其次，总支付量需要作出调整以便消除在一段时间内那些不可能与收入成比例关系的交易部分。

货币支付的估计数是从对记入借方的活期存款和其他可支取存款的计量中得出的。有登记的借方统计数是指由个人、合伙企业、股份公司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帐户中所记的借方，简言之，支付数列不包括联邦政府的交易。非联邦部门的货币支付必须相应地与其所产生的货币收入相一

致。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包括了联邦政府的支出和非货币交易的归算收入部分，这两部分必须从相关的收入概念中抽出去。最终的收入总量是指非联邦政府部门的货币收入，非政府部门是货币化的私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未登记和未申报的经济活动不包括在联邦政府部门内，上述收入概念与目前手头的问题是一致的。

总交易额可以有用地分解为三部分：(a) 与最终产品相联系的交易；(b) 包括不动产或金融资产的交易；(c) 纯粹的转移交换 (transfer exchange)。转移支付和金融交易有可能出现波动，这些波动与总收入的变化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前者源于金融政策的改变，后者则源于金融方面的创新。如此，可对总支付的估计数作出调整，将主要的金融性交易和直接转移的部分排除掉。最后得到的净交易额测度更有可能满足相关的假设。

交易总额的初始估计数由两部分组成，现金支付总额和记入个人、公司、合伙企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票存款帐户的借方部分。活期存款有多种周转速度，我们采用了那些排除大金融中心的周转速度系数以便尽可能最大地消除掉如科普兰(Copeland)(1952)所说的“金融绒毛”(financial flutt)。[16] 现金支付总量从法伊格(1986.b)的现金周转速度的时间数列估计数推导获得。[17] 为消除金融资产交易和转移支付部分，总支付额的估计数应进一步作修正，以获得净交易总额。[18]

在净交易额的估计数和私人部门的货币收入给定时，应用等式(17)可导出“未登记的总货币收入”的估计数。原则上讲，这一估计数代表了所有私人部门收入中受从国民生产总值中遗漏的那部分货币支付额影响的收入的估计数。这样，

该估计数包括了全部非法收入，即有意被排除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之外的那部分收入，以及那些无意之中被漏掉的合法收入，这是由于对税源数据和调查资料中的低报收入，以及对未注册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未申报收入调整不足的结果。关于邦联所得税，总的未登记货币收入是一个比未申报收入内涵更广的概念。总的未登记货币收入包括低于联邦所得税最低档（federal Filing threshold）的那部分收入以及没有向除国内税务局以外的财政机构申报的收入。由于未登记货币收入(非法获得的收入)包括了按照目前的会计惯例，不用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那部分收入，未登记货币收入的内涵比未登记收入更广。简言之，由于基本的收入概念在计量上存在差异，交易方法的估计结果与本章前几节得到的估计数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然而总的未登记的货币收入和登记的货币收入之和代表(或表示)了用现金和支票支付的经济活动中全部收入的估计数。

图 1.6 显示了用两种交易方法估计的总的未登记货币收入占登记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估计数。图中所列的“原国民生产总值”(old GNP)数列是基于 1985 年之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它不包括最近对联邦所得税中未申报收入的修正。“修正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列是基于最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修正的估计数。图中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对国民生产总值最近的修正所产生的总未登记收入。图中横轴与经过修正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用交易方法得到的仍从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遗漏掉的总货币收入的估计数(用百分比表示)。

未登记经济活动在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增长和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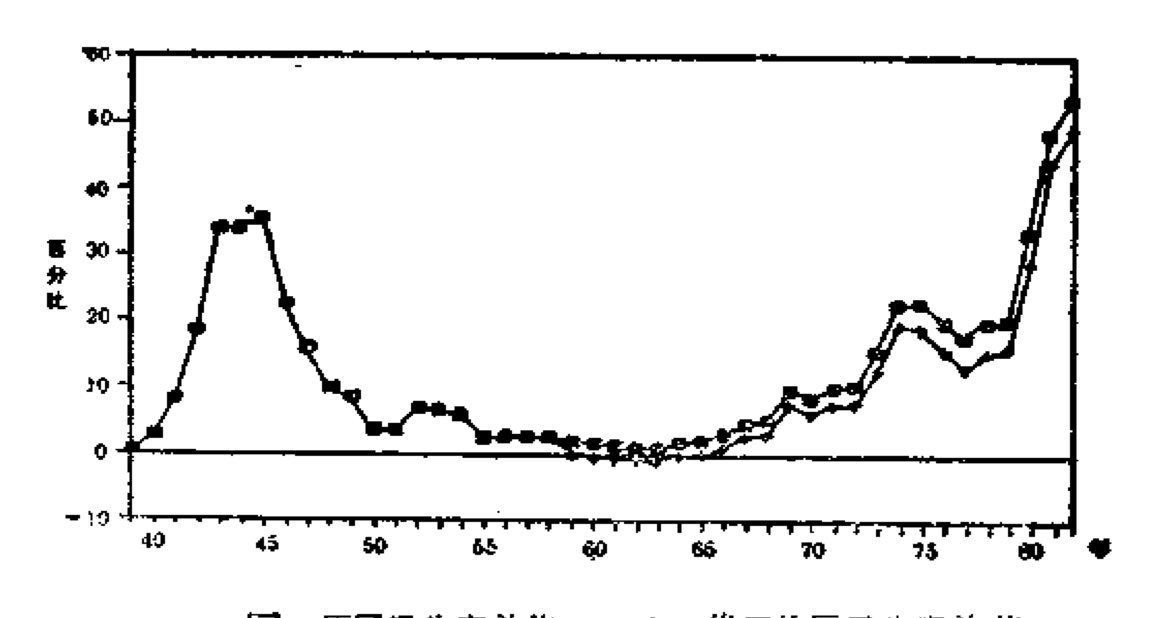



**图 I.6 交易方法估计值（1939—1940年）：**
**未登记国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修正后）百分比**

迅速被纳入有登记的经济部门之后，直到 60 年代后半期，未登记经济部门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在此期间，官方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估计数充分反映了总的名义收入的增长。这些估计数表明，名义未登记收入在 60 年代下半期开始上升，到 1975 年，已超过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以上，达到一个临时性顶点。在这段时间内，官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可能从整体上低估了整个经济活动的增长。1976和1977年，未登记收入所占的百分比似乎暂时有所下降，但在 1979 到 1982 年又急剧回升了。1982 年，估计数表明，未登记收入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49%。⑲ 1980—1982 年的情况似乎很不正常，整个未申报经济突然地扶摇直上。对有关数据资料的更仔细的的研究揭示，这种始料不及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活期存款周转速度的迅猛加速，而对债务锁链又没有作出相应的金融调节以便得到抵消。最近关于估计存款周转速度的方法

的变化可能部分地是可靠的，但是，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由现金管理方式革新所导致的纯金融性交易的调整可能是不充分的。在这个经验问题解决之前，对最近几年的估计数，必须持审慎态度。

在战后期间，由交易方法估计的未登记收入的短期路线显示了一个"U"字型，与另外一些可供选择的模型估计的结果相似。如果不考虑正在进行估计的某些具体的未观察到收入的概念，不同的估计方法都显示出：在二战期间，未观察到经济活动是增长的，随之而来的是下降，接着是一个相对稳定期，然后，是60年代晚期的上升。就不同的估计方法对未观察到经济活动不同部分的估计以及依赖于这类活动的不同指标这种情况而言，这种短期一致性是明显的。现金比率方法有赖于现金存量的相对增长来获得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估计结果。交易方法得到相类似的短期结果，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金支付在总支付中的比例一直是持续地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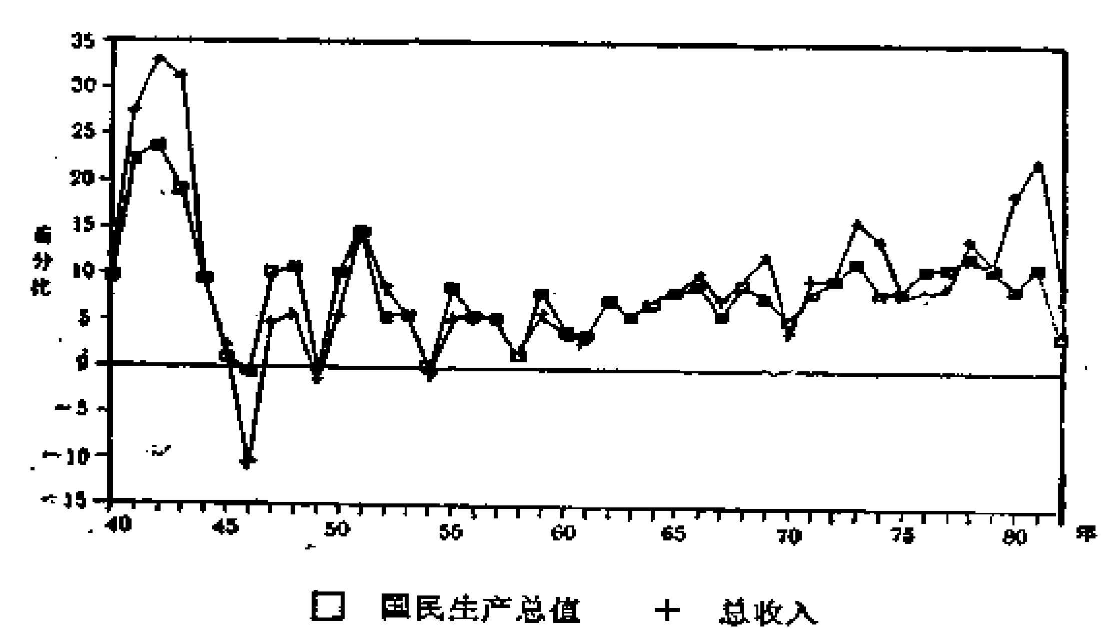



图1.7　交易方法估计值：国民生产总值与总收入的名义增长

图 1.7 显示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名义总收入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加未登记货币总收入)。图 1.7 中的估计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登记收入有迅猛的增长,而在战后年份里则迅速下降了。这一结果似乎表明,战争期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要比政府统计所显示的强劲得多,而战后年份的经济增长也不像政府估计所表明的那么强劲有力。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官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数充分地反映了名义经济活动总量的变动。自 60 年代后期以来,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要低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增长率。

上述经验性的估计结果大致符合采用未观察到收入假设的必要条件:即,在最近 20 年里,经验性估计结果显示,未观察到部门的增长与观察到部门的增长是相关的。对于交易方法估计的结果必须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对二战期间最后三年获得的未登记收入明显特别高的估计数,更应如此。这很可能是这些结果受到在此期间发生的迅速的金融创新的影响,由于与未登记收入的增长不相关的原因,所以,这些金融创新具有提高交易对收入的比率的作用。

交易方法的估计结果所存在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广泛应用的总交易量与总收入之间存在比例关系的假设也许是不正确的。如果这个假设出现问题,不仅说明前面交易方法的未登记收入的估计数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会使得人们对该假设在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其他领域中的盲目应用产生怀疑。违反这一比例关系假设的失误,可以解释许多货币需求函数预测失误的原因。它同时也表明,货币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将无法通过货币总量存量的变化确切地表达出来。如果货币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取决于货币存量,而是

更主要地取决于用来影响交易量的货币存量变动的强度，那末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必须作修正，以明确考虑到货币余额的周转速度。简言之，应更多地注意到于总交易量（PT）和总收入（*py*）之间关系变动的原因和后果。

## 概括与总结

由一个比喻性的术语“地下经济”所表达的众所周知的现象，是由多种经济活动组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从这些活动得到的收入组成的，这些活动逃避或躲避了社会现有的监督经济活动的技术。这种特征（包括我们试图研究的全部有关这类经济活动），其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以至于我们很难作出有用的分析。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对“未观察到的”或“地下”经济的含义的理论阐述或者考虑作经验性估计时，需要有更确定的概念。当我们选定一些具体的定义来描述这些活动的特征时，我们希望研究必须针对所调查研究的特定问题。从有关未观察到经济的研究文献中，可得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涉及违背和逃避财政法规的问题，第二个涉及我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精确性和可靠性问题。对违反税收制度程度的测量主要是根据未申报收入的金额，即，应该向国家税务当局申报的收入和事实上申报收入之间的差异，而对我们的经济指标的可靠性的测度，就是没有被恰当地计入常规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的那部分收入的数量，即未登记收入。未登记和未申报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

经济活动的指标，而经济活动指标则取决于构筑它们的税源信息。

已经提出了各种方法来测度未申报收入。所有现有的估计结果都显示，依法纳税的社会风气已遭到严重破坏，最近，官方的国内税务局将估计结果作了向上修正，这种修正进一步缩小了不同的对未申报收入估计数的差距。本章中的经验性估计结果表明，美国 1981 年的未申报收入的范围估计在 2800—4200 亿美元之间，占该年度报告的调整后个人总收入的 16—24%。毫无疑问，偷税漏税、逃税避税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的 20 年里，其增长势头也是令人惊异的。但是，在官方的国内税务局的估计数和使用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独立的估计数之间仍存在重大差异。本书作者的分析认为，更高的估计结果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在美国，由于偷税漏税、逃税避税所造成的国家税收损失，可以成为解释美国预算赤字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有充分文献材料证明，未申报收入的增长，对未登记收入从而对国家信息系统的精确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断增加的不遵守税收法规的现象，已经直接和间接地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出自在编制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过程中对税源信息的特殊的使用。只要我们充分了解了税源信息方面的未申报程度，就可以估计到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没有得到正确登记的那部分收入量。这种调整可以反映已有的税源信息方面漏申报收入的直接影响。当然，修正的可靠性取决于国内税务局关于未申报收入估计数的可靠性。如果国内税务局低估了这部分收入，目前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修正结果也会相应地低估未申

报收入。更为困难的问题来自逃税漏税现象的上升对未登记收入的间接影响。漏报税收资料的个人和厂商不可能对编制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当中所使用的其他种类的信息公正地作出反应。其他数据资料被暗中沾污所产生的后果更难估测，还没有人试图针对这种间接影响对官方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作出相应的修正。

目的是对未登记收入的规模作出估计的货币计量法表明，60 年代后期以来，地下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百分比已经逃出我们官方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的掌管范围。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与非法收入的增长有关，这类非法收入在货币方法中得到反映，但却从按会计惯例统计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漏掉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部分则是与合法来源的收入相联系，这部分合法收入可能并不是故意从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溜掉”的，因为它们或许是未注册的，或许是不恰当地被登记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所采用的非征税数据资料中。

未登记收入估计数的短期格局，大致上与下列假设相符合：过去 20 年来经历的经济困境有可能部分是统计上人为造成的，这是由于我们经济指标的可靠性受到系统的破坏。这种可能性被近来的联邦储备局 (FRB) 一项重要发现再次证实 (1984)，即美国通货供给中的 88% 正在“流失”。对美国家庭通货使用量的调查发现，美国家庭仅仅持有相当于在金融机构之外流通的该国通货总额的 12% 的现金，流通中的这部分 12% 的现金所提供的现金支付额，占有登记的个人消费支出的 40%。在美国，由于支票支付是主要的支付形式，因此，官方对已登记收入和支出的估计数明显地低估了实际

经济活动总量。

UIH 表明，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对于困扰职业经济学家们的许多事件的说明，可能要借助于对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作出更为仔细的考察。我们过去的职业倾向是去修正理论，使之与官方通过目前的估测机构测估到的事实更为接近。如果官方统计估测机构的测估结果被不断增长的未观察到的经济所扭曲，修改现存的社会信息体系比修改我们理论去与错误的事实保持一致对我们更为有利。

## 注　释

① 登记收入可以通过不同程度的“总值”来测度，这就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净值（NNP）之间的区别。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可以通过从国民净值中减去间接税、非税收负债（non-tax liabilities）、企业转移支付、统计误差，加上补贴（其中要减去政府企业目前的盈余）而得到。最后，个人收入是通过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利润（corporate profits）和存货估价与资本消耗调整、净利润、社会保险金、工资增长额减去支出额，再加上政府向个人的转移支付、个人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和企业转移支付而得到。

② 经济分析局定义转移收入为：农场中自己生产和自己消费的食品，也包括非货币交易的归算收入，如房屋所有者住自己的房子所节约的租金。

③ 例证之一是，农场生产和自我消费的粮食，在美国税法中是不纳入财政收入的，但却认为这是总经济收入的一部分，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并没有统计这种归算收入（imputation income）。

④ 这些包括两种调整，一种是对个人归算收入的调整，这部分归算收入纳入个人收入，构成了少报收入的税源信息。另一

部分，是对少报的资本利得收入和应课税的但不包括在个人收入内的非法收入的调整。

⑤ 初始的"BEA 缺口"估计(图中 BEA:Old)是在 1985 年对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中的统计资料作出综合性的修正之前由经济分析局编制的。修正后的"数列"(图中为BEA:New)考虑了新修正的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资料的影响。

⑥ 由于国内税务局的估计数包括了未申报的非法收入，而经济分析局的估计数不包括这部分收入，所以，国内税务局的估计数和经济分析局的估计数，严格来讲是不可比的。

⑦ 国内税务局的估计数包括在图 1.2 中。

⑧ 必须注意，尽管卡甘最初的研究考察了现金对整个货币供应量的比率，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恰当定义必须仅限于那些直接用作为交换媒介的资产。实际上，在美国，现金和活期存款及其他的支票存款，包括了最终的交换媒介。$C/D$ 方法的应用，须将 $D$ 限定为活期存款加其他支票存款。在下文中所有关于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的估计数将遵循这一常规。

⑨ 美国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对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包括了 1475 亿美元的未申报负税收入。

⑩ 模拟实验表明，未申报收入的最终估计数对于 $K_u$ 的选定值是相当敏感的。对国内税务局的未申报收入估计数作更仔细的考察就能提供 $K_u$ 的更精确的估计数。

⑪ 这一估计数采用了经济分析局调整后总收入的估计数，代替了坦齐的国民生产总值变量，用巴罗 (Barro)、萨哈沙库 (Sahasakul) 计算的 (1983) 平均有效边际税率的估计数取代了坦齐所采用的税率。这些估计数建立在等式(13)包含的附加性说明中的动态预测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坦齐采用的倍增形式的静态预测上。估测的方程式建立在二战后的若干年的数字基础上，以便消除由大萧条时期的银行崩溃引入坦齐方程式中的荒谬结果，那次银行崩溃导致了现金比率的急剧上升，而与未申报收入的增长无关。对1949—1980年期间未申

报收入的较高的估计，见法伊格的著作（1986c）。图 1.5 中的另外一种估计数是 1947—1980 年的数字，测估方程式为：

$$C/M = 1.291 + 0.630\tau - 1.531(ws) + 0.049r + 0.00002y$$
$$(8.724)\quad(4.953)\quad(7.266)\quad(0.164)\quad(2.349)$$

⑫ 估计的税收损失是由国内税务局（1983）通过把估算的未申报收入乘以总未申报收入中每美元的税收缺口的比率的估计数计算得到的。由于国内税务局测估的税收缺口量度中包括了过高估计的支出和扣除的影响，对税收损失测估的假设为，对所有未申报收入调整的效果对所有方法是一样的。这一假设对经济分析局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非法收入是被排除在个人收入估计之外的。

⑬ 一般现金比率模型的模拟（general currencyvatio model simulations）是由波特和拜尔作出的（第五章）。它假设，$K_u = 2, \beta = 0.9$，使用的基期是 1964 年，该期内未登记收入约占登记收入的5%。这些估计数没有能对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早先未登记的收入进行恰当的估计。

⑭ 在下列经验性的估计数中，基准年份是1939 年。假定在 1939 年净交易量对私人部门中记录的货币收入的比率等于$K^*$。

⑮ 如果交易额对收入的比率是可观察变量的一个稳定的函数，就可对交易方法的研究结果随时进行修正，所使用的方法与对 $C/D$ 模型的修正一样，使 $K_o$ 成为一个函数，而不是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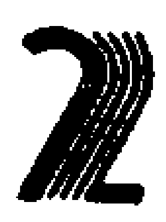
⑯ 对负债和周转速度的历史数列一直定期地作出修正，从而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数据系列进行联接，在这些时期内资料的样本规模和定义都发生了变化。历史数列是通过对相互重叠年度的数据作比例调整得到的，对此，旧资料和新资料都可获得。

⑰ 这一新的现金流通速度数列使用了 1984 年联邦储备系统从现金使用的调查中得到的基准估计数。

⑱ 法伊格（1980）详细讨论的具体调节包括如下各项：在主要证券交易所登记的股票和债券移动的销售额，由向其他支票存

款和现金提取转移而引起的估计数的负债，由回购协定的交易产生的估计的负债，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隔夜欧洲美元，进口和资本输出，以及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

⑲ 波特和拜尔（第 5 章）试图对交易文法进行同样的研究，以 1939 年为基准，未登记收入在1981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59.8%。波特—拜尔尝试的结果不正确地在净交易额中加入了政府支出部分他们也没有正确地对国民生产总值中推算收入和政府支出部分进行调整。测估结果中的其他次要差异，主要是由于使用了联邦储备局的基准通货周转速度估计数而产生的。



# 社会系统中的信息扭曲：地下经济与『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订者反馈』

从社会科学的历史渊源来看，社会指标是我们力图把信息定量化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有用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定量化的这一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所要探究的每一门这类学科的特征。过去对人类行为的定性研究和哲学探讨，已经让位于定量研究，以及通过强调统计推断和经验设计，力图规范地模拟自然科学。专业化的程度不仅在学科之间大大深化了，而且在学科内部也得到了发展。政治经济学分化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经济学又分解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尽管人们已经从定量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中得到重要收获，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每一门学科都在争论这些发展的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① 在涉及到组织机构和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中，问题不限于经验的有效性和统计假设的恰当对象这些科学问题。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已经抽象为一些总量，成为有用的数据被纳入公共政策之中。有关经济活动、政治行为以及社会趋势的大

量信息，最后被整理简化为数量符号，有时甚至是一个数字——如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它们所显现的客观性、简明性和广泛性，这些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度量可以用来作为科学调查和公共政策的基础。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社会指标已经成为个人和公共决策的关键性信息输入。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指标可靠性的新问题，它们在从狭义方法论方面研究测度误差问题上具有典型意义（Morgenstern, 1963)。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一组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即申报统计数据资料的“受调查者”，收集和把这些资料总括到社会指标中去的“观察者”，和在决策过程中利用这些指标的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关系。② 最近的对有关未观察到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的重要样板，我们称之为“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我们相信，这种现象对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两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社会指标的重要性

社会指标——诸如全国人口统计、民意调查、国民收入数据、选举记录、犯罪统计以及各种社会记录和档案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工业化年代所有杰出成就中的一类成果。有人认为，集中化的国家机构的扩张，使系统地收集信息资料成为可能，也有必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都需要数据资料，以便制定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配置的计划。经济和政

治决策的基本经济数据越来越多地由国家来收集。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汇总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专门化的社会科学基于某种类型的数据，同时也帮助产生出某种类型的数据：人口学建立在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使用国民收入统计和调查，政治学和社会学要利用选举统计和民意调查。

社会指标测度的可靠性和精确度具有重要意义。精确的数据资料为制订社会政策、反映民意和进行社会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在一些具有高度政策导向的学科中，如经济学中，它把政策、民意和社会指标的研究功能融为一体。

## 最新的指标系统"危机"

源于各种指标的信号的惊人的一致性表明，过去十年中已有根本性变化发生。严格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允许我们对某些趋势作出观察，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这些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关这方面的具有相互联系而又界限分明的研究却甚少。

社会学家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他们学科中的一个传统的课题，即"社会组织"，它通常包括离婚、犯罪和工业竞争的指标。美国和欧洲的离婚率已经显示了急剧增长的趋势。美国的离婚率在 1965 年到 1975 年之间几乎翻了一番。同期，英国和荷兰的增长率是三倍多。最近一项关于美国犯罪率的研究表明："美国城市的犯罪率都在迅猛上升，而不管其规模、

分布、未成年的犯罪者数量③及其人口的增减如何。”欧洲诸国的犯罪率统计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在70年代的十年之中增长了近两倍。在70年代的前半期，各地的劳资纠纷普遍增长，遍及整个欧洲……(Flora, 1981，第379页)。

政治学家们对社会的“不可控因素”和新的政治参与形式问题给予了不断增长的关注。在过去15年里，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急剧下跌。如表2.1所示，反映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的有关调查响应指数从1964年的55降到1978年的39。④与此相类似，表示居民对政府持诚实态度的指数也迅速下降了。越来越强烈的一种看法是，政府是由“巨大的利益集团”操纵的，远不是为公众整体利益服务。

欧洲的指标显示了同样的情况。在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中，政府中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的席位在整个70年代持续减少。从1949年到1972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联盟在议会中控制的平均席位从未跌到59%之下。然而，从1972年到1976年，其所控制的平均席位已跌到了50%以下(Flora, 1981)。

在西方民主国家，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它们在经济指标中得到反映：实际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莫明其妙的高通货膨胀率。这些征兆已经促使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如下事实不是没有联系的），有事实证明，遵守税法的意识正在日益淡薄。被称之为“地下经济”或“未观察到经济”(Feige, 1980)的经济行为有所增长，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的联合发展。

每一门学科都分别表达了对其所考察的体制的明显的分散化的领悟，正如前文中所归纳的趋势所指明的那样。这些

**表2.1 对联邦政府信任度指数**

| 年　份 | PDI[a] |
|---|---|
| 1958 | 50 |
| 1964 | 55 |
| 1966 | 34 |
| 1968 | 25 |
| 1970 | 9 |
| 1972 | 8 |
| 1974 | -26 |
| 1976 | -30 |
| 1978 | -39 |

PDI[a]：表示在关于对联邦政府信任度的问题上，回答"始终或大部分时间信任政府的人的比例"减去"有时或根本不信任政府的人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资料手册》(1958—1978)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1983年。

信息代表着某些更为基本的潜在过程的证据吗？它们是否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经济事件影响着政治和社会行为？或者相反？我们是在观察一个违反我们通常的均衡和自动平衡假设的爆炸性的社会系统吗？如果社会指标并不能代表对所研究的社会活动的客观量度，其本身只是系统运动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对产生这些社会指标的过程作出描述。

## 社会系统模型和信息流的作用

社会系统生来就是如此复杂，任何使之模型化的尝试都

必须对其进行高度的简化和抽象。严格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为社会科学体系大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建立了模型。为此，经济学家已经构造了亚系统模型，其目的在于解释诸如收入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经济后果。政治学家们为选举行为和官僚决策建立了模型。只是到了最近，人们才作出极大努力去揭示经济和政策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图2.1显示了一个简化的政治——经济系统模型的典型的图解。在这类模型中，几乎每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箭头或反馈环，都假设了精确的信息，而不管信息是输向还是来自选民、经济决策者、其他政府官员，或者是厂商。(Hibbs and Fass binder, 1931)。

图2.1中的系统类型是一些均衡模型，它们把自动均衡的基本概念，即把一些关键性变量保持在一个可容忍的限度内。在这类模型中，系统受到的外部冲击激起系统作出经济或政治的反应，使该系统回复到均衡状态。因此这类模型需要各种接收、解释和对信息信号作出反应的控制机制。信息信号通过社会指标的符号来传递。因此，在前面描述的模型中，涉及经济的信息，是通过国民收入帐户、价格和年失业指数的指标体系来传达的。这些信号，在它们影响群众政治取向的意义上，将被转化为代表选民倾向的其他信息信号，而这些信息信号又会在社会指标系统的符号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政府的政策和决策。⑤

实际上，所有政策的执行都假定，来自信息网络的信号运转是有效的，假定社会指标包含大致正确的信息。我们争论的观点是，在大范围内，后一个假设似乎难以成立。事实上，我们希望说明的是，社会指标的信息内容有可能受到人们试图描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运行的扭曲。我们将要

阐明的是，社会指标作为公共政策反应的信号手段越重要，作为对社会体系行为进行描述性量度社会指标本身也就越有可能退化。进而言之，如果这种信息的退化不被政策制订者所觉察，或者他们对此毫无办法，那么，社会系统本身也许就会变得高度不稳定。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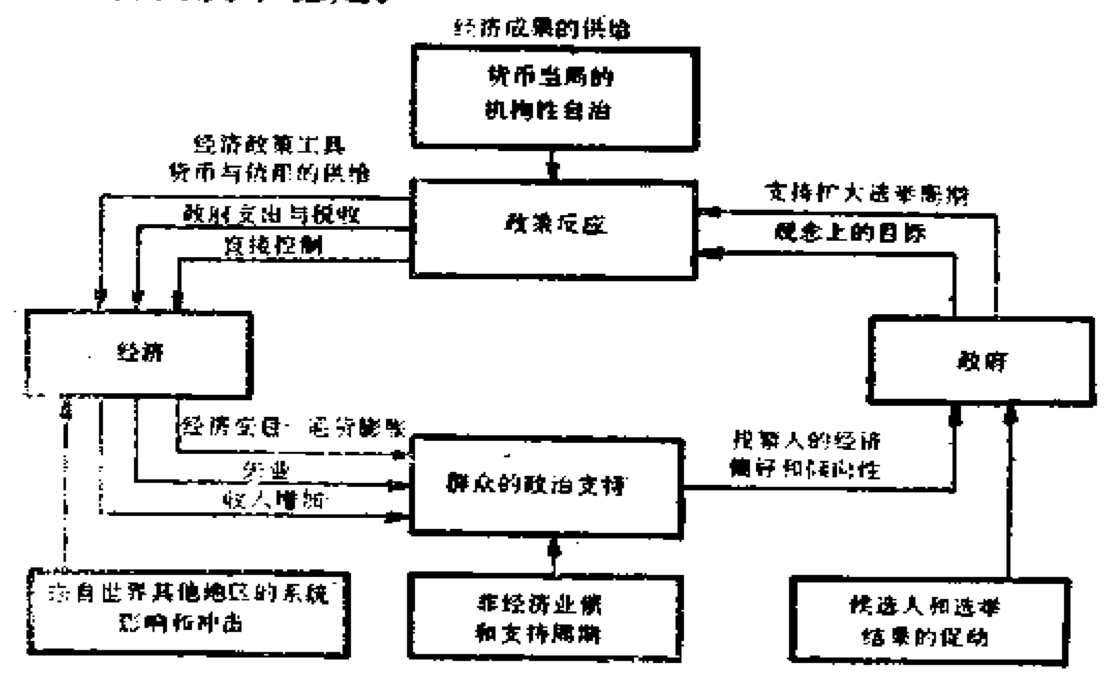



**图2.1　政治经济系统的典型模型**

资料来源：希伯斯和范斯宾德尔，1981P₄。

## 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

为了深入认识依赖于社会众指标的信息体系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考察产生社会指标的体制方面的要求。首先是要考察主要的信息源——受调查者。所谓受调查者，其典型形式就是以记录、或对问卷的答复，或通过自我申报的形式提

供信息的个人、厂商或政府机构；第二，要由一个职能机构收集和汇总这些受调查者申报或者是由其行为所显示的基本数据资料。我们称此过程的执行者为观察者；第三，某些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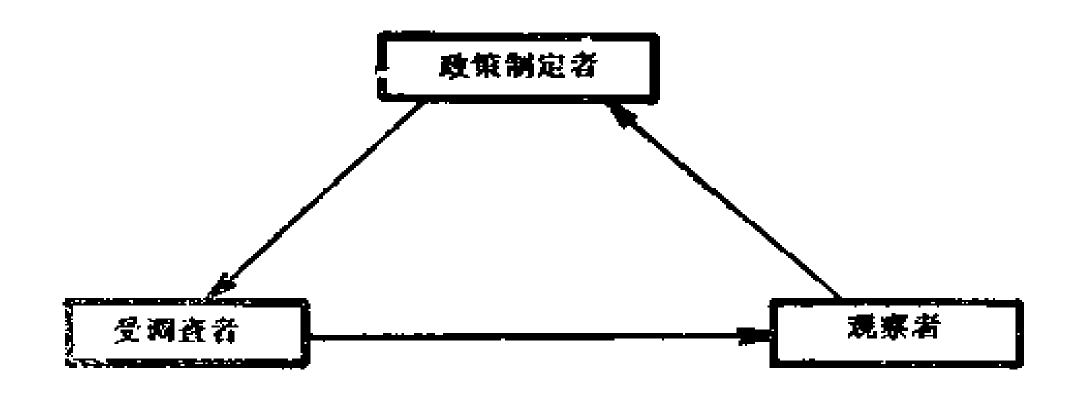



图 2.2　简单的信息系统

行机构，或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理解这些信息，并且把这些数据应用到与某些特定利益相关的社会政策中去。

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假定，图 2.2 中的三个执行者中的每一个，其利益和感觉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因此系统中的这三者之间的信息转移相对精确，不受偏见的影响。这一假设证明对社会指标的客观性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的双重要求是正确的、直接的不受偏见影响的信息流动如图 2.2 所示。

何种类型的信息混乱会导致这一控制系统的功能失调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希望测度的基本社会现象和测度手段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对诸如国民生产总值 (GNP)、价格指数、失业统计和各种综合指数等社会指标的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义。在测度方面的这种"改进"经常采取改变观察范围的形式，从而使依附于前者的社会指标值的含义发生变化。如果对由测度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指标的变化和正在测估的实际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区别存在困难，那

么"正确解释"和重新"校准"经济信息就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改进经济申报机制，扩大经济领域观察的范围，其结果很容易被误解为某一阶段经济的不正常的增长，或者是不正常的下降。

在图 2.3 中，我们描绘了"受调查者"、"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三者之间可能出现的信息反馈类型。我们相信，这会更精确地对信息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作出描述，其中包括极有可能出现的系统的信息扭曲。

首先，观察到的事实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使用的信息可以改变受调查者的申报和实际行为。例如，受调查者和观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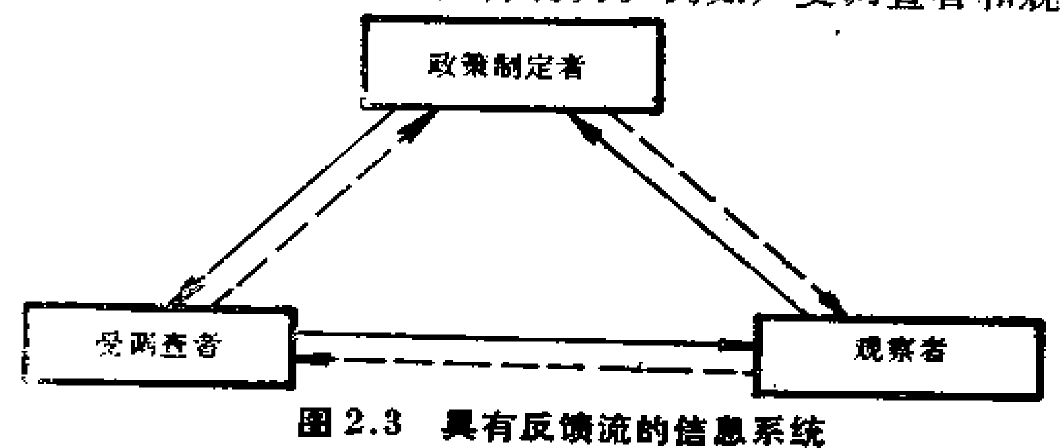


图 2.3 具有反馈流的信息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系统中，受调查者是人，观察者在场，可以影响受调查者的申报过程和受调查者的实际行为。⑦

"受调查者"、"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多种方式相互作用，反馈存在着不同种类和不同强度。图 2.3 表示了一种可能的简单反馈过程。不同的社会指标可能会受到极不相同的影响，这取决于信息来源、动机和反馈效应的强度。每一个反馈环都依赖于创造不同反馈强度的不同的经济、官僚和政治利益，由于各个执行者对社会指标有特定的兴

趣和与反馈体系本身的运行利害攸关，这就使反馈的程度强化了。

在不同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第一种类型的反馈。是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被受调查者所理解，因为他们之间关系密切。最明显的例子是税收信息的申报，在这场合，“受调查者”很容易理解他们自己申报的活动对自己直接的和可预测的后果。如少报收入，尽管容易遭受处罚，同样也包含了减少税务负担的可能性。

第二种类型的反馈发生在受调查者和观察者作用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如在官僚行为的情况中。政策制定者力图获得具有测度绩效标准意图的“受调查者—观察者”的信息。当这类被官僚机构察觉的测度被作为影响官僚机构本身的政策决策的投入因素加以研究并进行控制时，为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输入，越来越有可能被沾污。

## 系统效应：未观察到的经济

尽管在各项学科研究中已注意到了政策反馈的不同例子，但它们的全部社会意义则还尚未被充分认识到。部分原因是由于专业的严格分工本身，部分地是由于缺乏足够充分的样本。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阐明信息和政策反馈所具有的深刻影响的特征，阐明所采用的例子是地下经济增长的例子，以此来证明研究过程需要跨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工作是合理的。

60年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他们能够采用自动稳定机制和“微调”来控制经济，但是，骚动不安的70年代证明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预测的失败。经济学的理论预测和实际的宏观经济趋势之间差异的增大，构成一系列经济理论模型不能充分解释经济的异常现象。分析的特定范围从“供给冲击”（秘鲁鳀鱼生产的重大损失和欧佩克石油卡特尔的形成）到中央银行执行货币主义政策的失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信息系统已变得十分脆弱而极易受到扭曲时，理论经济学家们却在用所谓的“合理预期”假设为政府政策的重要性进行辩护。

用于计量和解释这些趋势的统计数字，是对“相机决择”的政府政策以及对与政策相联系的财政体系实行“恒温式”（thermostatic）控制的信息输入。它们需要精确性，仅仅是为了反映经济中可观察到部门的活动：收入、消费、投资和储蓄、价格和失业。社会指标与它们试图测试的经济活动之间的任何系统的偏差，会导致严重的政策失误。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大量的日益发展的未登记经济部门相联系的系统偏差已被引入社会指标体系之中。⑧ 由于传统的统计规范，通过不申报或申报不足，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从社会测估机构的视野中消失了。地下经济包括在合法和非法经济活动中利用现金和通过以物易物进行的市场和非市场交换。

弄虚作假和不申报某些关键性信息的强烈动机便产生了。确切、完整申报的各类信息被觉察到的消极后果越强烈，虚假的和使人误解的信息就越有可能产生。

这些反馈效应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特征具有什么含义，相对而言，还较少有人注意。有关系统本身的社会指标

反馈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进行测度的能力和必要性同时有所增加。最近明显的反馈效应，是由于信息系统的迅速完善和与之相伴随的受调查者中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申报活动的后果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信息传播如此之快，及其发生作用是如此直接，以至于受调查者、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领悟到，他们的利益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受传输的信息质量、而是受信息本身的性质影响的。当政策制定者对受调查者和观察者

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机制可在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中得到说明。它是通过把政府的数据收集机构看作为“观察者”，把个人与厂商看作为“受调查者”，它们通过调查媒介和自我申报自动提供信息。受调查者把观察者看作是政府机构的代理人，执行诸如征税、管理、补贴、转移资源的活动。从而产生抑制诚实申报和鼓励低报收入、低报支出和隐藏实际就业的情况。可能的检举揭发和侦查工作被“浮光掠影”式的调查、开假发票和根本就不纳入帐户的做法所抵消。受调查者也有可能设法使要征税的和受管制的活动转向“非市场”的和“自己干”的活动，以便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政府补贴接受者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接受者。

政策的后果有可能是强烈的。在分析一个经济系统时，其总的经济活动按某种正常的比率增长，不管其实质如何，由于经济活动从观察到的部门转移到未观察到部门，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的增长快于观察到的部门。这种转移的原因有可能是税务的加重，管制费用的增加，或者就是由于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下降。当观察到的经济部门在总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比过去更小时，收入统计就会显示增长下降的信息，

就会不真实地显示衰退的迹象。这种印象会通过失业数字的膨胀而得到加深，这是由于工人们转向从事未注册的经济活动，但却申请失业保险金。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数量就被夸大了。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将会高于真实的价格水平。价格统计唯一地仅从观察到的经济部门收集到。这些价格指数并没有反映未观察到部门中事实上可获得的更低的价格水平。

较低的增长，较高的失业率以及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引致政府直接的或间接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促使政府增加支出和各种救济。较高的价格指数会导致高工资、较高的社会保障救济金和退休金。它们也会刺激通货膨胀预期，而这种预期本身会带来真实的通货膨胀。因此，当统计上的错觉很快被转化为一种并不令人愉快的经济现实时，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常识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较高的价格把人们推入到较高的边际纳税等级，从而增加实际税负，这样，又会促使更多的经济活动转入未观察到部门，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税基减少的同时，政府支出却增加了，政府赤字也在增加，这就需要有更高的利率去吸引资金以便填补赤字，以及补偿贷款者面临的更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中，汇率和国际收支都会受到影响。当居民开始觉察到政府的行动正在使经济的困境恶化时，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下降，奉公守法的意愿就会进一步减少。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并不存在能使经济回复到稳定状态的“看不见的手”，因为经济运行的纠正机制已经受到破坏。

本文所述的景象，是呈现出滞胀迹象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中的情况之一；这种滞胀仅仅是统计的虚假现象的一个结果。

经济病人已经痊愈，但社会温度计却出了差错。

这种分析被实证性的事实所证实，即，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和不断增长的地下经济部门。对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的研究表明，货币化的未观察到的经济成份在观察到收入中所占的比率约在 5—25% 之间。

如图 2.4 所说明的，在 70 年代期间，美国和英国未观察到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迅速，这种增长与我们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困难的开始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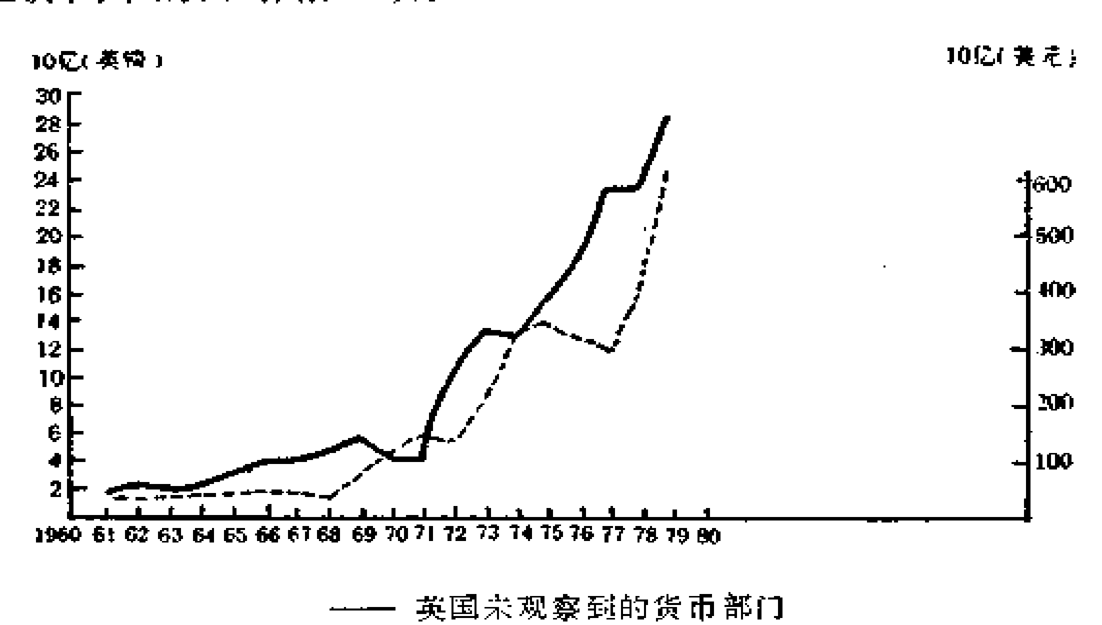



**图 2.4 英美两国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 1960—1979 年**

资料来源：法伊格，1981 年。

未观察到经济的样本的有效性在于，从范畴上可以证明图 2.3 中所示的信息反馈的不同类型。政治—经济过程的规范模型承认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但这类模型却错误地作了以下假设，即信息流不受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未观察到经济的例子表明了信息系统本身如何可能受到侵蚀，以致产生错误的社会指标，从而在

公民或政策制定者方面产生错误指导的行动。

## 未观察到收入假设的政治含义

关于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和不断增长的未观察到经济的假设，可以部分地解释专业经济学家们面临的某些自相矛盾的异常现象。同样，它有可能说明政治学研究文献中的某些实证性异常现象。麦克兰肯(Mc Crachen, 1973)在引用密歇根调查研究中心（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Finding）的结果时，已经提到下述情况：然而，这些反应的显著特点是，在人们对于他们自身经济状况普遍持有的观点中所反映的乐观主义要大大超过他们关于经济与政治环境所持观点中的乐观主义。如果个人参与地下经济活动没有在总的经济活动的社会指标中得到反映，这就代表了对总的经济状况的理解和对单个个人经济状况的理解之间的差异的可能的解释。然而，特别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是，总的经济指标对政治声望的影响，远远大于个人对于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理解。费奥里那（Fiorina）揭示了"过去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以个人的经济状况作为研究材料的不足之处和自相矛盾的后果。"(1981)。弗雷（Frey）则宣称："由统计部门收集和公布的有关经济状况的实际数据，在众多的功能中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在我们接触到的经济指标中，那些涉及到总的经济状况的指标所起的作用要大于那些侧重于反映个人经济状况的指标。"(Frey and Schneider, 1981)。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人对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估价，远比他们对总的经济状况的估价乐观，然而，在选举决策中，他们则更主要地依赖于经济指标，而不是凭他们个人的经验感受。但公众如果过分相信经济指标，就会忽视个人经济状况会影响政治反应这一因素。⑨这种可能性表明，不仅社会指标产生错误的信号，更不祥的是，公民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使用了这些失真的信息。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和过度悲观的经济预期。如果政治和经济行为不是由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Wilensky, 1981），更主要的是由显示与个人经历不一致的信息的社会指标决定的，那末，我们就必须对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合理”决策的基础重新认真地作出估价。⑩

## 观察者：职业行为和官僚行为

简单的信息模型假定，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分离的，而且是无利害关系的执行者。事实上，两者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自身的利益并影响对社会指标的测估，最终还要把这种利益倾向性输入到公共政策之中去。例如，观察者（职业官僚、社会科学家、负责收集和汇总信息的政府机构）试图测估官僚行为的意图，就有可能歪曲“受调查者”的行为。一个组织的高层人士想测估下属官员的意图就会改变这些下属者的行为和活动。下属必然会竭力逃避观察，改变其行为，转向上司所信任的和有奖励的活动。同样，官僚机构或者要末是

把他们的行为纳入到测度的行为之中(这种行为会服从于组织的明显的目标),要末立即面临处罚:削减预算和人员、否决必要的资金、整顿组织、或者甚至掉了乌纱帽。

进一步讲,某种行为(支付美元、建筑楼房、雇用人员)的硬指标也许与机构的法定目标并不完全相联系。这种行为被政府生产的增加值量度所强调,它假设政府支出的美元数是国家对社会福利所作贡献的一种指标。⑪

测度官僚行为反馈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法庭上对抗辩过程的改革——允许讨价还价。这是治安部门的一种组织上的变革,是为了适应官僚和政治上的需要,以此去提高已断案与未断案的比率——"清案率"(Clearance rate)。这种衡量的方法又对受调查者(罪犯和警方)的行为变化提供了刺激。罪犯坦白地承认了更多的犯罪事实,以此来获得警方的低调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清案率"本身就受到影响。这样,涉及犯罪根源和法庭管理的公共政策,就要受到被解决的犯罪案件的虚假膨胀的影响,其原因是受到了虚幻的行为信号的影响。(Skolnick,1966,第8章)。

此类例子中还没有一个怀疑官僚机构的诚实,相反,我们的论点是假定官员们是一群专业人员,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所偏颇,为的是促进政府机构的目标,其中一个正当目标,是保护由合法的立法机构确定的司法权。公共项目和公共机构被给予组织上的自主权,以考虑到责任性,其中包括测估有效行为的能力。如果官员们缺乏自主权,就更难设计出对此类行为的可测估的指标,因为负有责任行为的组织界限会得不到明确的限定,无论是对法律监督或者是政治监督来说。这是在制定组织行为的社会指标过程中内在固有的困境。这

一观点的基点是，官僚机构内在的刺激，不可能产生一种可以寻求最佳经济指标的途径。

我们对称之为观察者的行动者的许多行为特征在名为“估价研究”的论文中进行了分析。犯罪统计和法庭上的讨价还价仅仅是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接触到的进行“估价研究”的两个例子。尽管这里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具有实际价值，它们仍然受到严格的专业化研究所固有的扭曲并取决于数量指标。例如，随着教育资源向硬科学部门的转移，以及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出，社会科学家迫切地感到需要出版有关这方面的具有某种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技术的著作。对于数据产生的先决条件作过分深入细致的考察，其结果最好的可能是延缓出版，最坏的可能是根本就无法出版。⑫ 人们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刺激因素，以便随时接受可获得的信息资源的数据库以及分析这些信息，从而得到统计上的明显结果(Feige, 1975)。

## 政策制定者：精英对政治参与的反应

在政治机构和公共官僚机构中的“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过程的相似性，更加大了处理一个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地下经济的困难。约束官僚和执法人员行为的各种刺激因素，使他们难以发现关键性经济指标的缺陷并以此进行行动。政策制定者用来估计公众意愿和偏好的常规的经济指标，往往要末是调查结果，要末是选举结果。这二者

都有可能被同样的无反应和样本偏差所困扰，这就会削弱数据的可靠性和认识偏差的潜在能力。⑬

简单的信息模型的假设是：政策制定者希望从官僚机构那里得到客观的资料数据和客观的信息反馈，除了记录下公众的偏好和制订出能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外，政策制定者并无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此处再次说明一下，我们前面所称之为政策制定者的成员，事实上是一个由政治和行政管理精英们组成的一个复杂的联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举团体和职业兴趣。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并不要求有精确的数据资料。由于可直接和通过文件记录去获得"事实"，因此关上了那些想逃避"可能否定"下场的退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经常使用这种办法。例如，他的行政部门和职能机构并不想知道驻外行政机构的行贿受贿情况。

同样，通过立法机关或其他政策制订机构去建立一个机构或设计一种程序的办法也并非是一种公正的方案。经常性的情况是，政治家们建立程序和他们的官僚机构只是象征性地应付公众的压力，而并不给这些程序以足够的资金和权威去完成所委任的职责。在竞选场所，他们可以申辩，他们已经通过建立这些方案尽到职守和责任，应该在下次竞选中得到回报。通过建立官僚机构，政治家们就可同时推卸责任，因为不称职的责任就落到他们控制之外的机构头上；而这些政治家则又可捞到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这样一个名声作为政治资本。

此处相关的一点是，不论是职业政治家还是职业官僚，都不会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精确的社会指标"上。产生我

们上面简要阐述过的多种反馈后果的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没有一个政治或政府机构会由于他们自己的集团利益去修正这些失真的信号。

## 无反应问题

政治精英们通常假定，对调查没有反应的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公民将会作出反应，缺乏反应就等于是满意的，或者没有能力去行动，或者不愿意介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不存在政治上的威胁。

对精英们和对社会科学两者来讲，对于无反应者的可能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测估可能是相似的。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经济调查中，对调查的问题无反应的比率占到24—40%。典型的情况是，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是假定那些没有反应的人的反应和那些对调查做出反应的人的反应具有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的特点。

在更精确的研究工作中，把响应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已知人口数值进行比较，以便把更具信息性的数据归之于对无反应者的所谓的归算值。然而当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响应者之外，具有典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无反应者也会从事一些重要的不同的行为时，这种解决方法是不适当的。在违法或“准合法”活动的情况中，这种事前的假设似乎是极其可能的。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建立在各种调查方法上的（与间接的宏

观模型方法对立的方法)关于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估计数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调查较多地受到无反应者偏差的干扰。

然而，如果无反应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出于意志的行为，那么，任何一个特定的无反应者极有可能是在某些方面下了赌注的人，就必然地不能把他们作为对社会“无利害关系”的公民排除在调查之外。传统的处理这类遗漏信息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它们不能说明无反应者的自我选择，也无法估计无反应者的回答中的偏差的程度。⑭

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其他经济指标的建立过程，最明显的是国民帐户，它依赖于对收入和支出的估计数的调查统计。⑮在每一种情况下，无反应至少部分是“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的一种结果。无反应和低报收入与支出代表着引入社会指标中的种种信息偏差，这是由“受调查者”的行为导致的一种直接结果，“受调查者”又被其以下直觉所驱使：认为政策制定者能够进行调整，课税，或者相反，能够影响这些无反应者和低报收入者的行为，作为报告规定要求的一个结果。

## 信息—行为反馈

在政治学中，人们认识到，公众舆论式的民意测验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改变人们的看法，一是在公开报道观点的时候，二是在公众对“什么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作出反馈之后。

人们往往对他们认为会是什么的结果作出最有效或是最合理的反应。在有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在民意测验中呈上升趋势，它就能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因为人们把它看作一个潜在的胜利者。如果呈下降趋势(当然，其他情况相同)，走下坡路的过程就会加速。这样，关于舆论的观察与报道就是舆论本身的反馈。关于一个政党是否获胜或一个项目是否获得公众支持这样一些舆论报道，同样也会影响政治领导人关于战略、新闻媒介和政策的决策。反过来，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又会或者加强或者削弱关键性舆论制造部门的行为。这种现象已经假设了政治领导人高度公开的行为的极端重要性和公众舆论测度反过来对公众本身的实际上的即刻反馈的重要性。⑯

然而，政治机构在发挥其作用时，公众舆论在有关人们想什么以及在选举中将可能会怎样行动这样一些问题上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测度手段。公众舆论的表达和在某些方面作出反应都是在政治机构的安排下进行的。人们的偏好和政治要求的表达都是通过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渠道来传达的。在一个各政党的力量已从两方面被削弱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是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坚固基础遭到削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强调直接靠近政策制定者——通过新闻媒介作出更为迅速的反馈可能会减少舆论对政治领导人的约束作用，当然，这仅仅是假定把政治领导人看作是受操纵的。⑰然而不考虑这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如果公众舆论是由错误的经济指标形成的，无论它对政府决策有什么影响都会受到扭曲。

## “未观察到的政治”：社会运动

另一个例子是政治与经济的类同。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极为相似，是采用规范的制度化的程序制定的某些尺度来“测估”政治活动的。正如经济活动是通过调查和对经济活动的各种直接测度来报道的那样，政治活动则是要通过选举和相关的政治参与的立法机制来报道的。政策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在任何时候，整个选举是在妥协中和根据组成政府的各政治联盟的政策来估计选举结果的。正如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测估，假定所有重要的经济行动都得到测估一样，选举行为的报告也假定，全部重要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最终都将登记在选举投票箱中。

如果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的未参与投票者的不合作、不满意，以及如果未参与投票者有能力和准备以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形式（即任何非法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以外的还未登记的行为）重新介入政治体系，有效的执政同盟就无法形成。

政治上与未观察到经济相应的，是未观察到政治的发展，从传统的代仪制形式如选举、政党和立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个人参与政治的行为。临时性的为某一问题争论而展开的运动、围绕新问题所形成的社会运动——最近的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堕胎运动和冻结核武器运动——成为表达政治意识的具体形式。这样一些运动建立在流动的政治认同上，而不是依赖于传统的政治象征去获得支持。党派忠诚

的传统象征(即民主和共和)不再把个人系于一个政党，或者甚至系在一个政府上，并且保持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信条。流行的渐进政策试图改造意识形态。从政治上来看的左派与右派，在选举过程中不再把政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进行选择。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这种更紧密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与大量人口被结合进这些制度中去的情况相配合。相反，正如经济活动中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是不可能用赖以形成政策的社会指标进行精确测定一样，政治活动中也有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不能用有关政治参与程度的制度化量度加以说明。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中的某些部分是否是对传统的申报行为的可察觉的"成本"的反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就像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普遍不信任，导致未观察到的政治运动一样。或者，政治行为不能被现有的政治制度所测度，这就为政策制定者处理未观察到经济的后果造成更大的困难。

## 严格的专业化以及制度之间相互依赖的失败

观察者一受调查者一政策制定者反馈的后果由于综合的理论上的困难，和对问题的经验性的挑战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科学中的专业化是基于如下假设的。存在着一群相对自主独立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按习惯被称之为"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或者"文化"等。关于现代社会性质的基本假设(各学科在这些社会中得到发展，并首先证明专业化

是合理的)，是各种制度变得更具有差异性，以适应专业化的职能。假设非正式的亚系统确定一个科学研究对象(一个领域)并且成为研究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因素、行为和制度的各学科的中心。⑱

所有如上差异，可以历史地看作是一种与经济增长、个人自由、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以及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相联系的积极的和进步的趋势。“功能失调”事实上已经被认识到了——社会稳定的传统基础在衰退以及旧式的对人们行为的社会控制形式遭到削弱——但是，这些功能失调被看作是暂时的、滞后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对这种“功能失调”的认识，部分地得到了某些专门的社会科学的帮助。如果这些“功能失调”被限制在一个给定的制度领域里，它们就会从两方面得到补偿：或者是通过进一步的专业化(扩大差异)来削弱“结构性紧张”，或者是通过一种制度的“介入”来恢复源于其他制度功能失调而失去的均衡。

整个系统的“不完善”可被看作是在任何一个制度或子系统中允许存在的一个可观察的误差量。公众舆论作为一种修正机制发挥作用，以此来约束政治领导人的行为。经济体系可以发挥最低的管理职能。国家主要是保护市场和生产制度，缓和社会冲突。社区和家庭都要服从于经济增长和萧条的影响，但是，若需要提供基本的福利必需品，国家就将介入。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假定(也是一种惯例)：在人类智力的范围内，其他领域的机构对本领域的作用是正常的，在他们自己的专业分析中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影响。

## 信息扭曲的后果

甚至在一些理论专题文章中也认为反馈是一个系统问题。关于数据精确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考虑。⑲我们已经给出的例子是对经济活动、公众舆论、官僚行为中的“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的分门别类的说明。在任何一个单独的严格界定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理解这种综合影响的。

这一观点必须加以强调。每一个涉及经济活动、公众舆论和官僚行为的社会测度的惯例，都必须依赖于(必须这样假设)社会测度的结果，甚至它本身就是社会测度的产物。这些惯例基于如下前提：存在着(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一些客观的测度方法来解决人们收入多少，他们是否在工作和他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这些问题。如果存在多向反馈，那末，有效的社会测度问题和寻求一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分析框架的问题就合而为一了。

在公众舆论、组织行为、经济活动领域内的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订者反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关这类反馈的分析不能假定它们是互不相关的。如果公众舆论、国家机关的行为能力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这些社会指标同时以不相关连的方式受到扭曲，就会明显地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由于仅仅在各个专业化领域对这些问题有所察觉，已经建立的社会估测机制还没有彻底掌握这些问题，甚至社会科学分析家们也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些问题，政策制定者同样如此。

一些人可能持不同观点，认为未观察到经济构成一个安全阀。人们能够放弃在观察到经济中的选择权而到未观察到经济中去寻找就业机会，这就提供了流动性和不断增加的选择。但这种看法并没有考虑到关于这种行为的累积的社会心理后果。如果人们开始蔑视法律而行动，不再受社会约束，即使假定在短期内经济方面的用意是良好的，但从长期来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许会遭到侵蚀。尽管重税和繁杂的规章制度可能是解释隐形经济不断增长的理由之一，但正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Feige, 1980)。随着党派认同意识的削弱和执政党的腐败，社会和政治的异化越来越明显。当政治上的疏远与经济刺激相互发生作用时，就可能达到社会凝聚的容忍阈。

国家政策制定者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强大的利益集团，来自保持经济效率的一般要求，来自允许大众参与的民主程序的立法体系的需要。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从内部去制订出一个用于收集精确的社会测度的合理程序。

## 总　结

由于我们的部分论述是基于从社会指标中推导而得的数据，另一部分则是对其有效性的评论，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70 年代显示的社会指标并不全部

都是虚幻的假设。相反，正如规范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未观察到经济的扩张可能确实与社会瓦解和政治放任这些较重大的政治问题相联系的。这些背后的社会指标涉及到的是一种真实的趋势。犯罪率和离婚率在西方世界扶摇直上。主要党派的认同感实际上已经下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联盟的稳定性也是一样。这种趋势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其含义、原因及其后果仍然是模糊的。这些趋势也许与未观察到经济的增长有联系。对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问题的概念上的说明主要是针对关于社会科学中关键的经验性指标明显的反常现象的一般假设。

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的结果之一，是扭曲了社会指标并发出了经济危机征兆的信号。有关这种可能性的征兆是来自于政治学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扭曲的社会指标会影响政治决策。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初始的统计偏差会成为实际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误。理性的个人正在将其决策建立在不合理的信息基础上。因此，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危机"证据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信息系统的缺陷，而信息系统的缺陷本身又是在结构中产生的。

信息的定量研究和统计技术的引入，产生了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和计量经济学。$T$- 统计技术、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取代了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的纯理论分析和定性分析。进行纯理论和定性分析的杰出代表，如马克思、亚当·斯密、韦伯和托克维尔等，他们的理论没有数量化的支撑。现在已经是需要提出新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对定量化事实的质量本身提出质疑，而不是简单地去进一步放大这类事实本

身。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须对基于不合理信息基础上的合理行为的相关意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问题可以扩展到涉及公共政策，和研究设计尤其是评估研究的其他专门的社会科学领域。

现在所需要的是依据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这一假设对我们的基本的数据资料重新进行估价。有关一个社会的概念，就其总体来看，由各亚系统的反馈组成，这就要扩大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概念的范围和相关的数据资料。我们希望，在不否定专门人才的作用的前提下，恢复通用人才的合法作用和相应的各种类型合法信息和证据的重要性。事实上，未观察到经济的直接的、大量的例证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不同领域内的专家们是根据他们自己学科的观点去理解他们的。我们的初步努力是把一个跨学科的复杂问题的各种片断拼凑起来，这依赖于各专门学科提出的见解和提供的数据资料。这些片断单独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分析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来讲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迅速的变化正在产生着种种逃避传统估测模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形式。信息是理解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关键。我们必须使用同样的努力认识到，要对社会系统有所认识，就需要对我们自身的信息基础有所认识。

注　释：

① 心理学家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复制自然科学。甚至心理学家也

卷入到关于"可靠性"、精确性以及科学性研究之间的根本性辩论之中去了(Gibbs, 1979)。论战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如何、能否使基于经验数据产生的发现有益于现实世界的状况。

② 见法伊格(1982 b)的著作。我们的论文是对肯尼思·布尔丁(Kenneth Boulding)重要观点的延伸。他一再宣称，社会系统的知识是系统动态行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Boulding, 1917 1)。更有特殊性的是，坎贝尔(Campbell, 1974)列举了一些他称之为"定量指标的侵蚀性影响"的例证，他们重要观点中所隐含的内容，并没能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躯体，政策制订者们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其意义(Campbell, 1965)。

③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3月刊，1982年第3期)报道，赫伯特·雅各布(Herbert Jacob)和罗伯特·L·莱恩伯里(Lineberny)的研究表明这一点。他们对10个城市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把360个城市中5万多人作为选择的变量进行了研究。

④ 《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资料》(1952—1978年)，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安·阿伯·密歇根。

⑤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指标直接触发政策反应，如在"自动稳定"的情况下。此处，预先存在的规则是，缩短政府相机决策的网络，以便消除政治过程反应的滞后期。工资和薪金指数对于价格指标、名义税表、失业补贴，以及指数化的社会支付是明显的例子。

⑥ 参见麦吉和法伊格(1982年)、法伊格(1981年)、戈登(1981年)。

⑦ 在某些学科中已经认识到这类影响，已经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法来减少这类反馈的特定影响。医学实验考察"药物的安慰作用"(药物自身无效，但可对患者产生心理疗效——译者)以及估价研究文献对估测系统的设计(该系统把测估手段的滥用降到最低限度)具有的重要贡献(Campbell, 1974)。社会学

和心理学关心它们的“审慎的测度”以期尽量减少“观察者”对“受调查者”的影响。

⑧ 例如，经济分析局(Parker, 1984)已经对税源的申报误差作了改进性的调整，总计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误差为815亿美元，对个人收入调整数为693亿美元。

⑨ 里普塞特(Lipset)和斯彻奈德(Schneider)对近来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发现“人们对其自己生活状况的估计始终很高，尽管他们对政府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从总体上已经恶化了(第402页)。然而他们两人都接受失业、通货膨胀、生产率这些经济指标的有效性，利用它们来解释有关基于公众对美国政府机构信任丧失的调查数据。

⑩ 标准的经济学观点被阿罗(Arrow)很好地表达出来了(1951)，他假设“个人的价值被作为一种资料，并不会被决策过程本身的性质加以改变。”他强调这是经济理论中的“标准的观点”。显然，那种假设是有问题的。

⑪ 关于在官僚机构的报告中记载的受到“污染”的统计资料中的相关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在预算审查中可被用于评价官员行为的特定数据资料，在胡德(Hood)和达西尔(Dunsire)的研究中出现过(1981, pp 28—36)。尽管他们不想让那些模糊的信息干扰系统的经验性分析，但他们主要观点之一仍然是：由于有关人员配备、预算、司法、计划程序和法律机构的信息几乎不可能发现以及相互关联，甚至几乎还没有办法去确定一个“部门”。

⑫ 最近，从最好的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学著作中得到一些例子表明，有关国民收入、失业和公共部门大小的基本数据是基本准确的，这种假设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无需讨论。如果是由“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的反馈”导致了偏差，这种偏差又与一些自变量和因变量一起发生系统的变化，就有可能严重地影响结论。但这已经是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外的事了。见坎麦伦(Cameron, 1978)。

⑬ 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学论文辩护道，建立在确切的“社会指标”之上的合理的社会政策，毫无疑问，包括了资料的有效性，或由“观察者—受调查者反馈”产生的基本信息的被“污染”和扭曲的可能性。当然，整个论点假定，收集有关社会和经济趋势的确切数据的可能性是不成问题的。

⑭ 无反应问题在近来的计量经济学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人们采用了一些重要的新方法来处理此类问题。见海克曼(Heckman, 1979)。这种观点不仅对选举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使用调查方法测估未观察到经济的规模的研究更有突出的意义。一般来讲，调查方法所产生的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估计数，其大小总是低于间接宏观模型的估计数。

⑮ 例如，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数据，关于收入问题调查的家庭无反应率从1970年的14%增加到1976年的26%，见法伊格(1980, p.35)。

⑯ 与这一问题有关的部分反应是，法国在选举前一星期不允许搞民意测验。

⑰ 政治学家凯(Key)在其关于美国的创新的民意研究中(1961)讨论了“联动机制”和“反馈”问题，但并没有考虑“观察者——受调查者反馈”的可能性。就其基本点来看，他的反馈概念包括如下两方面的相互影响的思想：政治领导人试图“规范公众舆论，使其朝着支持(政治)计划和政治的方向发展”，以及通过公众的偏好“向政府施加影响，同时也接受来自政府的影响”(p. 422)。凯关于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精妙分析，是一个关于信息的机制控制模型的说明。例如，他说：“就舆论的前因后果而言……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消极因素；它把将有可能采取的行动界定在一个范围之内，但不能肯定是否会采取这种行动。”

⑱ 在政治学的规范著作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都认为国家具有制定政策的合理能力，有专门的收集精确的经济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从哲学观点对这些研究文献作

出批评的是柯拿里（Connolly，1981），他论证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主流政治学家们“轻描淡写地……把公民划定在一个特定的框框里……从容地抽象出了政治经济的行为”。

⑲ 尽管蒂斯耐(Deustch，1966)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到了反馈概念的重要性，他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定义为观察者一受调查者一政策制定者反馈的过程中基本数据受到系统污染的可能性。



# 政策失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未来纳入统计的经济部门

在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都被高失业、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所困扰，而在80年代，高利率和庞大的政府赤字又成为主要问题。宏观经济现象的实际观察结果与力图说明这些现象的传统理论的不一致，使经济学界因此清醒过来，意识到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对传统理论进行的特别修正及对滞胀和不断上升的赤字的创造性解释，使经济学家对众多已成定论的学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由于对这些经济病症的根源和治理对策缺乏一致意见，面对不断恶化的局面，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茫然无措。很明显，60年代学术界的乐观主义已经被70年代的经济滞胀蒙上了阴影。后十年的前景将取决于正确诊断前十年病因的能力。

60年代，美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是2.8%，平均失业率是4.7%，而在70年代，则分别达到6.6%和6.2%，60年代热情洋溢的经济学界以为可以把具有通货膨胀与失业相互替代特征的经济调节好。70年代，由于出现

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的特有供给冲击，通货膨胀与失业空前增长，醒悟过来的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其原因。他们煞费苦心地阐述理性预期理论和自然失业率理论，用以说明经济政策的失灵以及大型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失败。货币主义者寻找借口，声称其主张未得到完全的实施，而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则将其归咎于货币学派教条的传播。新的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经济模型中采用严格的理性市场出清约束，甚至像凯恩斯主义者一样，把市场不完善和行为非理性当作滞胀的原因。长期盛行的需求导向宏观理论尽管有些勉强，但还是仓促地接受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承诺。在这种知识界的大混乱中，不管作出多么积极的努力来挽救失败的理论，棘手的经济现实都将使这番心血徒然无功。

最近，法伊格又提出了另一个假说（1980 年， 参见第 1 章），对观察到的经济现实与已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日益扩大的差距，作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未登记收入假说认为，需要重新审视的或许是经济现实而非经济理论。在这种假说看来，未登记经济的增长扭曲了发出现行经济不适信号的官方经济信息系统。随着经济活动从登记部门转到未登记部门，像实际经济增长率、就业和生产率这样一些基本经济指标就可能被低估。由于逃避政府数据收集机关审查的增加的激励和偏好，假申报和不申报现象在个人之间和企业之间已经成为一种通病，社会指标因阿尔弗德和法伊格（第 2 章）描述的“观察者—受调查者反馈”过程而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经验材料表明，未登记经济规模很大，而且，70 年代在许多高度发达国家它还在继续扩大。

未登记收入假说的前途在于它对经济不适的现状提供了

另一个视角。把重点从对普遍接受的理论的重构转到调查经济“事实”的可靠性上，这个视角提出一组完全不同的问题，并寻找立即可能与传统理论和经济现实都一致的答案。

如果是社会指标本身的错误，给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传送了误导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必须弄清这种扭曲的性质和程度，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发出系统性错误信号的信息系统本身。一旦我们意识到，如果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受到系统扭曲，那么即使是理性的个人和决策者，也会产生非理性行为，我们就可以仍然坚持已是多数理论基础的理性行为假设了。

对经济系统的动态描述需要详细说明预期形成行为。我们不是以基于非对称性幻觉上的假设来代替预期以理性方式获得的信息为条件的假定。而是探讨以不合理信息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形成的后果。在经济和经济研究者中可能存在的一个根本幻觉是假定作为行为动因的经济事实是精确的，至少是无偏差的。未登记收入假说在观念上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它提出了会扭曲用以描述经济系统的信息基础的动态社会机制的另一特点。

由于高边际税率和其他成本较高的政府管制，个人和企业就有隐瞒其经济活动，不让政府资料收集机关知道的经济激励。尽管单个经济活动当事人对他们自己经济环境仍有相对准确的信息，但他们仍要凭借广泛的社会指标来估计总的经济环境。调查结果表明，个人对他们个人的经济状况要比对总的经济状况乐观得多。这正是根据假报告汇总的资料得出的经济不适的统计幻觉进行预期的结果。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居民对错误的信息信号做出反应，这就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不适。因此，就需要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考虑日益增

长的未登记经济和探索这种现象对经济系统动态学所产生的影响。

法伊格(1980年，第57页)对建立这样一个模型提出了一些意见：

该模型要体现各种与部门间资源转移有关的激励和成本……该模型要说明个人、企业和政府对以前所述方向上发生系统偏差的官方信息作出反应时的动态行为。这种模型要能够说明，对该系统产生的诸如供给冲击、提高税率或政治幻灭之类的外部冲击会诱使登记经济部门和未登记经济部门间发生重大转移。这种转移反过来又会影响官方统计，诱使滞胀症状出现，而这些症状接着又可能导致使滞胀幻觉变为现实的滞胀。与传统的均衡假设不同，这种模型试图确定假设的动态不稳定发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本章就是把这些思路的一部分引入标准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主要考虑“政策幻觉”的效应，即政策制定者不考虑未登记经济的存在而只对观察到的经济信息做出反应的过程。我们将证明，在广泛可能存在的某些条件下，仅仅依据登记部门收集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政策，尽管意愿良好，也会导致登记经济部门出现滞胀。未登记部门增长会产生经济衰退征兆，由于政策幻觉，这种征兆会转化为实际滞胀。

本章的目的不是参加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争论，而是说明怎样把未登记部门导入现行宏观模型，以对宏观动态学形成另一种认识。有鉴于此，我们在文中用一个简图来说明未登记经济部门的外生和内生增长的影响，重点放在对错误信息做出反应的政策后果上。作为图示分析基础的技术模型放在附录中描述。分析经济基本模型选用了美吉的（Mcg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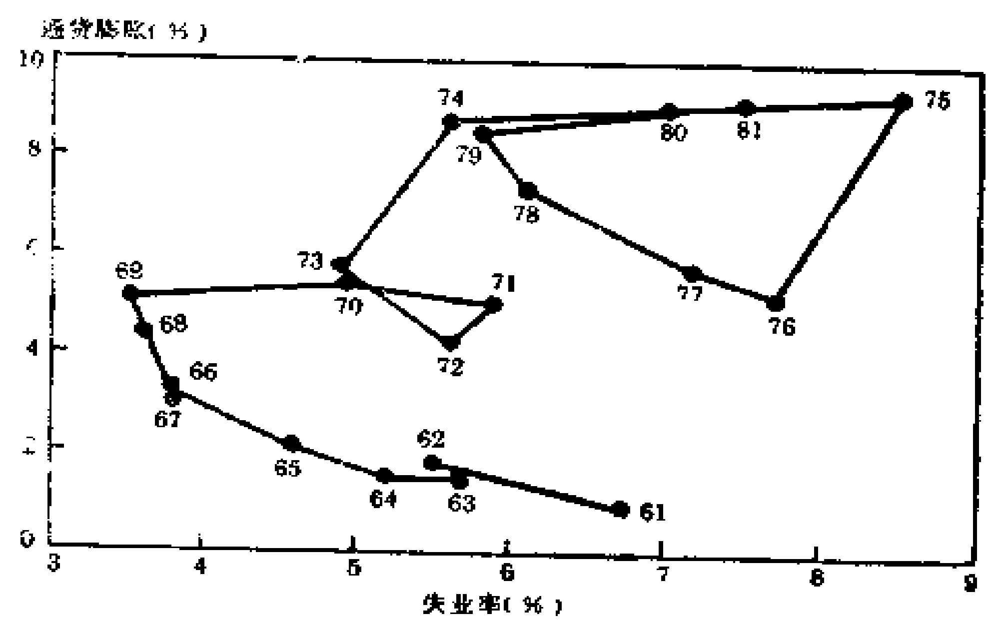
1982)模型，并将其扩展为既包括登记的经济，也包括未登记的经济的模型。基本模型是总收入决定的动态模型，它是以包容理性预期和自然率模型的货币中性结果及由托宾式资产效应和税收导致的供给效应带来的货币非中性结果及由托宾式资产效应和税收导致的供给效应带来的货币非中性结果，因此，该模型能够考察向下倾斜、向上倾斜和垂直的菲力普斯曲线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 问题的性质

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家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显然是由于受到对现实经济生活观察的启发所致。正如凯恩斯的"通论"是实际经历大萧条的产物一样，近来的理论研究也打上了近20年经济记录的烙印。记录于政府的官方统计，并很容易根据通货膨胀率和失业水平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总结。如图3.1所示，在60年代，在失业率稳定下降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只有轻微的上升，接着的10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不断上升。

60年代的经济学家把这期间较令人满意的经济记录归功于他们自己对政策控制变量的灵活操纵，而70年代的经济学家则把这一时期糟糕的经济记录归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和政策失误。在这两个时期，经济记录本身就没受到过怀疑。

法伊格(第1章，图1.6)测估了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货币的未登记经济的相对增长。测估结果令人吃惊的是，未登记经济从1966年开始的急剧增长，除两次暂时性中断外，



* 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率变化已作价格平减。

**图 3.1 通货膨胀与失业率**

资料来源：商业部和劳工部。

在整个 70 年代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测估结果表明，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未登记经济在有登记经济中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在 70 年代，未登记经济相对的急剧增长可能已经导致了近来政府统计的系统扭曲，而这些统计是政府政策的重要信息基础。因此，我们准备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至少前面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府统计所发出的错误信号。

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了关于对基于信息的预期形成的限制问题，以使预期与一般均衡模型一致。我们的目的是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即，当系统本身受到扭曲预期形成所用的信息基础的未登记的外生增长的冲击的时候，理性预期一般均衡系统的性质应当如何修正？进而言之，登记的活动向未登记的活动转移属于系统自身的内生变化时，这种系统又具有

什么性质?

全章所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技术附录中进行了详细说明，正文中，我们拟对该系统在另外的若干假设条件下的动态特征用图示法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 垂直的菲力普斯曲线与充分就业政策

我们先考虑具有垂直菲力普斯曲线经济状况，货币当局担负着最积极的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在图 3.2 中一个初始稳定的经济，在 $A$ 点有一个零通货膨胀率——充分就业的均衡点。建立的模型符合流行的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即当货币增长率 $\dot{m}$ 等于实际收入增长率 $\dot{y}$ 时，稳定就会出现。只要 $\dot{m}=\dot{y}$，就能维持初始的充分就业——零通货膨胀率均衡点 $A$。任何把失业率 $U$ 拉到自然失业率 $U_n$ 之下的做法都会引起沿垂直菲力普斯曲线的运动，通货膨胀率提高，但对失业率 $U_n$ 却不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现在考虑未登记经济一次性的外生增长的后果。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诸如越南战争或水门事件之类的外部冲击，就能触发从登记部门向未登记部门的转移。收入和就业从帐面上消失了，以前在登记部门就业的个人转向未登记部门，声称他们自己失业了。由于对于所有的通货膨胀率，登记部门的失业都增加了，因此，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便向右移动。新观察到的失业率是 $U_1^o$，这又诱使货币扩张到 $\dot{m}_1$。货币当局的反应在第四象限表示，是一种积极的周期政策。货币供

给增长率提高，通货膨胀率提高到 $\dot{P}_1$，因为货币增长率现在超过了实际收入增长率。新的均衡得以建立，实际失业率仍在先前的水平 $U_n$ 上，观察到的失业在 $U_1^0$ 上，而通货膨胀率却升到 $\dot{p}_1$。因此，总就业构成从可观察到的就业到未登记的就业的一次性移动所产生的影响，使经济从可观察的位置 $A$ 变到幻觉位置 $D$，并将保持在那里，其结果就是出现滞胀。尽管实际就业没有变化，但观察到的失业却上升了。而且通货膨胀率实际上也有上升。如果对公众信心的外部冲击继续发生，或者如果公众对政府的政策意向不存在幻觉，观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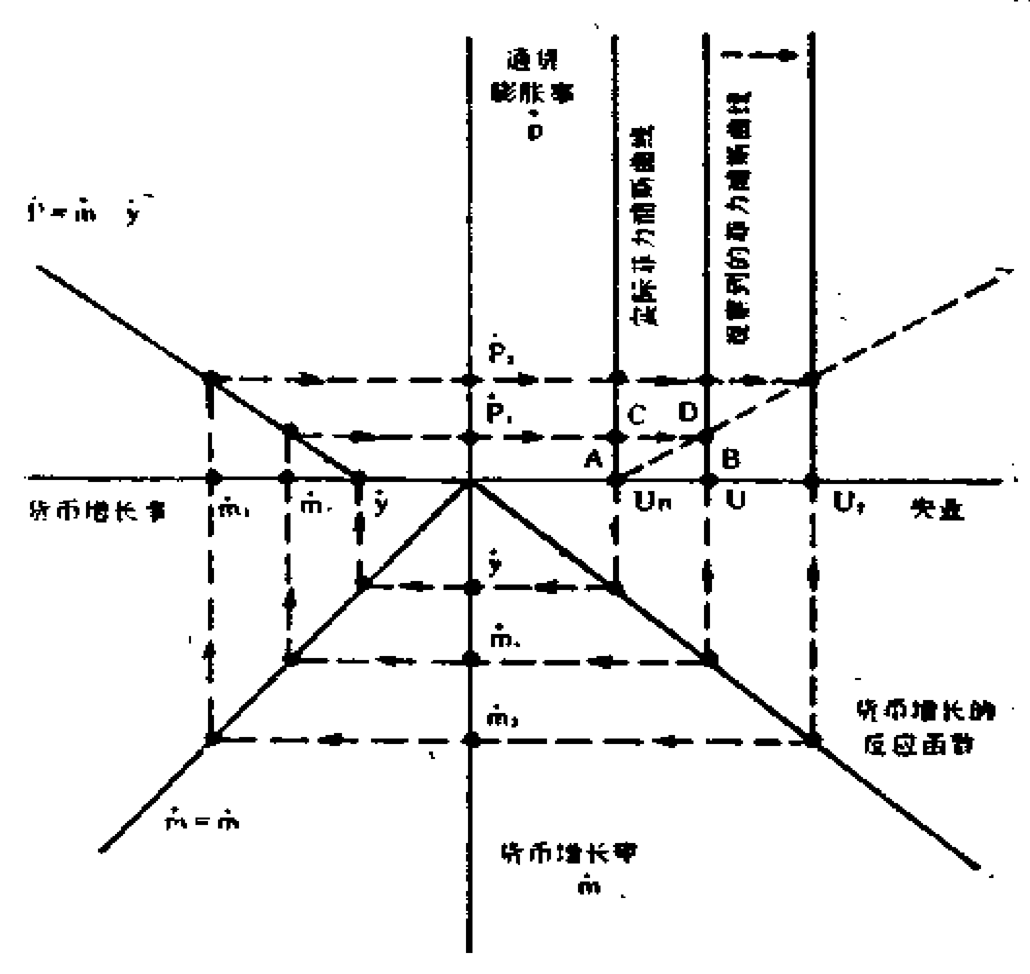



图 3.2 未登记经济部门的外生变动效应。这里的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货币政策是反周期的。

的菲力普斯曲线就会进一步向右移动，那么，这个过程将重复进行。观察到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加深的通货膨胀会把经济移到像 $E$ 这样一个新的可观察点。未登记活动的第一次外生增长都会刺激起另一轮通货膨胀以及更高的可观察失业率。因此，尽管实际经济完全是以通过 $A$ 点的垂直菲力普斯曲线为特征，但观察到的滞胀却会沿点 $ADE$ 向上倾斜的菲力普斯曲线。

## 向上倾斜的菲力普斯曲线

如果图 3.2 中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伴随着因税制指数化不当而造成的高实际税率，那么，就会给政策制定者又增添上一层麻烦。如果因供给方面的负效应，提高税率会降低产量和就业，那么，长期的菲力普斯曲线将向右倾斜，反映失业率随通货膨胀加剧而上升，对一个通货膨胀诱使税率上升的经济，可用图 3.3 中向上倾斜的菲力普斯曲线来表示其特征。像前面一样，我们仍把零通货膨胀的均衡位置用点 $A$ 表示，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 $U_n$，而且，$\dot{m}=\dot{y}$。未登记经济的外生增长将导致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向右移动。在通货膨胀率为零时，观察到的失业率在 $B$ 点为 $U_0^o$。当货币当局对观察到的高失业率做出反应，增加货币供给时，通货膨胀率便被推进到 $\dot{p}_1$。由于假定实际税率因通货膨胀诱导的纳税等级上升而提高，因而实际供给效应将把实际失业率提高到 $C$ 点，把观察到的失业率提高到 $D$ 点的 $U_1^o$。观察失业率上升又导致具有产生实际的和观察到的滞胀的非意想结果的“反周期”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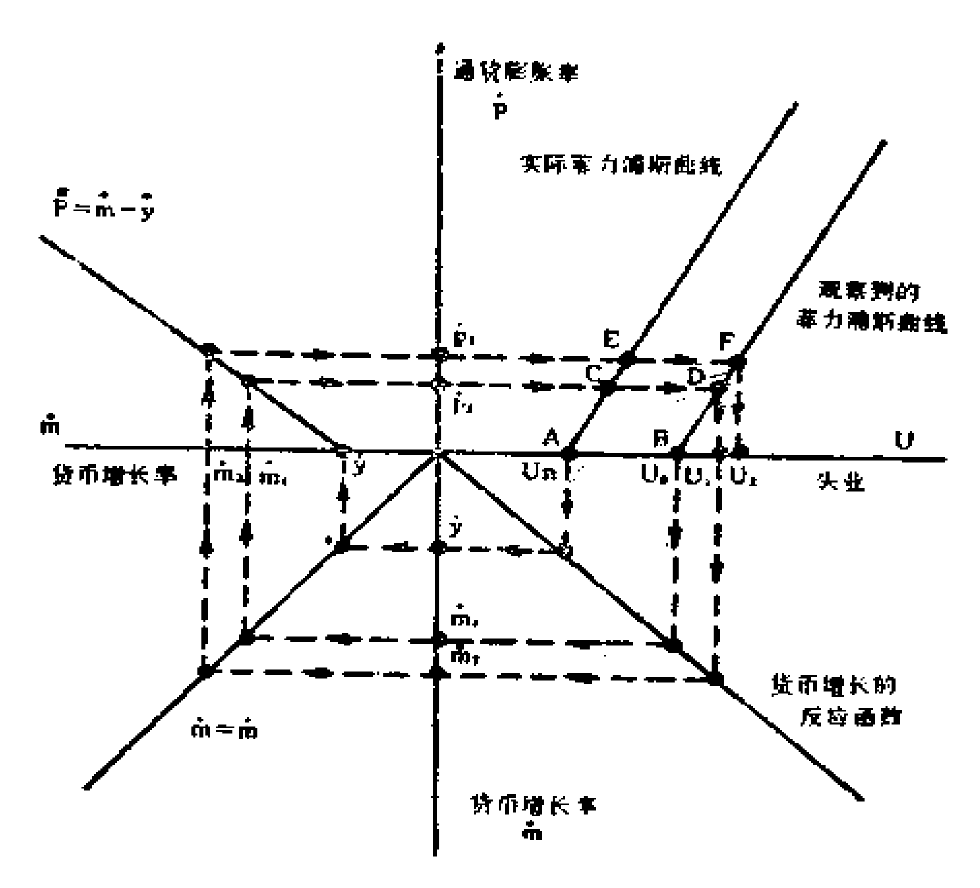



图 3.3　未登记部门的外生变动效应。这里的长期菲力普斯曲线向上倾斜，货币政策是反周期的

策反应。只要货币当局坚持"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就会自相矛盾地导致实际和观察到的滞胀螺旋。如果对系统的外部冲击进一步导致经济活动转向未登记部门，那随着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继续右移，这种向着一个爆炸性系统的趋势将进一步放大。

我们已经证明，由未登记经济的一次性增长引起的信息系统的最初幻觉，能够把否则是稳定均衡的系统变成一个具有实际滞胀激增特征的不稳定系统。经济不适症的纯粹幻觉转化成了现实的经济紊乱。

如果通货膨胀引致的税收增长又刺激了未登记经济部门

的内生增长，那麻烦就会进一步增加。直到现在，我们都认为未登记经济部门好像是完全外在地由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对政府的态度不变，那么未登记经济就有可能仅仅是出于为对付提高税率而隐瞒更多收入的经济刺激而增长。

为了说明这种内在性，我们考虑法伊格和麦吉在1983年所描述的简单未登记经济模型。我们假定，经济结构上与登记经济相同。因此，我们暂时忽略这两种经济之间效率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

假定代表性家庭对这两个部门产品的偏好能够由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表示：

$$U = CY_0^{\lambda}Y_u^{1-\lambda} \tag{3.1}$$

未登记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 $Y_u$ 的定价低于登记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 $Y_0$ 的定价。价格折扣率就等于税率 $\theta$，这种价格差别由这样一个假设保证，即未登记经济部门中的竞争迫使价格与逃税产生的较低的生产投入成本相一致。

代表性家庭决定不公开的收入额由等式（3.1）的极大化决定，收入约束为：

$$I - Y_0 - (1-\theta)Y_u = 0 \tag{3.2}$$

登记部门产品被看作为计价物的话，未登记部门产品就按 $1-\theta$ 定价。

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要求：

$$\frac{\lambda}{1-\lambda} = \frac{Y_0}{1-\theta}Y_u \tag{3.3}$$

因为总产量受下面等式约束：

$$Y = Y_0 + Y_u \tag{3.4}$$

其中 $Y_o$ 希文 $Y$，而 $Y_u=(1-Y)Y$，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等式(3.3)改写为

$$希腊字\ Y=\frac{\lambda(1-\theta)}{1-\lambda\theta} \tag{3.5}$$

其中 $Y$ 为可观察部门的实际产量份额。

由等式(3.5)可知，观察到的部门在总产量中的份额随税率上升而下降，随对其产品的偏好(λ)增强而增加，偏好参数(λ)反映包括信任和道德在内的对待政府的各种社会政治态度，因为偏好总被看作是既定和固定不变的，所以将这参数用显式置入效用函数，就可以引入通常在经济学中不予考虑的非经济定性效应。

等式(3.5)提供了税收政策和未登记部门之间的必要联系。在一个实行累进税和指数化不当的经济中，实际税率会随着通货膨胀提高。这种税率的内生提高对登记和未登记部门间收入分配的影响，除了传统提高税率会减少劳动和资本供给的供给效应以外，还会减少税基。

图 3.4 说明通货膨胀引起的税率提高导致向未登记部门内生移动的后果。与前面一样，我们从在 $A$ 点的零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均衡开始分析，用向未登记部门的一次性外生转移来扰动系统。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移向具有观察到的失业 $U_0^o$ 的右边位置，作为对观察到的失业水平上升的反应，货币当局(以充分就业政策为已任)提高货币增长率，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dot{P}_1$ 上，个人被推入更高的纳税等级，有效提高实际税率。诱致的高税率能够分成两个独立的效应。第一个效应为纯粹供给效应，使经济沿实际菲力普斯曲线从 $A$ 移到 $C$ 点，沿观察到的菲力普

斯曲线从 $B$ 移向 $D$。

无论实际还是观察到的失业都上升了，因为出于对更高税收等价的反应，生产要素减少了供给。除了这种纯供给效应外，还由于少申报收的激励更大，因而产生由登记部门向未登记部门的引致的移动。向未登记部门的这种内生转移表现为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向右旋转到 $BEH$ 轨道。由 $U_2^0$ 所代表的较高的观察到的失业率可以分解为由最初的向未登记部门的外生转移造成的虚幻失业增加 $U_0^0-U_n$ 和从 $B$ 点到 $D$ 点移动所代表的失业的实际增加。它反映了引致供给方收缩；税收引致的向未登记部门的转移进一步造成了虚幻失业增长（$D-E$）。综合影响把观察到的失业提高到 $U_1^0$，这反过来又刺激货币扩张。如图 3.4 所示，继续坚持充分就业的积极货币政策会产生滞胀螺旋，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实际和观察到的失业。可见，向未登记部门的内生性转移进一步加深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

有三个因素能说明我们描述的问题。第一是因向未登记部门转移而产生的信息扭曲。第二，是继续坚持本身是由错误信息触发的积极的反周期政策。第三，我们有了税级潜升效应。对问题的确认本身就表明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第一个条件须找到区分触发政府政策社会指标的实际的变化与想象变化的方法。一旦明确了，政策自动调节器就能重新确定标准，以将虚幻性的失业增加考虑在内。此外还可以为消除通货膨胀诱致的实际税收增加而把税制指数化。税制指数化建议已纳入里根政府的税收计划中，但现在受到对于较高非立法税收的政治压力的威胁。最后，图解澄清严格坚持积极的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危险性。尤其当这种政策显然达不到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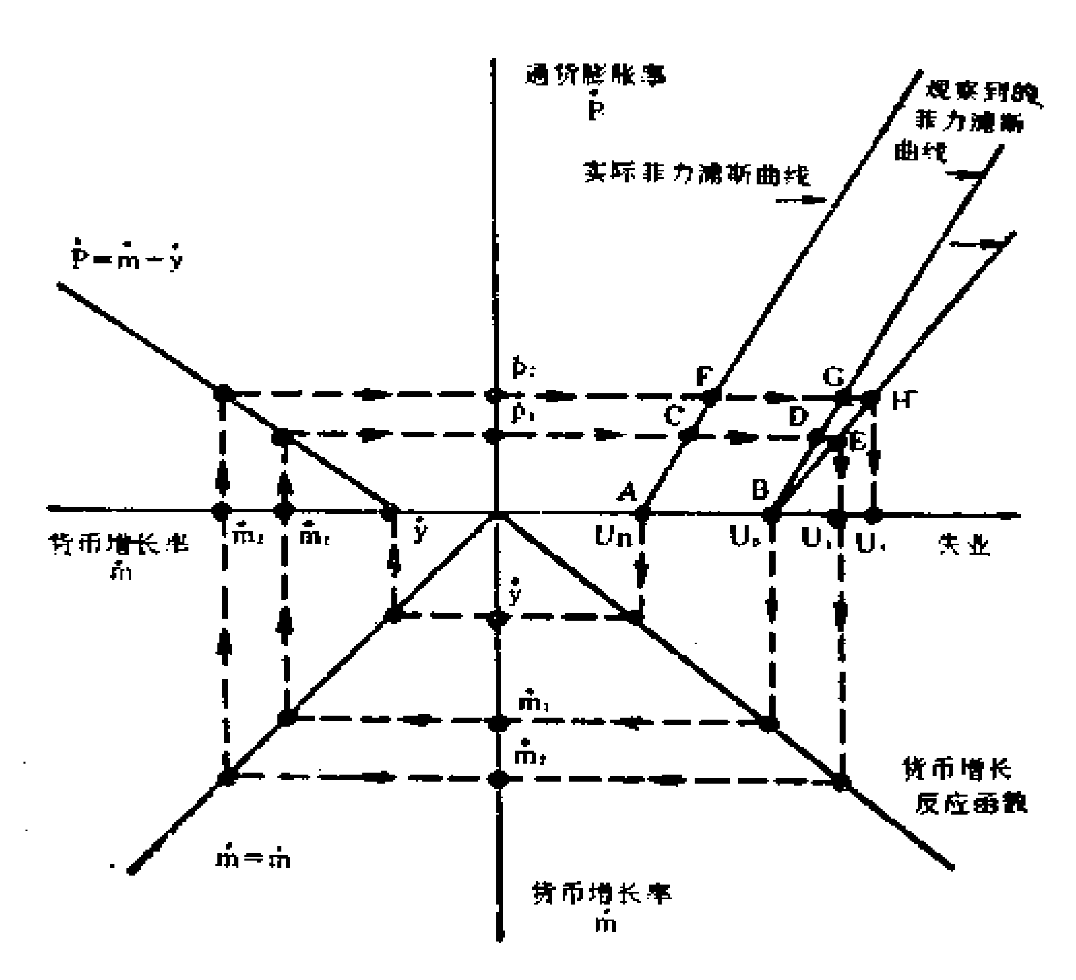



**图 3.4　向未登记部门的外生和内生转移的效应向上倾斜的非力普斯曲线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

时，这种危险性就更大。这些例子说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观察到的公开经济活动向未登记活动的转移，在精心考虑的政策制定者指导下的健康经济也可能陷入一种严重滞胀境地。

对这种动态滞胀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转而采取某种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这种政策变化在图 3.4 中可以用在选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使之与横轴平行的货币增长反应函数的逆时针旋转表示。新政策将使通货膨胀的上升螺旋发生逆转，从而逆转税级潜升

导致的未登记经济活动的增长势头，然而，如在下一节的论述中将看到的，得出税制指数化和放弃充分就业的货币政策会无代价地解决未登记活动增长所造成的问题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 价格稳定目标与财政自动稳定器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一个货币当局执行积极的反周期政策的经济中，经济活动不断转向未登记经济部门所产生的后果。在这样的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操作一般是稳定利率，而允许货币增长率有较大的波动。当私人信贷需求受到调节而政府赤字部分通过货币发行解决时，即使名义利率随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利率往往也会相对偏低。70年代当货币政策根据上升的信贷需求而调整时，就是这种情况。

1979年10月，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货币总量增长的新政策，利用货币控制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武器。因赞同货币主义者通过严格控制货币增长来减少通货膨胀的建议，货币政策放弃了稳定利率与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这种政策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实际利率的上升，这成为美欧争端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这一节的目的就是要探讨在货币当局通过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严格执行价格稳定政策的经济中，经济活动转向未登记部门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货币政策不能再借助货币扩张来适应政府信贷需求，因此，财政赤字必须通过大量

地向公众借债来弥补。由于货币政策现在以价格稳定为目标，收入和就业稳定的担子就更多地落到财政政策上。我们假定，财政当局将主要借助于自动稳定器，在失业时期增加财政开支。同样，在萧条时期，由于是固定税率，税基缩小就会使税收缩减。

图 3.5 描述了在货币政策以价格稳定为目标和财政政策以自动稳定器为基础的经济中，经济活动外生地转向未登记部门的结果。我们假定货币机关为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稳定在某一较低水平上而成功地使货币增长规则固定。于是，通货膨胀率在随后的分析中就可以不予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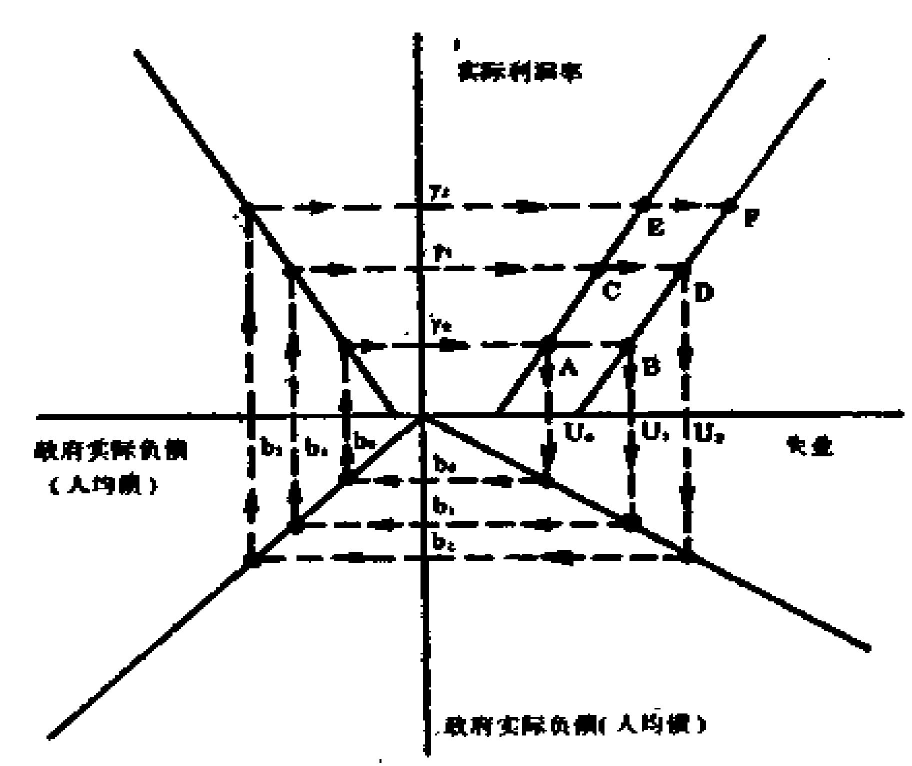



图 3.5　未登记部门的外生性影响。此处货币政策服从价格稳定目标，财政政策依赖自动稳定器机制

图 3.5 中，第一象限的 $ACE$ 线代表与模型中的均衡一致的实际利率和失业率的轨迹的实际利率较高的失业率相联

系。因为经济生产能力随着实际税率提高而降低，随着实际利率上升，以前在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机会消失了，这就导致经济中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

第四象限代表失业水平与人均实际政府负债水平间的内生联系。随着失业率上升，税收因所得税税基缩小而下降，但与此同时，政府开支却要增加，以满足失业救济和其他与萧条有关的社会支付增加的需要。既然货币增长固定，税收短缺就必须靠借公债来弥补，这就增加了对利率的压力。我们把均衡的失业与政府负债的轨迹表现为一个简单的线性函数，然而，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由于现有债务的利息支付提高，曲线可能成为政府债务增长快于失业增长的非线性曲线。这种效应会大大加强随之产生的后果。

图 3.5 中，第二象限表示政府债务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均衡关系。由于借贷增加会提高实际利率，这种均衡轨迹也向上倾斜。$A$ 点代表最初的均衡点，在此点上，失业率为 $U_0$，实际利率为 $r_0$ 的，筹措未偿政府债务资金所需的借款 $b_0$ 与现行实际利率相适应，因此，整个经济现在处于均衡状态，货币增长维持了某种固定的通货膨胀率。

与前面一样，我们现在向未登记经济外生转移的后果。因为就每一利率而言，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失业水平都更高，因而转移的结果就是导致 $ACE$ 线朝右移向 $BDF$ 线。观察到的失业率上升是一种幻觉，因此对系统的实际值没有独立的影响，然而，根据观察到的失业作出调节的财政政策在 $U_1$ 时会自动产生更大的赤字。政府借款增加到 $b_1$ 将迫使利率增加到 $r_1$，利率提高对供给方面的影响是，实际失业增加到 $C$ 点，观察到的失业增加到 $U_2$ 点。只要自动稳定器机制

是由观察到的失业率提高所触发的，政府借款就会增加，从而迫使经济沿着利率更高和失业率更高的不稳定方向发展。均衡通货膨胀未受影响，仅仅是高失业的幻觉造成了高利率和高实际失业率。使利率和失业轨迹向右移的进一步冲击会使不稳定状态恶化，像由于对政府信任下降而产生的地下活动内在增长所会导致的一样。

模型表明，最有希望摆脱这种预料中的高利率和萧条恶性循环的方法就是割断使错误的失业信号自动引发政府债务增长的联系。如果问题的原因被确诊为信息扭曲，就可以通过独立衡量经济活动转向地下部门对官方数据造成的不准确程度来加以纠正。一旦正确测度到信息扭曲的程度，就能调整政策规章以消除前述动态不稳定性。

反之，如果根本信息扭曲未被发现和错误地以为是政府债务增加导致问题的产生，那么，就可能建议采取放弃甚至颠倒自动稳定常规的政策。在萧条时期，政治上反对直接要求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只会排除这种政策选择，剩下的选择就是对既不受实际也不受所认识到的经济状况影响的债务膨胀实施武断限制。最近实施的格雷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 Act)中的减少赤字目标就体现了这一政策。它既没有看到错误信号问题，又潜在地破坏了自动稳定机制的有益的稳定效果。

必须纠正的根本问题是助长预期不稳定性的信息系统功能的恶化。要么，我们必须找到经济和政治手段重使民众自觉遵守服从政府税收法规和政府数据收集机关（使所有活动都属于公开经济部门），要么，我们必须承认，地下经济的信息扭曲效应，适当考虑地下部门的影响，从而调整政策措施。

## 摘要与结论

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70年代出现的某种重要因素导致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紊乱与政策无效。滞胀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经济政治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已经注意到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加强了对其原因和治理对策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也作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充分就业的货币政策目标转向价格稳定目标。我们考察的模型表明，在面对地下经济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变化能够以高利率和赤字膨胀来缓解滞胀问题。

地下经济假说认为，以前提出的许多问题可能离题太远，因为问题可能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试图解释事实的种种理论。前面的分析是向力图把根据提出另外一套问题所得出的一些直觉理论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考虑了由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所造成的指导政策的信息系统扭曲这种可能性所引起的后果。我们证明，只要这些政策是根据错误系统信息制定的，不管是采取强力行动的反周期货币政策还是以传统自动稳定机制为基础的财政政策，都只会产生破坏稳定而不是意想的稳定效果。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说明了可能系统地扭曲社会指标的总机制。地下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表明，在美国，在70年代，就是这种机制在发挥作用。

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的全部影响只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因为它既影响预期又影响现实的经济政治行为，但我们仍相信，我们至少建立了一个能够把起初的统计错误变成经济不稳定现实的简单机制。而且，我们还揭示了有关货币主义者政策的理论争论可能使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但即使货币学派观点正确而且其政策也付诸实施，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我们认为，未来的政策问题必须对地下部门的增长及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进行认真考察。一种讨论可以采取规范形式，经济活动转入地下部门的成本与利益和政策的制订是鼓励还是抑制该部门的增长。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将集中于税收实施、税收改革和最优税率问题，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可能更关心公德退化及不受管制机构管辖现象增长的后果。这里提出的模型力图既考虑经济刺激又考虑社会政治因素。

确已清楚的是，不论社会学家的规范观点如何，对社会学家们来说，都存在有待其解决的与准确量度和合理解释社会指标有关的实证问题。对目前论据扭曲程度更为科学的理解是消除我们已经证明可能产生重大不稳定后果的信息错误的最大希望。消除地下经济部门从而恢复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或者正确测度现行扭曲程度并据之重新调整政策措施，就可以避免政策失误。两种方法都产生了新一组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它们能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我们试图要证明的就是，就其目前构成而言，信息扭曲能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当货币政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时，信息扭曲的结果就是使滞胀更加恶化。当货币政策以价格稳定为目标，而财政政策旨在自动稳定收入时，结

果又可能是带来更高的赤字和更高的利率。然而，根本问题似乎既不在于理论上的缺陷，也不在于政策药方不灵，因为在我们所描述的两种经济体制中，只要社会测温器精确提供正确信息，政策就能成功地取得稳定的结果。然而，一个扭曲的信息系统能够破坏一个已稳定经济系统的稳定，而且，这种扭曲的预期后果与我们在现今经济中观察到的广为一致。

## 第三章附录：对本章图示结果的数学模型证明

### 1．模型说明

这个模型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本章正文中的等式(3.1)—(3.5)决定整个经济活动(划分为公开和地下两部分)。附录中的等式(A.1—A.10)决定产出的总水平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等式(A.1)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得出在时间 $t$ 产出为 $y$。等式(A.2)和(A.3)把实际要素总报酬与生产函数所示的要素边际产量联系起来。这些等式分别决定劳动和资本需求。

等式(A.4)根据预期税后实际收入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得出财富所有者想在下期积累的非货币资产。等式(A.10)表明非货币总资产 $A_{t+1}$ 由实际债券 $b_{t+1}$ 与实际资本 $K_{t+1}$ 组成。为便于说明，我们不采用一个单独的债券需求函数以及债券和资本具有不同实际收益的可能性，而是把债券和资本当作完全替代物。这意味着债券和资本的税后实际收益率相同。因此，债券和资本都算入非货币总资产。等式(A.4)是一种说明非货币资产积累是如何随税后实际利润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化而变化的储蓄函数。

## 等　式

$$Y_t = K_t^{\alpha} N_t^{1-\alpha} \tag{A.1}$$

$$R_t = \alpha Y_t K_t^{-1} \tag{A.2}$$

$$W_t = (1-\alpha) Y_t N_t^{-1} \tag{A.3}$$

$$A_{t+1} = B_0[(1-\theta_K)_t R_{t+1}]^{\beta_1} ({}_tP_{t+1}/P_t)^{\beta_2} Y_t \tag{A.4}$$

$$M_t/P_t = C_0[(1-\theta_K)_t R_{t+1}]^{-\alpha_1} ({}_tP_{t+1}/P_t)^{-\alpha_2} Y_t \tag{A.5}$$

$$N_t = N_0 \exp^{nt}[(1-\theta_L) W_t / W_f]^{\delta} \text{ for} (1-\theta_L) W_t \leqslant W_F \tag{A.6}$$

$$N_t = N_0 \exp^{nt} \text{ for} (1-\theta_L) W_t \geqslant W_F \tag{A.7}$$

$$M_t = m(\pi D_t) \tag{A.8}$$

$$b_t = (1-\pi) d_t \tag{A.9}$$

$$A_{t+1} = b_{t+1} + K_{t+1} \tag{A.10}$$

## 模　型　变　量

$t$ = 时间指标

$y_t$ = 在 $t$ 时的实际总产量

$K_t$ = 在 $t$ 时的实物资本存量

$N_t$ = 就业

$R_t$ = 资本和债券的税前实际收益率

$W_t$ = 实际工资

$P_t$ = 在 $t$ 时用货币表示的产品价格水平

${}_tP_{t+1}$ = 在 $t$ 时预期的下期价格水平

$A_{t+1}$ = 本期财富所有人愿意持有的实际债券和资本

$M_t$ = 名义货币供给

$b_t$ = 面向公众的实际债券供给量

$D_t$ = 累积的名义财政债务

$d_t$ = 累积的实际财政债务

$n$ = 劳动力增长率

$N_0$ = 初期的劳动力

$\theta_t$ = 劳动所得税率

$\theta_K$ = 资产(即债券、资本等)所得税率

$W_F$ = 充分就业时的实际工资

$m$ = 货币乘数

$\pi$ = 中央银行货币化的赤字份额

$\beta_1$ = 考虑预期税后实际收入的非货币资产需求弹性

$\beta_2$ = 考虑预期通货膨胀的非货币资产需求弹性

$\alpha_1$ = 考虑非货币资产预期税后实际收益的货币需求弹性

$\alpha_2$ = 考虑预期通货膨胀的货币需求弹性

$\delta$ = 考虑税后实际工资的劳动供给弹性

$a$ = 科布—道格拉斯劳动系数

exp = 带自然对数 1 的数字

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使有息资产较之无息货币要优，后者的实际负收益随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增加。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放弃货币资产的替代选择就是费雪在 1979 年所称"托宾效应"的一个现象。它为预期通货膨胀通过刺激资本形成而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提供了一个潜在机制。

等式(A.5)是与替代资产即债券与资本的预期实际收益优势成反比关系的实际余额需求函数。此外，等式(A.4)和(A.5)使总资产积累随实际收入水平升降而升降。

等式(A.6)和(A.7)描述了劳动供给函数。劳动供给被假定为正向取决于劳动税后实际收入 $(1-\theta_L)W_t$。要获得有限劳动力固有的劳动供给极限，实际工资 $W_F$ 就必须高于使整个劳动力愿意工作的水平。换言之，存在某个工资率，使整个劳动力供给垂手可得。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假定整个经济在税后劳动实际收益小于工资 $U_F$ 的环境中运行；即，工资率上升会诱使劳动供给增加。劳动供给对净工资变化的敏感性由参数 $\delta$ 表示。如果 $\delta$ 等于零，劳动供给就无弹性，从而在任何工资水平上都会有完全劳动供给。

等式(A.8)是货币供给函数。货币基础 $\pi D_t$ 是政府债务总额 $D_t$ 被货币化，亦即被中央银行所购买的份额下假定货币基础通过银行系统创造存款而乘以因子 $m$。

等式(A.9)表示用实际条件表示的可作为债券发给公众的政府剩余累积债务$(1-\pi)D_t$，政府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或作为债券卖给公众而货币化。

要确定模型，就有必要具体说明货币增长率和政府债务增长率。我们把确定货币增长率称为货币政策，把确定赤字的称为财政政策。本章正文图示分析可以通过考察我们在刚刚给出的代数模型中所说明的政策行为效应来说明。

### 2. 菲力普斯曲线和货币政策

模型中稳定均衡的特征是相对价格、税率、人均实际收入和资产固定。就稳定状态的均衡会涉及实际收入水平。资本、债券、货币和劳动力的增长而言，这个模型又是动态的。劳动力的增长率决定收入和资产的稳步增长率。如果劳动力没增长$(n=0)$，那么，稳定均衡就处于一种实际变量值固定的静态状态，但是名义值将随货币增长率变化。

当劳动力增长时，人均实物资产存量和收入在均衡中是固定的；但是，这就要求实际收入和资产存量与劳动力同步增长。因此，劳动力增长的稳定均衡要求政府实际债务与劳动力一同增长。如果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变，那么，这就要求政府实际债务不变。然而，名义政府债务必须随货币供给而增长，以提供货币基础维持公众实际持有的债券、资本和货币之间资产平衡。

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有关的长期菲力普斯曲线也暗含在模型之中。由于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增长率减除实际收入增长率，因此，这一菲力普斯曲线直接与货币政策相联系。短期反应和货币增长的意外的瞬间冲击效应也能加以分析。

为了推导假定在稳定状态下完全可以预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均衡关系，我们用(A.1)(A.2)中的$y_t$，同时把当期预期值换成下期收益率，得到

$$ {}_tR_{t+1}=a(K_{t+1}/N_{t+1})^{a-1} \qquad (A.11)$$

把(A.11)代入(A.4)替代${}_tR_{t+1}$以及把(A.1)代入(A.4)替代

$g_t$，得到

$$A_{t+1}=\beta_0[(1-\theta_K)a(K_{t+1}/N_{t+1})^{a-1}]({}_tP_{t+1}/P_t)\beta_2K_t^aN_t^{1-a} \tag{A.12}$$

在稳定均衡中，$K_{t+1}/N_{t+1}=K_t/N_t$，$N_{t+1}=(1+n)N_t$，因此，

$$\frac{A_{t+1}}{N_{t+1}}=\frac{\beta_0}{1+n}\left[(1-\theta_K)a\left(\frac{K_{t+1}}{N_{t+1}}\right)^{a-1}\right]^{\beta_1}\left(\frac{{}_tP_{t+1}}{P_t}\right)^{\beta_2}\left(\frac{K_t}{N_t}\right)^a \tag{A.13}$$

对(A.13)取自然对数，对均衡状态下的资本/劳动比率求解，我们得到

$$\ln\frac{K}{N}=\frac{1}{(1+\beta_1)(1-a)}\{\ln\beta_0-\ln(1+n)+\beta_1[\ln(1-\theta_K)+\ln a]+\beta_2\mu-\varepsilon\} \tag{A.14}$$

其中，$U$ 是稳定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变量，$U=\ln({}_tP_{t+1}/P_t)$，而 $\varepsilon=\ln(1+b/K)$。(A.14)中的 $\varepsilon$ 代表替代储蓄形式资本积累的政府债务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实际债务越大，人均资本积累水平越低。

改写(A.6)得出就业率为

$$E_t=\frac{N_t}{N_0\exp^{nt}}=\left(\frac{(1-a)(K_t/N_t)^a(1-\theta_L)}{W_F}\right)^\delta \tag{A.15}$$

其中，我们用(A.1)—替代(A.3)中的 $Y$，替代后(A.3)代替(A.6)中的 $W_t$ 得出(A.13)式。要表达现就业比率，我们把(A.6)除以劳动力规模。

对(A.15)式取自然对数，我们得到

$$e=\delta[\ln(1-a)+\ln(1-\theta_L)-\ln W_F]+\delta a\ln\frac{K}{N} \tag{A.16}$$

其中 $e$ 是稳定就业率的对数。

将(A.14)代入(A.16)替代 $\ln K/N$，我们就得到通货膨胀 $U$ 和就业率 $e$ 间长期菲力普斯曲线间关系(A.17)：

$$e=\delta[\ln(1-a)+\ln(1-\theta_L)-\ln W_F]+\frac{\delta a}{(1+\beta_1)(1-a)}\ln\beta_0-\ln(1+n)+\beta_1[\ln(1-\theta_K)+\ln a]+\beta_2\mu-\varepsilon \tag{A.17}$$

就 $U$ 对(A.17)求导，稳定通货膨胀率为

$$\frac{de}{d\mu} = -\left[\frac{\delta}{1-\theta_L}\frac{d\theta_L}{d\mu} + \frac{\delta a\beta_1}{(1-\theta_K)(1-a)(1+\beta_1)}\frac{d\theta_K}{d\mu}\right] + \frac{\delta a\beta_1}{(1+\beta_1)(1-a)} - \frac{\delta a}{(1+\beta_1)(1-a)}\frac{ds}{d\mu} \qquad (A.18)$$

等式(A.18)给出了该模型菲力普斯曲线的斜率公式。

如果 $de/du>0$，那么，通货膨胀率提高就会提高就业率（或降低失业率）。这是传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菲力普斯曲线权衡取舍情形。如果 $de/du<0$，那么，提高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低就业(或提高失业)率。这是稳定滞胀情形。其后，如果 $de/du=0$，则自然失业率假说就得到证实，即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图 3.2 设菲力普斯曲线垂直。图 3.3 采取停滞菲力普斯曲线形态。我们没有探讨传统的菲力普斯曲线的可能性。哪种曲线比较适合取决于(A.18)式的符号。(A.18)式的符号又取决于两种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提高指数化不当税制的实际税率的通货膨胀效应。如果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各自的供给弹性性 $\delta$ 和 $\beta_1$ 为正，那么，税率提高会减少它们的供给量。这因两个原因导致就业减少：(1) 在税后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减少更少；当提高税率因劳动边际产品下降而减少资本时，在任何工资水平上，对劳动需求都会减少。这些影响包含在等式(A.18)的第一页中。

(A.18)式的第二项是通货膨胀对资本积累产生的积极的托宾效应。这一效应发生的原因是对财富持有人而言，作为一种资产形式，与实物资本相比，高通货膨胀使得现金的吸引力降低。如果这种效应超过了通货膨胀的税收负效应，那么，就业就会随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增加。如果税收效应占居主导地位，那么，就业率就会随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下降。如果两种效应正好相互抵消，那么，长期菲力普斯曲线就变成垂直曲线。麦吉在 1982 年说明了某种效应占居主导地位的条件。

等式(A.18)最后一项影响菲力普斯曲线斜率的大小，但不影响它的正负。理由如下：

$$\frac{ds}{d_1u} = \frac{d}{d_1u}\ln\frac{1+b}{K} = \frac{1}{1+b/K}\,\frac{1}{K^2}\left(K\frac{db}{d_1u} - b\frac{dk}{d_1u}\right)$$

既然内含财政政策假设意味着 $db/d_1u=0$，那 $de/d_1u$ 的符号就取决于 $dK/d_1u$ 的符号，如果托宾效应为主要效应，符号就为正，如果通货膨胀的税收效应占主导地位，符号就为负。

例如，如果税收效应占主导地位，资本就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比率 $b/K$ 就会上升。资产持有中政府债务所占比例提高。由于 $K$ 的下降与 $Y$ 的下降有关系，持有的总资产也会减少。如果 $e$ 保持不变，那就要求 $b$ 和 $K$ 等量下降。由于根据财政政策 $b$ 固定不变，因而，为了平衡资产需求，$K$ 就需要更大幅度地下降。实质上，这就是挤出效应。当政府债务不与经济下降一起下降时，通货膨胀增加带来的就业损失就更大。

另一方面，如果托宾效应占主导地位，$K$ 将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增长带来了资产需求增长，将要求 $K$ 的增长比政府债务与收入水平同速增长时所必需的增长要大些。这种情况下的就业大于 $b/K$ 不变时的就业。总之，(A.18) 的第三项加强了我们模型中两种基本通货膨胀效应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效应。如果菲力普斯曲线垂直，那这种效应就是中性效应。

这些观察运用了以我们模型所描述的特征为代表的经济中的主要实际菲力普斯曲线。如果存在地下经济部门，那么我们可能观察到与实际菲力普斯曲线不同的情形，我们能够把等式(A.17)的实际菲力普斯曲线与分为公开的和地下部门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获得由等式(3.1)—(3.5)和(A.1)—(A.10)所指的可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

可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将根据未观察到的地下部门大小及其如何对通货膨胀诱致的税率上升作出反应而不同。观察到的稳定就业率为 $E^0=rE$。取对数得

$$e^0=e+\ln r \tag{A.19}$$

式中，$e$ 是实际就业率的对数，$e^0$ 是观察到的就业率的自然对数；而 $r$ 是观察到的占实际经济活动的均衡比率。

等式(3.5)把 $Y$ 确定为个人偏好和税率的函数。为简便起见，我们假设对劳动的税率$\theta$和对资本的税率 $\theta$ 相等。用(3.5)式代替(A.19)中的 $Y$，我们得到

$$e^0 = e + \ln\lambda + \ln(1-\theta) - \ln(1-\lambda\theta) \qquad (A.20)$$

实际就业率一定，公开的就业率将依对公开部门产出偏好增强而上升，依税率上升而下降。

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的斜率为

$$\frac{de^0}{d_1u} = \frac{de}{d_1u} - \frac{1-\lambda}{(1-\theta)(1-\lambda\theta)}\frac{d\theta}{d_1u} \qquad (A.21)$$

如果税率随通货膨胀率上升而提高（$d\theta/du>0$），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的斜率将小于实际菲力普曲线的斜率。因此，如果实际菲力普斯曲线向上倾斜，当存在地下部门时，情况似乎就会恶化。如果实际菲力普斯曲线垂直，我们就仍能看到一条向上倾斜的菲力普斯曲线，因为尽管实际曲线是垂直的，(A.21)式表明由于提高税率对地下部门的影响，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仍会呈正斜率。实际菲力普斯曲线甚至可能像常规曲线，但是由于增税产生的公开经济萎缩，会产生一种滞胀曲线的假象。

如果就税率而言，地下部门是外生性的，那么(A.21)就缩减为：

$$\frac{de^0}{d_1u} = \frac{de}{d_1u}$$

且地下部门仅仅导致了实际和观察到的菲力普斯曲线之间的一个平行移动差别。

图3.2和3.3假定存在外生的地下部门，$de/d_1u=0$，$de/d_1u<0$。图3.4假定$de/d_1u<0$，并假定因地下部门对通货膨胀诱致的税率提高作出外生反应，从而菲力普斯曲线斜率也存在一个内在因素。

在财政政策既定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就业的关系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我们下面研究货币政策既定情况下财政政策在模型中的作用。

**3. 财政政策与未观察到的地下经济**

当货币政策(就某一通货膨胀而固定)不变时，地下部门外生增长效应就是在政府开支和税收收入之间产生一个差距。为筹措弥补转移到地下部门的税收损失资金，赤字必然要增加向公众发行债券。一旦达到产生挤出效应和提高利率的地步，就会出现资本均衡水平下降，

降低劳动需求，提高失业率。如果增加政府开支补偿失业者，就会使赤字进一步增加，加剧信贷市场的全面紧缩。

因此，可以设政府开支由外生开支$\bar{G}$，以工资率$\theta$进行的失业补偿和政府债券利息组成。那么，政府总开支为：

$$G_t = \bar{G} + \phi W_T(N_L - G_t) + R_t b_t$$

其中$N_L$是总的劳动力，而$(N_L - N_t)$是失业的劳动供给。

总税入(没有包括地下部门)为：

$$T_t = \theta Y_t$$

模型中的稳步均衡要求政府预算应该在劳动力固定的静态状态中取得平衡，或者在劳动力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未偿付债务额能够与劳动力同步增长。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用静态的情形来说明未观察到的地下经济对失业率的影响。

假设经济最初是处于均衡状态，预算平衡，政府未清偿债务为$b_1$。假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通货膨胀率为零，加上劳动力的零增长，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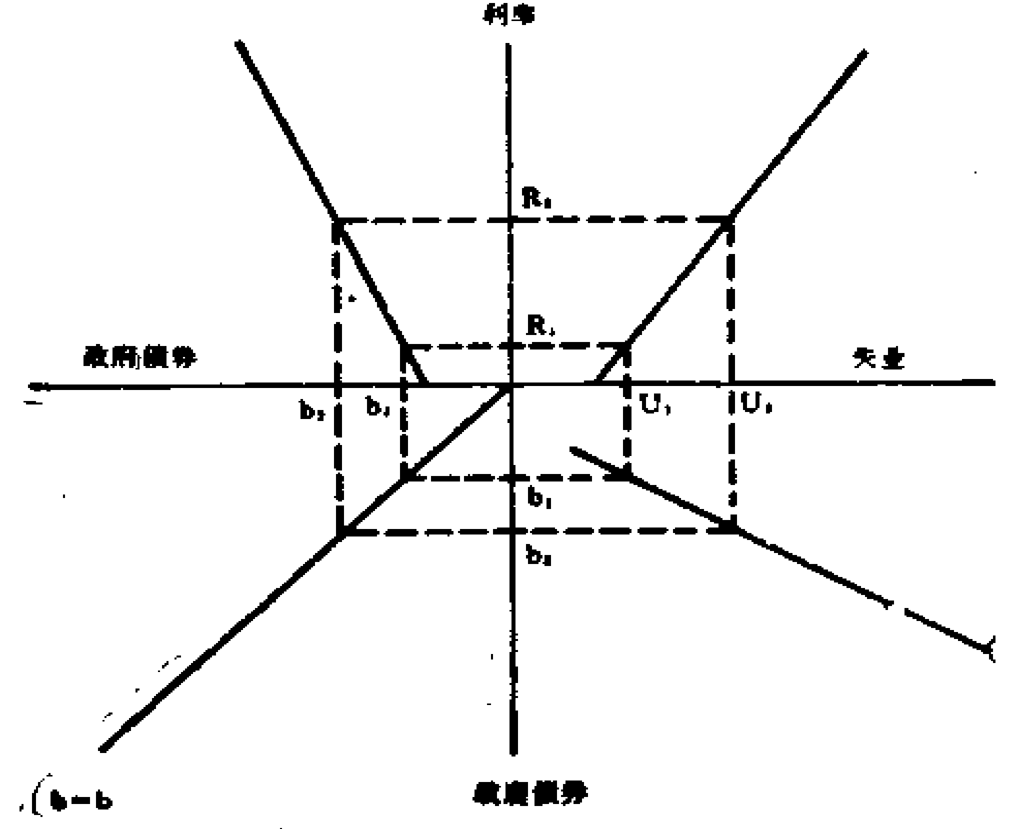



图 3.6 政府债务、利率与失业之间的均衡关系

管货币供给不变。那么，均衡政府预算约束为

$$\bar{G} - T = 0 \quad \text{或} \quad \bar{G} + \phi W_1(N_L - N_1) + R_1 b_1 = \theta Y_1$$

图 3.6 说明了这样一种静态均衡。在公众持有政府债券量一定的情况下，利率 $R_1$ 由资产市场确定。这一利率对应于某一特定资本存量水平，后者与模型中其他关系一道决定了一个失业率 $U_1$。图3.6所画关系用以说明，政府债务非货币化水平日益提高会提高实际利率和失业水平。例如，如果政府债务为 $b_2$ 而非 $b_1$，那么，实际利率就会分别提高为 $R_2$ 和 $U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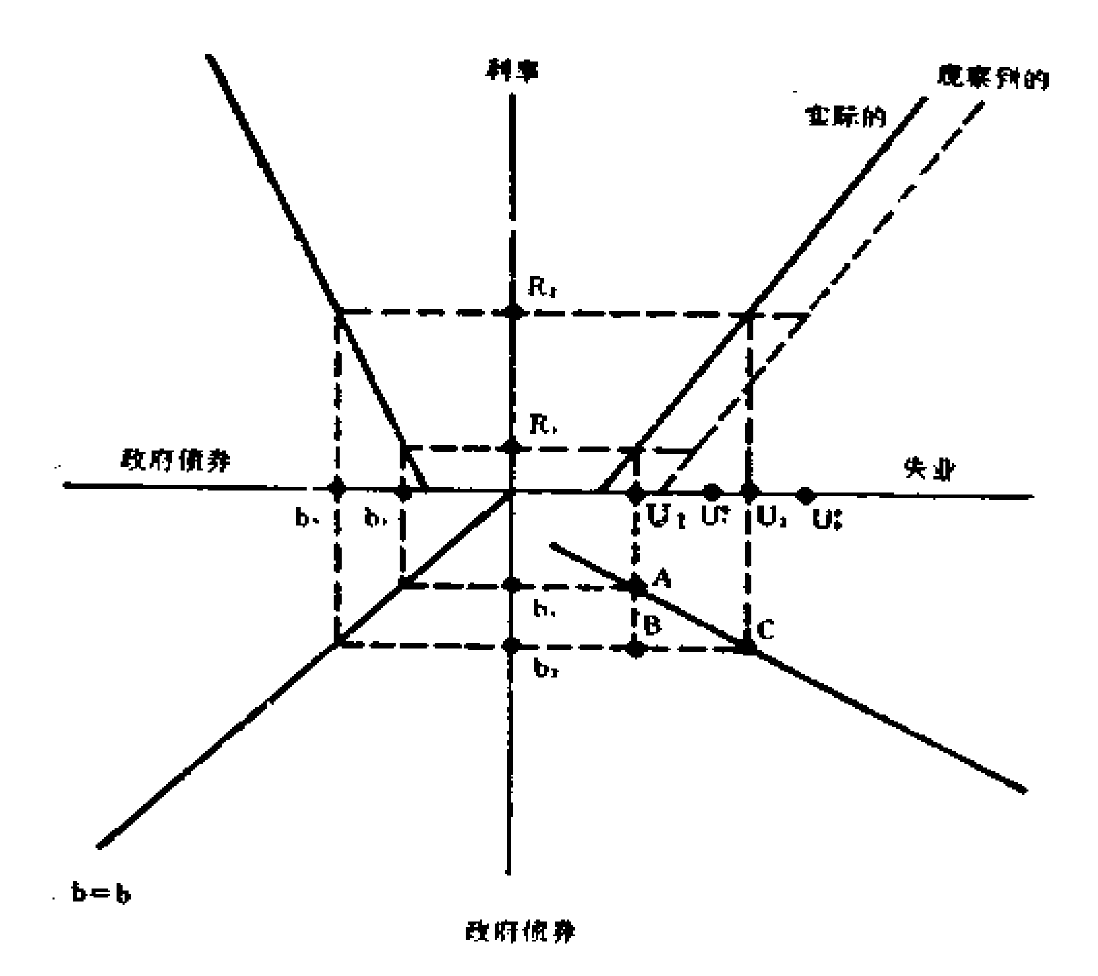



图 3.7 在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和财政政策包括自动稳定器情况下，经济活动外生地转向未登记部门的效应

图 3.7 引入了在每个利率点上，地下经济都使实际失业率与观察到的失业率不一致。这将在货币政策和外生政府开支既定的情况下扰

乱政府预算约束，现在我们有：

$$C-T>0 \text{ 或 } \bar{G}+\phi W_1(N_L-N_1)+R_t b_1>\theta Y_1$$

我们假定只对公开的收入收税，失业补助是根据公开的失业确定。既然 $Y_1^0<Y_1$ 以及 $U_1^0>U_1$，预算约束的右端减少，左端增加，这就意味着财政赤字。

在所举例中，财政赤字不能靠货币扩张来融资，因而，会使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额提高到 $b_2$。

图 3.7 表明，赤字$(b_A-b_1)$——这把债券供给从 $A$ 点移到 $B$ 点——导致了资产市场失衡，由于债券积累储蓄越多，资本储蓄就越少，因此，这就要求利率上升到 $R_2$。这就减少了收入和就业。

如果外生的政府开支 $\bar{G}$ 削减到能在 $C$ 点平衡预算，那么在点 $R_2$，$b_2$ 和 $U_2$，就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这样，观察到的失业就为 $U_2^0$。由于对政府债务积累的影响，地下部门既提高了利率又增加了失业。

如果政府开支削减，没有达到在 $C$ 点平衡预算的程度，那么，债券供给会继续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利率，增加失业。这种可能性会导致图 3.4 中所描述的那种恶性循环。

地下经济诱致的赤字对就业率的影响可以通过考虑债券供给对(A.17)等式求微分得到：

因为 $$\frac{d\varepsilon}{db}=\frac{1}{K+b}[1-n_{Kb}]>0$$

所以 $$\frac{de}{db}=\frac{-\delta a}{(1-a)(1+\beta_1)}\frac{d\varepsilon}{db}<0$$

其中 $n_{Kb}$ 是考虑到政府债券供给的资本存量，弹性为负。随着政府债务增加，就业率下降，失业率必然上升。

# 4 地下经济的合理规模

地下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人们经常认为的主要好处是地下经济是最有生产效率和最有进取心的经济部门；没有它，人们物质生活就会糟糕得多。意大利学者马蒂努(Martino)在1982年(1980, p.2)说过：“在意大利的所谓地下经济，是我的同胞们天才般的杰作，是使意大利免于经济崩溃的第二奇迹。”根据这种观点，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积极参与地下经济活动——他们只是对在法定经济中所承担的沉重税赋作出理性的反应，而在于合法经济管理不善。

人们认为的主要弊端是，未观察到经济相当大的部分是非法的，如此持容忍态度就会破坏纳税道德规范，造成法制和秩序的崩溃。而且，人们认为因逃税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会给为社会希望由公共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筹措资金带来严重问题，对私人和社会的利益与成本比较，从而导出：“社会最优化状态，”一直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事实上，丁伯根在1952年(Tinbergen, 1952)和塞尔在1968年(Theil, 1968)提出的定量

经济政策理论，提供了进行这种微观比较的精心设计的有效工具。社会总福利函数规定了“社会”归于不同状态的价值，因而能够进行利益和成本比较。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受经济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更具体地说，而且还受寻求最佳状态的经济模式的约束。其结果表明要保证最佳状况应怎样确定可以利用的施措。总体最大化方法也可用来确定地下经济的社会最佳规模。

第一节将概略介绍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在合法经济中社会对边际税率的最优利用、罚金、地下经济的查获率及地下经济的社会最优规模都由定量经济政策理论的特殊变形，即最优税收理论决定。第二节将表明，社会福利最优化准则并非无可挑剔，还需要有另一种替代方法。于是，民主经济政策理论就作为适用于地下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替代框架。

## 地下经济的社会最优规模

### 理论背景

与根据社会整体观点确定地下经济的规模大小有关的经济理论有两个分支。

第一个理论是最优税收理论，该理论用于确定考虑了税收对劳动供给、商品生产和收入分配影响的，与社会福利函数描绘的一样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税率（一般在诸如线性税收的既定税收结构中）。这种方法是由拉姆塞（Ramsay，在1927年最先提出的。最近，该方法受到新古典公共财政学派的特别注意，在《财政学杂志》尤为明显。①

第二个理论是贝克尔在 1976 年提出的犯罪经济学理论。贝克尔从犯罪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如过失犯罪)研究控制犯罪行为的可能性。②

当代经济理论中的这两个分支只是在最近才被结合起来研究。最初对逃税问题所作的理论研究(如阿林汉玛, Allinghama;桑姆, Sandmo,1972;斯里尼比斯, Srinivasan, 1973 以及辛格,Singh, 1973)几乎全部集中探讨个人对既定税率变动如何做出反应和如何根据主观预期的被稽查率和处罚率而只申报部分收入。科尔姆(Kolm, 1973)就正确注意到,这些研究注意涉及个人行为。只有记住了个人具有逃避税收和积极参与地下经济活动的动机,而进一步提出应怎样确定最优税率的公共政策问题时,这种研究才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

**对地下经济的利用**

桑姆 1981 年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替那些既能在法定(已税)部门又能在地下(未税)部门工作的人推导出了政策措施的社会最优利用及最佳地下经济规模。桑姆模型灵活地表达了用于地下经济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方法的基本原理,因此,值得描述其基本特征及主要结果。为使模型易于处理,桑姆只研究劳动市场和个人所得税。此外,假定边际生产率不变,使劳动市场需求方受到了极为时尚的分析。他完全没有予以考虑逃税对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影响。③

分析分两步进行。首先考虑逃税者和非逃税者行为。非逃税者的劳动供给沿标准轨迹进行, 个人效用函数 $U^{n}=U$

$(C^n, L^n)$ 的最大化服从预算约束。$C^n = W^n L^n(1-t) + a$，式中 $U$ 为效用，$C$ 为消费，$L$ 是合法（已纳税）部门的劳动供给，$W$ 为工资率，$t$ 为税率，$a$ 为一次性收入转移总额。上标符号 $n$ 表示与(同一)非逃税者有关的变量。

由于逃税者必须考虑他们的非法活动被发现和受到惩罚的因素，因此，他们使预期效益最大化。逃税者必须考虑两种处境。他们可能不会被发现，这时的消费是：

$$C_1^e = w^e L^e(1-t) + a + w^e E$$

此处 $E$ 为地下经济的劳动供给，右上标表示与逃税者有关的变量。相反，他们也可能被发现，这时的消费便是：

$$C_2^e = w^e L^e(1-t) + a - b + w^e E(1-\text{o})$$

其中 o 是罚金率，$b$ 是被发现时，课处的一次性罚款。这两个方程式构成下列预期效用的预算约束条件：

$$U^e = (1-p)U(C_1^e, L^e + E) + U(C_2^e, L^e + E)$$

式中 $p$ 是主观预期查获概率。如果求约束极大值，就会得这样的定性结果。补偿替代效应 $\partial L^e/\partial t$ 和 $\partial E/\partial \theta$ 预期为负值，但是如果不增加假设，就不可能推导出发现概率增大和税率提高对地下经济劳动供给的影响的方向，$(\partial E/\partial p, \partial E/\partial t \gtrless 0)$。效用函数的假设不可能说明收入效应的符号，但为方便起见，桑姆假设一次性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劳动投入 $(\partial L^e/\partial a, \partial E/\partial a < 0)$。

就给定因素 $(t, \theta, a, b, p)$ 而言，对两个群体的个人进行分析之后，第二步便开始探讨社会最佳政策。桑姆认为，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地由政府实施，因此，社会最优化问题是同一的。在着手解决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之前，首先要决定是否允许将非法活动偏好算入社会福利函数。沿着功利主义

路线，桑姆假设个人和社会效用之间的积极联系（帕累托原理），这种联系的原则可以扩展到违犯法律的个人。因此，计算逃税者的效用与非逃税者的效用后，社会福利函数为：

$$W = N^{n}r^{n}V^{n} + N^{e}r^{e}[(1-p)U(C_1^e, L^e + E) + pU(C_2^e, L^e + E)]$$

此处 $r^n$ 和 $r^e$ 是根据两个群体的效用得出的权数。政府根据满足外生收入 $R^*$ 的需要来选择税率 $t$，罚金$(\theta, -b)$以及发现的概率，使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此外，税收收入必须能承担查出逃税者的成本 $C$，这种成本被看作是发现概率和逃税者数量的递增函数：$C = f(p, N^e)$。于是，政府预算约束就是：$R(t, \theta, a, b, p) = R^* + f(p, N^e)$，表明税收收入依赖于使用的政策工具 $t, \theta, a, b, p$。

正如桑姆自己强调指出的，④ 从最优税收理论中得到：

（1）边际税率应该具有正边际税收入（$\partial R/\partial t > 0$），否则财政收入就可以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并且扭曲可以不花成本地减少。位于拉弗曲线向下倾斜部分的税率并非最优。

（2）提高罚金率或罚款（$-b$）或发现概率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结论。$\partial R/\partial \theta$，$\partial R/\partial(-b)$，$\partial R/\partial p > 0$。也应该产生为正的边际收入。在逃税者福利不计入社会福利函数（$r^e = 0$）的极端情形下，用以控制逃税的三种政策手段应根据能创造最大税收（从前的不等关系现在成为相等关系）加以确定。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从逃税者那里征收货币，用以减轻非逃税者的纳税负担，从而增加社会福利。

如同桑姆本人所承认的，这种相当复杂的约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相当明显。尽管如此，关于逃税者和地下经济的社会最优规模，仍然暗中通过政策工具的最大社会福利

值，尤其是由在地下经济活跃时的税率、罚款和发现概率确定。为了搞清楚地下经济以哪种方式对其结果产生影响，桑姆将这种结果与完全不考虑逃税者情况时的结果进行比较。(桑姆和戴西特,Dixt,1977)，在这种情形下，结论自相矛盾：当存在逃税现象时，与普遍看法相反，是不应该去降低边际税率。其理由是，地下经济部门也因课处罚金而受到扭曲，地下经济部门劳动供给处于次优状态。于是，如果合法经济部门的税率提高，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劳动提供给地下经济，那么其他情况相同时，这就表明税收应该更高(桑姆，1981，p.281)。

## 对福利最大化方法的几点评论

桑姆本人对他得出的特殊结论并不十分自信，甚至对他所采用的一般方法也不十分自信。他作了三点保留性的说明(pp.284—287)。

第一，税收的确定和公共支出彼此完全没有联系，这是布坎南(Buchanan)在1976年就一般最佳税收理论批评过的一个不足之处。最近，林德贝克(Lindbeck)在1980年令人信服地指出，公共支出对劳动供给的刺激效应至关重要。忽视财政帐户的一端会大大扭曲整个画面，这使桑姆等人得出的结果受到认真的怀疑。

桑姆的第二条保留意见的基础是，所用的功利主义方法(与传统的福利经济理论相一致)完全是结果主义的，即绝对是根据随之取得的分配结果判断某种政策的优劣。⑤ 不过，实

际上也应根据经济系统运行规律进行判断。

第三，桑姆对个人只是被动地对政府所颁布的税率和其他措施作出反应的内含假设也吃不准。研究税务当局与纳税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模型更为现实，因为纳税人能通过选举投票和其他手段来影响税率(至少在民主政体内是这样的)。桑姆也承认："尽管也需要规范理论去解决最优政策选择问题，但这也许给逃税的描述理论带来有趣的新希望。"(p.286)

正如我在下一节将指出的那样，桑姆所作的三点保留只涉及到问题的表面，而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应受到更为严格的批评。即使桑姆自己保留的也比他自己所要承认的更为严重。如果认真对待这些保留和批评，那么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必被剔除，而且必将选择一种新的政策确定方法。

对确定地下经济规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的主要批评集中在三方面，[6] 下面将讨论这些问题。

**加总问题**

自从阿罗(Arrow)在1951年的开创性研究以来，[7] 人们普遍认为，建立满足(1) 个人福利函数和(2) 加总过程特性的一系列合理准则的社会福利函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8] 这个不可能性定理已成为大量研究的课题，但基本结论仍然相同，除非绝对地假定个人效用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加总问题当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否则，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就不可能根据个人效用建立起来。一旦考虑到多维性问题，人或集团之间的冲突，和考虑到当就业于合法经济与就业于地下经济的人相比时，利益冲突就尤为明显从逻辑上来看，一致的偏好加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经验操作问题**

建立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即使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也远不能操作。似乎根本不可能，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人试过，确定社会福利函数参数的经验值。为了利用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的研究成果去确定地下经济的最优规模，为政策提供依据，就必须知道相当精确的参数值。为克服确定社会福利函数参数经验值的困难，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的坚持者，有时采取模拟试验，加入他们个人认为合适的数字。虽然这种程序可能有助于测试模型的可靠性，但决不是确定参数经验值的替代方法。

**假想存在一个慈善的独裁者**

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准则必然要被抛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假定有一慈善的独裁者，使工具变量取社会最优值，布坎南和远在他之前的维克塞尔就强调过这一假设的重要性。这一假设还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福利准则的结果，这一准则"假定有一个公共代理，某种替整个社会选择普遍状态的最高机构"。(见威廉斯，Williams，塞，gen，1982)事实上，执政者既无动因，也无可能使未知社会利益或总体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他们只追求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经济和社会进程应该解释为只追求自己目标的决策者的相互博奕的结果。桑姆(1986，p.26)用了三句话猜测当权者的相互依赖，但未得出这会阻止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的必要结论。

犹如曾经指出的，用于确定地下经济规模的最优税收理论理所当然地假定政府热心于并且有能力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用桑姆的话来讲就是："纳税人行为既定，政府选择税

率，罚款金额和查获概率，使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1981, p.265)。"但是，即使具有适当的信息，也毫无理由假定执政的政治家们会这样做。假定政治家也像其他人一样追求自己的效用，更站得住脚。⑨ 实际上，在政治经济模型中存在大量可用自身利益解释政府行为的计量经济学证据。就政治家来说，这包括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和保住权力的欲望。⑩

综上所述，主要结论是在政治经济系统中，政府并不是自由追求社会利益的外在行为者，而要依靠其他决策者，尤其要依靠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政府根据其他反对派的反应，尤其重新当选的机会，确定可以运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财政帐目的两个方面，即税收和公共支出，都是按这个目的使用的。因此，认为税入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最优税收理论程序就极不适宜。

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甚至一些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专家都接受了对社会福利最大化方法的基本批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虽然集体福利函数受到约束的最大化还不够完善，但仍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⑪ 在下一节里，我将争论确有另外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经济政策决策方法。⑫ 这个方法还处于形成完善阶段，从未用于地下经济问题。

## 地下经济和民主经济政策

### 过程和结果

在决策系统中，每个决策者追求自己的效用，合法经济和地下经济的规模只是他们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政府和议

会根据任期目标及财政和重新大选的限制，以及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存在的规章制度，制定出各项政策，尤其是税率、罚金和查获概率。个人(企业)的反应就是在既有法定又有地下经济工作的市场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当然，他们也能以公民身份作出反应。在大选期间，他们会支持(如果其他情况相同)，会将他们所喜欢的地下经济政策付诸实施的政党。公民的这种权力只能在特定社会中存在的规章制度内才能行施。就政府行为影响(潜在和实际)纳税人和选民及纳税人和选民行为又反过来影响政府行为而言，政治经济系统是封闭的。可以认为：这种过程是决定因素，地下经济的规模只不过是一种结果。试图影响这种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结果的经济顾问只好去分析带来这一结果的政治经济过程，在这里，这种过程就是关于地下经济规模的政治经济过程。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判定经济过程好坏的标准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人偏好。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分析结果型观点转移到过程观点。⑬

经济顾问一般可以用两种方法对政治经济作用过程进行干预。第一，分析管制政治—经济系统运行的现行法规和制度是否完全发挥作用，从而使政治供给商（政府及社会官僚机构)被迫服从个人偏好。经济顾问们可以建议，如何完善现有法规和如何建立新法规等等。

第二，如果法规既定，顾问们可以对现行政治经济作用过程满足个人偏好的程度及重要系统的扭曲程度进行分析。根据这些分析，提出如何克服这些扭曲的建议。

现在对这两个方法的讨论都考虑了面临的问题，即地下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

**影响法规**

当产生现行政治—经济过程依据的规章和制度安排发生变化时，就可以预期有迥然不同的结果。为使合法经济和非法经济的组合更加符合个人偏好，可以在两个方面对现行法规进行修改或制订新的法规。

第一，可能是对政治供给商即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实行更有效的限制，由于相当多的迹象表明，纳税人对税收和从事社会活动所受到的政府管制感到负担过重（纳税人变革），⑭因此，最重要的限制就是限制执政者可以征税和实施管制的权力。这样就会限制个人必须承担的，高于他们自愿用以交换公共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水平的税收量和管制量。这种个人超额负担符合政府和社会官僚的利益，从而增加其物质利益和权力。⑮对税收量和管制的数量和严厉程度进行限制会降低个人积极参与地下经济的动机，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明都已揭示了这一点。⑯

固定国民收入中税收的最高额度或指定公共部门的有限税基，就可以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这样，就保证了政府供应者不在既定税收总额之外增加税收。⑰

制定法规限制对在公共部门从事业务的企业和个人所实施的管制则更为困难。原则上讲，有四种方法可以控制管制负担。⑱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那些有利于行政管理部门而损害合法经济中个人和企业利益的管制的作用。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理想，但要实行则很困难，甚至实际上不可能监视。第二种方法是限制实施的管制数量。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现实，但容易被发布更少，但更为复杂的管制所抵消。第三，监督行政管理的过程，即监督管制决策形成的过程，如果准确知

道行政管理的生产函数，那控制行政管理产出也同样有效。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内在特性就是这种生产函数不太清楚。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固定管理决策中会被注意到的规则是唯一可行的控制办法，而且尽管有缺点，也确实得到了广泛使用。最后一点，控制行政过程中的投入，比如限制管理人员数量或和分配给他们的财政预算。尽管这种控制办法有明显的缺点，但由于比较容易制订和监督，因而限制管制过程中的投入方的法规也广为使用。

把合法和地下经济更满意地结合起来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迫使政治供应者更充分地考虑个人偏好。如果建立了合理法规，就消除了参与地下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因。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19] 个人对公共支出的水平和结构越满意，他们就会越愿意纳税，服从公共管制，从而在合法经济中工作。一种可能性是把增加管制的决策权力转交给与个人更为密切的地方机构，[20] 这种充满生气的联邦制不应停留在公社水平而应扩展到城市教堂管辖区或街区。另一种使公共支出和活动更符合人们意愿的办法是建立和扩大公民投票和议政机构，这样，经济顾问对提出在合法和地下经济间取得平衡的法规建议就有了很多可能性，这样更好地符合个人偏好。

## 影响现行政治—经济过程

规章制度一定，所有决策者在日常政治—经济过程中都在追求自己的效用。他们只会采取他们认为将对他们有利

的行动。因此，经济顾问几乎不能影响经济和政策决策过程。但是，决策者由于获得的信息不完全，所以也乐于接受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建议。这些建议向两类决策者提出，政治需求者（个人）和政治供应者（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政治需求者（个人）获得的有关地下经济成本和利益的信息，因种种原因会具有较大的系统偏差。主要原因是积极从事地下经济的个人（和企业）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地下经济的有利之处就未得到广泛的宣传。相反，合法经济的需求就组织得更好，因而，在政治—经济作用过程中就更有机会被倾听和采纳。特别是在地下经济中工作的人们的利益未由工会代表。大多数个人在地下经济中只是临时工作，而且不是作为自己的职业，因此，就没什么参加工会的动机。而现在工人组织恰恰就怕地下经济的发展使其会员减少。他们有充分理由反对地下经济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并强调地下经济的弊端和危险。因同样的原因，地下经济部门生产商的利益与公开经济部门相比，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表达。

合法生产商组织积极反对移向地下部门的经济活动，合法经济中的企业（给这些组织提供资金）害怕由于不纳税经济的竞争而面临成本劣势和销售减少。因此，可以相当普遍地认为：公开经济中的，并由公开经济提供资金的组织由于会因地下经济存在而失去影响和收入，所以他们极力反对地下经济。另外，地下经济中的个人利益在政治—经济作用过程中也没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在需求方面，政治—经济作用过程存在有利于合法经济而不利于地下经济的系统扭曲。针对这种偏向，经济政策顾问可以通过下列三种方式来抵消其影响：（1）使人们知道地下经济的优点；（2）提高地下经

济利益在政治—经济作用过程中被倾听和注意到的可能性；(3)向各党派指出，如果他们关心地下经济利益，他们就能从这些人中争取到新党员和赢得选票。这种可能性，不仅对那些在野党存在，而且对反对国家干预的党派也同样存在。这样，经济政策顾问就可运用各种可能，反对系统的信息扭曲和忽视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的利益的倾向。

经济顾问还可通过向政治供应者提供信息来影响现行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合法与地下经济的组合。从意识形态方面讲，政府没有必要反对地下经济。但从财政方面讲，每个政府都会对地下经济采取严厉措施。地下经济部门越大，税收损失就越大。这种财政影响如此重大以致从地下经济参与者中可能获得的选票都不能补偿它。政府利用现行政策措施，缩小地下经济活动的动机非常强烈。经济顾问必须接受这种明确定义的利益，他们知道，政府是不会考虑相反建议的。

社会管理机构反对地下经济动因更为强烈，因为当一个工人和企业既不纳税也不服管制的部门扩张时，管理机构就失去了权力和威信。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经济政策顾问影响政府和管理部门对地下经济的态度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只能影响实施政策措施的工具。只有当经济建议有助于他们最有效地打击地下经济，政治供应者才会倾听这些建议。就这点而言，经济顾问们有机会使其专业知识被运用，使作出的经济政策决策尽可能地符合个人偏好。

政府和管理机构打击地下经济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对地下经济活动加重处罚。这种方法比较显著，因此，可以估计政治供应者会最多加以运用。经济顾问可以

向政府、政治家及公共管理者提供与使用政策有关的问题的咨询。他们能特别指出：对地下经济采取严厉惩罚会使运用法律变得困难。因为无论是被告还是法院都会认为这种处罚是不合法的。过度的惩罚会减弱甚至消除边际威慑作用：如果人们因少量的黑市活动而受到了严厉惩罚，那么几乎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进一步参与地下经济活动，因为惩罚不会更高或高得多。严厉惩罚地下经济活动不仅伤害受影响的个人，而且也会阻碍政治供应者实现所希望的目标。

第二，降低税率，减少管制种类，放松管制程度使转向地下经济的动机减弱。政策顾问能够保证税率不会高到超过最高税入限额的水平。实行高税率，对政治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不利，因为税收更少，个人也承受了不必要的负担。[21]同样，也能对管制提出经济建议。为找出最高管制水平，有必要区分管制尺度和管制范围。政治供应者（尤其是社会管理机构）会由于强度与范围的增强和扩大而获利，但如果提高管制强度，由于个人和企业被诱致转向地下部门，管制范围就必然缩小。因此，经济顾问应该对政治供应者提出警告，不要在提高管制强度方面走得太远，否则，会因缩小管制范围而损害自己。

政治供应者用以打击地下经济的第三种方法是向公众呼吁，并进行道德劝说。使那些在(非法)地下经济中活动的人更具负罪感。这等于是完善和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最宽泛的定义上）。迄今，对何种方式可以影响个人偏好还不甚清楚。经济学家一般对这种方法都持怀疑态度。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可能甚至还会出现逆反效应。[22]要求人们纳税行为变得更道德，即不要欺骗的呼吁可能被个人理解为纳税道德再也

不是规定的信号。这甚至还可能诱使诚实的纳税人加入欺骗的逃税者的行列。经济政策顾问能够向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指出这种逆反效应的可能性并建议他们如果要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使用这种方法就必须谨慎从事。只有纳税人被说服，认为用其纳税提供资金的公共支出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更高的效用，才能一致地提高纳税道德。

以上讨论表明，经济政策顾问对现行政治一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尤其是对合法经济与地下经济的联合的成份划分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从政治上讲，执政者有明确定义的他们自己追求的自身利益。尽管如此，顾问们还是能够对经济政策的运用提供有用的信息。如果能够提出同时符合政治供应者和政治需求者利益的建议，这种办法就能提高个人效用。

## 结　　语

在解决地下经济政策问题的措施中，假想能够决定什么是社会利益并据此而行事的仁慈独裁者的方法迄今还是权威性方法。其证据就是定量经济政策理论和最优税收理论。这类观点的主要缺陷我们已经讨论过，对与之相替代的民主经济政策，我们也进行了简要探讨并将它们运用于地下经济问题。外生的最高计划者这种观点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一经济系统的观点，在这个系统中决策者，尤其是政府，是内生变量。在这个框架中，没人能预先确定哪种地下经济

规模是社会最佳规模。此外，合法和地下经济规模都是由考虑自己利益的决策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能帮助决策者对指导相互作用的最适当的法规找到一致看法，和对现行政治—经济作用过程中的个人决策者提供建议的经济政策顾问，可以影响这种结果并使之符合个人偏好。

## 鸣　　谢

感谢荷兰大学《地下经济高级研讨会》参加者对改进和完善本文所提出的有用建议，尤其是对组织者 L· 法伊格表示衷心感谢。对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 注　　释：

① 概述可参见桑姆(Sandmo)(1976 年) 或布拉德福德 (Bradford)与罗森(Rosen)(1976 年)的著述。

② 埃里希 (Ehrlich) (1973 年)用经济计量分析对这方面作了独特的研究。

③ 其他简化假设是，非逃税者和逃税者的相对份额固定不变，组内的个人是同一的，各组的效用函数相同。

④ 一开始就应该强调……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那种可以明确解答的问题：正规理论所能做的主要是创造一个能逻辑一致地讨论政策问题的框架 (p. 267)，和最优所得税模型几乎不能导

出普遍有效的结论(p.279)。

⑤ 关于这个术语的解释，可参见森(Sen)和威廉斯(Williams)(1982年)的著述。

⑥ 对标准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批评(如桑姆例举的那样)。因此，必须严肃地对用以描述逃税者行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提出质疑。大量的实际生活和经验证据表明，预期效用不可接受作为不确定条件下人的行为的实证模。休梅克(Schoemaker)(1982年)作了一个明智的概述。但是，本章不打算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⑦ 18和19世纪就有这样的先驱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奎斯·德·康德塞(Marquis de Condorcet)和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他们证明，简单的多数投票加总，会导致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这方面的解释可参见布莱克(Black)(1958)的著述。

⑧ 可参见森(1970)那本杰出的概览性著作，特别地，还可参见普劳特(1976)与克拉姆(1973)的研究。

⑨ 当然，这是公共选择的观点。这方面的概述，可参见米勒(Mueller)和佛雷(Freg)的著述。

⑩ 英国和美国的例子可参见佛雷(Frey)和施奈德(Schneider)的著述。

⑪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私人书信集，苏黎士，1982年3月。

⑫ 参见布坎南，布雷南与布坎南(1980年)，和佛雷(Frey)的著述。

⑬ 如前所述，这同偏离功利主义经济福利理论观点的运动有关。西蒙(Simon)(1978)提出，在相互作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过程导向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肯定，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就是这种情况。

⑭ 可参见罗威里(Lowery)和西格曼(Sigelman)(1981)的著述。

⑮ 政府趋向于比公民希望的支出更多，是政府经济理论的一条重要定理。这是布雷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0)论文的中心论点。至今为止，公共选择理论还没有很好形成自己的宏观官僚阶层理论，虽然尼斯卡宁（Niskanen）(1971)的官僚最大化假设可以很好地从特定的官僚一般化为整个官僚阶层。

⑯ 参见法伊格(1982 a)，坦泽(Tanzi)，(1980)或韦克和佛雷(Weck and Frey)，(1982年)的著述。

⑰ 参见布雷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0)的著述。

⑱ 也参见梅琼恩(Marjone，1981/1982)的著述，他对产出，过程和投入控制作了区分。

⑲ 参见斯哥特和格拉斯密克(Scott and Grasmick，1981)，或斯庇塞和朗德斯特(Spicer and Lundstedt，1976)的著述。

⑳ 参见布坎南(Buchanan，1977年)和佛雷(Frey)(1983)的著述。

㉑ 前面讨论的桑姆（Sandmo）理论模型(就它使非逃税者与逃税者的行为联系到一起而论）与最大收益税率的决定显然有关。这就像斯图尔特（Stuart）（1981），法伊格和麦吉(Feige and McGee)，(1983）就瑞典的情况，法伊格和麦吉(1982)就共同的情况所作的拉弗曲线的经典估计一样。

㉒ 参见蒂特勒和罗(Title and Rowe，1973)的著述。



# 对美国地下经济的金融透视

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日益扩展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隐蔽经济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逃避税收和政府管制。尽管这类活动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但它一般是指这样的活动——无论合法或非法——通过少申报甚至是不申报来获得收入。有些学者将地下经济限于指未记入国民收入统计中的合法活动的收益。①

奎特曼与法伊格最近发表的关于美国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测估是以货币总量统计为基础来推算的。其后，又有一些讨论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地下经济的测估结果陆续发表。其中一些测估十分重要，促使国会进行听证，政府也进行了各种研究。据国内税务局1979年的估计，美国在1976年从合法来源得到而未申报的收入在75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而从三类非法活动——贩毒、赌博与卖淫——中得到的收入在250亿至350亿美元之间。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国内税务局估计从合法来源取

得而未申报的收入从1973年的936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2497亿美元；从上述三种非法活动中取得的未申报收入从93亿美元上升到了340亿美元。国内税务局估计未申报合法收入的主要资料包括得自审计所得税收入样本的依法纳税者估测项目，和得自利用来自收入所得者信息的收入信息项目的个人纳税数据。对那些来源合法但未申报的收入，主要是根据两次全国家庭调查的信息，并经与社会安全管理局和国内税务局的记录进行反复核对，来作测估的。对非法活动未申报的收入的估计则基于调查数据和拘留记录。

货币统计研究的支持者们怀疑上述根据行政记录和调查这类来源进行的测估的准确性，指出这类方法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未申报收入。他们认为货币统计为测估地下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资料来源。例如奎特曼以地下经济中现金是唯一的交换媒介为出发点，指出这一领域活动的增加将反映为现金对可支兑存款比率的增加。另一方面，法伊格认为地下经济活动很可能记录在总交易中但未记录在收入中。这样，交易对收入的比率的变化可以反映地下经济相对规模的变化。这两种"货币统计方法"可分别称为现金比率法与交易比率法。

本章对地下经济的测估主要基于如上方法（某些方面有所拓展），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另外，本章还考察了人均现金持有量增长的若干原因，特别是大面值货币增长的原因——这是地下经济的又一实证。

## 简化的现金比率法

用货币统计资料测估地下经济活动的第一种方法基于现金与可支兑存款比率的变动。简言之，就是现金比率。② 这一方法有三个前提：1. 所有地下交易全部用现金；2. 地上活动的现金率不变；3. 地下收入中的现金周转率（即一美元地下现金所形成的地下收入）与当年地下持有的现金相同。这样，地下经济活动的规模可以从地下现金（实际现金减去地上持有量）与地上$M_1$的收入周转率之积来测算。表5.1 列出了在基准现金率为 0.217③ 假设下所测算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GNP)。测算的地下经济的规模一直在增长，但在70年代前其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体保持不变，70年代后比重上升很快，1982 年已达 14.6%。

## 一般化的现金比率法

法伊格在其后提出的另一种货币测估法将现金比率法规范化。法伊格认为有部分农场和家庭在地下交易中使用支票，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使用支票的方便程度胜过留下一"纸"审计线索的不利之处。同时由于地下部门的活动是以服务为中心的，这一部门的收入周转速度（收入对货币持有量的比率）可能高于地上经济，因为提供服务的中间交易较少。法伊格具体地作了如下假设：1. 地下部门的现金比率为 2，即地下参予者每持有二元现金对应于活期存款一美元；2. 地

表 5.1 用不同方法测算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a]

单位：十亿美元

| 年份 | 简单现金比率 | 修正现金比率 | 计量模型 TW | 计量模型 T | 交易法 基期 1939年 | 交易法 基期 1964年[b] |
|---|---|---|---|---|---|---|
| 1950 | 15.9 | 21.5 | 14.5 | 9.4 | 27.6 | 43.1 |
| 1955 | 14.7 | 15.6 | 12.8 | 10.9 | 1.7 | 21.6 |
| 1960 | 17.3 | 17.1 | 20.7 | 13.2 | −3.4 | 21.5 |
| 1965 | 31.6 | 38.6 | 26.3 | 17.1 | 9.6 | 44.3 |
| 1970 | 62.4 | 88.6 | 45.6 | 25.3 | 101.0 | 155.2 |
| 1975 | 150.8 | 246.0 | 77.0 | 46.6 | 467.3 | 567.1 |
| 1978 | 226.1 | 460.2 | 114.2 | 80.9 | 551.1 | 685.6 |
| 1979 | 317.8 | 558.5 | 130.7 | 88.6 | 628.4 | 779.2 |
| 1980 | 372.8 | 666.9 | 159.9 | 116.9 | 1095.6 | 1280.1 |
| 1981 | 427.1 | 767.6 | n.a. | n.a. | 1765.6 | 1999.2 |
| 1982 | 449.7 | 810.5 | n.a. | n.a. | n.a. | n.a. |
| 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重(%) | | | | | | |
| 1950 | 5.6 | 7.5 | 5.1 | 3.3 | 9.6 | 15.1 |
| 1955 | 3.7 | 3.9 | 3.2 | 2.7 | 0.4 | 5.4 |
| 1960 | 3.4 | 3.4 | 4.1 | 2.6 | −0.7 | 4.2 |
| 1965 | 4.6 | 5.6 | 3.8 | 2.5 | 1.4 | 6.4 |
| 1970 | 6.3 | 8.9 | 4.6 | 2.6 | 10.2 | 15.6 |
| 1975 | 9.7 | 15.9 | 5.0 | 3.0 | 30.2 | 36.6 |
| 1978 | 12.3 | 21.3 | 5.3 | 3.7 | 25.5 | 31.7 |
| 1979 | 13.1 | 23.1 | 5.4 | 3.7 | 26.0 | 32.2 |
| 1980 | 14.2 | 25.3 | 6.1 | 4.4 | 41.6 | 48.6 |
| 1981 | 14.5 | 26.0 | n.a. | n.a. | 59.8 | 67.7 |
| 1982 | 14.6 | 26.4 | n.a. | n.a. | n.a. | n.a. |

注：a. 诸方法的描述可见正文。

b. 假设 1664 年地下国民生产总值为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之 5%。

下 $M_1$（现金与可支兑存款之和）中属于地下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其对应地上活动 10%；3. 基准年 1964 年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 5%。④表 5.1 的第二栏列出了部

分年份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它们按修正后的现金比率法来测算，有关数据取年平均值。该方法对60年代中期地下国民生产总值的测算值高于奎特曼的简单现金比率法。从70年代开始，两种测算结果的差异明显扩大。到1982年，修正现金比率法测算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为地上国民生产总值之26.4%，几乎是简单现金比率法测算值的2倍。

## 现金比率法的进一步变形：坦斯模型

现金比率法的另一种变形(Tanzi，坦斯，1983)也可用来测估地下经济活动。坦斯详尽地综合了税收对现金比率的影响。他假定实际人均收入或定期存款利率(包括在 $M_2$ 内)下降时现金需求相对于 $M_2$ 上升，同时假定工资薪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现金对 $M_2$ 的比率正向变化，以反映支票支付增加的变化。他还假设现金对 $M_2$ 的比率与税收正相关。后一假设反映了税收增加时从事地下活动的利益，相应地在地下交易中现金的需求较 $M_2$ 的其他部分就有增加。

模型的经验程序采用两种不同的税收测估方法。一种是利息收入的加权平均税率(TW)，另一种是净付税总额对调整过的总收入的比率(T)。该模型(详见附录A)按1981年前 $M_2$ 的定义范围，用1930年到1980年各年的数据进行测估。坦斯把那些与地下活动相关的现金量定义为用所有解释变量(包括税收)的历史数据推导的值与税率为零时的(即假定不存在税收)虚拟值之差。和简单现金比率法一样，他假定地下

收入周转速度和地上货币周转速度相同。这样，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地下现金余额与地上以 $M_1$ 形式存在的地上收入周转速度之积。表5.1列出了按上述两种税率测估的地下经济活动规模。与前面的测算形成鲜明对照，从税率模型得到的测估值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约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5%。

## 交易比率法

法伊格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总货币交易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估计地下活动的货币统计方法。法伊格没有使用现金存量与活期余额的统计方法，而是着眼于由 $M_1$ 存量提供的货币服务流量，即用 $M_1$ 余额表示的总交易美元值。⑤这一方法中关键的假设是总交易与总经济活动成比例（"总"在这里系指地下与地下活动之和）。在该框架内，交易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最终产出的产品，现有实物及金融资产的交换及直接转移支付。法伊格意识到转移支付正不断改变着方式，有关资产交换的纯金融交易可能由于各种金融手段的创新而急剧增长。这样，为推导一种适于测估地下活动的交易值，法伊格从总交易中扣除了一组主要的资金交易与直接转移额，得到一个净交易测估值。然后以净交易与总收入的比例关系使其理论重新形成。

表5.2给出了一种根据特定的金融和非金融系列构造净交易系列的方法。表中的总交易是测估到的现金交易与相对于可支兑存款的总负债之和。⑥这样，从总交易的这一测估

值中可扣除三类现金交易：出于现金提取目的所形成的记入借方的活期存款及兑取支票储蓄的提款；由于购买各种金融债券(重新购买契约，隔夜欧洲美元，定期和活期存款，货币市场基金）而形成的现金提取额；以及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的交易额。最后，为使净交易与收入序列具有可比性，还作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调整。

在给定净交易系列值后，地下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过程与现金比率法就极为相似了。调整后的交易与收入的比例关系的假定用来对地下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测估：地上交易由基准期(该阶段假定不存在地下经济)交易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乘以某年的在录国民生产总值来得到。那年实际交易额超过地上交易的部分就是地下交易。最后，把交易与收入的基准比例应用于地下经济，便可推导出在地下交易中获得的地下收入。

另外，法伊格认为地上服务部门单位产出比那些中间投入较多的部门所需的交易要少。因为服务部门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而增长，所以他认为如果没有地下经济的话，净交易与收入之比趋于减小。这样，基于这一比率固定不变而测估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导致对这类活动的低估。

表 5.1 列出了采用不同的交易比率法测估到的地下国民生产总值。第五列的测估值假定基期 1939 年不存在地下交易；而第六列的测估则以 1964 年为基期，并假定当时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占当年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5%。用交易比率法测估的地下活动规模比用现金比率法测估的还要大，从 1970 年占申报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或 15% 到近年来高得多的程度：1981 年地下国民生产总值估计占在录国民生产总

值的60%强。⑦

## 货币统计方法中的收入周转速率测估

除坦斯模型的结果外，所有基于货币统计的测估都表明自60年代后期以来，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对地上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在加速上升。自1975年以来这种加速变得尤为明显。⑧例如，用修正现金比率法推导出的1975年至1982年地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年平均18.6%，是地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二倍。地下活动的这种加速增长意味着在$M_1$形式上的总收入速度的急剧增加。

表5.2列出了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周转速率的实际水平，即地下与地上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对$M_1$总额的比率，其中年份与表5.1相同，但所用货币统计方法不同。表中下半部列出了几个阶段的周转速率增长率。如表中所示，从1950年到1970年，隐含的总周转速率与统计的周转速率都增长了约3%，1975年之后，测算的总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在录收入增长速度大大加速，后者与长期历史趋势保持接近。例如我们考虑以1939年为基期的交易比率法所隐含的总周转速率，如表5.2第三列所示，从1950年到1970年总收入速度的年增长率为3.3%，之后这一增长率倍增有余，达到1975—1981年之间年增长7.6%的水平。这就是说，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表面价值来看，它意味着以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与$M_1$的比率来测算的周转速率增长极大地低估了真实水平。如果周转速率

**表 5.2 按不同方法测估的总收入的周转速率（地下及在录货币）[a]**

| 年份 | 现金比率法 | | 交易比率法 | | |
|---|---|---|---|---|---|
| | 简单现金比率 | 修正现金比率 | 基期二 1939 | 基期二 1964 | 在录 $M_1$ |
| 1956 | 2.700 | 2.750 | 2.804 | 2.943 | — |
| 1955 | 3.144 | 3.151 | 3.045 | 3.196 | — |
| 1960 | 3.705 | 3.704 | 3.559 | 3.745 | 3.583 |
| 1965 | 4.378 | 4.420 | 4.245 | 4.455 | 4.186 |
| 1970 | 4.996 | 5.12[illegible] | 5.180 | 5.436 | 4.701 |
| 1975 | 5.967 | 6.301 | 7.077 | 7.428 | 5.436 |
| 1978 | 6.929 | 7.483 | 7.742 | 8.125 | 6.168 |
| 1979 | 7.242 | 7.879 | 8.064 | 8.463 | 6.400 |
| 1980 | 7.487 | 8.220 | 9.288 | 9.748 | 6.558 |
| 1981 | 7.864 | 8.656 | 10.977 | 11.520 | 6.870 |
| 1982 | 7.691 | 8.479 | n.a. | n.a. | 6.711 |
| | | 实际年均增长率 | | | |
| 1950-1970 | 3.1 | 3.4 | 3.3 | 8.1 | 4.5 |
| 1975-1981 | 4.7 | 5.4 | 7.6 | 7.6 | 4.0 |
| 1975-1982 | 3.7 | 4.3 | n.a. | n.a. | 3.1 |

注：a. 周转速率定义为地上或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与地下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对 $M_1$ 的比值

不能在短期内出现较大变化的话，表 5.1 所列的地下经济的估计也就存在问题了。

## 从计量经济学的观点来评价现金比率法

虽然地下经济可能影响现金比率，但明显地，其他一些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分析这类比率的传统宏观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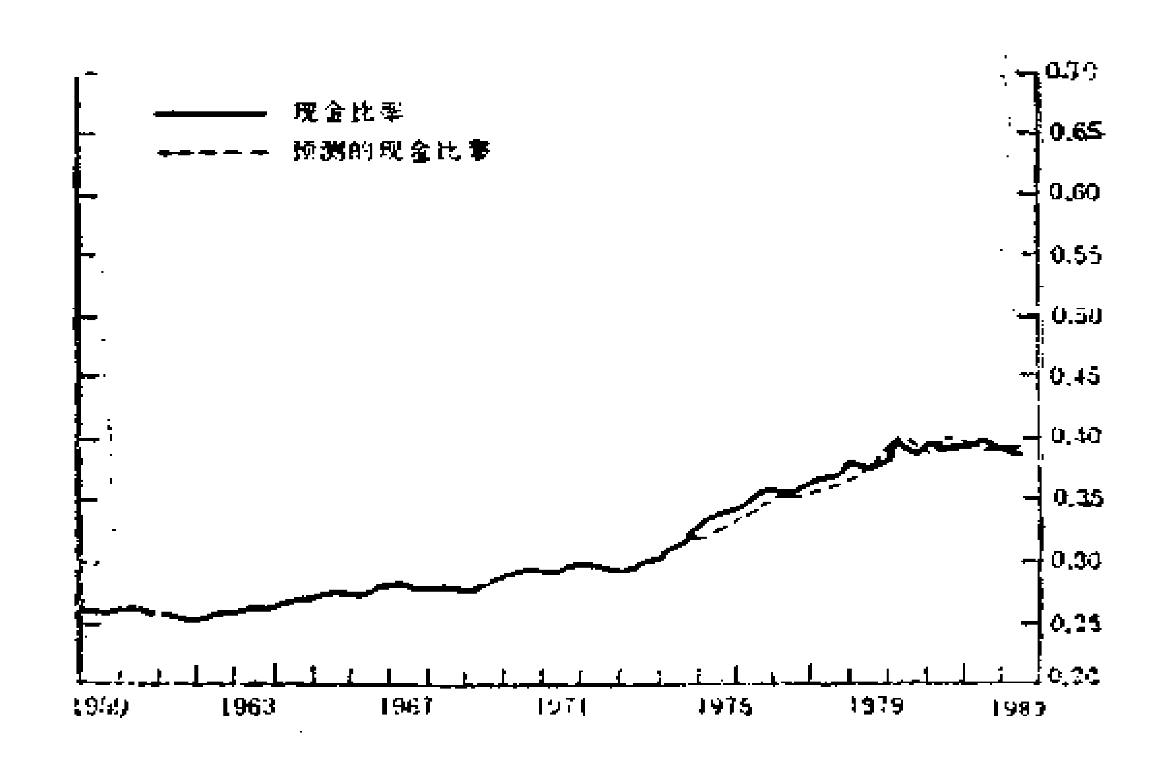



**图 5.1　实际和预测的现金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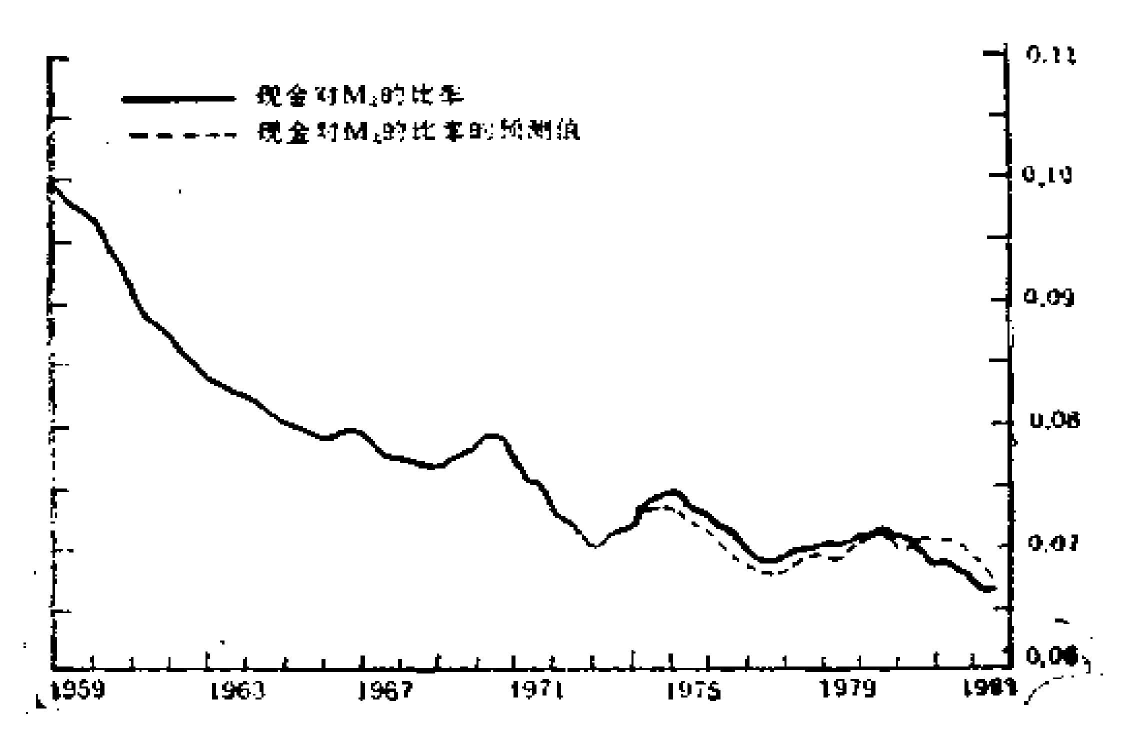



**图 5.2　实际的和预测的现金对 $M_2$ 的比率**

济方法涉及到这样一个模型，它或基于地上交易或基于地上货币需求理论(包括有价证券在内)。事实上，关于可支兑存款或 $M_2$ 的现金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由标准计量经济需求方程来比较精确地加以解释而无须考虑地下经济活动。图 5.1 和 5.2 给出了不同比率的实际值和预测值。这些比率来自政府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季度计量经济模型。模拟开始于1974年第三季度，延续到 1983 年第三季度。[9]

这些需求方程在不同的样本区间上作了测估，它们全都终结于 1981 年的最后一季度。这样，这一模拟只有最后七个季度代表了样本外区间。相应的，这些比率的实际值与模拟值在整个区间上的吻合并不能说明上述模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区间内很多段上，特别是从 1974 年第三季度到 1976 年第四季度的二年半时间里，可支兑存款特别是其中的活期存款部分的增长明显少于从标准方程得出的预测值。为了说明这一现象，活期存款方程在这一时期设置了一个可移动变量(SHIFT)，当它被除去后，这一模型就和大多数的传统需求方程一样过量预测活期存款。活期存款的这种高估实际上是现金对可支兑存款比率的低估。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未能解释的现金比率的跳跃性波动是地下经济活跃的一个证据。

然而，几方面的因素否定了上述解释。首先，政府专门委员会模型(庞特・索曼，Porter Thurman，1979)与其他模型(加西亚，Garcia)对这一时期的通货强劲未提供任何证据。这样，预测现金比率时的不足之处就主要来自活期存款的无法解释的疲软。第二，虽然对这种疲软已作了深入分析，但没有一种解释是依赖于地下经济的。[10] 相反，在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存款持有者们总是寻求完

善其货币管理技术。这一要求随着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完善，随着各种现金管理设施如现金集中帐户及远程支付功能的开发，随着越来越多新的金融手段和新技术的使用而逐步得以满足。

图 5.2 表明政府专门委员会货币需求模型相当精确地预测了现金/$M_2$的比率。但由于坦斯的需求模型也相当精确地吻合了这一比率，所以需对其模型作进一步分析。⑪ 作为对标准模型如政府专门委员会的模型的一种变体，坦斯试图在其需求方程中引入一个明确的税收项目以反映地下经济的存在。这样，地下活动规模的测估结果主要依赖于对税收效应的合理说明和估价。取坦斯方程⑫ 作为检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现金/$M_2$比率与税收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 1930 年至 1945 年这一阶段的数据。⑬ 事实上，当回归的时期限于战后的 1946～1980 年时，税收变量或者以不精确的符号(用 T 即总税收对收入之比)进入方程，或者成为一个统计上无足轻重的变量（用 TW 即利润收入的加权平均税率）(附录 A)。该定义可能导致地下经济规模的不同测估值，这取决于模型如何模拟。表 5.1 重复了坦斯的工作并对该方程进行了静态模拟，即，模拟没有考虑自动相关校正项，后者随前一阶段中的实际模拟误差而定。但坦斯模型的动态模似(其中只有样本区间开始时的错误考虑在内)却测估到1980年地下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申报国民生产总值之 18.5%，即约三倍于静态模拟的结果。⑭ 考虑到预测的税收效应对样本区间及模型所采取的方式的敏感性，坦斯对地下经济的估测只能认为是不确定的。

## 现金比率法中的基准、周转速率及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假定

用现金比率法测估地下经济规模时，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性的基本假设。前已叙及，现金比率法对近期国民生产总值与隐含的收入增长速率的测估值偏高。但把假设稍加变动，特别是关于地上部分的现金比率数值的假定，和所谓基准假定的改变，便会极大地改变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例如，每当实际现金比率低于基准率时，地下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变为负值。坦斯模型中的类似情况涉及到税收临界水平，其中他假定只要对产业征税就会出现地下经济活动。也许这样更合理一些：定义一个正常税率，再将地下经济的增长只与超过正常水平的税收增长联系起来。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上述基准化问题都须要作更系统性的处理。[15] 另一个重要假设涉及到地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地下货币余额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修正的现金比率法中，以服务为中心的地下部门相对于其对应的地上部门有着更高的周转速率；在另一种现金比率法中两种周转速率被看作是相等的。正如在政府专门委员会季度模型里测估的那样，相对于现金而言，活期存款随时间变动而呈负增长趋势。这就表明，相对于活期储蓄来说，现金的节省就更难。由大笔现金存取须要银行报告，这使得将现金转变为存款的交易成本增加，地下持有者们可能因此而遇到更多的麻烦。其结果，与地下经济的服务方面相背，

每一美元地下现金所形成的收入可能低于地上部门。

尽管基准假定和现金周转速率假定在测估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但现金比率法中还有一种更为棘手的假定：现金比率法对未记录国民生产总值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于测估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现金比率法而言是一个恒定量。假定在一特定年份里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测估结果是两个不同的值，不管将哪一个测估值作为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现金比率法测估的未录国民生产总值与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将是一致的。这样，经济分析局对测估结果的任何修正都不会改变现金比率法测估到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录和未录的两部分）与在录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一个有关现金周转速率与基准的更为确定的假设，就很难对不同的现金测估法的测估程序作出评价。另外，现金比率测估对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不太敏感。顺此而论，改进了的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测估值将改变未录国民生产总值占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但在可用的现金比率分析程序中并不存在这种改进的可能性。

## 交易比率法评价：计量经济问题

有关依赖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周转速率，已有既成理论，但关于总交易尚无既成理论可依，所以对法伊格的交易比率法作出评价就更加困难。但通过对交易与收入的比率进行随机性的观察就可发现，二者的比率在大多数时期与利率同向变

动。庞特与奥芬巴赫（Offenbacher，1984）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基于不确定条件下持有现金的存货模型为这种变动提供了一种局部性解释。他们揭示出记入企业借方的活期存款与利率及规模（企业规模）呈正相关，但与交易成本呈负相关。[16]附录 A 中的图 A5.1 绘出了用这一模型得出的除纽约外的总活期存款交易对名义 GNP 比率的预测值及实际值。如图中所示，借方对 GNP 比率的一些主要变动的解释可不考虑有关地下经济的因素。但这一证据只能看作是试验性的，因为总交易的理论尚未确立，图 A5.1所示的结果仅仅局限于样本内预测。在更多的样本外预测被证实之前，庞特—奥芬巴赫模型的适应性还值得怀疑。

**其他问题**

与各种现金比率模型相比，交易模型至少在理论上具有几方面的优点。这种方法不需要关于地上与地下部门相对收入周转速率的任何假设，也无须假设地下部门中以现钞为唯一交换手段及现钞与存款在那些部门中以某一给定的比率来运用。它以一种对称的方法处理现金与存款。此外，对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改进的测估值可以在正确的方向上对地下国民生产总值与地上国民生产总值二者的比率作出修正，即在录国民收入的增加或减少都直接提高或降低这一比率。

另一方面，这一方法无须对地上部门中交易率作任何说明。和其他方法类似，选择基准率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实际上，资料的限制是实施交易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从现有资料来源中测估必要的数据序列，必须作出许多假设。前也叙及，现金存量周转的测度并不存在，这就需要有一个

间接估计程序。不过，较之涉及总交易中的净现金及不动产交易来说，现金周转的测估问题相对容易一些。[17]

有关活期存款的总交易没有分为货币性的与非货币性的交易。当前，直接提供这种分类的唯一数据在纽约的几个主要银行之中。[18] 在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主要金融中心，那些数据所表示的总交易几乎全是货币性的。除在交易序列中剔除纽约的主要银行以外，法伊格还引用了一些金融中心关于借方的较早的历史系列数据以剔除某些可能是纯货币运动的交易。但由于此后不再收集这类数据，故无法以现有资料来源中衡量其与目前的这类资料的关系。此外，析出那些购买其他金融债券的活期存款借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例如，缺乏有关证券市场分类活动规模的综合测量尺度，也没有几种重要的金融市场证券（如重购契约）周转率的直接测估值。此外，金融管理技术的改善，特别是非金融机构采用的现金集中帐户，使得活期存款的借方在性质上是纯货币性的。这些借方增加了非金融企业持有的不同银行的活期存款帐户中的交易额，而不是金融市场的证券买卖。因而在交易比率法的剔除过程中无须剔除这类借方总额(卡尔逊，1982)。有些企业用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地减少了其 $M_1$ 的持有量。[19]

对交易法的最近测估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交易比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可支兑存款而不是现金。例如，净交易对在录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测估值从 1975 年的 8.46 增加到1981年的 10.03；但若现金交易的比例固定于 1975 年的水平，交易比率仍将上升到 9.54。这样，交易比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存款而不是现金。由于在地下经济中使用可支兑存款比使用现金被“抓住”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所以将交易比率的这

一增长所隐含的收入增长全部归结到地下交易上去似乎有悖直觉。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交易比率反映的增长中至少有部分与纯金融交易有关。研究一下交易比率法中1980年到1981年隐含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表5.2），似乎可以证实这种解释。1982年18.1%的增长率比当年在录部分的增长速度约快4倍。这样大的增长看上去不太可能，它说明在测估过程中部分金融成分尚未完全剔除。

## 金融统计方法综述

基于货币统计方法产生了一系列地下活动的测估值，几乎所有测估结果都显示出，自1970年以来，地下活动与货币总收入增长速度都有相对的增长。简单的和经修正的现金比率模型基于一系列很不可靠的假设，最关键的如：(1) 地上部门的现金比率即现金对可支兑存款的比率是恒定的，而不管经济要素如利率及收入中属于当前个人支配的部分如何变化；(2) 地下对地上或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变；(3) 地下部门中使用现金与可支兑存款的比率不变。交易比率法避开了上述问题，但近期的测估结果看上去不太可信，原因在于难以将纯金融性交易与其他交易分开。

最后，有一个现金对$M_2$的精确计量经济模型，它通过使用税收变量间接表示地下经济。不同于其他测估方法，这一方法并不指出地下部门相对于总经济活动的任何相对增长。但这一方法看上去也不很可靠：它与其他现金比率测估

过程一样作出了相同的不变性假设；它认为地下交易中完全不使用支票；它没有精确地测算出战后时期的税收效应。

## 对现金统计数据的评价

在很多情况下，地下经济存在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人均现金持有量达到可观的水平。在1982年底，现金，包括库存现金的保有量为人均675美元的水平。其中将近40%是面值100美元的货币。这种情况似乎与日常经验不太符合。但由于没有国外持有量的可靠的测估资料，所以国内居民的现金保有量测估值明显偏高。

尽管人均现金保有量很高，但图5.2及图5.3表明过去20年中，相对于$M_2$，旅行支票、国内非金融信贷、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名义个人消费支出测估来说，累计平均现金比重已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就$M_2$而言，这种运动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阶段上，处于$M_2$形式的名义收入增长率由于管制的取消及名义利率的提高而明显向上移动，同时名义现金收入仍为零。更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到70年代中期，现金对旅行支票甚至旅行支票本身都有类似的明显下降趋势，尽管与现金相似，旅行支票没有名义收益率，但与现金不同的是，它留下了一"纸"踪迹。最后，现金持有量在过去年代的变动已被一些模型很好地预测出来，不过其中没有考虑地下经济的情况(图5.4)。

然而，有人认为计量经济模型对现金余额的精确预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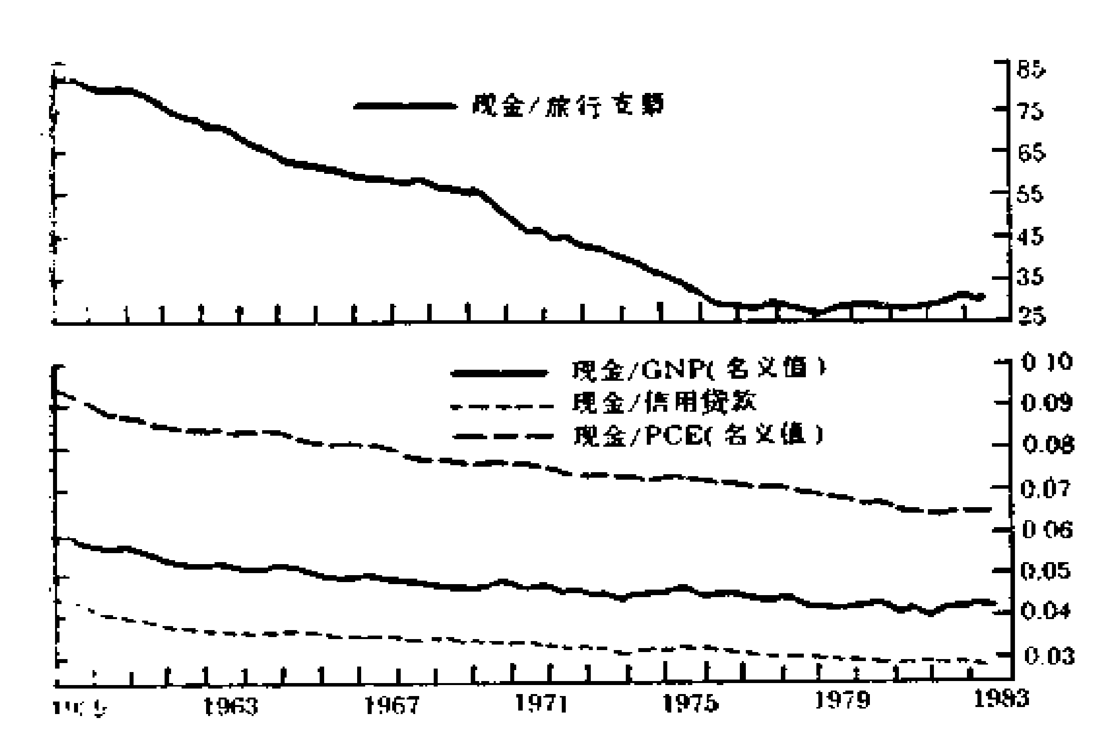



图 5.3 现金与旅行支票、GNP信用贷款和价格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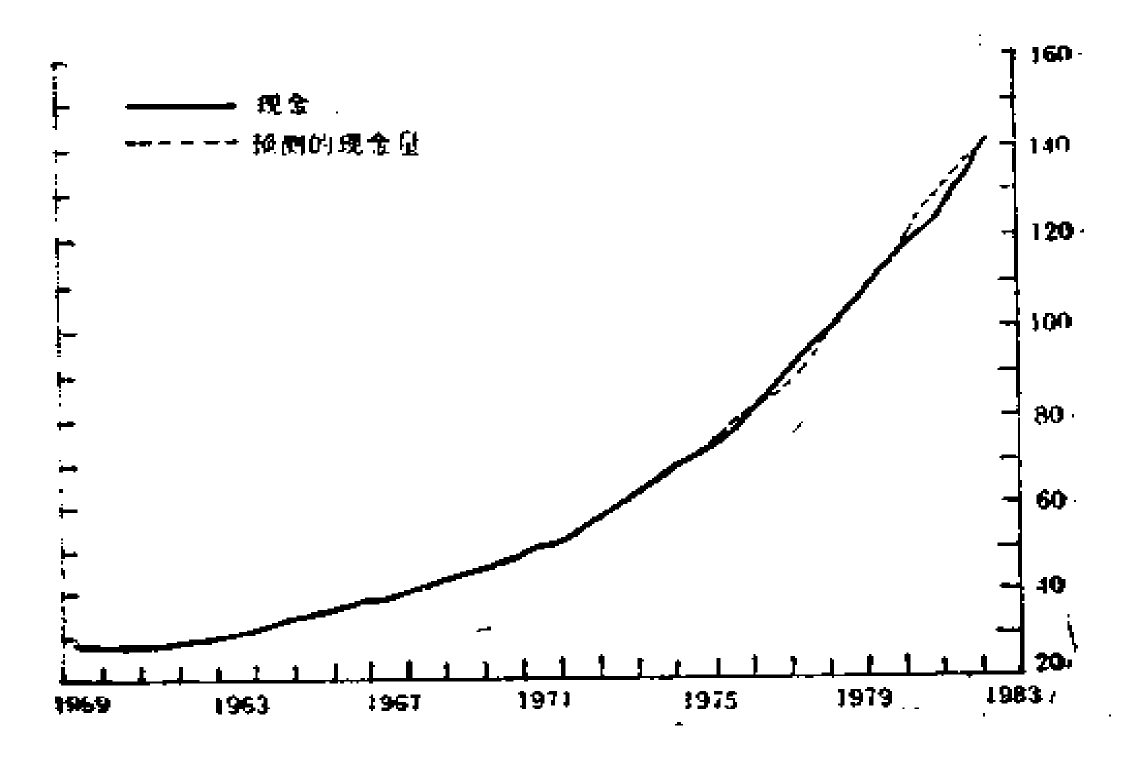



图 5.4 实际和预测的现金持有量

能是一种巧合。因为现金持有量是地上和地下现金持有量之和，地上部门付款方式的变动导致的现金持有量相对减少可能引起地下现金持有量的相对增加，从而使总和不变。更为常见的是，信用卡的使用可能使地上现金持有者节省现金的使用。但现金交易测估的结果表明信用卡所占比重很小——从现金交易估测来看1981年略大于2%。关于地上交易中现金使用可能减少的第二个因素是以支票支付的比重在增加。这一因素没有包括在标准的现金需求定义中，但即使对这一因素按坦斯方法处理时，政府专门委员会的现金比率方程的预测也无实质性改变。

另一方面，有人或许认为自50年代中期以来，累计现金余额(包括库存现金)仅保持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以致实际的人均现金持有量基本没有改变(图5.5)。这样，在金融统计方法中，如果采用的是实际人均持有量而不是总现金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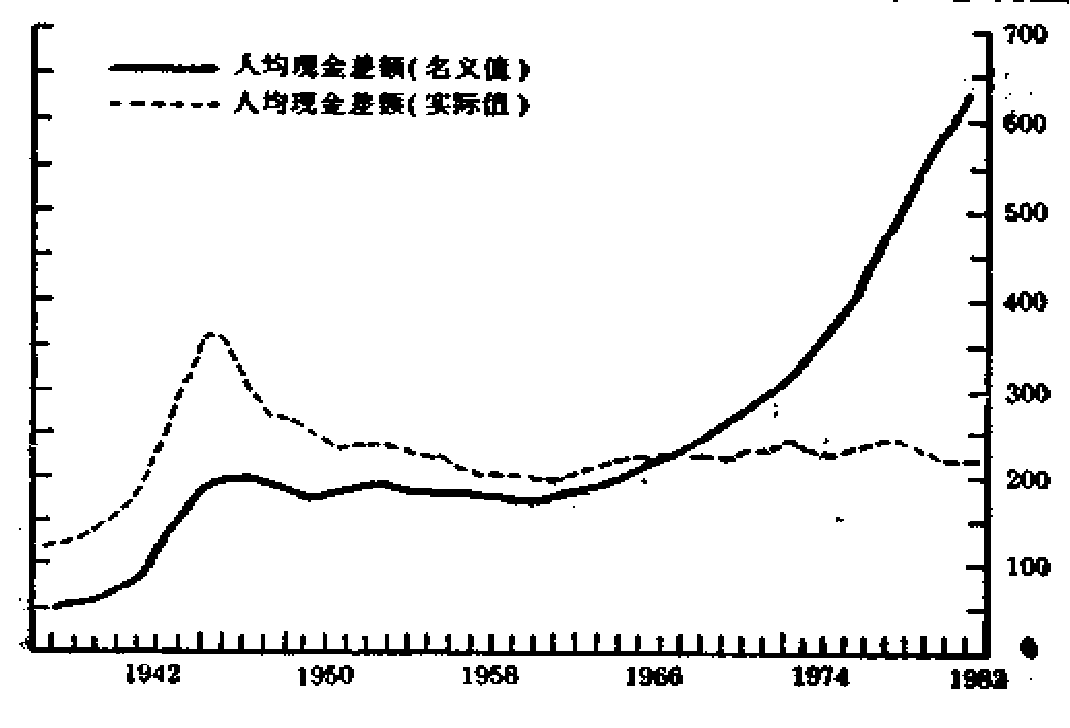



图5.5　人均现金差额

有量，则地下经济的相对规模从战后早期到现在将保持大体不变。㉘

如前所述，那些认为地下经济日益增长的人有时指出在现金存量中 100 美元面值的币种所占比例在上升（图 5.6）。甚至在实际结算中，面值 100 元币的比例都是惊人的（图 5.7)。它可能是地下经济活动增加的证据，也可能是地上交易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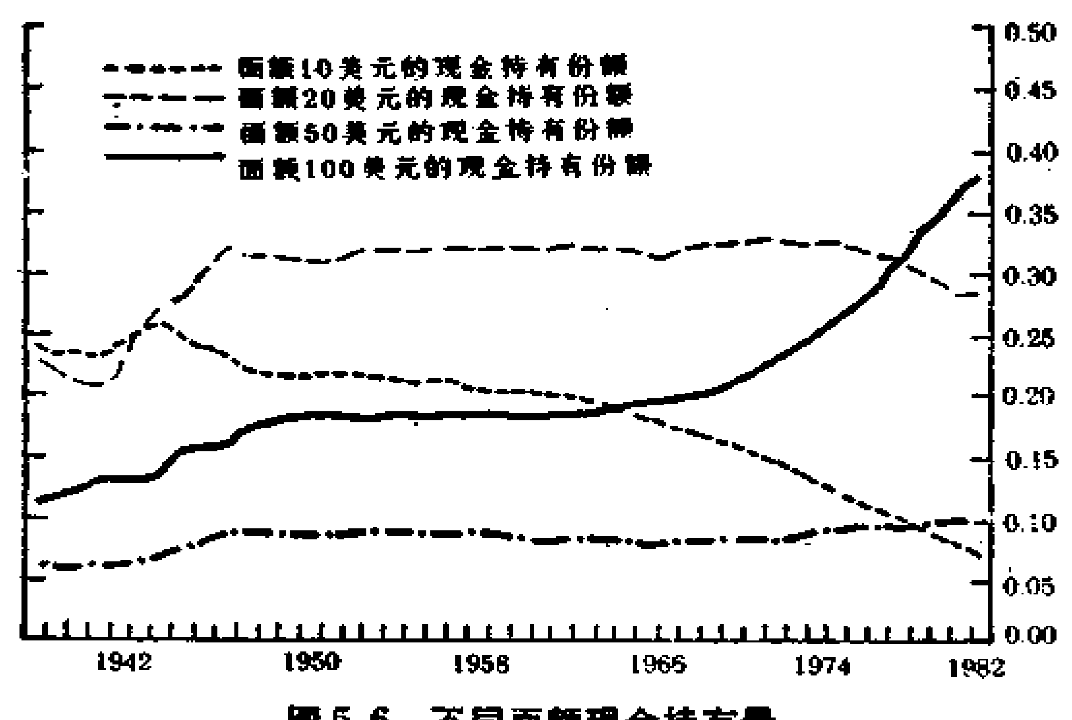



图 5.6　不同面额现金持有量

集中于后一种解释来看，应该注意到，自 1969 年以来，100 元币就是最大发行面值。㉙这样，价格水平的提高可导致交易规模的膨胀，进而使百元币运用的比例增加。百元币的这种“便利”是其他币种所不具备的。根据克莱默（Cramer, 1983)新近提出的模型，可以确定在所有币种中百元币的重要性。克莱默假定交易者力图使一定交易规模中用于交换的现金的单位数最小。表 5.3 列出了美国不同交易规模中应用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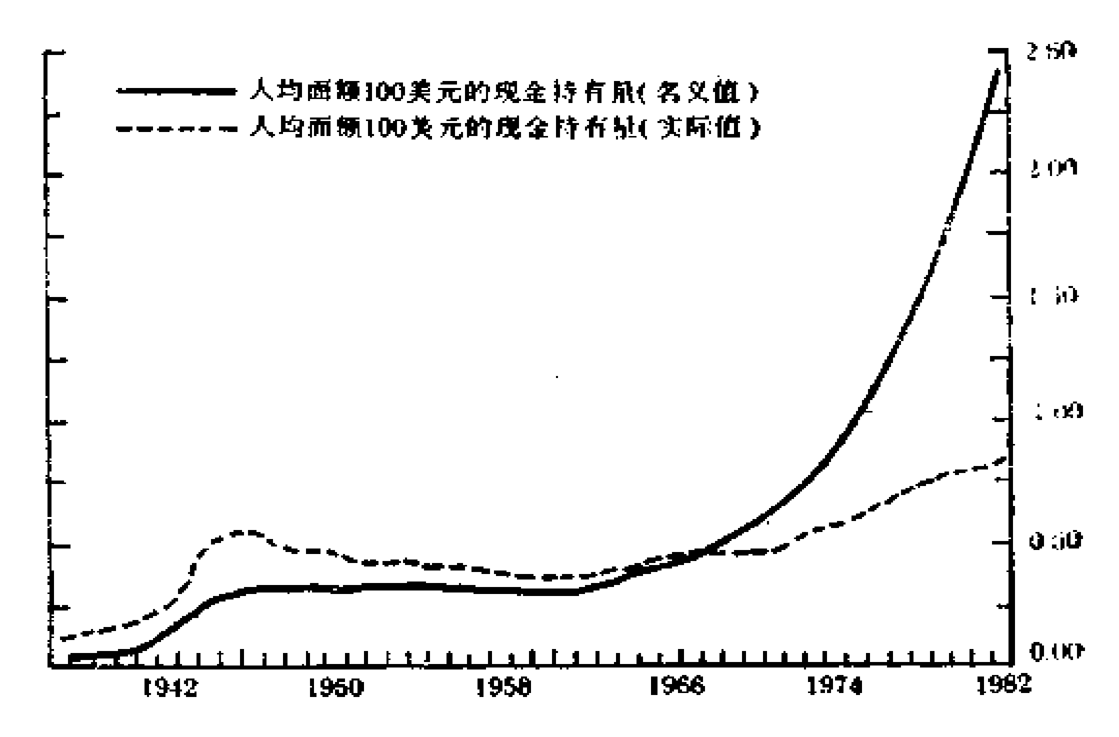



**图 5.7　人均面额为 100 美元的现金持有量**

**表 5.3　平均交易规模与面值组合之关系**

| 参数 $\beta$ | 平均交易规模（$） | 百元币份额（%） | 五十元币份额（%） | 二十元份额（%） |
|---|---|---|---|---|
| 10 | 12.69 | 12 | 13 | 22 |
| 20 | 25.38 | 19 | 20 | 33 |
| 30 | 38.08 | 25 | 28 | 29 |
| 40 | 50.77 | 31 | 32 | 23 |
| 50 | 63.46 | 37 | 34 | 18 |
| 60 | 76.15 | 43 | 32 | 14 |
| 70 | 88.85 | 49 | 29 | 13 |
| 80 | 101.54 | 56 | 25 | 12 |
| 90 | 114.23 | 62 | 21 | 10 |
| 100 | 126.92 | 66 | 19 | 9 |

莱默模型组合不同面值币种的结果。[22] 该测估建立于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所有达到一定规模（$\beta$）的交易的出现概率相等（即服从均匀分布），而超过该规模的交易则服从于帕累托分布。这样，每一规模超过 $\beta$ 的后续交易较其前一交易规模的出现概率略小。[23] 尽管难以将预测值和美国的实际币种结构相比，但表中仍表明随着单件交易的规模增加，在币种的最优组合中百元币的比重在上升。例如，光平均交易从略大于 25 美元（$\beta = 20$）上升到略大于 100 美元（$\beta = 80$），百元币的比重就从 19% 上升到 56%。

从这一分析中可见，持有现金中面值构成随时间变化是不足为奇的（图 5.6）。1978 年百元币在现金中的比重已超过了 20 元币。该图还显示出上次出现类似情形是在 1942 年。当时，20 元币的比重超过了 10 元币。从 1042 年到 1970 年，人均消费支出从 605 美元增加到 6048 美元。这样，每当人均消费支出增加 10 倍，面值组合中比重最大的面值就增加五倍，即新的比重最大的面值是原先比重最大面值的五倍。

对认为百元币比重上升可作地上活动解释的观点进行评价的另一方法出自于附录 B 中的方程，它只考虑了百元币的情况。该模型建立于如下假设之上：(1) 大于一定规模的交易的分布服从于帕累托分布；(2) 长时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与规模分布的变动成比例；(3) 个人持有的百元币数与其参与一定规模交易的概率成比例。在这些假设下，该模型将人均持有的百元币数解释为价格水平的函数。如图 5.8 所示，该模型的回归方程在样本外区间的性能很好，它解释了人均百元币持有量近来增长的实质部分。这样，理论与经验结果都说明百元币的增长主要与地上经济中的经济与制度性因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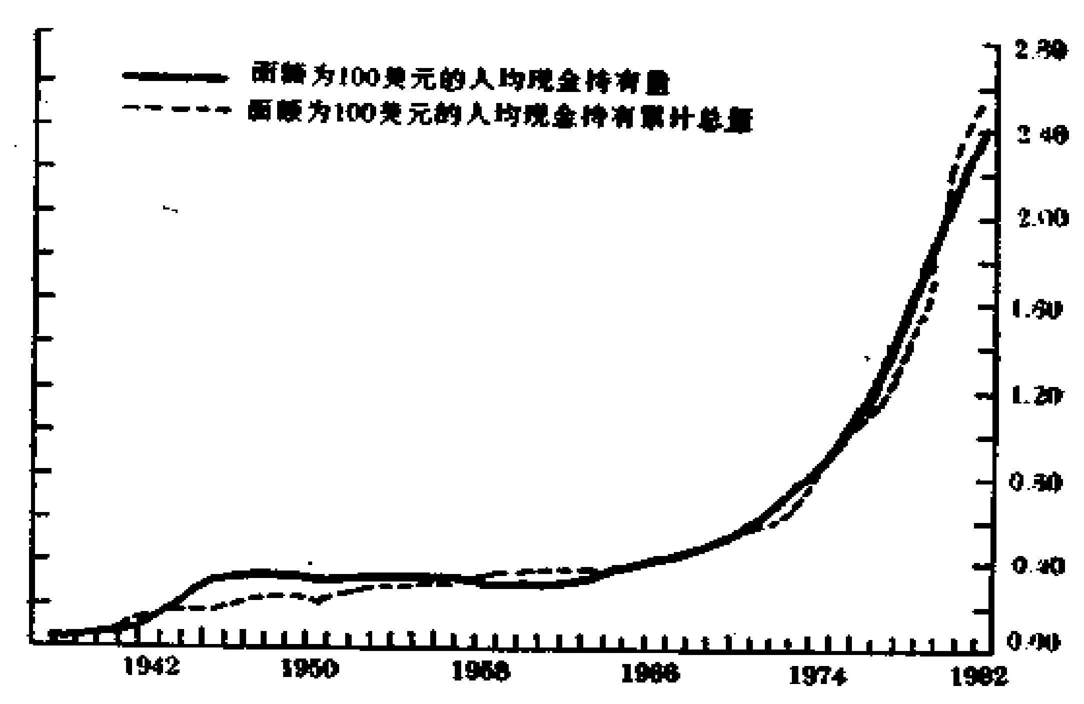



图 5.8 人均持有面额为 100 美元的现金量的实际和预测值

尽管现金持有量和形式乍一看有点可疑，但是人均拥有现金和百元币的增长不涉及地下经济就可得到解释。价格水平和货币面值的上升可解释现金拥有量的格局。

## 结　　论

金融统计的分析尚未发展到为地下经济活动提供可靠测估依据的水平。这种数据来源并没有充分证明地下经济在美国总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随时间增长这一假说。

当前，现金比率与修正现金比率方法仅仅是为了技术上的方便，而不是基于基本经济理论或其他经验规律所作出的假设。为方便起见而作出的地上经济中现金比率不变的假定

是这一方法的支柱，而一些重要的经济要素如利率等是在不断变化的。尽管坦斯试图通过一个细致的回归模型利用税收来处理这一问题，但他的工作没有能解决预测的税收效应的大小问题。所有的现金方法都作了这样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即地上国民生产总值对在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随在录国民生产总值测估值的变化而改变。另一方面，交易比率法对称地处理支票存款与现金，而且避开了各种现金比率法中的不变性假设。但由于难以从总交易中析出纯金融交易，以当前的数据来源利用这一方法十分困难。可能就是由于上述问题，用交易比率法测估的近期地下活动过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测估地下经济活动所遇到的问题对在总经济中使用现金与支票作为交易媒介提出了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随着更充分的数据来源与方法的提出，这些问题可望得到更好的答案。

## 附录 A：

### 经验性货币方程

联邦储备委员会(FRB)模型中的方程式。$M_1$，即现金（含旅行支票）、活期存款及其他可支兑存款的需求方程出现于委员会的季度经济模型中。简言之，活期存款及其他可支兑存款的方程式是建立在相同的理论交易模型上的，因此是同时估算的，且有相似的经验说明。人均存款需求是人均收入与保有存款的机会成本以及市场利率与存款自身利率之差的函数。对活期存款来说，其自身利率（Own Rate）为零，而其他可支兑存款的自身利率为 Rnow， 即在即期帐户上的利率。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程中的利率项为非线性型，这样可使需求的利率弹性随利率水平变化。

方 程 的 记 号

$C$ = 现金(坦斯)

$GNP$ =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N$ = 人口

$PCE$ = 个人消费缩减指数(1972 = 100)

$R$ = 定期存款的利率

$RATCHET$ = 现金管理棘轮

$RFF$ = 联邦资金率

$T$ = 总所得税对收入的比率(坦斯)

$TW$ = 加权平均税率(坦斯)

$U$ = 校正项

$WS/NI$ = 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坦斯)

$Y$ = 实际人均收入(坦斯)

**坦斯的测估结果**

样本区间为 1930—1980，使用加权平均税率：

$$\ln C/M_2 = -5.0262 + 0.2479\ln(1+TW) + 1.7303\ln(WS/NI)$$
$$[-3.61] \quad [5.81] \quad [5.33]$$
$$-0.1554\ln(R) - 0.2026\ln(Y) + e_1U_{-1} + e$$
$$R^2 = 0.950 \qquad DW = 1.576$$

使用平均税率：

$$\ln C/M_2 = -4.2005 + 0.3096\ln(1+T) + 1.7591\ln(WS/NI)$$
$$[2.93] \quad [5.26] \quad [4.26]$$
$$-0.1603\ln(R) - 0.2804\ln(Y) + e_2U_{-1} + e$$
$$[3.37] \quad [2.22]$$
$$R^2 = 0.947 \qquad DW = 1.677$$

**坦斯结果的复述**

样本区间为1930—1980，使用加权平均税率：

$$\ln C/M_2 = -5.0276 + 0.24791\ln(1+TW) + 1.7304\ln(WS/NI)$$
$$[-3.60]\quad [5.78]\quad [5.32]$$
$$-0.15583\ln(R) - 0.20178\ln(Y) + 0.75189U_{-1} + e$$
$$[-3.66]\quad [-1.87]\quad [8.14]$$
$$R^2 = 0.951 \qquad DW = 1.574$$

使用平均税率：

$$\ln C/M_2 = -4.219 + 0.30913\ln(1+T) + 1.5827\ln(WS/NI)$$
$$[-2.93]\quad [5.23]\quad [4.75]$$
$$-0.1611\ln(R) - 0.27712\ln(Y) + 0.83188U_{-1} + e$$
$$[-3.38]\quad [-2.18]$$
$$R^2 = 0.948 \qquad DW = 1.680(\text{残数标准误差} = 0.046738)$$

**按坦斯方法估计战后的结果**

样本区间为1946—1980，用加权平均税率：

$$\ln C/M_2 = -0.40611 + 0.018224\ln(1+TW) + 0.49337\ln(WS/NI)$$
$$[-0.45]\quad [0.29]\quad [2.22]$$
$$-0.016408\ln(R) - 0.095747\ln(Y) + 0.92868U_{-1} + e$$
$$[-0.48]\quad [-1.23]$$
$$R^2 = 0.989 \qquad DW = 2.10(\text{残数标准误差} = 0.018345)$$

用平均税率：

$$\ln C/M_2 = 0.1753 - 0.049305\ln(1+T) + 0.57418\ln(WS/NI)$$
$$[0.19]\quad [-0.84]\quad [2.57]$$
$$-0.051654\ln(Y) + 0.93041U_{-1} + e$$
$$[-0.62]\quad [15.02]$$
$$R^2 = 0.990 \qquad DW = 1.97(\text{残数标准误差} = 0.018114)$$

### 借 方 方 程

样本区间为1962:1—1983:2.

$$\ln\frac{\text{借方}}{\text{GNP}} = \underset{[-2.02]}{-0.91548} + \sum_{i=0}^{3} a_i \ln(\text{RFF})_{-i} + \sum_{i=0}^{3} b_i \ln(\text{GNP})_{-i}$$

$$+\sum_{i=0}^{3} c_i(\text{RATCHET})_{-i} + 0.8175U_{-1} + e$$
[13.16]

| | | |
|---|---|---|
| $a_0 = 0.012462$ | $b_0 = 0.29977$ | $c_0 = 0.0018843$ |
| $a_1 = 0.034339$ | $b_1 = 0.073013$ | $c_1 = 0.0023097$ |
| $a_2 = 0.032759$ | $b_2 = 0.016727$ | $c_2 = 0.001296$ |
| $a_3 = 0.0077217$ | $b_3 = 0.030554$ | $c_3 = 0.0089329$ |
| $\Sigma a_i = 0.087281$ | $\Sigma b_i = 0.38661$ | $\Sigma c_i = 0.006035$ |
| [2.15] | [5.26] | [3.13] |

$R^2 = 0.99613$　　$DW = 2.30$　　残数标准误差 = 0.020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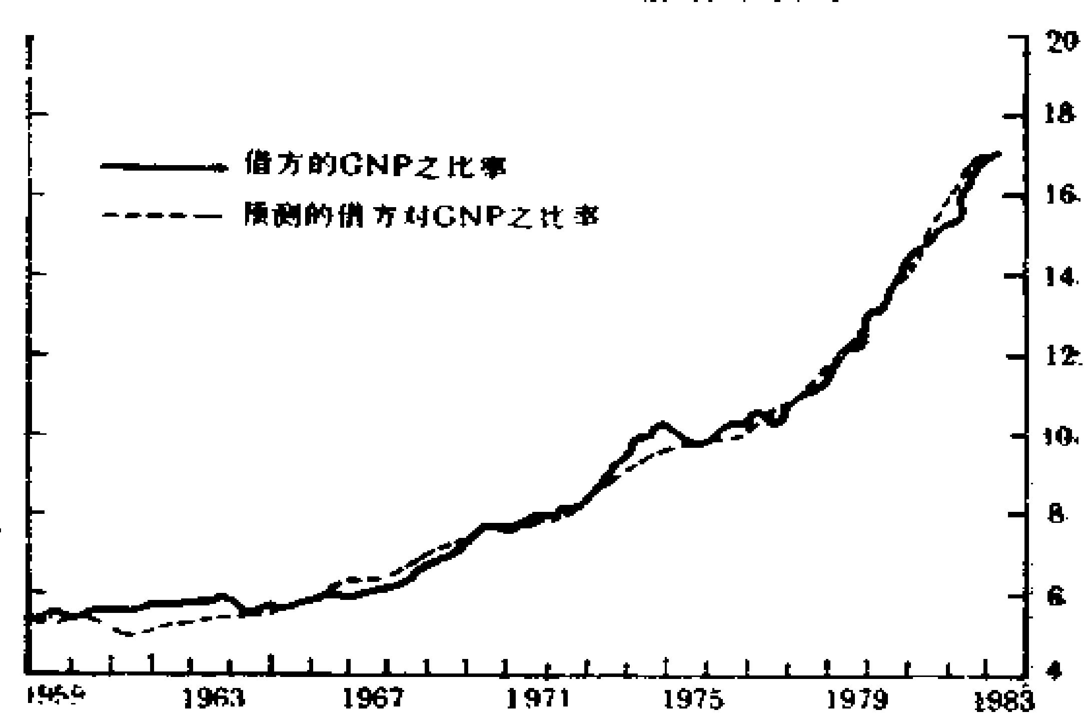



图 A5.1　借方 /GNP 比率的测算值与实际值

## 附录 B：关于面值 100 美元的假设

1．1967 年，假定消费物价指数（CPI）为 1，则现金交易中大于一定金额 $a_0$ 的大小分布为帕累托函数，参数为 $a$：

$$f_0(x/x>a_0)=\alpha a_0^{\alpha}/x^{\alpha+1} \qquad x>a_0$$

2. 1967 年后发生的交易与 1967 年相同，但除开那些 $Pt$ 倍于其 1967 年对应余额的部分，其中 $Pt$ 为第 $t$ 年的 CPI 指数。

3. 某人在 $t$ 年持有的百元币数 $n_t$ 与其达成至少 t 美元的交易的概率成比例，即 $n_t=KPr(x_t>\tau)$。

4. 人均百元币值测定数为 $n_t$ 与 $U_t$ 之积，其中 $\ln U_t$ 的均值为零，方差 $\alpha^2$ 即：

$$\tilde{n}_t=n_tU_t$$

给定上述假设，很容易证明：(1) 交易超过的概率与条件概率成比例，该条件概率为给定其超过该年的阈值 $P_ta_0$，交易超过 $t$；(2) 在以后年中超过 $P_ta_0$ 的交易也是参数为 $\alpha$ 的帕累托分布；(3) $l_n n_t=\alpha\ln(K>a_0/t)+\alpha\ln Pt+\ln U_t$。之后通过价格水平的对数来回归人均百元币持有数的对数 $l_n n$，由此来估算 $\alpha$，但在回归过程中无法分辨模型中的其他参数，如 $K$、$C$、$a_0$ 及 $t$。用一种顺序纠差结构，求得方程的估算为(样本区间，1955—1975)：

$$l_n n=0.83864+1.6797\ln(\text{CPI})$$
$$[-41.75] \quad [18.67]$$
$$+1.4858U_{-1}-0.69338U_{-2}+e$$
$$[9.97] \quad [-5.07]$$

$R^2=0.997$　　$DW=1.80$　　残数标准误差 $=0.01896$

**注　释：**

① 按惯例，国民收入统计不包括非法活动如放高利贷及违法药品交易等。

② 这一方法最早由卡甘(1958)提出，用以衡量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金比率的上移。后来这一方法为奎特曼采用。奎特曼和法伊格关于地下国民生产总值所作的最初估计保留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的支票存量在一些金融机构中很少统计到。

这使他们在测估过程中忽略了那些帐目而使用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最近几年来那些新开设的支票帐户迅速增长，并有替代活期存款(而不是现金)的趋势。其结果导致现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完全无关于地下活动而上升。这样，本章的现金比率估计是基于现金对可支兑存款比率的。

③ 这是奎特曼为 1937—1941 这一阶段的测估值。这时期可认为不存在地下经济，因为逃税刺激有限。

④ 关于上述假设的依据的讨论可见法伊格(1980)。在本书第一章法伊格分析了一般现金率模型对改变参数定义的敏感性。

⑤ 更精确地说，法伊格对总交易的估计基于测估现金与支票存款交易而忽略旅行支票交易，因为后者须由现金或支票购买。

⑥ 感谢法伊格教授提供这些估计。法伊格最初用罗伦特(Laurent)方法估计现金周转额。为说明该方法，可设想一个总通货为 100 美元的典型性经济，每年由国库收回不便继续流通的 10 美元通货。这样，纸币的平均流通时间为 10 年。罗伦特假定回收的每一张纸币经历了 G 次交易，而尚在流通的纸币只经历了$\frac{1}{2}$G 次交易。根据面值的不同和返还时间的不同，他计算了各类面值的货币在交易中累计次数与每年所付的总现金。之后取 G 值使总交易（活期存款加现金交易）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值在 1861—1967 期间为最大。法伊格在战后时期应用罗伦特法时发现现金交易速度明显下降，以 1940 年的年均 60 次降到 1944 年的年均 17 次。主要原因是在战时为节约劳动力与原材料而降低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在费雪提出现金使用的周转速度变慢的理论之后，法伊格略作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时间趋势测估，回归过程中各组正负余值结合有关记录，表明管理部门对通货数量的决策变动。回归结果形成法伊格方法中测估周转率的基础（法伊格，1980，p.26—29）。

⑦ 编者注：表 5.1 的交易法测估中，庞特和拜尔稍有疏漏，即

把政府开支加到总交易中而不是从收入中减去，结果导致未登记收入的过分交易值。修正结果可参见第一章，图 1.6，其中采用 1939 年为基期。

⑧ 然而，正如下面所描述的那样，当方程动态模拟而不是静态模拟时，坦斯模型所测估的地下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之大。

⑨ 对所有这些决定性因素进行动态模拟(如利率、实际收入等)须基于其历史性的经验数值。附录 A 对其结构作了概要性解释。

⑩ 关于 70 年代中期活期存款的情况已有很多学者作了深入分析，如：施戈德、斯坎丁、庞特、辛普森、毛斯克夫、艾斯勒和鲍勒斯 (Judd, Scadding, 1982; Porter, Simpson, Mauskopt, 1979; Enzler, Paulus, 1976。)

⑪ 请注意，坦斯使用的 $M_2$ 沿用了老定义。

⑫ 坦斯定义应视作减少型定义。为弄清这一问题可考虑一个表示地下与地上部门通货持有量的方程。设 $t^a$ 为地上部门 $B$ 申报收入所付税率，$t^u$为地下收入的预期税率。这样，在长期平衡中，实行人均现金持有量($c$) 的函数将相关于两部分：实际人均产出($Y^a$ 与 $Y^u$)与两部门税后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 $r(1-e^a)\cdot r(1-t^u)$，即：$C=C^a[Y^a\cdot r(1+t^a)]+C^u[Y^u\cdot r(1+t^u)]$。这里假设地下产出正向依赖于地下经济的税率：$Y^u=f(t^a)$。注意税率以多种方式进入结构方程，影响到 $t^u$ 的变化也将改变现金总持有量与地上税率之关系。

⑬ 甚至在 1946 年以前的时期，该定义亦值得怀疑，因为它没有考虑储蓄保险。

⑭ 法伊格 (1986$c$) 在评论坦斯方法时指出了动态模拟是较合适的方法的原因。战后时期的动态模拟结果列于第一章，图 1.5。

⑮ 它们可以与不同时期地下经济规模的独立测估联系起来，这方面的工作如国内税务局及经济分析局进行的工作。法伊格在他的一些论文中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1980，本文第一

章)。假如这些独立的测估自身有问题的话，这种方法就不会取得完全满意的结果。

⑯ 辛普森(Simpson)与庞特描述了交易成本的具体参数(1980)，为简单起见，亦可取在录 GNP 为规模变量。

⑰ 由于没有可靠数据说明哪部分现金存量属于国外持有、因而，关于国内现金交易的任何推断都有可能被夸大。

⑱ 在1983年8月，所有保险银行的活期存款借方帐户上，活期存款为111.5兆美元，其中48.4兆美元是在纽约主要银行办理的。

⑲ 基于政府专门委员会资金流量统计的数据，$M_1$ 中为非金融企业持有份额已从1959年第一季度的34.2%下降到1983年第三季度末的18.6%，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70年代。

⑳ 因为这一时期总经济在增长，若其他不变，通货人均持有量相对恒定意味着地下经济较地上经济下降势态。但持有通货的机会成本的增长和通货管理上的完善明显地抵消了交易水平的增长，从而使通货人均持有量基本不变。

㉑ 1946年百元以上面值的纸币没有印行，这些纸币的使用也大幅度减少，到1969年，已经可以看出不必恢复印行大面值币，如：$500、$1000、$5000、$10000等币种。

㉒ 感谢专门委员会的格里·安德森在制作本表中所给予的技术上的帮助。

㉓ 即：规模为 $x$ 的交易的分布函数是：

$$f(x)=\begin{cases} c & x\leqslant\beta \\ c\left(\dfrac{\beta}{x}\right)^{a+1} & x\geqslant\beta \end{cases}$$

其中 $C=a/\beta(a+1)$，$\beta$ 为分布之上限，帕累托参数 $a$ 设为1.65，这是一个近似值，用以说明百元币人均持有量。



# 荷兰的地下经济与国民收入总帐户——敏感度分析

在70年代后半期，未记录活动与欺骗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本章将探讨欺骗行为对作为制定经济政策基础的宏观经济统计的可靠性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制订政策需要统计资料，如果统计资料因庞大且增长着的未记录部门而有偏差，则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产生宏观经济效应，法伊格与麦吉(McGee，1988，第3章)举出一些信息扭曲而可能出错的例子。阿尔福德与法伊格也研究了信息扭曲及其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1988，第2章)。本章研究欺骗行为对宏观经济统计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本文用“欺骗(fraud)”一词代表在向税务部门申报收入过程中的未报与少报行为。因此，在本文中它不包括税务部门所知的非法活动收入(如卖淫等)。本文不讨论在人人守法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可能情况。

在考察欺骗行为对宏观经济统计的影响时，明确所用的有关概念非常重要。按照海尔(Heertje)与科罕(cohen)的观点，中央统计

局(CBC)把"非官方"一词用于所有未包括在国民帐户中的商品、服务和收入流量。这些流量被看作为"非官方流通量"。要理解调查结果则需要理解欺骗行为与非官方流通量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此本章第一节将详细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用一种描述生产活动分类的图解来总结本节。对生产活动进行分类揭示了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只部分受到欺骗行为扭曲。

第二节对欺骗对预期官方国内生产总值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敏感度分析。为此，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按所采用的测估方法或数据来源部门分为六大类。对每一类构成我们都列出了欺骗可能引起的扭曲范围。将各类进行综合，就能获得欺骗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扭曲的上限。这一分析的结论是，国内生产总值扭曲超过5%的可能性极小。

同样的分析方法还适用于调查欺骗行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所产生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决策中更多地用到增长率而不是变量标准，因此，讨论非官方流通同样应该重点考察增长率问题。分析的结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偏差极少超过0.5%。

## 欺骗行为对国民核算的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欺骗行为总会扭曲国民收支帐户的测估值。在这一节，我们要争论，事实肯定不是如此。首先我们来看看测估方法。艾尔吉拉(Algera, 1982)所描述的几种方法可用来测估国民核算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央统计局所

用的测估方法称为生产方法。生产方法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商品生产者与劳务提供者。从观念上讲，生产者提供了有关生产和中间投入的必要信息。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建立年度投入产出表。这种方法具有可以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并从中发现干扰源(冯·艾克，Van Eck，1983)的优点。在进行国民核算估测过程中，投入产出表起着中间产品的作用。[①]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直接运用生产方法。由于不是随时都能获得所有商品和劳务生产的统计信息，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机构有时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来取得缺漏的信息。于是，这种“间接”方法就偏离了理论生产方法。如果把经济活动看作是商品和劳务的循环流动，那有时就可能通过收集不同循环点的信息来估算某些部门的生产与中间投入。商业部门的生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商业部门产品的测估方法是：根据调查推导出商品价值，用它乘以商业利润，商业利润随商品类型不同而不同。农业部门的某些部分也需要用间接方法来测估。

在间接方法的推算过程中可能包含有统计(资料)错误。但是，由间接方法所估算的生产过程的内容并不受生产者有欺骗行为时所引起的特定的系统性扭曲的影响。只要资料不是来源于生产者本人，这些生产者的欺骗行为就不会扭曲根据间接方法所作的估算。但这并不是说间接方法就毫无偏差。

于是，当讨论只限于因生产商欺骗所引起的统计错误及扭曲时，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欺骗并不总是导致国民核算测估扭曲，因为中央统计局在测估过程中采用了对系统扭曲更为敏感的间接方法。

非官方流通与欺骗活动的关系可用表 6.1 所列的矩阵表

表6.1 生产活动分类

| 官 | | 方 | | 非官方 | | | |
|---|---|---|---|---|---|---|---|
| | | | | 有待划入国民总帐户核算 | | 无须划入国民帐户核算 | |
| 1. | 无欺骗行为的活动 | 1.1 | 官方文件记录的生产 | 1.2 | 合法活动的统计误差 | 1.3 | 自我服务及家务活动 |
| 2. | 含有欺骗的活动 | 2.1 | 未向税务当局申报的贸易活动 | 2.2 | 建筑部门欺骗行为 | 2.3 | 私有房屋地下转租 |

各项提供了说明性例子。

示，② 该矩阵可看成是生产活动的分类。

欺骗行为包括2.1,2.2和2.3这几个种类。其中有些活动(如2.3)，因为根据现行定义不应包括在GDP中，所以不会扭曲国民核算的测估。这并不否认，生产界线以外的活动的增加对制订政策及完善将来国民核算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间接核算方法的结果，有些欺骗活动（如2.1）混杂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如果这样，我们就说欺骗隐含地包括在GDP之中。下节的敏感度分析就考察欺骗行为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可能偏差，因而，分析将集中于2.2项中的活动。

## 对扭曲程度敏感度分析

对国民核算测估的敏感度分析是根据用以揭示个别帐户项目及每一项目同整个经济活动的关系的详细调查方法进行

的。该分析将国内生产总值看作是经济部门毛增值之和，详细分析了它的构成。这些构成按所用测估方法及原生产部门分成六类。有些测估来源于基本不受欺骗扭曲的部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测估过程中所有的方法一般对欺骗行为反应不灵敏。③ 在着手进行分析之前，先将国内生产总值分成六类：

第一类由用间接方法测估的国内生产总值成分组成，包括所有由间接方法测估的毛增值，具体成分如下：

农业（不包括园艺业），不包括农用种籽生产所创造的增值。生产用产量乘以现行市场价格测度。产量由独立的观测人员通过测算作物面积与单位产量来取得。

原油与天然气的生产和勘探：尽管产量资料由生产者提供，但还是进行了一些独立核查。例如：不可能不受控制地利用现有管道网售出大量天然气。正是这一部门对荷兰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政府对其严加控制。这又产生了将这一增值划为第二类的强烈争论。这种选择不会影响本章结论。

石油业：毛增值几乎完全依赖于原油及石油和煤炭产品的进出口。数量和价值根据海关报关单来决定。

不动产运营：产值为租出房屋的总租金加上业主自用房屋的相当租金。估算方法为平均租金（或相当租金）与租出房屋总数（或业主自用数）相乘。

上述测估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即信息不会因生产者自己或其他人的欺骗行为而受到系统扭曲。这意味着不管欺骗行为在以上各组中所占比重是多少，它总是等于测估中所暗含的欺骗行为的百分比。因此，导致官方测估出现系统偏差的比重为零。

第二类表示政府生产。这包括政府部门和受政府全面控

制下的国营企业的毛增值，有以下几类：

一般政府部门：总增值为雇员报酬，固定资产消费及政府所付间接税三项之和。

增值税：这一概算等于财政部收付基础上的税收减去一些主要部门中间投入所纳的增值税（这些部门如通讯、银行、保险、不动产经营及健康服务等）。

公用事业：它们受政府全面控制。

铁路：这些是以国家为唯一股东的法人企业形式而组织起来的。

有轨电车及补贴性机动车服务：它们都受到补贴，因而要受直接控制。

通讯：它以国有企业形式来组织。

银行与保险：产值为服务费加利息差额（银行）或保险费净收入减除赔偿额（保险）。它们分别受制于中央银行（虽然不是所有银行活动如“黑钱”的储蓄等都在控制之下）和保险公会。根据定义，银行利差不在国内生产总值范围之列，故应减去。

医院、精神病院和保育院：它们也都由政府资助。

受到补贴的福利设施，社会——文化与文化机构和法人企业社团：它们绝大多数接受补贴。在簿记、人事、工资政策方面坚持与政府管制相似的管制。

上述经济部门不具备引起国内生产总值扭曲的那些欺骗行为所具有的经济部门特征，因此可以假定欺骗行为不会引起该类测估出现偏差。

第三类包括大企业，第四类则包括小企业的生产。

对这两类的测估由经济实体直接向中央统计局报告。为

了解析第三、第四类的内容，我们得稍稍偏离主题来详细说明数据资料收集整理过程。尽管这两类还包括园艺、渔业及部分服务部门，但这里我们只探讨工业部门。

有关工业部门的总增值概算过程如下：每年向这两类企业发出调查表，在有些组中只查询雇员为十人的或十人以上的企业，而在另一些组中则查询所有企业，如有必要，为说明未调查企业(雇员少于十人的企业)，“自有帐户”(工人及不计酬家庭工人)所创造的毛增值，可以将调查获得的概算值提高，最常用的做法是（在生产情况下）用人均产值(调查所得数据)乘以未调查企业的人数。后者可以从社会保险基金记录及有关机构中得到。至于“自有帐户”工人则根据劳动力普查数据来推算。通过上述方法就可得到各工业部门的毛增值。

最近，中央统计局(在 1983 年)进行了一次调查，目的在于将上述估计分为两部分：即（1）雇员在百人以上的企业的毛增值；（2）雇员在百人以下的企业的毛增值。④

第五类包括对“未调查企业”的生产的测估。测估方法是将被调查企业的测估值增加能反映未调查企业的必需量。因以下原因，敏感度分析对大、小企业的数据分开处理。

a. 大企业的欺骗行为可能被众多个人所知道，尤其在欺骗行为延续多年时更是如此；

b. 在荷兰，雇员在百人以上的企业需要提交满足一定要求的资产负债表以核准其活期借贷帐户，而且资产负债平衡表必须由注册会计师直接掌握；

c. 大企业有更多更好的途径来利用财政管制所提供的机会。

因此，在上述情况中，避税的作用可能比逃税更大。

这种测估方法至少是部分地对欺骗行为反应不灵敏。让我们来考察产值的测估，给定一个非常小的企业的人均产值，它是根据被调查企业的人均产值推导的，即在两类中所含有欺骗扭曲是相同的。而实际上小企业欺骗的人均产值可能高于大企业。尽管测估中已包含有部分欺骗产值，但还可通过在工人人数中添加相对欺骗数（即实际工人数与官方估计数之差）来求得未被包括的总欺骗数（表现为毛增值的一定比例）。

最后一类（第六类）由财政数据推导出的增值所构成。⑤该类据以进行推算的资料基础是税收文档，从而源于生产者自己。

需要特别提一下对商业部门的生产测估，商业部门产值应等于下列各项之和。

a. 经营商品的商业利润为可用于交易的商品额乘以一定百分比。这些利润可分为进口商品利润和国内产品利润。

b. 某类商品自动决定的利润，如二手商品及工业用黄金等。房地产代理商的经营也包括在商业部门的产值之中。不过该类并不重要。

c. 对进口货物所纳间接税（货物税、进口税）。

为了将商业部门的总增值在上述六类中进行分配，故产值与中间投入将按比例分割。商业部门的产值分配过程为：

1. b中所提利润不重要，故省去。这意味着它们将成比例地分摊到其他利润中。

2. 对进口货物所付间接税划归第二类。

3. 进口货物的贸易利润划归第一类，因其价值是根据报关单决定的。

4. 国内产品的商业利润按下述过程分派：

设有 $N$ 组工业，用 $g_i$ 代表 $i$ 组的商品的利润的和，

$$g=\sum_{i=1}^{N}g_i \tag{6.1}$$

令 $A=\{a_i j\}, i=1,\cdots,N, j=1,\cdots,6$，为 $a_{ij}$ 为 $i$ 组中属于 $j$ 类的生产比重的一个矩阵。这样，$g$（国内产品贸易总利润）可分为六部分，分别为 $g_j(j=1,\cdots 6)$，它们满足：

$$g_j=\sum_{i=1}^{N}g_i a_{ij} \qquad j=1,\cdots,6 \tag{6.2}$$

按上述过程，可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如上六类进行分析。其中编号最小的类别对欺骗行为引起的干扰最不敏感，而编号最大的则最敏感。我们这里给出的经验测估是以1979年的国民核算为基础的。表 6.2 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给六类的最终方案（表 6.3 列出了更详细的结果）。根据这些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 53.7% 的 GDP 分到第一、二类，它们或是由间接方法估算，或是不涉及扭曲 GDP 的欺骗行为的部门。

表 6.2 GDP 的分解a

| | 类 | | | 别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合计 |
| GDP（十亿荷兰盾） | 65.2 | 104.6 | 61.3 | 54.0 | 11.3 | 19.7 | 315.9 |
| 百分比 | 20.6 | 33.1 | 19.3 | 17.1 | 3.6 | 6.2 | 100 |

a. 市场价，单位：十亿荷兰盾（GDP、国内生产总值）

为测估国内生产总值中欺骗行为所引起的扭曲的可能范围，有必要对可能受欺骗行为影响的上述各类所占比重假设几种不同组合。我们这里对每一类用五种欺骗比重方案来就国内生产总值对欺骗行为的抗干扰能力作敏感度分析。表

**表 6.3　国内生产总值的分解，1979 年（10 亿荷兰盾）[a]**

| 主要分类组[b]中的首位数 | 类别 1 | 2 | 3 | 4 | 5 | 6 | 合计 |
|---|---|---|---|---|---|---|---|
| 0 | 8.5 | 0 | 0 | 2.8 | — | — | 11.33 |
| *1*[c] | 0.5 | — | — | — | — | — | 0.5 |
| 2/3[d] | 19.9 | — | 38.3 | 12.1 | 3.9 | — | 74.2 |
| 4 | — | 6.6 | — | — | — | — | 6.6 |
| 5 | — | — | 7.3 | 6.1 | 6.1 | — | 21.5 |
| 61/66 | 21.0 | 2.9 | 10.4 | 5.9 | 0.9 | 0.0 | 41.1 |
| 67/68 | — | — | 0.7 | 6.4 | 0.4 | 0.7 | 8.2 |
| 7 | — | 7.6 | 4.4 | 8.4 | — | — | 20.4 |
| 8 | 15.3 | 15.0 | — | 0.8 | — | 12.8 | 43.9 |
| 9 | — | 17.4 | — | 9.5 | — | 6.2 | 33.4 |
| 政　府 | — | 44.4 | — | — | — | — | 44.4 |
| 最终支出的增值税 | — | 21.3 | — | — | — | — | 21.3 |
| 银行补差幅度 | — | -/-10.6 | — | — | — | — | -/-10.6 |
| 总　计 | 65.2 | 104.6 | 61.1 | 54.0 | 11.3 | 19.7 | 315.9 |
| 总计百分数 | 20.6 | 33.1 | 19.3 | 17.1 | 3.6 | 6.2 | 100 |

a. 由于数字取舍，表中数字可能与国民的测估值略有不同。

b. 主要分类组的首位数：0，农业与渔业；1，采矿业；2/3，制造业(除建筑业之外)；4，公用事业；5，建筑业；61/66，贸易；67/68，宾馆、咖啡厅、消费品修理；7，运输、仓储、通讯；8，银行、保险及商业服务；9，其他类别。读者可参阅中央统计局(1974、1982)的有关资料。

c. 没有包括石油和天燃气生产。

d. 含石油和天燃气生产。

6.4 列出了各种欺骗方案，其中欺骗的程度由低到高，第五种可看作是可能扭曲的合理上限。

**表 6.4 欺骗的可能组合：毛增值百分数**

| 方案 | 类别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Ⅰ | 0 | 0 | 1 | 5 | 10 | 20 |
| Ⅱ | 0 | 0 | 2 | 10 | 15 | 30 |
| Ⅲ | 0 | 1 | 3 | 15 | 20 | 50 |
| Ⅳ | 0 | 1 | 5 | 20 | 40 | 60 |
| Ⅴ | 0 | 0 | 2 | 10 | 30 | 40 |

按不同方案把比重分别代入相应类别，就可测估出由表 6.4 所示各方案所暗含的国内生产总值扭曲的相对与绝对百分比。表 6.5 所算的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产生的扭曲的范围为 1.8% 到 9.1%。我们就第五种方案被认为是可能的上限而言，我们断定欺骗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扭曲不大可能超过 5%。

**表 6.5 欺骗引起国内生产总值扭曲的相对与绝对数**

1979 年

| | 方案 | | | | |
|---|---|---|---|---|---|
| | Ⅰ | Ⅱ | Ⅲ | Ⅳ | Ⅴ |
| 十亿盾 | 5.8 | 11.6 | 20.5 | 28.6 | 15.3 |
| GDP 百分比 | 1.8 | 3.1 | 6.5 | 9.1 | 4.8 |

## 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分析

上面分析了非官方流道的可能范围及其对扭曲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影响。我们现在转入更重要的问题，即欺骗行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尤如法伊格与麦吉(第 3 章)所描述的那样。在构造宏观经济模型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其水平用得更多，这意味着受到扭曲的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将构成严重威胁。本节包括一个与上节相似敏感度分析，但这里已稍加修改以集中讨论增长率问题。我们仍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类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类原则是将那些用同种方法处理逐年变化所得到的内容或在相同数据来源基础上得到的数据归并起来。

为分析逐步变化而选定的第一类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中由间接方法估算的内容。第二类则包括国民核算中的“政府”部分。由于据信这两类年度测估均不受欺骗干扰，故其逐年变动也不受欺骗影响。

第三、四类分别代表大、小企业部分。这两类的数据均源于生产者本身，因此，如果欺骗部分的增长超过申报数的增长，就势必扭曲官方测估中的逐年变化情况。在上节的方案中，我们设小企业的这类的欺骗现象较大企业严重。在这里的“增长率”方案中我们再假设第四类即小企业中的欺骗增长速度较第三类即大企业快。

第五类由“极小型企业”组成，其逐年测估变动部分地对

欺骗行为不敏感。该类的测估方法是：用适当的因子（工人数）乘上指标(如人均产值)。因此，全部相对变动由指标的相对变动和因子的相对变动构成。该类测估中的系统偏差也就是第四类测估的指标的系统偏差加上因子的系统偏差。因此，该类的测估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就等于第四类的偏差加上在业人数增长中的由欺骗引起的偏差。

第六类包括那些根据财政数据测估的内容。在这里给出的测估中，1977年的测估只是简单地根据财政资料加以提高，以包括欺骗。1977年以后各年的测估都是"自有帐户"工人的人均产值与中间投入乘上反映价格、"自有帐户"人数以及生产率变化的相应指数。这些众多而且十分繁杂的指数通过有关工资(工资指数)、价格(如政府价格管制条例)以及成本等几方面信息来源获得。不管这些指数怎样不精确，它们都是根据不受生产者所报资料的影响而获得的，因而不会受欺骗所引起的系统扭曲。这样，人均增值变动指数也就对欺骗不敏感了。毛增值的增长基本上是间接估算的，也不会受"自有帐户"工人欺骗所占比重可能出现的增长的影响。所剩下的只是"自有帐户"工人人数增长中可能包含的系统偏差。因此，结论和第五类相似。

在计算中我们用下列记号：

$N$ = 官方测度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

$N_i$ = 归于 $i$ 类的毛增值，$i=1, \cdots, 6$

$T$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T_i$ = 应测度的都已测度时的归于 $i$ 类的实际增值，$i=1, \cdots, 6$

$F$ = 国内生产总值中欺骗引起的扭曲的绝对规模

$F_i = N_i$ 中欺骗引起的扭曲，$i = 1, \cdots, 6$

我们还将使用如下定义：

$$f_i = N_i/N \qquad i = 1, \cdots, 6 \tag{6.3}$$

$$f_i^* = T_i/T \qquad i = 1, \cdots, 6 \tag{6.4}$$

$$a_i = (T_i - N_i)/N_i \qquad i = 1, \cdots, 6 \tag{6.5}$$

$$a = (T - N)/N \tag{6.6}$$

变量的相对变动用符号(～)表示。我们所作的第一个观察报告是：

$$\tilde{T} - \tilde{N} = a(\tilde{F} - \tilde{N}) \tag{6.7}$$

官方测度增长扭曲取决于欺骗增长与官方测估增长之间的差别($\tilde{F} - \tilde{N}$)和扭曲的相对规模($a$)。很明显，欺骗越大，其快速增长对官方测估的影响就越大。

上述分析表明，增长测估值的敏感度分析只有结合水平的分析才能进行。这更加强了上述论断的说服力，因为只有在欺骗额已经较大时，欺骗的迅速增长才会引起官方增长测估出现大的偏差。

根据上述定义及等式，我们可导出：

$$\tilde{T} - \tilde{N} = \sum_i f_i^*(\tilde{T}_i - \tilde{N}_i) + \sum_i (f_i^* - f_i)\tilde{N}_i \tag{6.8}$$

可以证明右边第二项值可能为负。事实上，根据前面的方案，我们有：

$$f_i^* \leqslant f_i, \quad 其中\ i = 1, 2, 3 \tag{6.9}$$

此外，70年代最高增长数字已出现在前三类中，因此极有可能：

$$\sum_i (f_i^* - f_i)\tilde{N}_i \quad \leqslant 0 \tag{6.10}$$

如果该项的总量与系数一定，就可将其全部省略。

对第五方案来说，$f_i^* - f_i$ 的变动范围在 $-0.0097$ 至 $0.0209$ 之间。这样，在我们下面的计算中，我们用 $\sum_i f_i^*(\widetilde{T}_i - \widetilde{N}_i)$ 作为前面 $\widetilde{T} - \widetilde{N}$ 的近似值。

改写该表达式得：

$$\widetilde{T} - \widetilde{N} \lessapprox \frac{\sum_i (1 + a_i)}{(1 + a) a_i f_i (\widetilde{F}_i - \widetilde{N}_i)}$$

这里$\lessapprox$表示上面的近似值。

表6.6列出了五种方案，分别代表增长比例 $\widetilde{F}_i - \widetilde{N}_i$ 的不同组合，其中 $i = 1, \cdots, 6$。每一 $\widetilde{F}_i - \widetilde{N}_i$ 代表官方测估扭曲的超额增长。在各方案中均有 $\widetilde{F}_1 - \widetilde{N}_1 = \widetilde{F}_2 - \widetilde{N}_2 = 0$，因为其官方测估不受欺骗干扰。

$\widetilde{F}_3 - \widetilde{N}_3$ 和 $\widetilde{F}_4 - \widetilde{N}_4$ 分别表示大、小企业中欺骗的超额增长，这一超额增长完全反映在官方测估的扭曲之中。$\widetilde{F}_5 - \widetilde{N}_5$ 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第四类的人均欺骗的超额增长，第二部分为未注册工人人数(以每人次计)的超额增长。可见，$\widetilde{F}_5 - \widetilde{N}_5$ 与 $\widetilde{F}_4 - \widetilde{N}_4$ 的差别至多就是第五类中高于官方测估水平的总就业超额增长。最后，$\widetilde{F}_6 - \widetilde{N}_6$ 为该类总就业超过官方测估数的超额增长。

当上述百分数构成与官方预测的1979—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6.3%的增长率相比时，可以看出非官方流通增长的假设增长值相对高一些，特别是C、D、E所代表的。E方案为“高”方案，我们用它来表示超额增长的合理上限。

只有了解非官方流通的规模，才可以测算不同模式对官方增长估算所产生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上述“增长方案”与前一节的“水平方案”结合起来。对每种组合都可求出官方计测的增长中的近似偏差。

表 6.6 欺骗增长出超

| 方案 | 类别 | | | | | |
|---|---|---|---|---|---|---|
| | $\tilde{F}_1-\tilde{N}_1$ | $\tilde{F}_2-\tilde{N}_2$ | $\tilde{F}_3-\tilde{N}_3$ | $\tilde{F}_4-\tilde{N}_4$ | $\tilde{F}_5-\tilde{N}_5$ | $\tilde{F}_6-\tilde{N}_6$ |
| A | 0 | 0 | 2 | 5 | 10 | 0 |
| B | 0 | 0 | 5 | 10 | 10 | 5 |
| C | 0 | 0 | 5 | 10 | 15 | 10 |
| D | 0 | 0 | 10 | 15 | 25 | 10 |
| E | 0 | 0 | 5 | 10 | 20 | 5 |

表 6.7 列出的偏差百分比率没有参照各类中明示欺骗进行测估计算，但考虑了总的明示欺骗测估数并对预期增长偏差产生不断变小的影响。

表 6.7 官方计测的增长率的偏差[a]

| 欺骗水平 | 欺骗增长出超 | | | | |
|---|---|---|---|---|---|
| | A | B | C | D | E |
| Ⅰ | 0.1 | 0.2 | 0.3 | 0.4 | 0.2 |
| Ⅱ | 0.2 | 0.4 | 0.5 | 0.7 | 0.4 |
| Ⅲ | 0.2 | 0.6 | 0.9 | 1.1 | 0.7 |
| Ⅳ | 0.4 | 0.9 | 1.2 | 1.7 | 1.1 |
| Ⅴ | 0.2 | 0.5 | 0.7 | 1.0 | 0.6 |

a. 根据欺骗的相对规模(Ⅰ,…，Ⅴ)与其增长出超（A，…，E）求得偏差，偏差以百分数表示。考虑到时间因素，6.7 中所列百分比下降不会超过 0.1%。

在我们所拟的方案Ⅰ和Ⅴ和 A 至 E 中，我们着重考虑方案 Ⅲ—Ⅴ 和方案 C—E 的百分比构成的重要性。虽然方

案 V 和 E 分别代表水平方案和增长方案的合理上限，但我们不可断言 V 和 E 结合在一起就是增长扭曲数字的适当上限。我们必须考虑到出现这种较高百分比组合的可能性极小。从长期过程来看，方案 Ⅱ 和 B 的组合可能更具代表性。可以说，只有在不大可能出现的欺骗超额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扭曲超出合理的上限时，偏差才可能超过 0.5%。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由欺骗超额增长所引起的增长偏差极有可能小于 0.5%，不大可能出现更高的百分化。

## 结　论

本章我们就荷兰的国民核算测估进行了敏感度分析。分析集中于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中由欺骗所引起的偏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偏差的分析是通过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具体组成进行分类以使同类内容受欺骗的影响相近来进行的。分类的标准包括资料来源、分类构造方法及其所代表的经济部门。

在某些类中测估内含有欺骗部分，而在另一些类中，测估与不受准备参与欺骗的部分经济活动有关。最后，对那些未内含在测估中欺骗类别也求得了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扭曲规模。我们的结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偏差很少超过 5%。

第二部分集中于增长率的测估。如果知道超出官方增长的欺骗未内含在测估中的超额增长和扭曲 GDP 官方估测的相对欺骗数量，就能确定 GDP 相对变化的偏差。把欺骗超

额增长方案和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扭曲方案结合在一起，就可求出官方估测增长率中的扭曲程度。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严重扭曲和欺骗超额增长百分比很高这两种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0.5%以上的偏差。

注　释：

① 当然投入一产出表也可以按其本来作用供分析各类产业之关系。

② 冯·蒂聂(1981)，布鲁克兰德(1982)，冯·艾克(1983)给出了该表更详细的版本。

③ 对国民经济总帐户测估所进行的敏感度分析受到冯·蒂聂(1980)在集体讨论非官方流通上的观点的启发。

④ 该调查的结果用来形成第三、四类。第三类包括雇员在百人以上，资料源于生产者且不在第一、二类中的企业的净增值。第四类包含雇员在百人以下，范围与第三类相同的企业净增值。该类还包括园艺、渔业及农用种籽生产所产生的增值。关于第三、四类再作一些附加说明。

1．第四类还包括园艺及农用种籽生产的净增值。该部门的产值主要通过拍卖量来测定。资料不是来自生产者而是拍卖行。虽然这与该类所用测估方法略有不同，但其相似性足以证明其属于该类。

2．涉及服务部门各企业的资料无须划分为两部分。其净增值划归第四类。这是因为其测估方法完全不同于制造部门所用方法，这使得区分工作十分困难。此外，大型、非政府机构服务部门的净增值不大，其资料来源于这些机构自身。

上述测估方法对欺骗不敏感。不考虑生产者向中央统计

局申报的产值与净增值高于向税务部门申报数的情况，我们可认为测估中未隐含欺骗成分。

⑤ 它包括下列各组的"自有帐户"工人：部分宾馆、饭店、咖啡厅、消费品的修理、商业服务、机械出租及其他动产、卫生与兽医服务、社会文化机构等。



# 联合王国地下经济的评价

对联合王国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我们所使用的测估方法和对有关事实的观点，都是十分审慎的。我的论点是，此处的“任何结论都是一种充满信心的理论而非严格的事实……把所有信息资料的影响综合到一起，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其数字还不到5%”（奥赫金斯，1986，p.36）。在此之后，官方机构——国内税务局（IRS）和中央统计局（CSO）——已经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国内税务局外强中干的妥协使人产生了新的感觉——逃税成为最普遍的行为，同时也能得到最有效的控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经济学委员会下设的一个专家小组，对于与隐形经济的测估和理论有关的研究课题进行了报道和讨论。研究结果显示，在70年代末期，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中约有2%～15%是未观察到的经济。此处，我想研究的问题是，对展现在面前的如此丰富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是否可以减少关于英国隐形经济的规模和发展趋势方面所存在的混乱认识。

本章主要结论是，尽管货币测估模型的

测估结果表明未观察到的经济占正常经济的比重在10～15%之间，其他方法测估的结果，表明其幅度在3～8%的范围内，现在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事实：在70年代中期，未观察到的经济处于被扼止的状态，甚至有些回落。这就与那种直观的观点相一致了，即在繁荣的年份里，当常规经济被严格控制的时候，对隐形经济的需要和其范围便达到最大化。假如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认为在传统的国民收入测估过程中，并没有将增长的隐形经济包括在内，衰退的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完善的统计的看法便与现实背道而驰了。

## 隐形经济的定义

英国关于隐形经济的定义，主要集中在涉及到税收损失和国内统计测估误差之间的若干具体问题上。毫不奇怪，国内税务局的官员们选择了前一种定义："我们认为……，黑色经济是这样一类经济活动，它们一开始就怀有漏税的动机，获得收入的经济行为从国内税收机关的视野中消失了。"(BIR，1981，p.24)。①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经济学分会的工作小组也采纳这个定义(SSRC，1981，6、2、段)，同时拒绝使用那些无助于问题解决的过于宽广的定义。例如，在引用斯图亚特·亨利的论述"隐形经济一直被普遍地描述为非正规经济及非正规机构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犯罪行为"后，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会评论道："其他定义同样模棱两可，因而，毫不奇怪，定性的，以及从人类学和印象主义角度的研

究远比定量分析和系统研究流行。”(SSRC, 1981)更广泛的定义由国家统计署(CSO)提出(麦卡菲，Macafee, 1980, p81)：“这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要素收入，不能从构成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度量的规范的统计资料中测出。”这个定义与法伊格的定义十分相近(1981, p.205)。法伊格关于隐形经济的定义是“由于现存的统计制度，没有申报或申报不足使得这类经济活动，从社会的测估机关，最明显的是从国民总产值统计中漏掉了”。不管怎样，这两类定义之间的细小差别仍向亨利的定义提出新的质疑，在隐形经济与家务活动经济部门或非正规经济活动之间如何划出明显的界限？具体例子已经足够丰富了；如果邻居之间十分友好，相互交换照看婴儿的劳务活动。例如儿童临时俱乐部中每个成员都有收入(20元)，并且都面对同样的价格表(半夜前每小时1元，后半夜每小时2元)，能把这种相互照看婴儿的活动看作是隐形经济的一部分吗？但是如果邻里之间进行的是正规的交换劳务活动，并且是职业性的服务(修理抽水马桶，电工修理，法律或医疗咨询)，同样定义适用吗？这些活动将无法包括在基于要素收入而得出的隐形经济定义之中(正如国内税务局和中央统计局的定义一样)，但是这些活动与法伊格的定义却相近，这一定义主要集中于未观察到的活动而非未观察到的收入本身。如何对待这类交换活动的问题在格书尼(Gershung)和波尔(Pahl, 1980)的论点中获得重要成果。他们认为，自我服务活动的增加，将更有利于许多生产活动的“家庭化”，这些活动在过去可能是属于正规经济活动的。

区分“物物交换”和友善帮助的一种方法是将任何一种凭借个人基本就业技能，从外面给他(或她)家庭带来收益的活

动定义为经济活动。这一定义抓住了将易货活动看作收入替代的必然逻辑，但也提出了测估和依法纳税方面的问题。更为特别的是，这一定义既没有包括那些具有多样技能的交换活动，也没有包括无需技能的活动。

## 中央统计局与隐形经济的差异测度法

虽然中央统计局（CSD）对于隐形经济用了更为广泛的定义，但是，他们对于隐形经济规模的测估却不到国内税务局对隐形经济规模估计量的一半。中央统计局的测估是基于国民收入的收入角度和支出角度测量差异得到的。它们的结论估计隐形经济占国内总产值(GDP)的2—3%，而国内税务局对自我就业和私人雇工的逃税额做了大致推测，结果表明这一百分比可达7.5%，最近的修正值在6—8%之间。本节和下面各节将对这些测估数的基础作一考察。

国民收入的收入角度测估值通常比支出测估值要小，这种差异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讲主要反映了如下事实：尽管某些收入可能没有申报或申报不足，但由此引致的很多的支出在官方统计中却都显示了出来。尽管中央统计局常常相应地通过将未审报收入的测估结果包括在内以加大对收入的测估，但直到最近关于地下经济规模的争论发生，他们才承认对收入统计作了上述调整并公布了一些有关的细节。中央统计局的观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测估值被看作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的项目之外的全部交易价值量的

没有总体偏差的测估。相反，收入测估值却更大程度地依赖于提供给国内税收机构的收入统计资料，这就有可能造成申报收入的水平低于实际收入水平”(麦吉，1980，p.85)。

原始的收入——支出间差异(即最初的余值差)被中央统计局分为三个部分：

1. 未申报的要素收入；

2. 时间误差，它起因于交易的不同各方在不同时间间隔内登记所进行的交易；

3. 其他测估错误。

在对申报不足的要素收入进行相应的调整之后，后面两项的误差综合在一起形成余值误差。表7.1所列的数字是自1969年以来的初始余值误差量，以及未登记收入和余值误差的数量。

其结果是令人惊异的。在表中所列的12年中，其中有6年的初始差异(初始余额差异)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低于1%，仅从1974—1976年超过了2%。从1976年的顶峰状态的3.5%之后，其绝对值和相对值每年都在持续下跌。从统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初始余值差被分割成未申报收入和余值误差，其方法考虑到申报收入估计值的持续不变趋势，余值误差考虑到了这种趋势的变化程度。中央统计局假设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未登记收入增加到占国民收入的2%左右，但此后始终保持在那个水平上。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小组(SSRC working group，1981)对地下经济的差异测估值持怀疑主义态度，这些统计资料又支持了这种怀疑主义观点，因为这些统计数字与从前(甚至最近)的基于差异法的未登记收入值大不相同，表7.1

表 7.1　地下经济与国民帐户中的收入-支出差异

| | GDP(*E*) | 初始余差 | | 未申报的收入 | | 残差 | |
|---|---|---|---|---|---|---|---|
| 年 | 英镑 | 英镑 | 占GDP百分比 | 英镑 | 占GDP百分比 | 英镑 | 占GDP百分比 |
| 1969 | 39667 | 150 | 0.38 | 466 | 1.17 | -316 | -0.80 |
| 1970 | 43574 | 40 | 0.09 | 537 | 1.23 | -497 | -1.14 |
| 1971 | 49490 | 1010 | 2.04 | 578 | 1.17 | 432 | 0.87 |
| 1972 | 55347 | 200 | 0.36 | 924 | 1.67 | - 724 | -1.31 |
| 1973 | 64347 | 160 | 0.25 | 1236 | 1.92 | -1076 | -1.67 |
| 1974 | 74661 | 1670 | 2.24 | 1407 | 1.88 | 263 | 0.35 |
| 1975 | 94475 | 2550 | 2.70 | 1830 | 1.94 | 720 | 0.76 |
| 1976 | 111585 | 3920 | 3.51 | 2215 | 1.99 | 1705 | 1.53 |
| 1977 | 126943 | 2530 | 1.99 | 2496 | 1.97 | 34 | 0.03 |
| 1978 | 145304 | 2360 | 1.62 | 3247 | 2.23 | - 887 | -0.61 |
| 1979 | 166464 | 1330 | 0.80 | 3754 | 2.26 | -2424 | -1.46 |
| 1980 | 193488 | 1040 | 0.54 | 3652 | 1.89 | -2612 | -1.35 |

资料来源：GDP来自《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统计》，1981年版（HMSO，1981）、表1．2．其他资源来自CSO，电话交谈，1982年4月。

所列的从1978—1980年的余额误差是几个月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额的1—1.5倍。1978年新的余额误差是一个消极的数字，约为8.87亿英镑，而我在两年前提出的数字为12.4亿英镑（奥金斯，1980，表1）。这种不同的测估结果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我先前曾记录到由中央统计局给出的六个月期限的三种不同的测估结果（奥金斯，1980）。测估结果的这种不同，使得任何试图使用差异法（即使作为一个大致测估地下经济规模的增长或者减少的指标）去测估地下经济规模的尝试都变

得复杂起来。两年前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整个70年代，地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从1971年占国民收入的1%上升到1978年几乎占国民收入的3%。新统计资料表明，如前所提及的那样，给出了更大的估计值。很难说这是反映了一种智慧的产物还是统计学家为使统计资料具有更先验的连续性而使之然。

尽管对未统计收入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初始余额差进行的，然而，“从政府其他部门，例如，从国内税务局以及从生产统计中得到的资料，都有助于对遗失的要素收入进行测估”。

**表7.2　对不同类型未登记收入的测估**

| | 占全部未登记收入的百分比 | | |
|---|---|---|---|
| | 1971 | 1974 | 1977 |
| 自我活动收入 | | | |
| 渔　　猎 | 0.2 | 0.4 | 0.3 |
| 制　　造 | 2.9 | 3.5 | 4.7 |
| 建　　筑 | 27.0 | 18.1 | 20.4 |
| 转　　运 | 2.0 | 1.7 | 3.7 |
| 销　　售 | 8.8 | 6.5 | 12.1 |
| 金融(银行服务等) | 1.6 | 1.6 | 3.9 |
| 其他(服务) | 7.9 | 8.0 | 13.0 |
| 职业性(服务) | 4.5 | 3.6 | 5.8 |
| 未收集到部分 | 18.4 | 16.6 | 14.6 |
| 自我活动总收入 | 73.5 | 60.1 | 78.2 |
| 工资和薪金 | 20.9 | 12.8 | 20.9 |
| 公司福利 | 5.7 | 27.1 | 0.9 |
| | 占有登记收入的百分比 | | |
| 自我活动收入 | 7.9 | 12.1 | 23.5 |
| 工资和薪水 | 0.3 | 0.4 | 0.3 |
| 公司福利 | 0.4 | 4.1 | 0.2 |

(麦卡菲,Macafee, 1980, p·85)。实际上，中央统计局(连同国内税务局),每年都按不同的收入者类型对未登记收入进行了审慎的测估。图表7.2给出了近些年按部门分类，未登记收入的状况。

资料表明，超过3/4的未登记收入是在自我服务业中形成的，只有1/5是属于就业收入部分（或者是兼业收入，Moonlighting)。

在自我就业这一栏目里，建筑业(正如我们的预料)是逃税最厉害的部门，其未申报收入大约占未申报总收入量的1/4。这就意味该部门未申报收入已经超过了其申报收入的1/3。需注意，这一测估结果（不像其他测估结果）部分地是基于生产统计得出的，因而可能比通常的测估结果更精确。

总而言之，差异模型并不能得出有关地下经济可信的或连续的测估结果。假若系列的数据已经产生，这种测估结果也必然是低估的，因为模型作了一个不十分可信的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国民收入的支出法测估是精确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支出的测估值是偏低的，实际的未申报收入量远大于差异模型的测估结果。充其量，差异模型的测估结果只是隐形经济增长趋势的显示器。

## 国内税务局的测定

人们通常引述的有关英国隐形经济的测估结果为，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5%(下议院，1980，Q4673,QQ4658—

60,1981,1982),这一比重是较为可信的(1979)。作出这一测估结果的是英国国内税务局 (United Kingdom's Board Inland Revenne)前任主席威廉姆·波尔(Willarm Pile)。他的继任者劳伦斯·艾里(Lawrenece Airey)充分地接受了他的这一结论,并提出6~8%这样一个幅度。最近又指出,英国地下经济的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6~8%这个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测估结果反映了国内税务局对英国自我服务和受雇佣两类行业中未申报收入的程度和频率(次数)的判断.同时反映了对国内税务局在管理英国税收体系过程中的经验的判断。

英国税务局测估的基础是:为隐形经济的各个给定数量,计算出每个就业人口未申报收入的暗含水平。基于此,在 1979 年 3 月份,比值为 15% 的地下经济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就业者每年低报收入量为 720 英镑。这一测估结果,在威廉姆·波尔看来有些偏高(1979)。然而,假定在下述情况下,这一数字又是令人可信的,即假定每个自我就业者年平均低报收入1000英镑,并假定每四个或五个就业者中,有一人未申报其第二收入,其平均额为 1000 英镑。这二个假设就会使得低申报总额分别达到 20 亿英镑左右和 60 亿英镑左右。如果考虑到公司逃税,如低报利息支付等等这类情况,那么,总量就可能达到 90 亿英镑,占国民收入总额的 7.5% 是极有可能的。

如果将国内税务局的模型和假设应用到目前英国经济的资料分析中,它将表明,英国地下经济的总量将达 150 亿英镑,或者每个自我就业(服务)和 1/4 的雇员中平均每人每年低报收入在 1750 英镑左右。

如果将上述假设与中央统计局用差异法测估隐形经济的结果作一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两种测估结果的差别主

要归因于关于同时兼二个职业的假设上。中央统计局和国内税务局都假设，由自我服务者的低报收入所导致的地下经济每年占国民收入的2%。中央统计局假设从受雇佣者中形成的隐形收入（如未申报的小费）需加0.5%，并将兼职——即获得未申报的第二收入的工作——作为自我服务（自我就业）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样，国内税务局的测估表明，受雇佣者进行兼职的情况导致了一个占国民收入5%的地下经济，而中央统计局并未对这一大类中的隐形经济作具体的测估。尽管劳伦斯·艾里先生试图说明，主要是由于它们所测估的现象极不相同，中央统计局和国内税务局才存在着观点上如此之大的分歧（英国下议院，1981，Q2004）。关于兼职收入量的主要差异，事实上是解释国内税务局和中央统计局测估差异的主要理由。这大概是可以进行更精确测估的。

现有统计资料表明，劳动人口中不会超过10%的人兼有第二职业（艾登，1978）。这很难符合国内税务局所作的更高的假设，因为，这类就业者中至少还有一部分收入是申报了的。当然，困难主要在于，如何确定这些统计资料的精确性：如果那些没有申报第二职业所获得收入的人对关于他们是否从事第二职业的调查持消极态度，拒绝与调查者合作，那么，正规的资料就没有多大使用价值。这种观点在我们考察关于收入—支出差异的微观统计资料时将得到进一步讨论。

## 逃税的依法测估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小组认为，"由美国国内税务局

承担的依法纳税测估项目”(Taxpayers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提供的“是目前可资利用的有关地下经济的基础性统计资料”(SSRC, 1981, 第2.1段)。目前，按英国的法律规定，国内税务局没理由认为纳税人的申报不能令他们满意，调查人员也仅仅能就有关收入的申报问题进行调查。在英联邦，使用纳税者依法纳税测估项目资料的进一步的障碍是，英国亦没有与“美国精确性比较档案”(American Exact Match File)相对应的资料库，以此去进行地下经济活动规模的测估。

“依法纳税测估项目”关于未申报收入的测估，与表7.2中描绘的英国地下经济的测估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对照。表7.3给出了TCMP的测估值，并计算出所隐含的低申报收入额，并假设这种测估对英国的情况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依法纳税测估项目研究测估到1976年，在美国，自我服务者中36—40%的收入没有申报，英国中央统计局1977年对英国这一类收入的测估结果为23.5%。依法纳税测估项目对属于雇员收入的测估结果为，未报收入在2—3%之间，这一结果明显高于中央统计局大约0.8%的测估值，而又大大低于国内税务局大约8%的测估值。

依法纳税项目揭示了美国个人收入的总体申报率在92%—94%之间。在英国，根据已申报经济的部门差异得出的总的申报率与依法纳税测估项目测估结果相比要低得多，在88.6—91.2%之间。这样，在1979年，未申报的个人收入在130亿到170亿英镑之间，占国民收入的7.5—10%之间。

显然，将美国的统计资料应用到对英国的地下经济规模

表 7.3 依法纳税测估项目(TCMP)在英国关于个人未申报收入测估过程中的应用(1979 年)(10 亿英镑)

| 收入类型 | 已申报收入，1979 | TCMP对已申报率的测估(%) | TCMP对已申报收入幅度的测估 | TCMP对未申报收入幅度的测估 |
|---|---|---|---|---|
| 自我劳动 | 15.3 | 60—64 | 23.9—25.5 | 8.6—10.2 |
| 工资与薪水 | 96.6 | 97—98 | 98.6—99.6 | 2.0—3.0 |
| 租金、股息及利息 | 10.4 | 84—92 | 11.3—12.4 | 0.9—2.0 |
| 佣　金 | 8.1 | 84—88 | 9.2—9.6 | 1.1—1.5 |
| 资本所得 | 0.6 | 78—83 | 0.7—9.8 | 0.1—0.2 |
| 总　量 | 131.0 | 88.6—91.2 | 143.7—147.9 | 12.7—16.9 |

资料来源：《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统计》，1980 年版(MSO，1980)，TCMP 关于申报率的测估，其资料主要源于由个人所得税项目测估到的未申报收入统计。

的测估上来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未申报率是很不可信的，这种数据所强调的重点是获得有关各种类型收入的低申报水平及次数的更为准确的测估值。

尽管依法纳税测估项目在英国的充分应用是不可能的，但英国国内税务局已经开始正式尝试，试图对自我服务业收入按依法纳税程度进行测估(下议院，1982)。一个随机样本为 5500，称之为程序 D 的调查（自我就业者收入），已经在 1981 年抽取完毕，它代表了此类情况 300 件中的一件。每一个区域的税务调查人员必须对该区与此类活动有关的所有档案进行稽查，并提出：

a．申报调查将显示出应税收入存在着低估情况的可能性。

b．开始这项调查的正当范围。

表7.4给出了这一调查的结果，当然此外必须要强调这一结果仅仅是根据税务调查人员的判断得出的。它表明这一调查的成功率范围在1/5之内，可能性收益在2/5之内。在3/10的这类样本中，可以为进行正式调查提供充分的条件，另外，4/10的样本可提供某些条件。总之，6/10的此类样本可以提供可能性或者或然性结果，这样，总起来看，大约7/10的样本能够为调查提供一些或大量的条件。目前，每年大约只有3%的自我服务收入的申报得到了调查。

**表7.4 英国国内税务局关于自我服务收入的依法测度研究的初步结果($N=5500$)**

| 关于调查的表期结果 | 调查合理程度的估计 |
|---|---|
| 概然值，22% | 充分，31% |
| 可能值，42% | 不充分，39% |
| 无结果，37% | 不合理，29% |

资料来源：众议院，1982。

现在，我打算就这些测估数值的有效性和精确性进行验证，这要通过研究所挑选的样本，这些样本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可能值或者是或然值，并且可被看作为调查提供某些或许是充分的正当条件。这种精确性试验结果将为自我就业者的真实逃税水平提供最“过得硬”的数据。

须记住，国内税务局关于地下经济的规模已占国民收入的7.5%这一猜测结果意味着，在1981年每个自我就业者均少报收入达1750英镑。如果这一新的测估——自我就业者中2/5的人对其所得没有低报收入是正确的话，那么其余60%的人其人均未申报收入就要达到3000英镑，才能使自

我就业者的未报总收入符合国内税务局的测估值。如果这一数值是可信的话，我个人的判断是，3000 英镑是最大可能的人均未申报收入的顶点。

## 关于收入一支出差异的家庭调查证据

当人们对采用国民帐户的差异法对地下经济进行测估表示出大量的怀疑之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小组认为，在个人家庭层次上的收入——支出平衡，是一种测算地下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对此进行量化分析的有效途径(SSRC 1981，p1.2)。推而广之，特定家庭的申报收入与支出及其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至少可以表明产生未申报收入的隐形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这种差异在自我就业的情况下经常会被注意到。例如，收入与财富分配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就比较了 1975 年英国受雇佣者和自我就业者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状况。他们发现自我就业者的生活水平高于受雇佣者的生活水平。并且如果这种比较是按收入和年龄进行编组的话，上述二者之间的差距还会加大。或许这可用来解释，自我就业者缘何拥是更多的财富来购买耐用消费品。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推论。

这种生活水平的差异引导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对同一相似收入水平的自我就业者和受雇佣者的家庭支出情况进行比较

(1981)。我将对分析结果作一简要总结。

用于比较的基础资料是1971—1977年之间每年的家庭支出调查(Family Expenditune Survey--FES)。家庭支出调查是一个连续性的、具有多重目标的收入支出调查。这一调查使用了7000个家庭的年有效样本量(约占参加调查的70%)。家庭支出的详细情况是通过采用一个为时连续两周的支出日记的记录方法进行收集的，收入的统计资料则主要反映了周、月和年的综合性支出。

新闻媒介的详论已经表明，自我就业者较之其他家庭似乎将收入中更大的部分用于支出。最初的资料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在对资料进行研究的七年中的每一年中，自我就业者家庭的支出—收入比率(在总体或特定的收入水平上)远高于各种职业组的雇佣者家庭。尤其上述研究表明差异最大的是发生在那些所申报收入相对较低的自我就业者家庭中。

然而，对资料的进一步考察表明，雇员收入的测估基本上是当前的实际收入，自我就业者收入的测算使用的是现存的近十二个月的收入统计资料，随之发生的各种统计资料上的时滞就足以构成解释大部分收入差异统计的因素了：一旦统计资料基于这种误差进行更为接近的调整"修正"之后，自我就业者就不再与他们的支出—收入比率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了。

这种分析遗留下了四个未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否自我就业者(和其他各类家庭)只是从其已申报支出中完全排除了由其未申报收入所形成的支出？是否在家庭支出调查中一个为期两周的资料就能够由此导出一个家庭中长期的并带有规律性的支出(或收入)方式？地下经济的参与程度是否是家庭支

出调查中未回答率30%和自我就业未回答率40%的构成因素？最后，不管自我就业者家庭已申报支出—收入比率与其他家庭的这一比率有何不同，总体来看，家庭收入与支出的这种差异能够表示未申报收入吗？只有最后这个问题经得起任何经验性的分析。

蒂尔努特（Dilnot）和芒里斯(Morris，1981，p.58)对1977年的家庭支出调查档案进行了筛选，以便确定究竟是哪些家庭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具有差异（他在事先就对前面提到的自我就业者收入的时滞进行了调整）。

他们力图在分析中“抓住”收支差异可能不是地下经济活动引起的家庭。例如，他们在低限测估内排除了领取抚恤金者或者是临时失业者，他们争辩说这些人超出收入开支是靠压低不动产消费或临时借债维持的。这些家庭包括在隐形经济规模的测估上限中。

在考虑到这些与其他问题之后，他们假设任何一个支出超过收入20%以上的家庭（最低限度为每周3英镑）就有未申报收入。低限估计表明这类家庭中的9.6%平均每周超支31英镑，总数达32亿英镑，占1977年国民生产总值约2.3%；上限估值则表明14.8%的家庭平均每周差额达30英镑，这将意味着未申报收入达42亿英镑，占1977年国民收入的3.0%。

蒂尔努特和芒里斯(1981，p58)明确提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人们对那些对地下经济过高的测估提出质疑。他们分析的三个特征消除了对较低测估的怀疑：使用方法的特性，选择20%的差异额作为分界点，他们所接受的家庭支出调查项目未回答者参与地下经济活动的程度不会大于调查回答者的假

设。

蒂尔努特与芒里斯(1981，P·65)讨论了一系列关于支出与收入差异的非地下经济活动的原因，他们指出："凡是任何这类原因都可能导致人们实质性地介入地下经济活动时，我们都建立了系统性的阀门，把这类家庭过滤出来。但在过滤性可能太强时，我们将其包括在低限测估之内，而未包括在上限测估中。"不过，他们没有列出所有阀门的精确的范围，也没揭示出使用阀门的经验数据影响。他们所提到的特别的"阀门"也尤其成问题：把因不寻常重点购买造成的开支较高的家庭排除在外。将这类家庭的收入差异剔除掉，同样可以认为，这样一种大宗购买(如耐用消费品或节日采购)，极有可能是由未申报收入进行的，其性质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明确地认定20%以上的收入差异是地下经济活动的迹象是一种"武断"的观点："在较高水平上，我们似乎可以将根据所有其他信息看起来是潜在黑市经济参与者的家庭剔除掉，而将明显不是的10—15%家庭包括进来。"(蒂尔努特和芒里斯，1981，p·66)。尽管明显地，区分点较低对地下经济活动的测估水平的影响要小于对假定参与数目的影响，但还是未能获得分界点确定得较高的结果的敏感度情况，也未获得有关使一些家庭"明显"不是"黑市经济候选者"的因素的情况。

第三种弱点从定量上讲可能是最严重的。蒂尔努特和芒里斯假定30%的家庭没有对调查作出反应，其参与地下经济活动的平均程度与频率同另外70%对调查作出反应的家庭是一样的。尽管，例如，个体经营者的回答率要低于那些雇员。在这一假设下，基于他们的测估结果，国内税务局头头

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下议院，1981，Q2205)："我个人认为，不要看重这一测估结果，因为这种结果是从家庭支出调查中推导出来的，对调查作出回答的仅70%左右，而另外30%未作回答的与作出回答的基本相同，在这里，黑市经济具有隐藏之处。"

表7.5列出了蒂尔努特和芒里斯基于对未作回答者的隐

**表7.5　家庭支出调查项目中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由无反应者形成的地下经济的规模(%)1977**

| 有未申报收入的无反应者所占的百分比(%) | 家庭支出调查(FES)关于无反应者的平均未申报的数量 | | | |
|---|---|---|---|---|
| A. 蒂尔努特和芒里斯低估值的范围 | £31 | £41 | £51 | £62 |
| 9.6 | 2.3[a] | 2.5 | 2.7 | 3.0 |
| 14.4 | 2.6 | 2.9 | 3.1 | 3.4 |
| 19.2 | 3.0 | 3.3 | 3.6 | 3.8 |
| 25.0 | 3.4 | 3.7 | 4.1 | 4.4 |
| 50.0 | 5.2 | 5.7 | 6.2 | 6.7 |
| B. 蒂尔努特和芒里斯的高估值范围 | £30 | £40 | £50 | £60 |
| 14.8 | 3.0[a] | 3.3 | 3.6 | 3.9 |
| 22.2 | 3.5 | 3.9 | 4.4 | 4.8 |
| 33.3 | 4.1 | 4.8 | 5.5 | 6.2 |
| 50.0 | 5.1 | 6.2 | 7.2 | 8.2 |

a. 蒂尔努特和芒里斯(1981)的测估值。

注意：蒂尔努特和芒里斯假设，在家庭支出项目调查中无反应者中有30%具有相同的可能性参与地下经济(二人的低估值为9.6%)，以及与另外70%有反应者一样，其低报平均数为每月低报31英镑。表中的数字则显示，无反应者与有反应者在上述方面有诸多不同。

资料来源：蒂尔努特和芒里斯，1981。

蔽经济活动所作的不同假设得出的结果。例如，如果假设未回答者具有未报收入的可能增加一倍，那其最低估计由2.2%上升到 3.0%，如果假定再翻一倍，这一比例就上升到3.8%。如果再假定未回答者中的一半人的未报收入是回答者的两倍，最低和最高的测估值就会分别为 6.7% 和 8.2%。

因此，非常清楚，即使不考虑所作调查对回答者的保留，对未回答者的假设也会实质性影响结果。即使是对未回答者的假设更为谨慎，也会把蒂尔努特和芒里斯的最低估计值提高到 4% 左右。

## 货币总量与地下经济

为对美国地下经济作出测估，使用了三种建立在货币总量分析基础上的三类研究方法。它们是：大小面额现金相对需求法、活期存款比例法以及法伊格的交易周转法。在英国，关于对这类方法的怀疑主义态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小组是这样表达的："认定对货币职能的稳定需求这一问题已经广为人知，并已成为相当多的理论研究的内容。看起来，在这类关系之中的余额误差并不一定导源于地下经济"(SSRC，1981，p2.1)。下面，对三种方法在英国的应用结果作一简要回顾。

### 大面额钞票分析法

构成"大面额钞票"法基础的假说是，地下经济活动交易

要求现金支付，由于正常经济交易的大额支付都是用支票或信用卡办理的，因而大面额钞票需求就特别反映了地下活动。人们怀疑这一假设的来源是有关个体商人的背包里都有大量大面额钞票的轶事。

在以前的一篇论文中我已经指出，通货膨胀对大面额钞票持有量有“替代效应”及“名义收入”效应。也就是说，人们不是简单地通过增加小面额的钞票数量，而是通过持有大面额的少量低钞票数(货币价值不变)，来对通货膨胀作出反应。对这一假设进行考察是基于英国1972—1978年的统计资料进行的。分析表明，大面额纸币数量的增长远低于替代效应假设，其结论是，大面额钞票的假设对于测度地下经济并非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奥金斯，1980，p·17—21)。随后的研究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法伊格，1981，p·207)。

**现金—存款比率法**

可以这样认为，当前发达国家中测度地下经济的大多兴趣是由古特曼在1977年所作的有争论性的、地下交易额占测度国民收入10%的估计所引起的。古特曼假设，随着支票和信用卡使用数量的增加，现金需求会相对下降。不过，他争论说，现金与狭义货币供给$M_1$的比例在美国从1961年以来一直增大。假定1939—1941年的比例水平是正常的，认为“正常比例与近来比例的差异可以看作测度非法持有的现金量的方法”(p27)，他测估了支持地下经济的现金持有量，并且，根据由一美元所形成的经济活动量在非法与合法经济部门是相同的假设，他得出结论说，地下经济活动至少占登记国民收入的10.4%。

表 7.6 流通货币与货币供给，1963—1981

| 年 | 现金，[a] £m | 现金占 $M_1$[b] 的比率 | 现金占 $M^*$[c] 的比率 |
|---|---|---|---|
| 1963 | 2,254 | 32.5 | 21.5 |
| 1964 | 2,353 | 32.1 | 21.0 |
| 1965 | 2,512 | 32.2 | 21.0 |
| 1966 | 2,685 | 34.5 | 21.1 |
| 1967 | 2,780 | 34.4 | 20.6 |
| 1968 | 2,856 | 33.8 | 19.3 |
| 1969 | 2,922 | 34.7 | 19.3 |
| 1970 | 3,149 | 35.0 | 19.5 |
| 1971 | 3,435 | 33.7 | 19.0 |
| 1972 | 3,900 | 32.8 | 17.4 |
| 1973 | 4,299 | 33.3 | 15.3 |
| 1974 | 4,800 | 35.5 | 14.7 |
| 1975 | 5,511 | 35.5/33.9 | 15.6 |
| 1976 | 6,323 | 33.8 | 16.5 |
| 1977 | 7,217 | 33.7 | 17.4 |
| 1978 | 8,422 | 32.8 | 17.6 |
| 1979 | 9,416 | 32.9 | 17.4 |
| 1980 | 9,935 | 33.1 | 15.9 |
| 1981 | 10,473 | 31.7 | 14.4 |

a，包括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年平均数主要是基于每年 5 月份、6 月份和 11、12 月份简单平均值而得出。

b．$M_1$ 是指现金加英联邦私人部门的活期存款。

c．$M^*$ 指 $M_1$ 加英联邦私人部门的定期存款。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季度简报，1970 年 9 月份到 1982 年 3 月份。

我在1980年回顾了美国对奎特曼方法的争论，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分析英国数据(奥赫金斯，1980，p·11—16)，表7.6中更新了前一分析中的数据，并提供了相对于$M_1$和$M^*$的现金持有量的数字。$M^*$为$M_1$加上英国私人部门英镑定期存款的更广泛的货币供给概念。古特曼因在分析中没有使用后面这个比率而受到批评。①

根据古特曼的假设，现金对$M_1$的比率并没有对英国的经济增长假说提供证明。表7.6中的数据在1946—1970年工党执政期间有一种轻微向上倾斜的趋势，在随后的保守党执政期间，出现了一条轻弱的S形曲线，在1977年又略有下降。

更宽松的现金与$M^*$的比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相当稳定地下降；到1974年底，这一比率仅是1963年的2/3，与相对通货需求递减的假设相一致，比率从1974年上升到1978年的顶峰后又开始下降。

力图重复古特曼的研究，并根据这些数据和不确定人们什么要持有现金的假设，得出有关地下经济的趋势与规模的结论甚至会不值得描述。如前所述，这些没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地下经济的情况。

最近，马休斯(Matthews)进行了辛勤努力，试图将现金需求与地下经济联系起来。马休斯假设，个人偏爱的现金—存款比率是由"某些本身对经济变量反映灵敏的定性用途和职能"决定的。此外，还更难以置信地假设，有关现金和存款持有量决策不受其他资产决策的影响。

选择现金还是存款取决于影响每一持有形式的质的要素。存款质量因通货膨胀率和支付利率而提高，并假定会随

时间因其作为支付方式的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假设现金—存款比率与所有这些变量呈负相关关系。

但是，现金具有“匿名性”，这是地下经济交易的宝贵品质。在平均家庭所得税和平均销售税加重的情况下，这种品质还会更为宝贵。不过，也需要假定，一些人，远非那些具有登记收入和兼职收入者，在失业时可能选择专门从事地下经济。这样，现金—存款比率就预计会和失业、家庭平均所得税及销售税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普通最小平方回归方法，基于六个变量和已登记的国民收入由 GDP(E) 测度，分析从 1973 年第三季度到 1979 年第二季度间的每一季度的现金—存款比率。

对这些结果的阐述将有差异。马休斯争辩道：“假使我们的地下经济变量还很粗糙，三个变量中有两个符号正确而且显著也是令人鼓舞的。”(p·13)结果表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没有实际意义，时间趋势变量一致性显著，但在假定其为负时它却为正。销售税变量一般不显著(显著时符号反常)。不过，失业和所得税变量的符号正确而且显著。

由于因变量是两个变量之比，每一变量都有假定性质，模型的局部误差使人们怀疑根据模型对“成功”结果的解释是否正确。例如，利率的失灵对于现金—存款比率产生的影响，可能意味着现金—存款比率和持有决策不受更广的资产持有决策的影响的假设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存款持有量的变化(当然也包括现金—存款比率的变化)，可能对现金的地下经济品质毫无关系。

马休斯在模型方程中通过失业率和所得税两个变量的参

数计算了地下经济的规模。计算的平均最低测估值为在录国民收入的 3%，最高估值为 10.9%。因此，模型表明，失业引起的地下经济活动多于税收所引起的。

马休斯关于地下经济与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最高和最低测估，假定 1973 年为 0，由表 7.7 所示。

如前面所示，我论证其可靠性会因与对其据以推导的模型的结果所作解释有关的问题而降低。

**表 7.7　马休斯关于地下经济的测估值**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高估值 | 低估值 |
|---|---|---|
| | % | % |
| 1974 | 0.5 | 0.8 |
| 1975 | 2.7 | 6.5 |
| 1976 | 3.4 | 10.8 |
| 1977 | 3.1 | 11.5 |
| 1978 | 2.3 | 10.6 |
| 1979 | 3.3 | 11.0 |

资料来源：马休斯(1981)。

**对地下经济的交易分析**

这是由法伊格为分析美国(1979，1981)而首创的。自从应用于许多国家以来，非常著名。无需作任何说明。如同古特曼的方法一样，人们的反应依赖于对货币总量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关于英国地下经济，法伊格的研究结果是，从 1960 年占国民收入的 0%（基点数）上升到 1979 年的 15% 左右。在这

20年的时间内，可以确认出七个主要阶段，三个阶段迅速增长，两个阶段迅速下跌，另外两个阶段相对稳定。这些不同时期的情况如表7.8所示。

表7.8 法伊格关于英国地下经济部门的测估

| | | | |
|---|---|---|---|
| 1960—1961， | 增长， | 从0%到 | 6% |
| 1963—1966， | 增长， | 从6%到 | 12% |
| 1969—1971， | 下降， | 从12%到 | 8% |
| 1971—1974， | 增长， | 从8%到 | 22% |
| 1974—1975， | 下降， | 从22%到 | 15% |

资料来源：法伊格(1981)。

在70年代下半期，当英国经济（和社会）陷入一种特殊困境时，根据法伊格的结果，地下经济部门相对处于静止状态。

法伊格的测估结果有两方面，我将作进一步讨论，以得出本章的结论：首先，这些结果与其他已经考察过的结果的关系，其次，根据这些阶段有关英国经济的其他统计资料对法伊格结果作出解释。

结果不相同。蒂尔努特和芒里斯以及中央统计局的最低测估值为3%。我对蒂尔努特和芒里斯结果所作的整理研究表明，他们的分析使结果决不会低于4%，国内税务局认为为6～7%；马休斯对1979年的测估结果高估值为11%，而法伊格认为有15%。

只有三种测估结果，即蒂尔努特和芒里斯、中央统计局以及法伊格的测估结果，提供了研究地下经济趋势的数据。中央统计局的结果有两种解释：麦卡菲的解释和表7.1中以

更新的资料所作的总结。麦卡菲对余值差异所作的测估结果显示了与法伊格揭示的不同的趋势，只不过是规模次序有所不同。他们两人的测估结果都显示了在60年代晚期为一个较低顶点，70年代初期相对快速增长，1974年达到更高点和70年代晚期相对稳定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测估把国民收入差异测度高峰从1974年移到1976年，从1973年到1976年为迅速增长阶段，随后下跌了。马休斯的测估结果为，1974—1976年为快速增长阶段，1976年之后比较稳定了。

这样，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每一种测估结果都显示了在70年代早期地下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尽管在增长阶段是1971—1974年，还是1973—1976年的划分上存在分歧；第二，每一种测估结果都显示，在70年代晚期，地下经济没有相对增长（尽管在此阶段，公众对于高税率的批评达到白热化程度）。

测估结果在有关70年代早期地下经济增长时间划分上的差异，可能是由某些估测未能考虑到的滞后结果的影响所致。但是，差异使我们有信心地分析地下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变得十分困难。法伊格的结论和模型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

法伊格强调指出："即使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经济中，由于经济要素从可观察到的经济部门向地下经济部门的不断转移，也会导出实际收入下降，失业增加，生产率降低和价格上涨的感觉。"（p·206）当讨论他的结论时，他指出："结论表明70年代记录的经济大衰退和急剧通货膨胀，可能部分是由于地下经济的增长造成的统计资料的失真所致。"（p221）。

但是，法伊格测估所确认的地下经济增长阶段，实际上

恰恰是官方统计表明经济运转相对较好的阶段。

5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三个阶段分别为1959—1961年，1963—1965年，1970—1973年。从1975年起，失业率测度为2%，只有1960—1961年和1964—1966年稍低。在70年代，1973年和1974年失业率最低。在法伊格的测估结果中，这些阶段中的每一时期都是法伊格结果认为地下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1975—1979年这一时期还有一点值得探讨。在此时期，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管制。一种"社会契约"限制了收入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十分严格。如果地下经济确实不受管制影响，那就应期待在此期间地下经济应该增长。然而，测估结果却都没有显示出这种情况。

显然，这些评论并不能最终"证明"任何东西。滞后效应可能扭曲"实际"的地下经济和我们对其测估之间的关系。我们仍然处在研究地下经济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时候，可能建立起表明标准理论（地下经济的规模与高税率、"合法"部门的低增长、高失业率、通货膨胀有正相关关系）是正确的测度。

但是，如同这里所讨论的数据资料与地下经济在合法经济紧缩时增长的假设更为一致的事实，表明集中探讨可能是地下经济诱因的供给条件的标准理论时要格外审慎。从需求方面来看，合法经济和地下经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不令人意外。当合法经济运行良好时，人们就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并用此来请他人从事标准的地下活动，如改善和扩大家庭。这些人也可能从事像自我服务之类的家务活动时间更少，因此更倾向于雇佣别人来代替他们进行这些劳动。如果关于地

下经济水平变化的原因得到恰当的理解，类似这类的需求方解释就需进一步注意。

## 结　论

过去两年的研究对于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的“均衡”理论的所有争论并没有提出多少具有辩驳意义的东西。对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从2.5％到15％不等，我仍同意5％的猜测。关于地下经济增长趋势的问题，有两点共同看法。在70年代早期增长，在后期呈稳定状态。但是，这些趋势与一系列有关地下经济增长原因的最普遍的假设存在矛盾。因此，对于常规经济中“沙滩上的脚印”的根源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始终证明是有根据的。

注释：

① 戈尔曼，引文见罗斯（1978）。

# 8

# 对联邦德国地下经济的初步估价

近年来，人们对于联邦德国地下经济的兴趣已大为提高。地下经济活动已成为各种新闻媒介的热门话题，并被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所关注。德国联邦银行在其1977年年度报告（23页）中指出："无疑在某些领域已越来越多地使用现金支付，特别是在商业活动的'灰色领域'，在这一领域，是以现金结算的，不必纳税，也不必为社会福利机构捐助。"同样，德国经济咨询委员会（Sachverstanndigenrat）（1980，第296段；1981，第373段）指出，地下经济的增长是对课税负担加重和各种繁杂规定的抵制的表现。

为了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德国经济中被忽视的这一部分，本章试图估价德国的这一未观察到成分的规模及其增长情况。在阐明这一研究中的现象之后，我们将回顾德国地下经济存在的证据，并提出一些新的实证材料，这些实证材料是基于已经运用于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不同方法而得到的。

## 定 义

首先，必须澄清由于各种不同定义而带来的字义上的混淆。像"地下的"(underground)这样一类字眼也许会使人误解，因为它们给人以非法活动和不道德活动的印象。大多数作者（法伊格，1980；弗雷，1981；坦斯 1980）给这一观察不到的部分定义为可观察到部分的补充。因此，它包括一切没有被当前官方测定系统测定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一相当笼统的定义当然给各种不同的概念留有了余地。因此，似乎有必要对一些常规惯例达成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在未观察到经济的测定方面。这些惯例涉及到营业额或增值概念的使用，涉及到超出传统的国家帐目模式的各种经济活动的取舍，也涉及到对未观察到活动的税收统计不同方面的分类。

虽然估价增值比估价全部交易量有时要困难些，但是从实际使用的资源或是所得收入方面来定义未观察到的活动是很有用处的。这一概念等同于国家帐目惯例以及各项经济政策指标的制定方法。而对于有关逃避销售税的各种问题还须要有一个总体的概念来说明。

传统的国家帐目模式除不包括业主占用的、不收租金的膳食设备外，还要排除一切私人的不是为了赚钱的各种实物和服务交易。这种省略是由于估价问题。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作为国家帐目基础的生产概念限制性太大①。将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的概念限定在与国家帐目模式相一致的概念中

就忽视了未观察到活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且不断扩大的部分，即家庭经济。尽管存在着一切有关价值估价的问题，这一部分应该是未观察到成分中值得分析的一部分，否则，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替代可能性就会被忽略。

用于测定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的大多数评估方法都依赖于这项活动本身某一特征。货币方法主要是通过从总体货币交易中剔除可观察到的货币交易来评估未观察到的货币活动。其他研究方法仅仅是对未申报收入进行的评估或对非正式就业的计算。所以，测估数额有相当大的出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各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未观察到经济中的侧重面不同。

## 对于德国未观察到活动的现有证据回顾

德国未观察到的现有实证材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散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证材料，表明未观察到的成分已在德国形成多少种不同的形式。

2．手艺人协会的预算：1978 年手工业部门中非法劳动营业额达到大约 300 亿马克，约占手工业部门营业总额的 16%。汉莫尔（Hamer）（1978）怀疑这一部门的私下劳动很可能在 20% 左右。

3．据观察，对非法劳动罚款额已有显著增加，从 1976 年的 140 万马克增长到 1980 年的 370 万马克。

4．据推测，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70 年代后期现金持有量的巨大增长从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未观察到经济的存

在。

5. 劳动部以及建筑行业估计，建筑部门非法的临时就业大约有 20 万人。

6. 向税务当局申报的收入与国家帐目中的收入之间存在差异。

手艺人协会的领算是粗略的，但是，对这一数字的解释导致了许多问题，因为未观察到部门每单位产品的价格仅仅是手工业部门官方价格的 30%。因此，有必要证实一下，非法劳动营业额的预算是在官方价格上还是在实际价格上进行估价的。

汉莫尔（1979，114 页）认为，按照实际价格进行测估似乎恰当些。这意味着，既然非劳动要素投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手工业部门增加的未观察到的价值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3%。将这一数字同对非法劳动罚款数额进行比较，似乎私下劳动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受到了罚款。罚款额的增加也许是更多的检举揭发以及非法劳动数额增长的结果。

有关 70 年代后期现金持有量增加的实证材料可以主要由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降低来加以说明（见兰菲特与来蒙特，Langfeldt and Lehment，1980）。德国纸币的平均单位价值大致与价格指数成比例增长。与美国相比，德国的大面额货币占货币总额中的比重相对高些。荷兰、瑞士的大面额货币比例更高②。

建筑部门非法就业的估测人数约占该部门中总的合法就业者的 20%。但是，作为未观察到活动的指标来看，这些数字就相当含糊了，因为这些非法工人是否整个年度都处在就业状态，这一点并不清楚。非法就业所创造的增值部分是由

国家统计中支出部分记载的。只是他们的收入没有向税务和社会福利机关申报。因此，可获得的实证材料并没有对德国未观察到成分的规模以及发展做出全面的估算。在我们对未观察到成分提出初步估测之前，先提出上报给税务当局的收入与国家统计的收入之间已计算出的差异结果，因为这也许能为了解德国的逃税状况提供信息。

## 差　异　法

这种方法考察上报到国家税务机构的收入（经过对负税收入和国家统计数据之间进行概念上的调整之后）和从国家统计数据单独测估的收入之间的差异。皮特尔斯（Peterse，1981）已对西德1961、1965、1968、1971以及1974年的统计

**表8.1　上报税务局的收入（其概念上的差异已经过调整）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差异**

（单位：十亿德国马克）

| | 1961 | 1965 | 1968 | 1971 | 1974 |
|---|---|---|---|---|---|
| 经调整的雇员上报财政当局的收入 | 148.8<br>(91.9) | 216.7<br>(92.1) | 249.6<br>(91.8) | 393.4<br>(96.4) | 549.1<br>(97.9) |
| 经调整的上报财政当局的其他收入 | 68.4<br>(70.3) | 89.8<br>(72.8) | 117.2<br>(79.2) | 159.1<br>(87.0) | 186.6<br>(88.1) |
| 经调整的上报财政当局的总收入 | 217.2<br>(83.3) | 306.5<br>(85.5) | 366.8<br>(87.4) | 552.5<br>(93.5) | 735.7<br>(95.2) |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皮特森(Peterson，1981，P.30)。

数据进行了概念上的调和并由表格 8.1 表示。其结果表明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这种差异的大小，对国民收入而测估过程必须审慎。少报收入比例的下降趋势或许是由于在收集税务统计资料和国民收入统计资料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化的结果。据定义，差异分析法仅仅能测定出那部分包括在国民统计中而没有上报税务当局的收入。这种差异分析法并没有提供测定未观察到成分规模的方法。它仅能对财政管理的效率给予提示。

## 对德国未观察到货币因素的更为全面的测估

为了对德国未观察到的货币成分的规模和增长进行更为全面的估测，国际文献中讨论的三种方法都曾被运用于德国的情况：

1. 简单的活期存款比率(奎特曼，1977)；

2. 根据货币的需求函数，对税收诱致性现金持有量的测估(坦斯，1980)；

3. 交易法(法伊格，1979)。

以上这些方法基于金融信息仅仅对未观察到的货币成分进行预测，而没有考虑物物交换活动。肯德里克(Kendrick，1979)和伊斯纳(Eisner，1978)对美国调查的结果表明，未观察到的非货币因素很大，而且相对于合法经济有急剧的增长。由于德国的非货币形式的未观察到部分的可比测估无法得到，因而我们专门研究货币形式上的未观察到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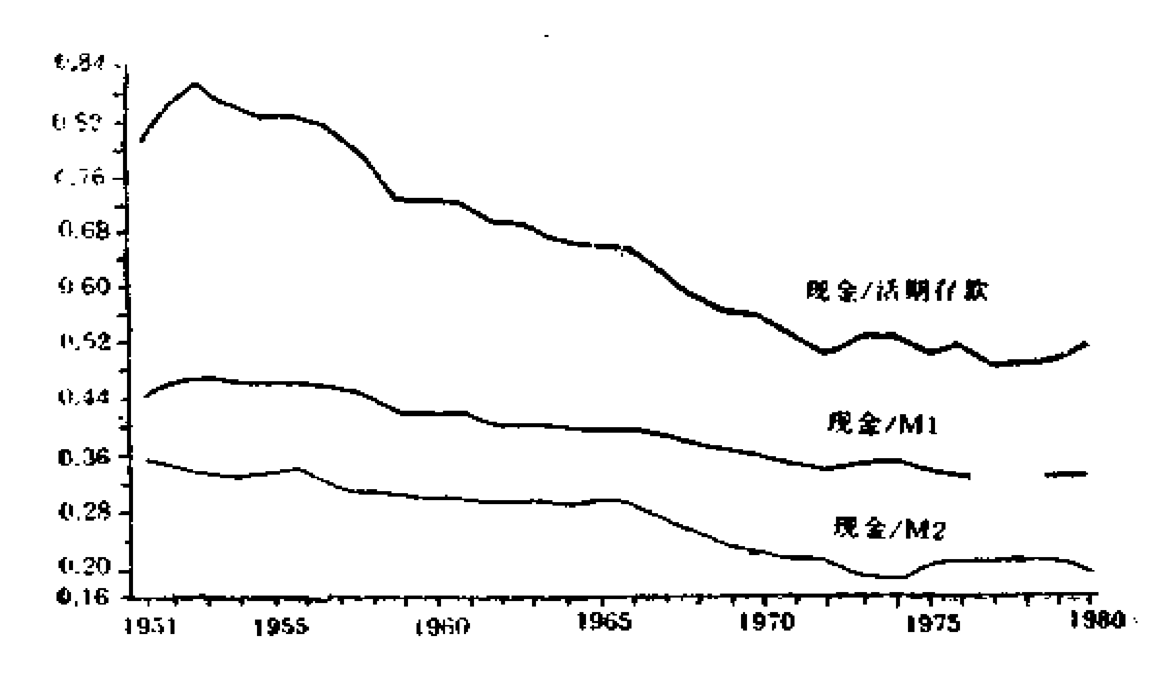
除了以货币统计为基础的方法外，我们还探讨了以劳动市场的数据为根据的测估方法。这些数据试图测定可供货币形式的及非货币形式的未观察到的活动利用的潜在劳动力。

## 现金—比率方法

将现金—活期存款比率法运用于美国经济，表明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且，这种方法还表明，货币形式的未观察到的成分迅速增长是现金同活期存款比率提高的结果(奎特曼，1977)。

图表8.1表明，德国活期存款与现金持有量的比率从1951年至1980年实际上急剧下降。货币与*M*1及*M*2的比率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这种趋势中的变化仅仅能在最后几年中观察得到。然而，更为明显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与合法经济相比较，不正常成分已经增长。因此，似乎有必要对奎特曼的设想作进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对那些对德国情况有效的设想更应如此。

假定货币是未观察到的成分中唯一的交换媒介过于刻板。因为被发现的风险相当小，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不正当的买卖也有用支票来支付的。对挪威的调查以及国内税务局的估测表明，未观察到的买卖中有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是由支票而不是由现金支付的。奎特曼所假定的未观察到的经济成分和观察到的经济成分中货币收入增长速率是均等的，




**图表8.1 与活期存款相关的现金的趋势。$M_1$ 和 $M_2$(1950—80)**

资料来源：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的月报，各类期刊，由作者本人计算。

这一点也一直受到怀疑。而卡甘(Cagan,1958,13页)认为，未申报的收入导致对现金储藏的不正常的需求。法伊格(1979,7页)猜想，不正常成分——由于服务的重要性——比合法成分更浑然一体，所以，很有可能有比较高的收入增长率。

然而，奎特曼方法中最为严重的缺点是，他假设现金—活期存款比率仅仅受未观察到的活动的影响。由于卡甘对1958年与货币总供给相关的现金需求做了重要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除了不正当的活动外，许多其他的可变因数也影响着货币比率。在德国，一个更为完善的金融系统的发展促成了现金比率的下降。由于这些缺点，现金—比率法还没有运用于计算德国未观察到的货币化经济成分。

## 由货币需求函数得出的税收诱发性现金持有量的测估

坦斯(1980)修改了卡甘原来的模型，导出了货币需求为几个外生变量包括税收水平的一个直接函数。因此，他避开了现金同活期存款的比率仅仅受税率变化的影响的批评。在详细说明了统计上的重要关系之后，坦斯模拟了由于税率提高而导致的现金持有量增长的过程，并以此作为逃税的典型形式。以正常的货币收入速率乘以这些额外的现金持有量，他得出两种不同的未观察到货币化经济的预测值。第一种是以纳税相当低的基期为根据，第二种是以零税率为根据。

哪一种变量是说明逃税的原因的独立变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坦斯使用现金与货币供给 $M2$ 的比率来防止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转移而影响其结果。③ 现金—活期存款比率分析法更有利于长期分析，因为它允许从一系列说明变量中剔除利息率。然而，由于现金和活期储蓄表示了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较而更为不同的替代弹性，所以，我们没有利用这一方法。由于活期存款和税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克朗夫兰德(Klovland, 1980, 23 页)直接从货币需求函数中估测出逃税税额。

根据德国的情况，我们试用了所有这三种因变量来测定税收诱发性现金持有量。坦斯(1980)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税收比率——个人所得税和转让的个人收入净额之间的比率，最

高的法定税率以及利息收入的加权平均税率。而我们仅仅使用了税收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④ 应该注意，虽然平均边际税率是更好的逃税指标，但这种时间序列在德国并不存在。分析过程中的其他外生性变量有收益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指数来测定的生活费指数同一般价格指数之间的比率。⑤ 假设：

$C$ = 公众持有的现金，不包括库存现金，

$D$ = 活期存款，

$M2$ = 货币供应 $M2$，现金 + 活期存款 + 定期存款，

$Y$ =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Y_{cap}$ = 人均实际国民收入，

$r$ = 1 个季度的货币市场比率，

$P1/P$ = 生活费指数同内含的国民生产总值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指数之间的比率，

$T$ = 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的总体税额，包括各类社会捐款，

$P$ = 内含的国民生产总值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指数，假设实际变量向长期预期变量的调整遵从常规的存货调整过程，下列公式要服从于实证检验：

$$\ln(X)_t = \beta \ln a_0 + a\beta \ln Y_t + a_2\beta r_t + a_3\beta (P_1/P)_t + a_4\beta T_t + (1-\beta)\ln(X)_{t-1} + u_1$$

上面公式中 $X$ 分别表示为：$C/D$［方程式(1)和(2)］，$C/M_2$［方程式(3)和(4)］，以及 $C/P$［方程式(5)和(6)］。收入变量分别由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来测定。另外，一切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表达，因此，假设常数弹性代替系数 $a_2$，$a_3$，$a_4$ 的常数半弹性。可以预料 $P_1/P$ 和 $T$ 变量

**表8.2 德国(1952-80)C/D、C/M2以及C/P的决定因素**

| 方程编号 | 因变量 | 常数 | 测估系数 $\ln y$ | $r$ | $\ln r$ | $T$ | $\ln T$ | $P_1/P$ | $\ln P_1/P$ | 外生性滞后变量 | $R_2$ | 见 | $e$ | Durbirn H-统计 |
|---|---|---|---|---|---|---|---|---|---|---|---|---|---|---|
| (1) | $\ln(C/D)$ | 5.64 | −0.488 | 0.011 | — | 0.0057 | — | — | — | 0.317 | 0.9904 | 0.021 | 0.67 | — |
| | | (3.20)[b] | (3.29)[b] | (5.27)[b] | — | (1.03) | — | — | — | (1.51) | — | — | (4.84)[b] | — |
| (2) | $\ln(C/D)$ | 4.45 | −0.485 | — | 0.081 | — | 0.296 | — | — | 0.378 | 0.9901 | 0.021 | 0.69 | — |
| | | (2.56)[b] | (3.44)[b] | — | (5.96) | — | (1.54) | — | — | (1.94)[a] | — | — | (5.04)[b] | — |
| (3) | $\ln(C/M2)$ | 2.92 | −0.096 | −0.0040 | — | −0.017 | — | −0.0008 | — | 0.498 | 0.9772 | 0.030 | 0.75 | — |
| | | (1.84) | (0.56) | (1.27) | — | (2.16)[a] | — | (0.08) | — | (3.04) | — | — | (6.15)[b] | — |
| (4) | $\ln(C/M2)$ | 0.960 | 0.0008 | — | −0.0020 | — | −0.771 | — | 0.870 | 0.465 | 0.9787 | 0.029 | 0.77 | — |
| | | (0.34) | (0.00) | — | (0.09) | — | (2.68)[b] | — | (1.53) | (3.16)[b] | — | — | (6.39)[b] | — |
| (5) | $\ln(C/P)$ | 0.29 | −0.014 | −0.0054 | — | 0.0099 | — | 0.0045 | — | 0.861 | 0.9960 | 0.017 | — | 1.22 |
| | | (2.28)[a] | (0.22) | (3.03)[b] | — | (3.62)[b] | — | (0.97) | — | (12.89)[b] | — | — | — | — |
| (6) | $\ln(C/P)$ | −2.80 | 0.102 | — | −0.033 | — | +0.340 | — | 0.408 | 0.790 | 0.9956 | 0.018 | — | 1.45 |
| | | (1.42) | (0.82) | — | (2.81)[b] | — | (3.11)[b] | — | (1.12) | (8.62)[b] | — | — | — | — |

a. 显著性为10%。

b. 显著性为5%。

注：结果来自一般最小平方回归方程，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T-values)。

将是正数，而就货币、活期存款以及 $M2$ 而言，其他系数的符号依弹性的相对大小而定。

最适合前面方程式的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可见表格8.2。由于分析的意图在于决定诱发性纳税货币持有量，故而我们集中考虑 $T$ 变量的符号和意义。假定 $C/M_2$ 方程式中 $T$- 为有效负数，也许会有这种情况，活期和定期存款的产生是与不定期活动相关的。另一方面，低收入弹性也许会表明，$T$-变量已经起到了加速增长趋势的效果。$C/D$ 和 $C/P$ 这两个方程式正确，因为它们表明税率的提高导致相对较大量的现金使用量。根据公式(5)，假如税率上升一个百分点，调整过程末端对实际现金需求量已经增长了4.9%。很显然，对于德国的 $C/D$，$C/M_2$，以及 $C/P$ 的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性检验，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些方程式来评估税收诱发性未观察到的货币活动。方程式(1)、(2)、(5)和(6)曾被用来模拟可归因于课税负担提高的现金持有量的增加。使用实际现金需求函数来预测的数额略高于使用现金—活期存款比率预测的数额。由于假如持有活期存款是为了逃税，这些估值就会偏低，所以，我们只有用方程(5)计算的结果才在表格8.3中表示出来的。

根据坦斯(1980)的模型，我们计算出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我们测得1950年及50年代末期间税率的提高产生的未观察到经济活动。第二，我们测估了与年终税收水准相关的总的未观察到的活动。这一模拟的额外的现金持有量乘上了观察到部分的收入周转速率。⑥ 表格8.3中的结果表明，1980年，540亿马克，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3.7%可归因于1950年以来的课税负担的加重。⑦1980年，税收的存在产

**表格 8.3　根据税收诱发性现金持有量测估未观察到的货币化活动，用方程(5)进行计算。**

（单位：十亿马克）

| 年　　代 | 非法货币(1) | 合法货币 M1 (2) | 合法货币的收入速率 (3) | 未观察到的经济活动 | |
|---|---|---|---|---|---|
| | | | | 马克(4) | 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 最低税额 | | | | | |
| 1976 | 5.86 | 170.82 | 6.58 | 38.55 | 3.4 |
| 1978 | 7.32 | 208.93 | 6.17 | 45.16 | 3.5 |
| 1980 | 8.38 | 229.64 | 6.50 | 54.47 | 3.7 |
| 零 税 额 | | | | | |
| 1976 | 19.07 | 157.61 | 7.14 | 136.16 | 12.1 |
| 1978 | 22.77 | 193.48 | 6.67 | 151.88 | 11.8 |
| 1980 | 26.57 | 211.45 | 7.05 | 187.32 | 12.6 |

注：(4)栏=(1)栏×(3)栏

生了约 1870 亿马克的未观察到的收入。假定在具体过程中有差异、特别是税收变量的不同公式，坦斯（1980，450 页）计算的美国结果同德国的结果之间的相同点是惊人的。

即使与税率增加相关的现金需求量可以确定，仍然还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假设作为基本的现金—比率研究方法的基础。现金仍为隐蔽部门的唯一交换媒介，而且现金收益速率假定同观察得到部门中的相同。这些论点已经讨论过了，因此，我们考虑坦斯模型基础的另外一些假设。

在有关逃税的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以不纳税形式获得货币报酬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决定逃税现象，如(*a*) 对政府的态度，(*b*) 基本的宗教、文化素养，(*c*) 严重的罚款以及 (*d*) 逃税的难易程度。这些因素是不可测量的，可是，

忽略了这些因素就忽略了影响逃税的重要因素。税率对于逃税的关系也许是一个太简单的表象，除此之外，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未观察得到经济的发展，如政府制定的各种规定。由于这些原因，对税收引起不正当活动的估测往往低于未观察到的货币收入总量。

## 交易方法

法伊格(1979)提出了另一种测估未观察到货币活动的宏观经济方法。而奎特曼和坦斯则特别注重现金持有量的变化。法伊格认为，基于现金和活期存款交易总量的信息情报会使对不正当经济的增长和规模的预测更为精确。

根据货币流量理论，交易总额揭示了与总收入之间相对的经常性的关系。既然一般可以从支付方对交易量进行预测，而且这一预测不会受地下经济发展的干扰，那么，这一预测可以用来测定收入总额，包括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收入。这样，假如交易和收入之间存在比例关系，那么，与观察到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的交易量的重大增长就表明未观察到货币成分的更大的增长。

全部交易不仅包括购买新生产的物品和新提供的劳务，而且包括购买半成品和中间劳务、现有资产、以及纯金融交易。假定资本和财富储存增加，德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就有必要仔细分析货币交易量的变化是不是由那些可归因于未观察到活动因素之外的因素引起的。

为了将法伊格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对德国的研究，有必要预测一下依靠货币和活期存款进行交易的交易价值总量。假设在一选定的基点年份中不存在非法活动，交易总值除以该基点年份的交易和收入之间的比率，我们便可得到随后几年经济活动的预测总数。再减去观察到的活动之后的剩余数就是未观察到活动的预测数。

对于德国，仅能利用1950年—80年这一时期的连惯性的数据。由于该国一分为二，更早时期的数据是不可能用来进行比较的。要选定一个基点年份，而在该基点年份里未观察到活动可假设是可以忽略，这是相当困难的。在50年代初，高累进税率[8]、多种法规、以及劳动力供给过剩都是促进未观察到活动的典型性因素。所以，将50年代中期作为基期似乎更合理些。但是，应当记住，即使在这一时期，德国经济中毫无疑问仍存在着某些未观察到的活动。

为了测估现金交易的总值，有必要测定活期存款和现金的周转量。可以根据由于转帐引起的非银行帐户借方款项的数据，直接借款数据、支票结清数据来测估活期存款周转量，这些统计资料是由德意志联邦银行[9]收集的。然而，有关现金周转量的可比较数据是不能直接得到的。由于仅有现金持有量的数据是公开发表的，因此，法伊格(1979)提出了一个利用不法现金破坏率(the rate of destruction of soiled and unfit currency)的信息来测估年度现金周转量的办法。为了实施这一方法，我们假定平均的未偿付率，在它由于不适进一步流通而被收回之前，可以维持125项产生收入的交易。[10]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1948年—81年间纸币的使用寿命为1.8年。纸币的使用寿命随着价值单位的增加而大大延

长，因为它们周转率低以及人们小心处置(见表格 8.4)。

**表格 8.4 不同面值单位纸币的平均寿命**

| | 单 | | | 位 | | | | |
|---|---|---|---|---|---|---|---|---|
| | 1000 | 500 | 100 | 50 | 20 | 10 | 5 | 平均单位纸币 |
| 寿命(年数) | 6.1 | 4.7 | 3.1 | 1.7 | 1.3 | 1.3 | 2.5 | 1.8 |

资料来源：德意志联邦银行，内部报表。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德国纸币的寿命似乎是相当短暂的。因此，我们更仔细调查消毁破损纸币。年平均现金储量除以年补数量，得出该年份的纸币寿命。这个比率表明1968年前具有很大波动和以后趋于稳定。纸币回收的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机关对货币发行影响的结果。1948 年货币改革之后，德意志银行的纸币就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纸币代替。1957 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之后，它的流通纸币又逐步被取代。这就是说，由于纸币的替换，德意志联邦银行计算的纸币的寿命很有可能偏短。因此，假定纸币的平均寿命约为三年似乎更合理。由于不能断定纸币发行的影响、纸币质量标准的变化、以及中央银行销毁脏纸币的行为，我们假定整个时期纸币寿命不变。考虑到对于每张纸币的交易总数以及纸币的平均寿命不确定，我们用了四种不同的估值结果(35，43，57 和 62)试验现金周转率。在进行最后计算之前，有必要调查研究进行中间交易，纯金融交易，或者现有资产的转让是否不同于最终产品生产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价值就得更改，以便对未观察到的货币活动进行预测。

对于中间产品交易的时间轨道的考查没有得出关于总的货币交易值是否受到工业内部贸易程度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

的明确答案。有关德国的可供比较的官方投入—产出表格仅从1956年之后才有。作为全部最终交易的一部分，中间交易量从1965年的0.90略微上升为1957年的0.94。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是否表明一体化程度已经下降，因为投入产出表格是根据生产类型而不是市场情况进行产业分类的。

可以预料，随着不动产股份的增加，现有资产的转让将要比新产品、新服务的销售有更大幅度的提高。为了模拟现有资产转让同新资产销售之间的比率，我们考查了轿车产权转让同新车注册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的时间轨道可见图8.2。[①] 1956年至1980年之间，产权转让量的增长要比新车注册快两倍。很有可能现有产品转让同新产品之间的关系同其他资产一样呈同样的趋势。因此，我们假定现有资产转让量同私人消费加上投资乘以图8.2中的比率的量是不相上下的。应该承认，这种估测是武断的，然而，不可能获得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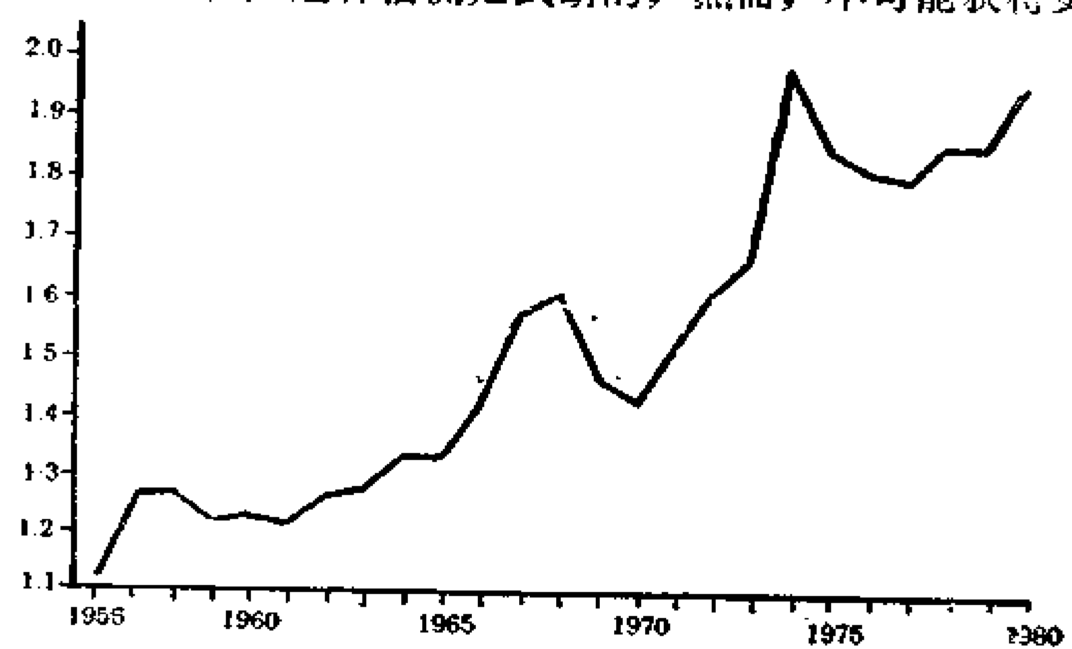



图8.2 轿车财产同新车注册之间的数字比率(1956—80)。
资料来源：近期统计办公室，统计年鉴。

为精确的信息资料了。

为了对金融交易的交易净额进行预算，有必要减掉各种类型的其他财务交易中的借方款项。然而，这些必不可少的借方数字却无法查到。许多货币资产的储存数据可以查到，但是预期的流程数据却没有记载。尽管存在着这些难题，我们仍试图在借方款项数字之内加上以下项目预测出纯财务金融性交易额：

所有股票、债券销售的市场价值，

存入储蓄帐户或建设和贷款公司帐目的金额，

贷款利息以及每年作为偿还的非银行贷款，

股票兑换现金额，

作为来自定期存款中的借贷替代的年平均短期定期储蓄(一年为期)。

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金融交易预测结果由图8.3表示出来。很明显，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金融系统迅速扩大，因此，促使了金融交易的增加。这就很有可能对金融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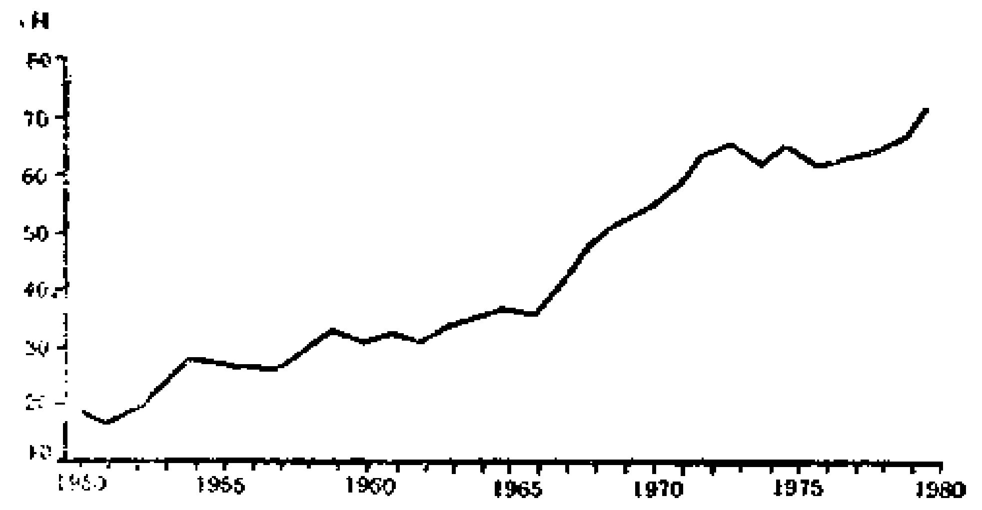



**图8.3 1950—80年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金融交易**

资料来源：德意志联邦银行每月报表，各月期号，自己计算。

量的估价过低，因此，对金融交易的预测似乎是保守的。

由于存在着现有股票的转让以及纯粹的金融交易，我们纠正了现金交易量，之后，未观察到活动计算如下。以1956年一年作为基点年份。以后几年纠正了的交易量除以基年比率，然后减掉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剩余金额就是对未观察到货币化部门中的收入的测定。

以1956年作为基期，假定货币每年平均周转率为62次，按照现金交易比率法得出的结论便是，在1980年，德国未观察到的货币化成分达到约4千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12] 这一计算结果相当高，但却同法伊格（1979）对美国的预测数非常一致。图8.4提出未观察到货币化经济的测估占官方国民生产总值同平均税率的百分比。该图表明，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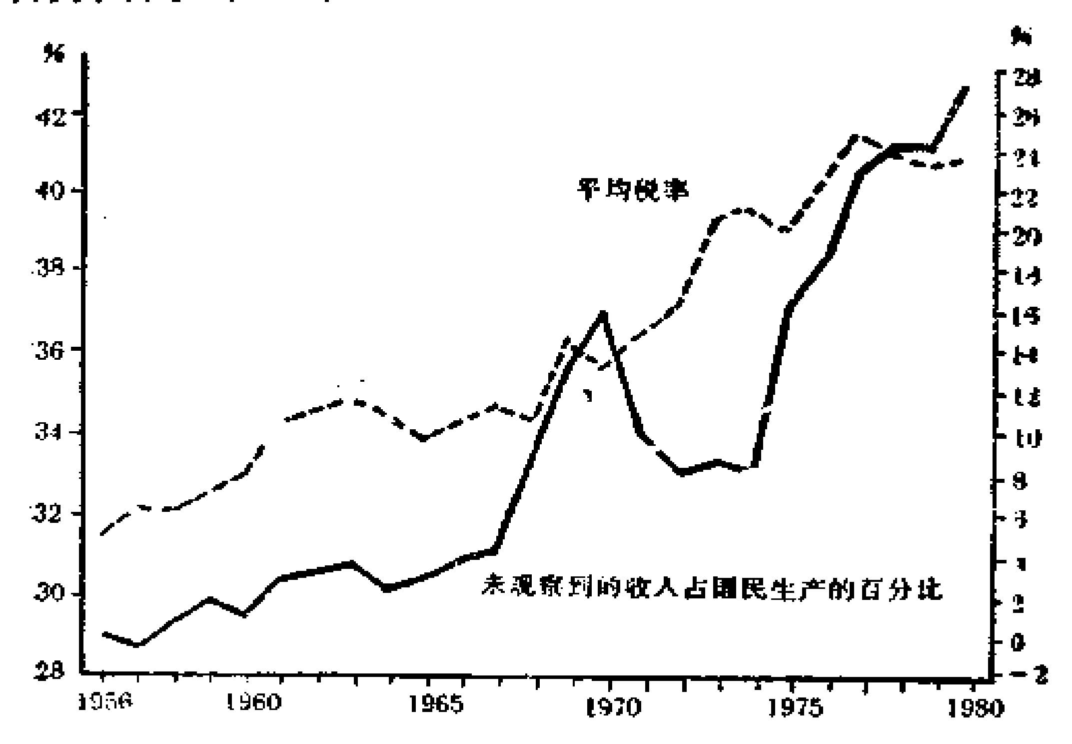



图8.4　以交易方法来测得的未观察到货币收入同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56—80)。

资料来源：统计室、统计年鉴，作者计算。

是在70年代，未观察到的成分比正规经济发展快得多。

既然为了获得对未观察到货币成分的估测数额，假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些假定必须被视为基于推测的。仍然存在着可能过低或过高估计的不同资料。值得怀疑的是，在选定的基点年份——1965年里，所有经济活动都限于官方部门。由于假定该基年中没有任何未观察到收入，我们就已经低估了未观察到货币化成分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假如由于更为一体化，未观察到部门的收入周转率高于观察到部门的，那么也会产生对非法经济的过高估计。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情况下，金融转让以及现有资产的转让显然已大大增大了货币交易总额。由于对货币流量的估计是保守的，对这些因素的估计可能偏低，这样就会导致对未观察到部门的过高估计。

## 劳动力市场方法

为了对未观察到部门的发展有所印象，仔细考查一下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有益处。散见于各处的资料表明，德国未观察到的活动中相当程度是劳动密集型的。因而，不正当成分的增长应该与官方记载的就业数字[13]相对下降同时并存。这本身表明参与率（劳动力登记数与人口总数之比——译者；另参见第八章）下降、失业率升高、工作周缩短、节假日增加、或无故旷工更为普遍。图8.5表明德国的参与率、每周工作时间以及失业率的进展情况。图中事实似乎证实了这一假定，即50年代中期可以作为基期来预测德

国的非法活动。1957年参与率达到了最高水平48.7%，而每周生产时间1955年达到最高峰48.72小时，失业率迅速下降。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合法经济的黄金时代。1949年引入市场体系以及劳动力有动力、流动性和技巧的情况，促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经济混乱，边际赋税负担减轻以及社会保险的捐款下降。在这一时期内，资源很有可能都转移到合法的货币化市场部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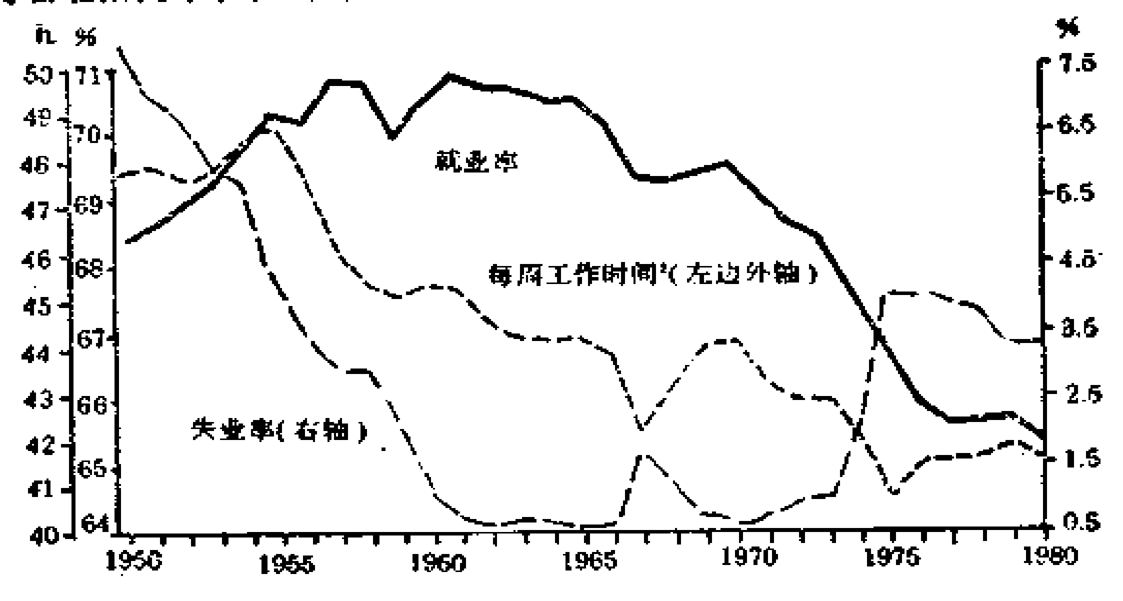



**图8.5　1950—80年，西德的就业率、每周工作时间以及失业率的进展情况：**

(1) 劳力参与(包括外国工人、15—65岁的工人)；

(2) 工业蓝领工人有酬的周平均劳动时间。

60年代期间，这一发展趋势略有逆转。然而，参与率的下降可以由人口统计的发展状况(儿童和老年人的增加)，而不是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变化来说明。25岁到60岁年龄组的专业参与率仍然较高(指男性工人)，甚至有所提高(指女性工人)。只有每周生产时间的发展情况可以表明官方部门的吸引力下降。然而，外国工人大量流入仍有可能促使官方部门

中熟练工人的增长，正如工资流向绝对增长所表明的。

70年代可大致概括为获取资源提供公共商品及再分配的公共部门不断发展的阶段。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可以归因于当时宣布的公众“就业保证”。政府努力通过对深造以及早退休进行补贴的办法来解决不断增长的失业问题。这些措施仅能靠增加的税额和社会保险捐款来获取资金。为防止滥用津贴，有必要加强立法。因此，在未观察到部门工作的刺激作用大为加强。在这十年中，自己动手以及在未观察到的货币部门工作的活动可能已迅速扩张。

德国工会组织要求缩短终身劳动时间，每周工作时间似乎表明，自己动手以及非法劳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至今，伴随失业剧烈增长而来的不是社会动乱而是人们相对的默认，这一事实可以归因于失业带来的大量益处，人们有机会在非法部门获得额外的免税收入。总的来说，转移支付的激剧增长很有可能导致人们要求获得转移支付，同时又未注册便工作的情形，否则，他们常常会失去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将参与率下降产生的工作时间低于最高水平的每周平均生产时间以及失业总量加起来，得出总体未观察到活动可得潜在劳动力。然而，应该记住，这反映出了非法活动的名义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预料，收入越高，总伴随着人们会更加要求“闲暇时间”。[⑭] 图8.6表明，一部分时间在官方部门工作而从事非法活动的潜在劳动力供给的发展情况。这一比率在50年代初期曾大大降低。在50年代中期降到最低点后，一直不断上升，直至1980年。1967年和1975年的两次高峰反映了萧条时期失业的急剧增长。总的来说，参与率的

下降以及周劳动时间的缩短促成了非官方经济的潜在劳动力不断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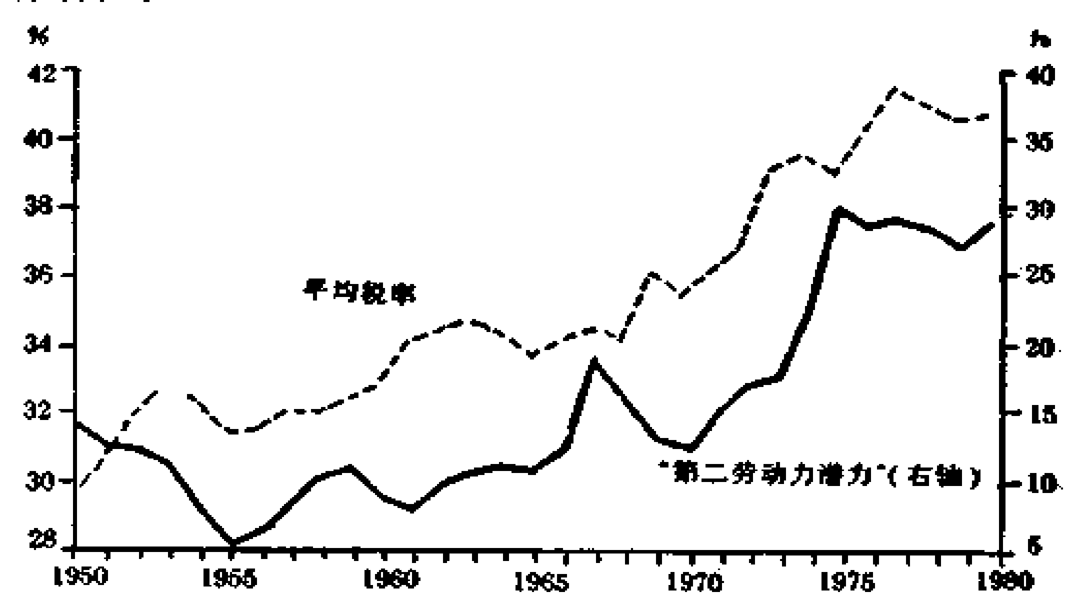



图 8.6 相对官方部门的劳动时间，德国未观察到部门可获得的劳动力市场的潜力以及平均税率的发展状况（1950—80）

资料来源，统计办公室，统计年鉴，作者计算。

官方劳动时间相对下降很大程度上可能看作未观察到部分的相对增长的信号，然而这一预测数据不可直接与货币需求方法和交易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因为这些预测数据包含了货币的和非货币的未观察到的活动。另外，这一预测数据仅能对未观察到的部分的相对增长提供信息。为了测估未观察到部门的规模，有必要对这一部门的生产能力做一假定。尽管有些不足之处，以劳动力市场统计为根据的进一步研究应该进行，特别要考虑假日延长和旷工以及人口发展的影响。

## 结　论

本章试图测估西德的货币性未观察到部分的规模。测估数据应该说是初步的，因为，为了进行定量测估，不得不做了些关键性假定。基于税收诱致的现金持有量计算的测估表明，1980 年，货币性未观察到经济大约 500 亿马克，这已相当接近于协会的预测。由于同样有相当限定性的假定，这些测估应该被看作是偏低的。交易方法测估的结果，1980 年，官方统计测量系统没有统计到的大约为 4000 亿马克，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7%。由于计算那些可以被认为是纯金融交易的货币交易总额有困难，交易方法得出的测估数据似乎偏高。然而，两种预测方法都没考虑物物交换活动。至今仍得不到对德国的非货币性未观察到部分的测估数据。

总之，所有测估结果表明，德国未观察到的经济确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所用的方法都表明了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里。

## 注　释：

① 见伊斯纳尔(I.A.Eisner，1978)，朱斯特 (Juster，1979)，肯德里克(Kendrick，1979)，托宾(Tobin，1972)。

② 这些国家 1975 年的银行纸币系列构成可见费思 (Fase) 和宁

科克(Nieuwkerk, 1977, p.84)。

③ 加西尔(Garcia, 1978)认为，在美国，活期存款已深受新的金融手段的影响，如购回协议，自动转让系统或者现有帐户。

④ 税收总额包括一切税额以及向公共部门和社会保险系统的一切捐款。由支付社会保险所引起的税额的增加归因于德国的付款强制性，因而，这给未申报收入以额外刺激。

⑤ 内德尔(Neldner, 1977)指出，这一价格比率已对德国的现金储蓄率有重大的、明确的影响。

⑥ 在德国，经验性的分析已证明，货币供应M1的变化表明它与观察得到的经济活动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为得出额外现金持有量，我们用经过调整的货币供给M1来计算货币的收入速率。

⑦ 克朗夫兰德(Klovland, 1980)根据长期的预期估值，模拟了未观察到部门的现金持有量。然而，将预期现金持有量同实际货币的收入速率联系起来似乎不一致。由于调节速度〔在方程(5)中为0.14〕特别低，因此，以预期额外现金持有量为根据的模拟就会导致相当高的未观察到的货币化成分。

⑧ 中央银行在1950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见23页)：在1948年货币改革之后的前两年中，逃税与现金持有率具有相关性。

⑨ 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月份报告III，表格23。

⑩ 这一数字是劳林特(Laurent, 1970)对美国1890—1965年间的预测。法伊格(1980)报道说，一项有关新货币发行的技术性研究表明，一张纸币的终身媒介交易总次数预期在200—260次之间。

⑪ 仅从1956年以来，财产登记才有据可查。

⑫ 与期望的相反，假设每单位货币每年交易次数不足62次，便会导致对货币化未观察到成分的测估额略微偏高。

⑬ 德国的就业数据的计算不是以考查为根据的，而是通过对所有企业普查得出来的。

⑭ 在经济文献中，人们对劳动——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着争论。但是，对于“闲暇”的定义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



# 瑞典的地下经济

瑞典的税率，尤其是边际收入税率，居欧洲税率榜首。对于平均工资收入者而言，边际税率高达75%，这就说明直接税、间接税及相关的收入转移所产生的影响。① 若将经济划分为已税与未税两个部门，那么已税部门的边际劳动总产品（gross marginal product)的价值必须是未税部门边际劳动产品(总产品或净产品)的四倍，才能使边际劳动时间的纯报酬相同。

因此，边际高税率促使人们将时间用在家务劳动或闲居等无须纳税的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它刺激人们通过支付小额优惠(fringe benefits)和大量借贷以减少利息支出等方法来避税。由于高税率，逃税可得到高额的额外收入。

综上所述，高边际税会导致产生相对小的课税基础，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其中一些(不是全部)因素会缩小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national account statistics)，计算可观察到的经济的范围。

多年的经历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

家和大众新闻媒体意识到高边际收入税的不良影响。然而影响程度究竟如何，人们仍然争执不休。占瑞典国会95%席位的四大党派认为：这一不良影响非常严重，因而必须降低边际收入税率。其中的三个党派（占75%席位）已经通过了一项税法改革方案，对平均收入者，将边际收入税率由75%降到70%。②

这一税法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未纳税活动的刺激因素，但已税经济活动的总报酬与纯报酬之间的差额仍然可观。

本章的重点是以逃税这一表现形式，研究瑞典的地下经济。逃税是指有些收入未予申报或在纳税申报单上假报收入扣除额而产生的对申报收入的估计不足。本文中所有对逃税量的研究，都是经过抽样调查和评价的。它可使读者最大限度地估测瑞典额外工作逃税情况的规模及发展过程。

## 抽样调查研究

本文中有几项是通过对抽样样本直接提问来研究逃税情况的。在 1966 年，瑞典的民意研究机构(SIFO)提出了如下问题：“你是否逃避过应交纳的税款？”有 12% 的样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对两个逃税的类似问题作抽样调查，进一步肯定了上面的结果。政府报告(SOU, 1970, P.25) 认为有 28% 的人有逃税行为，瑞典民意调查机构 1979 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 7% 的人“总是过低申报收入”，有 10% 的人“总是过高申报扣除额”。瓦尔内里(Warneryd)和瓦尔鲁德(Warlerud) 1981 年的调查结果，有 19% 的人“总是过高申报扣除额”。

后项研究仅限于男性，并且其他研究(1980a，1981)也表明，男性逃税者居多数。

在一些调查时间限定为一年的研究中，对"在1980年通过职业工作或劳务获取了不正当收入"这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瑞典民意调查机构(1980a)的结果占14%，瓦尔内里和瓦尔鲁德(1981)的结果占12%。

调查结果表明，占全国人口总数10%—80%的人都与逃税有牵连，但并未表明逃税有趋于严重或减少的迹象。由于抽样调查涉及的问题不同，上述比较也受到影响。

瑞典民意调查机构(1966)的调查还涉及了有关未申报收入的数额问题。在12%承认少报收入的人中，其中71%的人声明未申报额不超过500克朗(85美元)，10%的人在500—900克朗(85—170美元)之间，8%的人在1,000—3,999克朗(170—680美元)区间内，4%的人超过了4,000克朗。还有7%的人未给出任何界线。为了了解上面所列数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百分比的大致情况，要注意区间的中间数，和作为上区间的8,000克朗，这个区间未作回答的人的比例分布，结出了相当于196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的少申报收入。

## 未申报收入的分布

有几项研究还对不同分组的未申报收入状况进行考察。结果为出现频率较高的为男性(SIFO，1980a，1981)，青年

(SIFO, 1966,1980)，中年(SIFO, 1979,1981)，与薪水阶层相比的企业主(SIFO, 1979, 1981)，与中层、上层相比的工人(SIFO, 1980)，某个给定年龄组中的高薪者(SIFO, 1979)。其他研究(SIFO, 1966)发现城市逃税情况严重，而瑞典民意调查机构(SIFO, 1980)则认为城市与农村无差异。

瓦尔内里和瓦尔鲁德(1981)发现高收入者接受不正当收入比较严重，因为他们有较多的逃税机会，並自恃不易被稽查到。在调查不同职业者获取不正当收入的频率时，瑞典民意调查机构(1980a)发现学生出现的频率最高(35%)，其次是建筑业(26%)，继之为家庭主妇(22%)，加工制造业(13%)，商业(13%)，最低的是卫生保健业及社会福利业(11%)。

## 非法报酬的支付

抽样调查表明收受非法报酬的情况较为严重。瑞典民意调查机构(SIFO, 1970)，瓦尔内里和瓦尔鲁德(1981)在各自的调查中，分别有28%和42%的人承认支付非法报酬。两个研究结果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由后者的研究仅限于男性。

当时间周期限制在一年的范围内，比例下降至19%(SIFO, 1980a)。在后者调查承认支付过非法报酬者中，有81%的人声明其数额不超过1,000克朗(170美元)，17%的人在1,000—10,000克朗(170—1,700美元)区间内，还有2%的人超过10,000克朗。按区间的中位数及20,000克朗

计算，这些数额表明非法支付占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

非法收入获取频率最高的是企业主，最低的是工人。在给定的年龄组中，这种比例随着收入的高低而增减（SIFO，1979)，上层或中上层比例最大(SIFO，1980a)。并且，该比例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成年男性居多，城市农村相似(SIFO，1980a)。

瓦尔内里和瓦尔鲁德(1981)断言，随着房屋拥有者的增多，教育的发展，逃避税收机会的增加，家庭规模的扩大，对违反税规和逃税的进一步宽容，以及税收计划的频繁变动，非法报酬的情况将会更趋严重。非法的报酬随着年龄的下降而减少，并且随着逃税被查收的预期风险的增大及收入的增加而急速减少。(与SIFO的结论相反，1980a)

## 对违反税法的态度

瑞典为了了解人们对违反税法所持的态度，民意调查机构分别在1958及1978这两年，作了比较性的抽样调查。1958年的调查表明，有77%的样本认为隐瞒申报应税收入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1978年的调查中，只有75%的样本持此看法。在1958年的样本中，只有16%的人认为隐瞒申报应税收入不是严重违法行为，而1978年却有22%的人持此看法。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对违反税规的犯罪行为越来越采取宽容的态度。

## 抽样调查的总结与评价

概括上述结果，逃税者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逃税额少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由于几个原因，调查结果很可能对逃税情况估计不足。首先，在回答自己参与黑市交易情况时，被调查者是趋向打折扣的。尤其面对不知底细的调查者，他们更会作出如此反应。从伊萨克森和斯托姆(Isachsen, Strom, 1981)对挪威的调查报告中，反映出不同调查方式对结果是有重大影响的。在面谈时承认参与黑市活动者占26%，而在通过邮局投递进行的无记名调查中，则达40%。

再则，有些人虽然很可能参与了未观察到经济领域的活动，但他们根本未参加抽样调查或是回避某些特别的问题，这种趋向，使调查系统本身就存在着误差。而且，调查的问题总是局限于诸如："因从事某项工作或劳务而获得不正当收入"一类的具体逃税类型。这样就很可能把货物销售收入通过易货逃税，假报扣除额等逃税方式排除在外。这些调查可能缩小了逃税的范围，从而引起相当程度的低估。

## 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之间的差异

很久以来，瑞典一直全面、严谨地掌握着经济活动的统

计数据。政府是依据支出项数据来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当税收因素很可能导致对产值估计过低时，避免仅用数据资料是一方面，收入统计主要基于所报的收入，以达到征税之目的，因此，若用差异法，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将成为测估逃税额的理想原始数据。汉森（Hansson，1981）应用此方法，通过对家庭消费、储蓄、纳税等方面的家庭总支出与申报单上所申报的收入之间的差异来测估逃税的数额。

对于支出、收入方面进行不同的项目考查，呈现出逃税额估计值不同数据误差。在调查报告里，对于数据误差是靠上调或下调进行修正的，考虑到农户的逃税、利息股息的逃税，及夸大薪水扣除额的逃税等因素，逃税额向上做了修正。另外，从 1978 年家庭支出调查来看，很可能低估了逃税额。因此，对于一些消费项目，逃税额的低估值应作小幅度的上调，而逃税额的高估值就该作稍大幅度的上调来校正了。为了取得数据可能误差的上、下限，我们主要是以住房补贴、房产投资、工作餐和工作补贴及利息收入几方面扩大了对逃税的测估范围。

通过上述调节，1978 年的差异逃税额由 150 亿克朗上调到 165—273 亿克朗。这个范围相当于 197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0—6.7%。图 9.1 是 1970—1979 年间调查报告的结果。

平均来看，低估的逃税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8%，而高估的逃税额则占 6.4%，图 9.1 产生的短期变化大体上可算适当的误差。除这些变化外，所示结果表明，逃税额在该时期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致相同。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出乎意料的结论。

上文仅对家庭部门及个体企业的逃税进行了测估，但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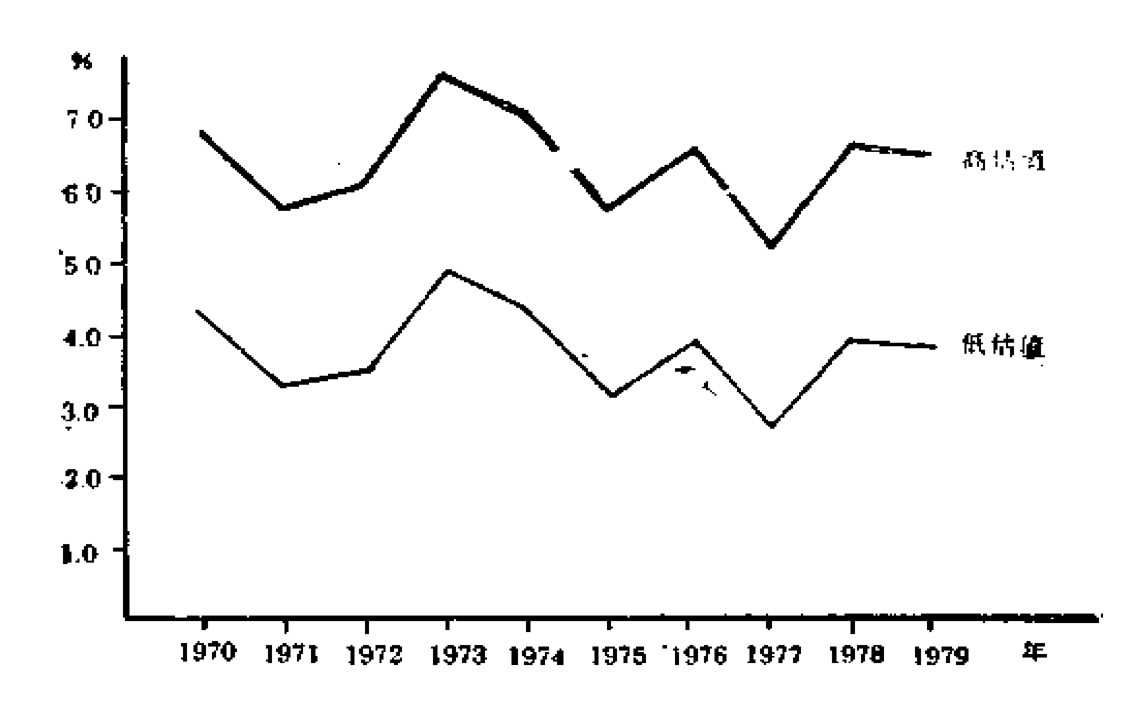



**图 9.1　所得税收入中低估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未包含合伙企业及国营部门的逃税情况。与家庭部分相比，它们的负税收入是非常少的。

而且，家庭部门中有些(并非全部)易货贸易收入亦未纳入消费及投资的估测范围。这说明，已测估的逃税额并未包括易货交易中应纳的税款，另外，也未包括从事非法经济活动所隐瞒的收入，例如：贩卖毒品、盗窃、行贿等。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中不含这些消费。

更加普遍的是，由于人们可能少报用于购买黑市商品和劳务支出，这种差异法可能使逃税额低估。不过，瑞典的统计在设计时，也部分考虑到上述因素，以避免该问题的出现。所报的测估值也有一些修正值用来弥补误差。除去上述添加的逃税形式，笔者认为，对逃税规模的最佳猜测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8—6.4%。

由于差异法所求得的逃税额是两个巨大数值之差，所以

此法并不可靠。因任何一项有些微差错，都可能酿成逃税测估值的严重误差。

## 申报工时与实际工时之差

来自瑞典建筑业和维修保养业黑市经济的竞争尤为严重。迈尔斯顿（Myrsten, 1980）为这些部门的企业家团体测估了上述行业未申报的工作总量。黑市部门未申报的工时量的计量方法为，用包括超时工作量在内的所有工时减去向政府部门申报的总工时。

一个受雇的油漆工，1978年的满工作量为1,800小时，刨去5%的失业率，10%工时的病假，2%工时的换工损失，平均工时应为1,500小时，但官方工时仅1,250个工时。这暗示着约有250个工时未予统计。此外，迈尔斯顿（Myrsten）推测，每个雇工的超工时为100小时，使得未予统计值共达350小时。

个体油漆工申报的应税收入相当于1,000工时，据推测，他们的总工时为2,000小时，这暗示着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油漆工的未申报工时就达1,000小时。由此推论，未申报工时占申报工时的30%。按同样的计算方法，推测出建筑、维修保养业各下属部门未申报的工时比例大致为：木材、水泥部门占10%，管道部门占16%，电气按装部门占25%。迈尔斯顿（Myrsten）对不同职业的测估情况汇总表明：未申报的工时占申报工时的15%。

在瑞典住宅建筑承包商协会(Associated Generat Contractors for Home Builders of Sweden)任职的谢尔·乌尔松(Kjell Olsson)应用此法考查了三个较大的建筑承包商行，结论为：未申报工时占申报工时的10%。其中含几个有误差的原始数据。有关包含额外工时在内的总工时，其资料十分难得，所以有关测估量主要以理论来推测。关于申报工时也会与实际情况有出人，对个体者尤甚。从事非法经济活动者并非仅仅是注册的雇员，同时还有退休工人和在其他行业注册者。申报工时低于测估总工时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接受调查者可能在别的行业工作，或在度假、上学、进修。

由于调查人员对所调查部门的机构安排颇为熟悉，上述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

## 与其他研究的关系

为了与前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有必要将未申报工时变换成黑市经济领域所增加价值的比例标准。若按黑市经济领域每小时的报酬为申报工时报酬的60%推测，前文10—15%的工时测估就相当于增值6—9%。

另一种难以置信的说法是，建筑业及维修保养业的未申报收入的比例已超过了上述收入与整个经济的比例。瑞典民意调查机构(1980a)也进一步证实了该说法。瑞典民意调查机构在对建筑业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作出反应的样本中，有26%的人承认从事了非法领域的工作，而与之相比，各行

各业抽样的总结果仅为14%。因此，可以认为6—9%是非法收入比例的上限。运用瑞典民意调查机构的结果，可得出整个未申报收入的比例为3—5%。

## 以现金—存款比率为基础的测估

《商业杂志》(《Veckans Affarer》)应用单纯现金比率法对瑞典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规模进行了测估。结果发现它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国内、国际文献大量引用了该测估结果。③

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该测估结果有严重的误差。该方法所要求的一些限制假设条件，在1920—1975年期间，瑞典极有可能并不具备。在这期间，用现金支付工资的方法开始持续地向用帐户转移的方法转移，这样就违背了该现金存款比率是固定的这一假设。再则，对货物、劳务的支付已由现金支付变为以支票、邮政转帐、信誉卡为主的方式支付。这一时期的前一段，个人收支很少使用支票，而现在个人以支票作为支付手段则变成极为普遍了。法伊格对此方法提出批评，指出：若以为在未观察到的领域，现金支付是唯一的手段，那就错了。此观点同样适用于瑞典。单纯现金比率法要求下列假设：1922—1933年期间几乎不存在未观察到的领域。然后又指出该时期的前五年及后五年，未观察到的经济均占观察到经济的20%。《商业杂志》是根据现金与定期存款加活期存款之间的商对瑞典进行观察的。在确定比率的决定因素中，

包含了定期存款，但对此未作理论阐述。然而，众所周知，通货膨胀、利息率及税收制度的变化对定期存款与现金之比的影响。由于此法忽略了影响整个比率的其他变量，人们对使用它的方法产生疑虑。而定期存款并不作为交换的最后媒介，所以将其纳入，从概念上看也是不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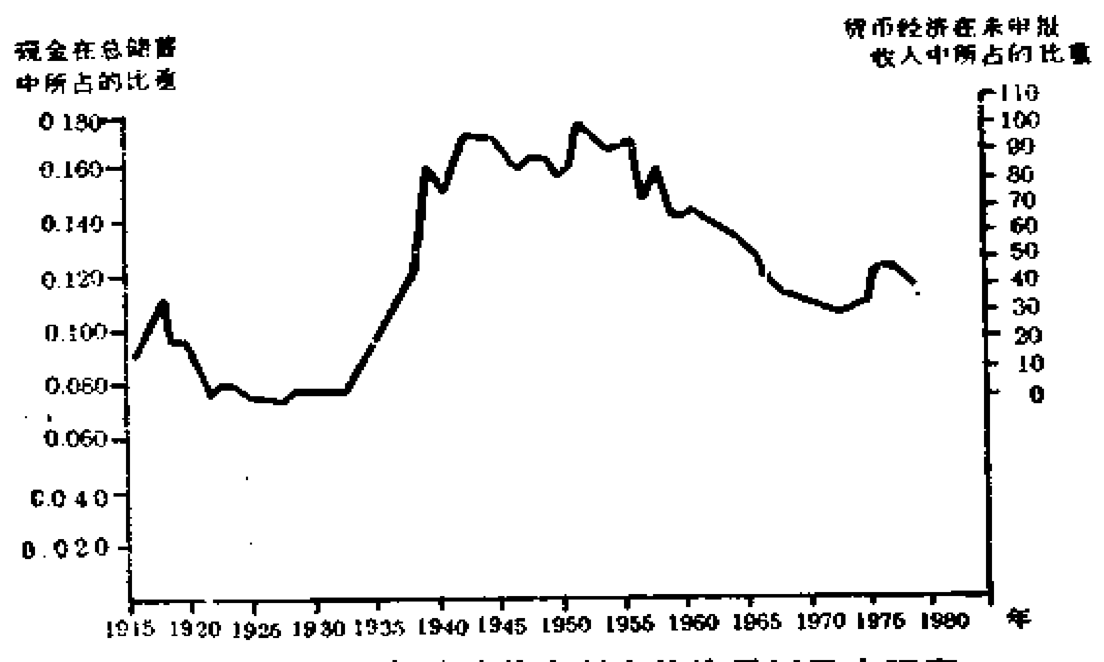



**图 9.2 现金在总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在未申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图 9.2 标明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现金与总存款的比率。图 9.2 右边的刻度为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unobserved monetary economy）在已观察到的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测估。用这个方法得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由三十年代的 0 猛增到 1957—65 年超过 100% 以上，然后又骤然跌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低谷。另外，这个重新计算的结果不同于原来报告的结果。[④]

笔者认为，应将《商业杂志》上引用的资料从关于瑞典逃税规模的测估结果中剔除出去。

## 货币比例法的其他应用

卡甘(Cagan, 1958)与奎特曼(Gutmann, 1977)直接应用现金比率法来研究瑞典的地下经济，得出了无法使人信服的结果。据此法测估的未观察到货币经济比例,如以1939年为基期年，即增长率为零的话，1957—1961年增长率达到100%,然后在七十年代中期增长率又跌至5%。

若用活期存款加邮政转帐存款来替代活期存款的方法，将现金比率法应用于瑞典的情况，那么，二次大战前任何一个有可查数据的基础年（1926—1938年）都意味战后大部分时期都存在着否定的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笔者的结论为：单纯现金比率法在瑞典不可行，其原因就是有关时期上述支付方式的变化。

克朗夫兰德(Klovland, 1980)采纳了被坦斯(Tanzi, 1980)进一步发展了的方法,在计算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规模与发展时，使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的货币比例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并将此方法应用于瑞典和挪威。然而,由于该模型的规范及周转率的衡量标准要求严格，使得研究结果极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所测估的综合税收参数是负值，这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中，未观察到的货币收入比例在经济中是负值。

差异如此之大的各种结果，不可能成为测估未被观察到货币领域的可靠依据。

## 已被发现的低申报

国家税务管理机构（Rikss katteverket）对下属经济部门一段时期内的统计数据作了修正。修正的重点是那些据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申报工时或收入的部门及纳税人。对作为测估逃税总额基础的修正，这就限定了作为全部逃税总额测估的基础的价值量。

以 1978 年的价格计算，此修正表明在每个受检查的案例中，低报的收入平均为：养貂工人 35，100 克朗（5，900 美元）、广告与公关部门18，000 克朗(3，100 美元)、建筑设计人员 14，300 克朗（2，400 美元）、材料部门 68，300 克朗(11，600美元)、各类纳税者的抽样样本 21，900 克朗（3，700 美元）、需交纳各种税款者的抽样样本 29，300 克朗(5，000 美元)。前四项修正期限少于五年，第五项为两年，后一项为一年。若上述 1—5 年中，样本的平均申报收入为100，000—400，000克朗(33.900—67，800美元)，那么，已发现的少报收入就达申报收入的 8—16%。因在个人样本和公司样本的申报收入规模方面，缺少更为精确的数据材料，上述计算有较大的误差。另外的严重误差来自于调查过程中，将重点置于那些预计程度严重的低申报者及部门，且审计出的也只是纳税者的部分秘密收入。

## 警 察 总 署

据警察总署(Rikspolisstyrelsen)(1977)委员会估计，税法专家们由于稽破"更为体系化的违反税法犯罪"，稽破逃税额达5—10亿克朗。"若设侦破率为5—10%，这项测估表明每年最低的逃税额为50亿克朗，最高为200亿克朗。"这是最后一个可以说明瑞典逃税规模的证据。这个测估值相当于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5.4%。不过，由于稽查范围是"更为体系化的税法犯罪"，它未包括靠薪水进行逃税的轻度逃税者。再则，大量尚未证实的查处案件，也会导致较大的误差。

##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的逃税额的幅度

本节根据已有的测估，对瑞典的逃税规模进行最接近实际的猜测。

与其他几项测估相比，根据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差异法得出的结论似乎比较可信。因此，就以占国内生产总值3.8—6.4%这个百分比为起点。这个测估不包括：

1. 通过诸如贩卖毒品之类的非法活动的逃税；
2. 通过易货逃税；

3．家庭领域以外的逃税。

这一逃税测估额应向上调整，以弥补上述三点。

然而，其他大部分测估都低于该起点。瑞典民意调查机构的测估结果为0.4—0.5%。警察总署的测估为1.4—5.4%，虽然这项测估的调查范围更小，但结果仍低于起点。这些较低的结果，加上迈尔斯顿（Myrsten）—乌尔松（Olsson）3—5%的计算结果均表明需将逃税的范围向下调整。修正法中被稽破的8—16%的逃税范围，应作大幅度下调，以弥补抽样方式的缺陷。

这些研究意味着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差异法中6.4%这个高测估值应作下调。但研究结果与3.8%这个低估值却是一致的。这表明七十年代末瑞典逃税规模的最佳猜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8—5.5%。这个比例相当于每个瑞典公民在1980年逃税3，300—4，800克朗（560—810美元）。

最后这项测估是综合五种使用不同方法研究的结果。如前所述，每项研究的原始资料都有很大误差。将之综合考虑有助于最后测估的可信度，但误差的幅度仍较大。

## 逃税情况的发展趋势

瑞典的大众传播媒介经常传播一些奇闻轶事般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逃税情况日趋严重。政治家们亦对此发生浓厚兴趣。经济学家米达尔（Myrdal，1978）、杜·里茨（Du Rietz，1980），迈尔斯顿（Myrsten，1980）等人也认为逃税情

况呈上升趋势。笔者在本章的开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然而，若仔细观察已有的有关研究，就会发现上述观点缺乏系统的证据。抽样调查表明人们对违反税法的行为，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但并未发现逃税情况有日趋严重的迹象。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对同样问题的答案为，七十年代逃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持恒。

结论：现在仅有的几项对过去逃税情况发展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瑞典逃税情况是否在不断发展，这一问题有待商榷。

## 逃税情况持稳定状态的合理解释

长期以来，瑞典的税率一直上升。对于平均收入者来讲，包括直接税、间接税及相关收入转移在内的边际收入税率，从1965年的59%上升至1980年的75%，税率不断上涨，这种情况，易导致逃税情况的增加。因此，逃税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严重，这种说法可部分地看作是对税率增加的预测结果。

然而，自七十年代起，税收审计部门的信息来源有所扩大，公司不得不更加详细地记录其收支帐目，这些因素会使逃税减少。

再则，公共部门与大公司的增值比例有所增加，也有可能降低逃税。在上述情况下，其内部控制严格，对所申报的收支要求相当精确。如果没有与雇主关系密切的人介入其中，向税务机构作歪曲真相的申报可能受到限制。

上述两个具有减少逃税的因素，与由于提高税率而导致逃税增加的因素相抵销。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逃税占瑞典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为稳定。

## 已观察到与未观察到的经济

本节根据上文对逃税量的测估来考查瑞典的未观察到的经济。未观察到的经济即是，不包括在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中的经济行为。它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所创收入根据税法应该纳税的，第二类为其他经济行为，例如自己为自己做饭，自己修理车辆或房屋，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管理与教育等等。这种将未观察到的经济划分为应纳税与非纳税的方法，与法伊格(Feige，1979)将这种经济划分为货币与非货币经济的方法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是根据支出项计算的，那么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的差额就包含在已观察到的经济中。不同类型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见图9.3。该图表明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其计算方法应为逃税额减去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统计中的差异额。

上述测估法是在对支出项以免低估而稍作调整后计算出支出与申报收入之间的差额来测估逃税。因此，此方法不宜用于测估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其他四种测估法都与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无关，不过，它们可以用自己与上一方法相比的差异，来对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作出相应的估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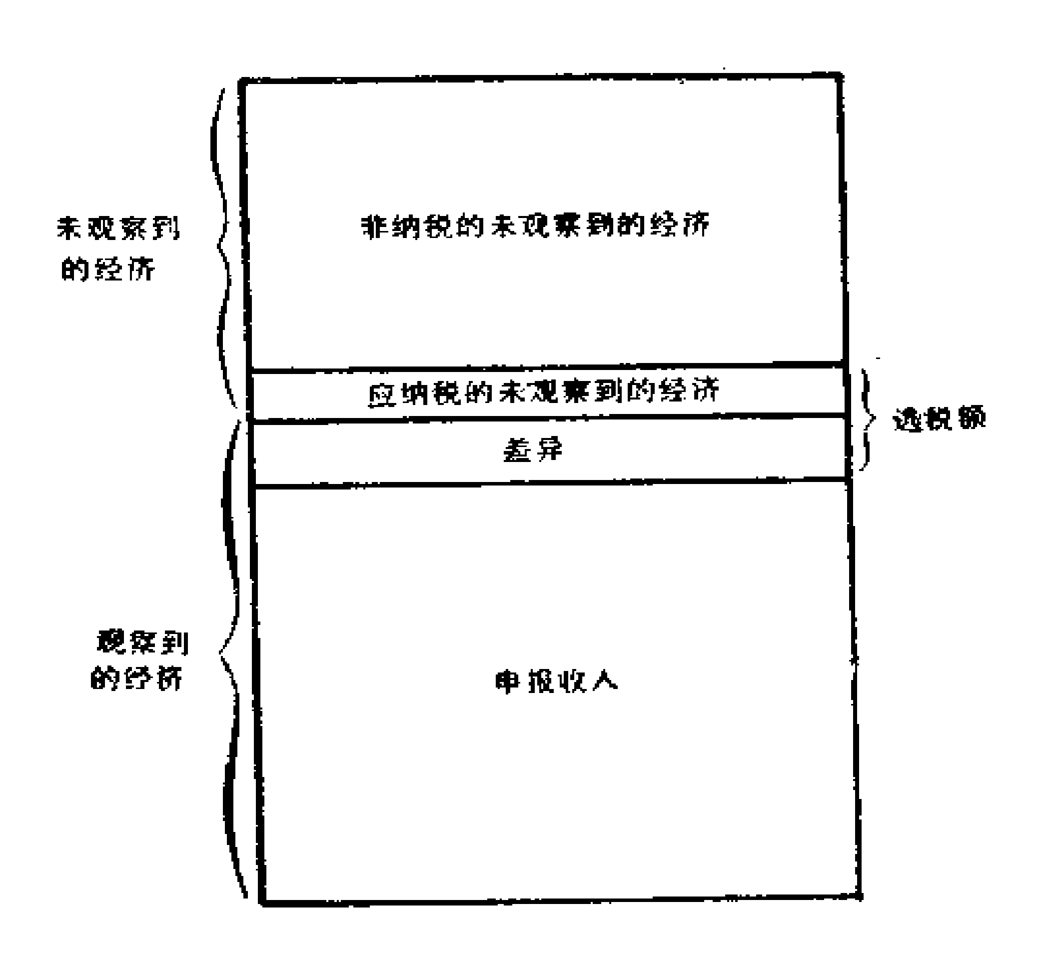



**图 9.3　对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经济的分别考察**

这四种测估法所得出的逃税额都低于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统计的差异逃税额。这就说明瑞典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领域相对小些。由于这四种方法原始资料的误差较大，因此，可信度仍然值得怀疑。可以理智、谨慎地下这样的结论，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不可能超过，譬如国民生产总值的10%。因为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未包括物物交换，而应小于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上述结果还表明瑞典未观察到的货币经济规模也相当小。

## 未观察到与未纳税领域的评价：官方统计的测度误差

本节考查由于未观察到经济的存在，而导致官方统计测度误差的重要性。

若只分析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帐户统计所要测度的经济行为，那么，国内生产总值的测度误差，主要是由应纳税的未观察到的经济引起的。上文的结果表明这种测度误差很小。

表 9.1 给出了当应税未观察到的经济达到已观察到经济的 10%，且这一比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时，测度误差的增长率，给定应税未观察到经济的规模与增长上限时，表 9.1 给出的 0.9% 这个增长率的误差，与瑞典已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从 1960—1970 年的4.8%下降至1970—1978 年的 1.4% 相比是比较小的。

**表 9.1　增长率中的度量错误**

| 年 | 观察到的可征税经济 | 未观察到的可征税经济 | 总的可征税经济 |
|---|---|---|---|
| 1 | 100 | 10 | 110 |
| 2 | 102 | 11.22 | 113.22 |
| 增长率：% | ·2 | — | 2.9 |

若未观察到经济的物价水平在年 1 中为已观察到经济物价水平的 50%，年 2 中为 49%，那么已观察到经济的通货膨

胀率10%，就相当于整个应税经济通货膨胀率为9.4%。此外，与有记录的通货膨胀率——1960至1970年为4.0%，1970至1978增至9.0%的增长速度相比，测度误差也不算严重。

若给定未观察到应税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则对通货膨胀及增长的测度误差较小。然而，未观察到的应税经济应当被认作比这里的测估更高些，发展速度也更快些，这样才可以部分解释70年代在瑞典出现的滞胀。

把分析扩大到经济的非税领域，则未观察到的经济与已观察到的经济相比就相当的大了。对已观察到的经济领域的测度，自然就为总体经济发展提供错误的信息情报。

在一项综合平衡瑞典已税和未税经济的模型中，汉森(Hansson)与斯图尔特(Stuart, 1982)模拟了一个模型，由于税款的增加已经使1965—1979年期间已税领域的年增长率降低了1.1—1.6个百分点，因而，税款的增加也被模拟为已经使未税领域的年增长率提高了0.4—0.5个百分点。鉴于它们是同等重要的领域，模拟的结果为，总体经济是以负0.4—0.6的百分点增长。这样在这些模拟中，总体经济与已税领域的增长率相差0.7—1.0个百分点。

## 效率影响

这一节讨论包括逃税子部门在内的未纳税部门的经济活动的效率影响。纳税部门中75%的边际税率，意味着已税生产的毛利润必须是不纳税部门毛利润的四倍，方可得到同样

的净利润。要使纳税与不纳税领域的平均净利润相等，就必然会因已税部门太少，而产生相当大的效率损失。不纳税部门生产费用较高，是由于为了使经济活动不超出本部门，需要承担高额的交易成本，并存在着小规模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而逃税的子部门则选择低水平的工艺技术以逃避侦查。加上非货币处罚、处罚的风险及"道德"成本。

由于未税部门生产的毛利润与纯利润间的差距过大，因此，相比之下，不纳税部门较已税部门的生产竞争更加激烈。

不纳税部门，包括逃税的子部门，不仅从纳税部门吸取资源，而且还在本领域内交换资源，从未税部门，例如闲暇处获得时间与精力。不纳税经济使交换双方获益，否则，这些劳务将耗费在家务中。例如，一个汽车修理工和一个油漆工交换劳务，相互修理汽车和粉刷房屋，他们就会相互得利，且不会使其他纳税人遭受损失。若两者中任何一方去纳税的劳务市场买这些劳务，那么不纳税部门就因不经济的行为或增加了另外的纳税人而产生效率亏损。

结论：由于从纳税部门汲取资源，不纳税部门涉及效率损失，又由于不纳税部门在本领域内汲取资源或从其他不纳税使用者处汲取资源，所以不纳税部门也涉及效率收益。

因此，对未观察到的经济领域进行效率影响的估值时，必须考虑从不同用途处汲取资源的程度。较小的交换收益且趋近均衡表明，不纳税部门的所有经济活动成比例地下降，涉及超过一定范围的净收益。不纳税部门的进一步收缩必须包括消除在很大程度上互利的劳务交换以及资源转向效益相同的纳税经济部门。

这项松散的讨论以及通过实例的解释表明，不纳税部门

中可能存在着一种有效的中间标准，它大到足以允许在该部门内进行最有利的交换，小到足以避免对来自纳税部门的资源进行不必要的再分配。

可以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来确定适当的逃税标准。该标准大到足以允许在该领域内进行最有效的交换，小到足以避免从纳税领域大量汲取不必要的资源。

上述结论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其目的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标准来修正税法与惩罚条例，打击这个层次上的逃税。

其次，以区别对待的政策获得效率。这就是修改税法与实行惩罚条例，重点针对可能从纳税部门汲取资源的经济活动，而对那些主要使用其他不纳税的时间与精力的逃税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例如：税法修订本的重点是针对制造业中的少报收入者，而不是靠临时看管孩子或给邻居搞些修理而得到的交换收入。

## 分配效应

包括逃税部分的人在内的不纳税部门同样影响各部门间的实际收入分配。逃税的存在，使实际收入在牺牲其他纳税人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对逃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商和消费者有利的再分配。

边际利益被以可能受罚、风险及道德成本形式出现的成本所抵销，而边际间利益则有相当大的再分配效应。在生产要素供给完全有弹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竞争性部门，税收逃避

的全部利益都通过更低的价格而扩展给消费者。更普遍地讲，不纳税部门无须纳税有利于该部门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人们。善长修理，管理者常比那些有一技之长，但只能用于纳税部门的人收益要高。逃税及更一般的不纳税经济活动也妨碍着政府根据记录收入进行的收入再分配的努力。

## 结　束　语

概言之，逃税及更一般的不纳税经济活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效率效应。因此产生的再分配效应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政府再分配政策的管制范围。

对逃税而言，这些结论以及逃税额较小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及大众传播媒介所示的极大逃税利益相比，效率效应和再分配效应都是很小的。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这种关注，即用逃税的大量个人收入，所涉及的赌博或风险因素与实际收入相同者其待遇也应相同的原则的冲突及对社会公平和谐的潜在挑战来进行解释。

将此观点扩大到包括整个地下经济时，这种更大规模的经济则可能含有更重大的效率与再分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未被统计和传统的经济分析所察觉。

**注　　释：**

① 参阅汉森(1980)。

② 比率税要求税率稍稍超过50%。

③ 参阅 Delorazoy (1980)、Isachsen and Storm (1980, 1981)。Klovland(1980)Magnusson(1980)Persson(1979)。

④ 原报告作者无法解释他的结果是怎样计算而来，结果为何不同这两个问题。

# 10

# 意大利的非法经济：研究结果概述

## 早期的历史

意大利对地下经济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一些劳动力市场研究者指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参与率迅速降低。在50年代末，官方统计的总参与率接近45%（这里指劳动力与人口总数之比），与大多数工业国家差不多。在60年代末这一比率降到39%，到70年代中期，就降至低于35%，远低于邻国比率，更不用提与法国、美国相比了。法国与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已增长，而且前十年的增长速度还相当高。于是就有这样的思路：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远未结束——最多只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其余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就业适龄人员具有各类地下职业，但由于害怕失去所从事的工作，因而声明自己不属于职业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意大利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局(ISTAT)通过劳动力季节性抽样(QSLT)所估计的参与率大大低估了职业人口的个人参与程度。根据观察，有些类型的工人(各年龄阶段的妇女、男女年轻人及老年人）参与率下降，而正处黄金时代的男性工人参与率并未下降。因此，随着总需求停止以六十年代初的速度增长，商业企业便根据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挑选工人，留下“强壮”者，而将较“瘦弱”者排除在外，与李嘉图（Ricar—dian）模型中的土地利用法颇为相似。接下来引起学者们关注的就是佛雷(Frey，1975a)在1975年发现与伦巴第（Lombardy）服装业有关的家庭就业活动骤增，而与此同时，记录的蓝领性就业却大量减少。

随后的多领域研究及区社抽样调查发现了不断增多的重要证据，在所有生产活动部门中，都存在着半隐蔽性劳动。①②

## 意大利非法经济简史

意大利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在战后的1962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已接近充分就业，工业工资增长比平均生产率的增长缓慢得多，投资高、出口部门的生产体系迅速扩大（尽管旨在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部门并非如此）。在1962年，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劳动市场的不断开放，工资开始迅速增长。紧接而来的利润下跌，迫使意大利制造业寻求新的控制成本战略。结果1963—1972年

期间的特征就是在工业方面大量努力节约劳动。劳动节约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集中使用劳动力中的“黄金年龄”男性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通过大量减少女工，进一步降低退休年龄，不雇佣非熟练的年轻工人而实现。其二为将不适用装配线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项目进行分散生产。建立行业车间，小规模的制造单位，更广泛地利用家庭就业，其目的都是恢复完全的劳动灵活性。在整个经济繁荣时期，主要劳动阶层之间大量和稳定的工资级差（男性与女性、熟练与非熟练）是意大利劳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60 年代中期，在工会要求平等的压力下，这种级差开始缩小，尽管平均生产率并未相应提高。相反，这些年来生产率的差异却越来越大。在城市与工业化地区对低成本住房、服务、及社会基础设施的要求迅速扩大时，1963—1964 年的经济衰退对建筑业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前十年建筑业的繁荣曾吸引了大批意大利南方地区的劳动力。处境更为不利的工人们开始怨声载道。尤其在妇女中，旷工与失望与日俱增，她们感到处理好工作与家务的关系越来越困难。有时，工会也默许这种旷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贫困生活和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的一种间接补偿。总而言之，“第二”劳动力（即妇女、青年和老年）单位成本增加，并开始超过了“强壮”劳动力的成本水平，因此损害了处在最弱边缘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60 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的“报复机会”成熟，官方控制的劳力市场的货币工资不能压低（实际工资仍低于所有其他邻国），因而一个并行的“非法”劳务市场开始得到发展。随着对其需求增加，非法劳动供给迅速增长，与被迫的停业相比，许多工人似乎更乐意接受这些不稳定的就业——尽管报酬低

于官方市场，但对时间的安排却更为灵活。能够选择使用非法劳动力的公司，无论是直接利用还是转手承包给小规模的生产者，都想尽量利用这种盛行态度。

在需求方，逃避工薪税提供了雇佣非法工人的刺激因素。其他成本节约动因包括：避免与工会签订合同、计件付酬及在工作时间与休息方面对劳动利用的高度灵活性。在供给方，隐瞒就业状态的动机相当强烈。最显而易见的是逃避所得税，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尤其对妇女，及对年轻人及老年人，对理解源源不断的非法劳动供给也同样重要。

## 劳动力市场探讨的基本框架

意大利对“非法”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通常框架可作如下描述：

Ⅰ．无职业的人口（意大利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局的定义）

（1）无法找到工作者，

（2）可利用非法活动者。

Ⅱ．失业(领取失业津贴)

（1）不工作者，

（2）在等待固定职业时，从事临时性的工作者。

Ⅲ．“合法”就业(具有社会保险保证金)

（1）只有一个职业者，

（2）从事多种职业者。

Ⅳ. 暗中就业的外国人(在适龄人员中)

在上述分类中，非法活动包括Ⅰ.2、Ⅱ.2、Ⅲ.2和Ⅳ等项；“非法活动”一词适用于任何超出社会保险制度所从事的职业及提供的服务；包括合法的雇主暗中支付超时工资或违反谈判协议、许多业余和临时职业（公司往往不对这类人员进行登记，以免同已经对它们有公开敌意的工会发生冲突）、私人服务、违法建筑活动以及未管制的学徒工作。因此，就性质来看，大部分所谓的非正当职业，其实就是未受到保护的，通常是极不不稳定的工作，不受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控制。

毫无疑问，非法经济的规模与劳动力利用的灵活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灵活性被定义为根据需要来调节劳动力规模的可能性。它依赖于某个具体国家劳动力市场及财政制度的机构性特点。在意大利，工薪税及间接费用等于在基础工资额上增加50—70%(比欧共体任何其他成员都高)。这一点就极大地刺激了雇佣方的逃税行为。③ 再则，适用于所有具有15人以上公司的劳动法规定，除非能够证明存在着“正当的理由”公司就不能中止工人的职位。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旨在保护职业稳定的正当理由，尽管都不如意大利严格。

## 从事多项职业

对 ISFOL-Doxa 调查中所进行严格的抽样研究，目的

在于测度意大利经济中从事多项职业的程度。据测，在1974年，正式雇员中有1，068，000人从事两个或更多的职业(即占合法劳动力的5.5%。加里诺(Gallino，1975)提供了同量的间接测估值。

众所周知，城市中从事多项职业者，多数都是在工作量一贯较轻的政府部门供职。正常的工作量一般是从早晨8时到下午2点，每周也不足30个有效工时。政府部门职员的收入往往低于同类私有部门的工资，因此，这是一种特别补偿。另外，在大工业区，工厂工人从事多项职业也非常普遍。

随后调查的目的是确证多种职业及多种职业持有者的定性特征，而不是完善整个测估。在都灵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90%的持有多种职业者是男性，其平均年龄大于持有多种职业的女性，文化水平也要低一些。从事多种职业看来是一种稳定活动(在过去四年中，80%的工人持有过一种以上的工作)。商业企业主要提供白领职位(簿记、销售、计算机操作、税收咨询)，家庭则需要个人服务、维修工作。对第二职业支付的时工资一般超官方税后时薪。

另一在极为不同社会背景下所作的调查是坎鲁洛和蒙坦拉里在1978年所作的调查。他们调查了1934个工人都是意大利中部四个村庄的村民。在被调查对象中，有14%的人持有不止一种的职业，有时两种职业都不是公开职业。在多种工作持有者中，41%的人为临时农民，20%的第二职业属于制造业部门，39%的为服务业。

## 制造部门的在家工作

佛雷(Frey)、利夫拉吉(Liuraghi)和德·桑蒂斯(De Santis, 1975)对意大利的非正当经济方面进行了基础研究，它清楚地显示了70年代初期，织袜、服装及纺织等部门的这些组织的形成。据他们测估，这些部门在家就业者超过了500,000人，且全为年龄在十几岁、二十出头及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她们大部分居住在比较富裕的农村，因此容易兼从事临时务农。

表10.1 制造业中在家工作情况一览表，1972—73

| 在家就业的工人数 | 产品 | 地区 |
|---|---|---|
| 480,000 | 袜子 | 艾米利亚、威尼托、托斯卡纳、马尔凯、普利亚 |
| 150,000 | 纺织品 | 皮德蒙特、托斯卡纳 |
| 150,000 | 鞋 | 威尼托、托斯卡纳 |
| 155,000 | 玩具 | 利古里亚、托斯卡纳 |
| 100,000 | 汽车附件 | 皮德蒙特、伦巴第 |
| 90,000 | 服装 | 托斯卡纳、艾米利亚、伦巴第、普利亚、拉克斯(Laxi) |
| 80,000 | 皮革制品 | 威尼托、托斯卡纳、拉齐奥、伦巴第 |
| 68,000 | 手套 | 坎帕尼亚 |
| 30,000 | 化妆品 | 西西里、卡拉布里亚 |
| 40,000 | 塑料制品 | 皮德蒙特、伦巴第、托斯卡纳 |

（续表）

| 在家就业的工人数 | 产品 | 地区 |
|---|---|---|
| 25,000 | 建筑材料 | 威尼托、翁布里亚、阿布鲁齐、西西里 |
| 20,000 | 电动机 | 伦巴第 |
| 15,000 | 自行车 | 伦巴第、马尔凯 |
| 15,000 | 玻璃 | 托斯卡纳 |
| 12,000 | 家具 | 托斯卡纳 |
| 170,000 | 马赛路 | 威尼托、伦巴第，拉齐奥 |
| 1,600,000 | 总计 | （于加工业） |

资料来源：S. 布鲁斯科 (S. Brusco) "Prima Note Per un Studio del Lavoro a Domicilio." 1973 年 4—6 月。

另一项对手工操作领域的早期研究是布鲁斯科(1975)进行的，他发现家庭工业也被广泛用于装配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这些工作由大量的非熟练女工完成，计件付酬。

在 70 年代的中期和末期，这一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目的为了发现正在形成的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组织。表10.1提供了 1972—73 年在加工领域在家工作人数的测估值。

## 非正当工作活动

对于非正当活动的各种测估值大多是根据劳动力季节性抽样调查结果作出的。在1978年进行的国家经济社会综合调查(CERES)中(1978)，人口是按性别、年龄及职业状况而划分的(表 10.2)。不同来源的分散信息通过适当的加权汇总在

一起，得出了由劳动力季节性抽样(QSLF)非法人口对照总数中从事非正当活动的比例测估值。

表10.2 国家经济社会综合调查对1977年非法劳力的测估

（单位：千人）

| 年龄档 | 男性 | 女性 | 合计 |
|---|---|---|---|
| 14—29岁 | 520 | 890 | 1410 |
| 30—49岁 | 0 | 600 | 600 |
| 50岁以上 | 450 | 810 | 1260 |
| 合计 | 970 | 2300 | 3270 |

CERES估计参与不正当活动的工人为327万意味着实际参与率为44.7%（而ISTAT前轮测估值为36.1%，后一轮为38.9%）。该项研究没有说明如何判断这些数字的统计意义。应该指出，表中计算的是工人人数，而不是职业，因此，统计中没有30—49岁的男性工人从事非法职业这个结果，只能说明那些专门从事非法职业者一个也未被发现。但是，许多失业者在寻找工作和领取失业津贴的同时也活跃在非正当职业领域。因此，1977年从事非法职业者肯定多于3,270,000人。蒂尼(Contini)孔蒂尼在1979年报告中对这一数字估计为410万，其中不包括农业部门的非法工作者（如表10.3所示)。这一数字同样也可能低估了非法活动的程度。例如70年代在意大利暗中工作的外国人——无论是季节性的还是长期的——都已迅速增多。由于缺少专门调查，对他们人数的测估至多只是理论上的猜测。④塞西斯(Censis)估计在1978年从事不正当职业的外国人为100万，集中在农业部门和家庭服务业方面。渔业与零售业中似乎以北非血统的工人为主，家庭服务业中则多数为索马里人（几

乎全是妇女)、拉丁美洲人及中美洲人。

大部分非正当活动对所要求的技术熟练程度一般都不很高。不过，在多种职业从事者中发现了一个重要例外。这些人往往都有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部门都很重要的专门技能。这个发现是与能得到的其他国家的资料相符的。

**表 10.3　70 年代中期非农业领域中的非法工作活动测估**

| | |
|---|---|
| 制造业 | 160 万 |
| 建筑业 | 60 万 |
| 另售和批发业 | 140 万 |
| 服务业(其他) | 100 万 |
| 合　计 | 460 万 |

资料来源：B. Contini, Lo Sviluppo di un Economia Parallela,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Milano (1979).

## 对不正当劳动供给测估的微观探讨

科隆比诺 (Colombino, 1978) 最先对用微观观察法测估的家庭所致劳动供给建立可测模型。德尔·博卡和图尔瓦尼 (Del Boca and Turvani, 1979)在 1979 年探讨了家庭在农村与城市背景下的不同作用及其与非法劳动供给的联系。在农村，所有成员都季节性地参与各种市场或非市场经济活动。"扩大了的"家庭最能满足以小型商业企业为基础的高度灵活的工业结构的需求。在城市，消费者选择与要求的范围要大些，但与此同时，都市化及工业化的发展混乱引起环境的外

在效应，提高商品市场与劳动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家庭作为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和提供单位。同样，对高度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需要，④也促使众多人去非法劳动力市场寻求职业，那里，灵活性为其行业准则。

## 非法经济的发展及决定因素

上述所有对意大利的研究，其目的都是为确定整个或部分重要非法经济部门的规模和具体说明其特性。孔蒂尼(Contini，1979，1981)对非正当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及其宏观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采用下列方程作为测估相关变量的基础。

$$FLT = OT + OA + U_1 + U_2 \qquad (10.1)$$

$FLT$ = 潜在劳动力

$OT$ = 部门性长期工业就业

$OA$ = 长期农业及服务业就业⑤

$U_1$ = 合法经济部门的失业

$U_2$ = 非法劳动力

潜在劳动力是根据1971与1975年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局进行的两个有关非劳动人口调查来测估的。⑥这里的 $U_2$ 是一个残余指标，它包括了大部分的非法劳动力，即所有部门的边际及非法工人，包括未充分就业者、季节工人、零工及未被官方算作劳动力的“泄了气的”适龄人口。这些官方不计入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与前面几类人员相重迭。

这些计算结果表明，1962年(在经济最繁荣时期) $U_2$ 至少达160万，在1972年增加一倍多，达380万，接着就随总体上升趋势而大幅度波动，虽然上升趋势的速度减慢，这与70年代末非法就业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16—18%是一致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frac{U_2}{FLT}=f(a、c、e)\quad 这里\ c=\frac{W}{\pi}\qquad(10.2)$$

方程式(10.2)是表示小规模开放经济中非法就业比例决定因素的一种简单归纳形式。供给方一个结构上的因素，即农业人口外流 $a$，这在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尽管非农业部门存在着不确定性。需求方的周期性决定因素为"合法"经济中的单位劳动成本 $c$，$c$ 定义为货币工资与用实际条件表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 $\pi$ 之比(短期内的外因)。$c$ 一提高，经济社会就会把供给从合法部门转向非法生产领域。第三个变量是意大利里拉与欧洲美元的总换率 $e$，其含义为，与决定意大利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关的劳动成本应该用一般用以计算契约金额的那种货币来表示，这个模型要求明确测度单位。成本差异，但又找不到可信赖数据。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假设，合法工资远高于非法市场的工资，并且上涨速度也更快。根据1965—77年期间的季度性数据进行测估，得出下列等式(括号内为 $t$ 比率)：

$$\frac{U_2}{FLT}=35.04-0.0035a+0.022c-0.016e-1$$
$$(8.11)\quad(2.81)\quad(3.67)$$
$$(R^2=0.89,\ DW=2.36)$$

农业人口的流失，$a$，说明了 $U_2/FLT$ 变动的55%的原因。其余的则是由单位劳动成本及汇率造成的，确证了浮动

汇率内含的贬值使其单位劳动成本低于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单位劳动成本。单位劳动成本与汇率的替代弹性大约为－2。因此，$a$不变，那么，非法经济的增长率将稳定在1978年的水平上（16.8%），如果单位产量的劳动成本10%的年增长率，被里拉对欧洲美元贬值5%所抵销。

## 小规模工业和非正当劳动的利用

对西方世界地下经济的许多研究文献都表明，隐藏活动主要发生在服务业与房屋维修业。在意大利，制造业中也存在着地下经济。意大利的情况因此而与经验相违背吗？已知包括大量非正当活动的各个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消费品范围很广。所有生产劳动密集程度都很高，规模经济不起主要作用，技术本身就简单地导致计件付酬。此外，与其他制造业部门相比，这些部门的企业规模一般都较小，这就容易隐蔽，工会控制也更松。

这里还有一种解释。大规模的生产常常分成各自独立的生产过程，在技术或者所需劳动密集程度上都不大相同。高度劳动密集的工序可以有利地转包给那些有办法获得廉价劳动的公司。到现在，意大利地下经济中也已有相当多的这类公司，它们已承担了替代更为著名的国际转包公司或成为其子公司的作用。因此，分散生产，转包给小规模公司似乎成了70年代意大利制造业的显著特点。直接利用非法劳动力仅限于小型或极小型企业，而间接利用则涉及到每一个人。

大公司转包给小公司，小公司又转包给更小的公司，直至转包到家庭作坊。因此，人们希望找出小公司与大公司之间行为上的差别——并且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前者几乎能自由地进入非法职业市场。几个中小型企业反映指标确实是表明这一趋势(孔蒂尼，1981)。在1968—73年期间，各个制造业部门都增加了固定资产，小企业尤甚。此外，小企业减少了就业人数，而大企业则增加了就业人数。当然这里的就业人数系指合法就业，它暗示了小型企业主大量地用地下工人来替代合法雇佣工人。在较大的企业中，工会阻止了此类事情的发生。最后，在70年代中期，小企业增值毛利润(税前)份额要比大企业大得多。其他的研究也表明了同一趋势。布鲁斯科(Brusco，1975，1979)对几种工业(服装、袜、制砖业）不同生产阶段和家庭制作活动一直很盛行的地区的成本曲线进行了测估。他发现当虽然那些机器设备及车间布局过时的企业也有规模经济，但其影响远不如那些投资于新技术并据其改进了组织结构的企业那样大。因此，进行分散生产可能不会损失规模经济。另外，还有使用极为灵活的劳动，带来的成本节省。在发生上述情况的地方，小型制造企业的发展迅速，但在家就业似乎呈下降趋势。

## 不正当经济的意大利定义及其他定义比较

如在本文所看到的，意大利研究者们所指的“不正当经济”的定义比其他偶尔提到其他定义范围更窄。下面根据活

动类型的分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a. 家庭生产和非市场活动

b. 非法工业活动

c. 外国人及未成年者暗中从事的工作

d. 犯罪活动

前三类属以非法形式从事合法活动，后一类为非法活动。该分类把犯罪活动（即：毒品走私、吸毒、赌博、卖淫、行贿、以合法方式掩饰的偷盗的钱物）与所有其他合法但可能违反财政和劳动立法的活动区分开来。意大利劳动市场的研究对象 b、c 类活动，这些活动很容易受到劳动法及财政刺激的影响。广义的地下（隐藏）经济包括上述四类活动。

## 对不正常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测估

意大利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说明非法劳动力的发展，而不是力图测估非法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比例。对于许多劳力市场作为地下活动主要指标的研究者来说，有一种普遍采用的测定整个经济活动中非法收入比例的自然方法。给定地下工人人数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一旦对工人人数的测估被转变为非法职业数量的测估，便可以得出非法收入的测估。使用此法进行的极为保守的测估（孔蒂尼，1979）估计出非法国民生产总值（Irregular GNP）约为1977年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的7.5%，同年，意大利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局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测估进行了重要修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

考虑未申报的活动。对于现有指标的修正标准是双重的：

a. 增加就业数据来说明各个部门的非法、未申报的职业和。

b. 更新对于少于 20 个雇员、属于 1967 年小工业企业调查范围的公司所创造的人均增值的测估。

表 10.4 表明了测估方法改进后，国内生产总值测估所产生的较大变化。1976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调了 8.9%，1977 年上调了 9.8%。77 年以后，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变动都与 77 年的修订数字有关。

**表 10.4 新旧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
**(1977 年 IsTAT 修正以后)**

| | 通用里拉(十亿) | | | 百分比变量 | | |
|---|---|---|---|---|---|---|
| | 1975 | 1976 | 1977 | 1975 | 1976 | 1977 |
| 农业 | — | 18 | 305 | — | +0.2 | +2.3 |
| 工业 | 5,324 | 6,760 | 9,069 | +11.1 | +11.0 | +12.4 |
| 能源 | 5 | -21 | 119 | +0.1 | -0.3 | +1.3 |
| 加工制造 | 4,650 | 5.987 | 7,808 | +14.3 | +13.7 | +15.3 |
| 建筑 | 699 | 794 | 1,142 | +7.2 | +7.2 | +8.6 |
| 私人服务业 | 2,530 | 3,132 | 3,878 | +5.3 | +5.4 | +5.6 |
| 贸易和旅馆服务 | 2,321 | 3,092 | 4,084 | +14.0 | +15.1 | +16.6 |
| 交通运输 | 750 | 559 | 851 | +12.1 | +7.1 | +8.7 |
| 其他、银行与保险业 | -541 | -519 | -1,057 | -2.2 | -1.8 | -3.0 |
| 公共服务业 | 2,425 | 2,899 | 3,552 | +19.3 | +18.7 | +18.7 |
| GDP 合计 | 10,306 | 12,808 | 16,990 | +9.0 | +8.9 | +9.8 |

人们普遍认为经过1977年的重要修正，意大利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已走上正轨。根据布莱兹(Blades,1982)的研究，意大利国民核算包括未申报活动的比例比其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高。据测估，由于未申报合法经济的活动，导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低估为 6%(法伊格，1979)。

另外还有阿尔瓦罗(Alraro, 1979)与福特(Forte, 1979)的间接测估，前者认为未申报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为14%，后者认为除了15%的测估比例外，还应再加上7%的住宅收入，这些测估还包括专业人员、收入足以维持生计的人员、以及店员的未申报收入。对劳动市场的研究未将此纳入考虑范围。

萨巴(Saba, 1980)的报告是唯一的一个根据C/D不成熟的看法而作的。它的数据高于其他研究的数据是不足为怪的。1968—1978年期间正常国民年平均增长率为16.7%，而非正常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0.8%。因此，到1978年底，非正常国民总值所占的份额估计超过了官方报道的30%，而在1968年该比例还不足10%。

## 意大利当代研究的概述

总结意大利过去与现在对非法经济的研究，可能会注意到下列现象。在对具体工业部门的几次大规模调查中，仅有一部分建立在严谨抽样统计的基础上。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区域研究与社区调查不断增多。这为我们洞察当地情况提供了大量信息，但从几乎不能得出普遍结论和对基本人口参数进行推理这一统计学观点来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几位作者已打算参照现有劳动力及从事地下活动比例的统计指标核查区域及社区研究的结果，其目的是找出官方统计数据与其他研究成果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有些成功地完善了现有测估，另一些则设法用令人更为满意的宏观理论来说明现

在的发展。意大利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局对非职业人口进行了两项专门调查，两者都进一步肯定了实际参与率高于劳动季节性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给1977年开始季节性调查的新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调查最主要的目的是找出以前未发现的活动。这个新计划的调查表明，1977年的平均参与率为38%，而不是以前的35.9%，这似乎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尽管许多人认为其低估程度仍相当大。

注　释：

① 历史上并没有强调，对于更多地发现地下工人利用方式的兴趣，直接产生于许多左派青年学者的政治困扰，他们迫切希望了解经济制度是否和怎样对由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作出反应的。

② 参阅贝尔贡齐尼(Bergonzini, 1973)；克雷斯皮(Crespi)和塞加托里(Segatori)(1976)；布鲁斯科(Brusco, 1975)；卡努洛和蒙塔纳里(Canullo, Montanari, 1978)；科穆内·迪·莫代纳(Comunedi Modena, 1978)；及佛雷(Frey, 1975b)。

③ 工薪税是社会保证制度的主要财政来源。尽管意大利采用了明显的累进所得税制，但源于直接税收的财政收入还是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其原因就在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逃避所得税。

④ 内务部偶尔公布允许外国人暂时居住的资料。

⑤ 整个1974年有关“长期就业”的官方数据都能得到。“长期”的意思是一个星期工作超过32个小时。1975—1977年的数据都已测估。

⑥ 这些调查的目的是完善非就业人口的定义，以及建立发现这些人口的手段。1977年再次进行了这种调查，成为重新制订目前国民收入与产品统计所用的调查表的基础。

# 11

# 挪威的地下经济

考察地下经济，必须要有可行的地下经济定义。法伊格将此定义为"现行社会经济管理技术测度未申报的(那些)经济活动"；坦斯(Tanzi)认为，地下经济就是"未申报和(或)申报不足而官方统计数字未加反映的国民总产品；麦卡菲(Macafee)还提出了第三种定义。

从这些定义可见，运用不同方法评估地下经济，其内容往往各异。根据货币储备构成发展情况所作的估计，就不能包括易货交换部分；国家税务局进行的分析，侧重于逃税行为的未报收入；而国民生产总值收入概念比应税收入概念更广。然而，缺乏通行而实用的地下经济定义不应阻止研究人员测量地下经济的各个方面。须知，不同的考察方法，大多能够分析不同的未注册活动。

我们试图用微观和宏观两种方法考察挪威的地下经济。从1980年9月的调查研究为依据的微观方法，颇为新颖；宏观分析仍基于传统方法，因为它侧重考察现金存量的增长。

微观方法只考察与劳动有关的未注册收

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搜集资料，以求验证地下经济中与边际税收效应、罚金缴纳、可探明程度和劳动供给人口因素有关的诸种假说。

## 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

阿林汉玛和桑姆（Sandm Allghama）在1972年建立了一个模型，把税收申报问题作为不确定性下的关键问题。由于忽略了劳动供给决策，他们就能集中考察有价证券投资组合方面。在此框架内，只要纳税人规避风险，平均税率的变动就会产生传统的收入和反向替代效应。可稽查性和罚金率的变化都会产生具有明显迹象的替代效应。

一旦将阿林汉玛——桑姆模型扩展到劳动力供给方面，所有派生出来的局部性问题就要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伊萨克森（Jsa-chsen）和斯托姆（Strom）指出，如果假定一种会导致工时总供给刚性的特定效函授，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尽管理论成果与日俱增，但几乎没有人试图从经验方面进行考察，在地下经济中，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当事人的行为。正如彭凯沃尔（Pen Cavel）所说，“可见，这些文献急需注入经验分析，用实际行为检验这些假设，并消除其中的含糊暧昧之词。”

缺少相关数据显然是个难题。在完成了包含45个问题的877份问卷之后，我们便获得了能够用观察到的行为检验理论的科学性的数据。

首先必须郑重指出，不可过分相信文中结论，因为对隐含假设的检验可能导致一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结论。

## 宏观(模型)探讨

我们将用宏观模型简要地估计一下地下经济的规模。这些描述是以克朗夫兰德和伊萨克森(Klovland，Isachsen)以及斯托姆的估计为基础的，只有少量但是重要的变化。假定更高的税率会加剧逃税，而逃税加剧又增加现金需求，估计方法就以现金需求为基础。在第三部分所讨论的调查研究结果证明了后一假设。

以下是若干必要的定义：

$C$：公众所持有的货币

$p$：价格指数

$y$：实际$GDP$

$i$：定期存款利率

$\pi$：通货膨胀率

$CON/y$：个人消费占$GDP$的比率

$t$：总边际税率

$Q$：存量调整参数，$0 \leqslant Q \leqslant 1$

模型可以表示为

$$\ln C - \ln C - 1 = Q(\ln^* - \ln^c - 1) \qquad (11.1)$$

其中$C^*$表示对现金的长期需求；

公式 $$\ln\frac{C^*}{p} = a_0 + a_1\ln y + a_{2i} + a_3\pi$$

$$+ a_4\frac{CON}{y} + ast \qquad (11.2)$$

预计式中系数符号为：$x_1>0$，$x_2<0$，$x_3<0$，$>0$，$x_5>0$。这些系数是不考虑它们同时并存的情况而根据单一方程式：(Single—equation) 测定的。由于高税率的逃税效应是延时的，所以用了第四级阿蒙 (Almon lag) 滞后的税收变量。与税收变量$x_5$相关的变量是一些滞后变量的总和。所使用的年度资料包括 1952 年到 1979 年这一时期。

估计给出如下结果(括号中的为 $t$ 值)：

$$\ln\frac{C}{P} = \underset{(3.65)}{-1.250} + \underset{(3.41)}{0.309\ln Y} - \underset{(2.54)}{0.024i} + \underset{(0.03)}{0.003\pi}$$

$$+ \underset{(1.44)}{0.001}\frac{CON}{Y} + 0.007t + 0.534\ln\frac{C_{-1}}{P} \qquad (11.3)$$

除了涉及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之外，所有的测估参数都是预期的符号。

为了继续评估地下经济的规模，我们将 11.3 式改写成：

$$\ln C = \ln P + \hat{a}Z + \hat{a}_5 t \qquad (11.4)$$

其中 $XZ$ 包括 $X$ 和税率以外的其他变量。这里 $\hat{2}$ 和 $\hat{25}$ 均系估计值。

那么，在时间 $\tau$ 的预期现金持有量为

$$\hat{C}_\tau = \exp(\ln P_\tau + \hat{a}Z_\tau + \hat{a}_\tau t_\tau) \qquad (11.5)$$

为了成功地测估地下经济的规模，我们以 1952 年作为基期年份。所以，如果税率仍然保持 1952 年的水平，现金持有量的预期值就会是

$$\hat{C}_{52,\tau} = \exp(\ln P_\tau + \hat{a}\hat{Z}_\tau + \hat{a}_5 t_{52}) \qquad (11.6)$$

那么，差额 $\Delta C_\tau = \hat{C}_\tau - \hat{C}_{52\tau}$ 就是基于1952年的正常现金量的基础上属于逃税部分现金的增量。我们再假定，1952年或此前若干年内未曾发生逃税行为。那么差额 $\Delta\hat{C}_\tau$ 就是 $\tau$ 期地下经济中流通的现金量的测估值。如果引入假定的外生变量，我们就可以得到当 $\tau = 1978$ 时的估计值：

$$\Delta^C 1978 = 29 \text{亿(克朗)} \tag{11.7}$$

为了完成这一评估，我们需要估计现金收入流通速度。由于挪威银行运行体制的作用，流转平衡一直扩大到包括部分定期存款。因此，运用 $M_1$ 的交易平衡包括总通货、普通支票帐户、工资帐户、邮政储蓄和估计为10%的定期存款。根据坦斯和其他人的分析，我们认为，地下经济中现金收入流通速度等于合法经济部门 $M_1$ 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我们得到1978年的周转率为：

$$V_{1.78} = \frac{Y_{78}}{M1_{78} - \Delta C_{78}} = 5.0 \tag{11.8}$$

其中 $V_{1.78}$ 为周转率，$Y_{78}$ 是1978年官方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M1_{78}$ 是1978年 $M_1$ 货币量(包括如前所述的定期存款)，而 $\Delta C_{78}$ 为(11.7)的估测值。

如果 $Y^b_{78}$ 表示黑市经济在1978年所创的GDP，那么，

$$Y^b_{78} = V\Delta C = 5.0 \times 2.9 = 145 \text{亿(克朗)} \tag{11.9}$$

$$\frac{Y^b_{78}}{Y_{78}} = 0.063 \tag{11.10}$$

或者说，在1978年地下经济占挪威合法经济部门的GDP的6.3%。

必须指出，该估计值包括各类逃税活动。在下一节，我们将测估与未申报劳动收入有关的收入。

## 调查研究的主要结果

该调查是在1980年9月，由一专门的私人民意测验机构（Gallup Institufe）进行的。在轮回调查中，调查者要求接到有关地下劳动市场问卷的人在一周内填好寄回。在受到调查的1198人中，接受问卷的人有958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80%，其中877人在随后的两周按要求填写并寄回了问卷，占总受询的人数的73%。在不愿接受问卷的240人中，大多数为65岁以上的人。对一些回答结果，我们据这一偏差对样本结果采取了适当的加权纠正。定期访问搜集到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性别、年龄、婚姻、社会地位、居住状况和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情况。有81人开始愿意参加调查，但后来没有寄回问卷，所以我们没有有关他们的资料。

和全国人口相比，我们877人的最终样本只代表25—39岁这个年龄档次的男人反映的情况。

在陈述主要调查结果之前，对调查方法进一步加以评述是适宜的。在我们进行调查几个月之前，Verdenr Gang 报道了另一民意测验机构关于地下经济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涉及1002名对象，采取面询形式。两次调查，对被调查对象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是否参加地下劳动市场的调查结果见表11.1。① 由表11.1可见，在直接面询过程中，人们更不愿意提供有关参与地下劳动市场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公开承认从事未申报交易的活动比填问卷更难。假如一个人基本能肯定

**表 11.1　地下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过去 12 个月内)**
**占样本数的百分比**

| | | |
|---|---|---|
| 1. 在地下市场的工作量 | 20 | 16 |
| 2. 地下市场支付的劳动报酬 | 29 | 16 |
| 3. 已工作和已支付量 | 9 | 6 |
| 4. 地下劳动力市场的参与<br>(行 1 + 行 2 − 行 3) | 40 | 26 |

注意：VG 调查中的资料并没有根据年龄和性别进行加权计算。为进行恰当的比较，我们的结果是未加权结果。这两个结果是在 1980 年调查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

受到某种匿名形式的保护，那么把一些查对符号填入问卷的相应栏内，就会更自在一些。

不管怎样，似乎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低估了地下劳动市场的规模。掌握低报程度的途径在于占有样本于集中地下经济活动的翔实资料，并将之与先前问卷所得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勿庸讳言，在分析问题的现阶段，这种方法颇为急需但却没有可行性。

表 11.1 揭示的差别提醒我们，一旦触及地下经济这种带敏感性的问题，阐述调查结果，就包含着不确定性。兹将调查的主要结果归纳如下(必须注意，为了正确表示样本性质，估计值都经过调整。)：

1. 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有 18% 的 15 岁以上的人承认有地下劳动收入，而 26% 的人说他们支付过地下劳动报酬。从买卖双方来看，在先前的一年中，共有 37.5% 的人参与了地下劳动市场活动。37.5% 是调查后的估计值，而表 11.1 中 40% 的估计值，直接来自问卷答案，未经调整。

2. 有40%的接受调查者回答，他们曾经在地下经济中劳动一次以上。

3. 65%的人回答，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参与地下经济活动。

4. 男女劳动时间的长短随年龄而下降。从需求方面看，性别不同，方式就不同。对非正常劳务需求最大的是25—54岁之间的男性。对女性来说，需求最大的有25—39岁以及55岁以上两个年龄档次。

5. 对劳动市场的劳务需求随受教育年限而递增；地下劳动市场的劳务供给，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先增后减。

6. 从市场上工资额和地下经济中的劳动时数看，地下劳动市场的规模估计为55亿克朗，占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如果我们根据应询者所提供的所谓其"邻居"参与黑市活动的情况进行估计，该估计值就上升为3.5%。

7. 地下劳务的买者一般对该劳务的素质及其供给状况都颇为满意。

8. 一般认为，地下劳动市场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

9. 在最近10年内，相对其他年龄档次的人而言，年轻人的地下经济参与率呈增长趋势。

10.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大约80%的地下劳务是用现金支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关于宏观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地下经济部门的运动是靠现金支撑着的。

## 逃税者行为：若干经验分析

在调查中，要求应询者估计自己的边际税率；罚款率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还回答他们上年的毛收入和纯收入，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实际”边际税率与其想象的边际税率进行比较。可以把罚款率的回答与实际规则进行比较，把可稽查的测估值与我们所作的更严谨的预测进行比较。这样比较的结果表明，对边际税率的估计过高，但估计值与实际边际税率的误差，随收入增长而减少，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的人们对于被稽查的可能度和罚款率也估计过高。消除这三种误差以后，净值相当于低收入的人们选择的最佳逃税率水平。

调查中获得的答案，可作为各参数的观察值。因种种原因，答案或许不能提供所需信息。首先，我们对答案的解释可能有误；其次，应询者可能隐瞒真相；最后，如前所述，他们的估计值可能与实际值不符。然而，对个人所为而言，重要的是感觉，而非现实。

调查包括人口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若干问题。以下是我们从一些返回的问卷中抽象出来的结论。在所有问题中，使用了相同的独立变量。独立变量分为以下六类：

1．经济变量。经济变量包括考虑到可变劳动供给而扩展的逃税经济理论所提出的各种变量。因此，边际工资收入［即小时工资率 $w$(1－边际税率)］是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引

入工资率和税率两个不同的变量。地下劳动市场的工资率也与扣除的罚金单独发生联系。可探明程度也单独作为一个变量。②最后，我们还采用了基于应询者参加抽彩、足球打赌、纸牌和赛马等所确立的投机指标。假定逃税是源于应税人的冒险偏好和打赌偏好。当然，对逃税与投机赌博之间的关系也有其他解释。通过参与赌博，未申报收入就能被掩饰起来。也就是说，用于官办足球打赌的未申报收入可能获得免税并合法的奖励。此外，无固定职业者可以将其空闲时间用于打赌和参与地下劳动市场的短期就业。

2．人口统计因素。人口因素可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40 岁以下，有子女和无子女的未婚者。

40 岁以下，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已婚者。

40 岁以上者。

3．居住地点。具体有三类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城市和乡村地区。

4．居室种类。农房、单一套房、半独立式住房、公寓、寄居和其他。

5．教育。7～9 年教育，10～12 年教育，大学。

6．职业。具体有 18 种不同职业，表 11.2 和 11.3 作了准确说明。

在调查中，提出了如下三类问题：

1．如果有机会，你会逃税吗？（有机会就逃税）

2．你曾经至少逃过一次税吗？（逃过一次）

3．你在最近 12 个月得到过地下劳动收入吗？（去年）

如果答是，答案值为 1，如果答否，其值为 0。所以，因变量是二维的，而自变量又是连续或多元的。二元和多元变

**表11.2 调查结果，男性倾向性 I——III**

| | 有机会就愿意干 (Ⅰ) | | 过去曾经干过一次 (Ⅱ) | | 去 非 (Ⅲ) | |
|---|---|---|---|---|---|---|
|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 A | | | | | | |
| 固定期限 | 0.788 | 0 | 0.206 | 0.24 | -0.019 | 0.90 |
| 边际税合合法工资率 | -0.003 | 0.20 | -0.002 | 0.45 | -0.003 | 0.35 |
| 非法工资率 | 0.001 | 0.43 | 0.003 | 0.01 | 0.001 | 0.15 |
| 缴纳罚金后的非法工资率 | -0.001 | 0.49 | -0.002 | 0.36 | 0.001 | 0.47 |
| 可稽查程度(概率) | -0.579 | 0 | -0.624 | 0 | -0.406 | 0 |
| 投机系数 | 0.027 | 0.22 | 0.062 | 0.02 | 0.028 | 0.24 |
| B | | | | | | |
| 40岁以下，未婚 | 0.226 | 0.01 | 0.257 | 0.01 | 0.282 | 0 |
| 40岁以下，已婚无子女 | 0.228 | 0.02 | 0.147 | 0.20 | 0.257 | 0.01 |
| 40岁以下，已婚有子女 | 0.144 | 0.03 | 0.112 | 0.15 | 0.105 | 0.14 |
| 40岁以上，未婚 | 0.180 | 0.19 | 0.219 | 0.18 | 0.146 | 0.33 |
| 40岁以上，已婚有子女 | 0.147 | 0.03 | 0.073 | 0.36 | -0.006 | 0.94 |
| C | | | | | | |
| 城　市 | 0.077 | 0.13 | 0.020 | 0.74 | 0.140 | 0.01 |
| 乡　村 | 0.010 | 0.88 | 0.138 | 0.08 | 0.117 | 0.10 |
| D | | | | | | |
| 农场住户 | 0.192 | 0.16 | 0.208 | 0.51 | 0.119 | 0.43 |
| 半独立式住户 | -0.018 | 0.82 | 0.061 | 0.50 | 0.131 | 0.12 |
| 公寓住户 | -0.044 | 0.55 | -0.004 | 0.96 | 0.016 | 0.84 |
| 临时住户 | 0.056 | 0.72 | 0.127 | 0.49 | 0.082 | 0.62 |
| 其他居民 | -0.374 | 0.04 | -0.188 | 0.38 | 0.036 | 0.85 |

(续表 11.2)

| | 有机会就愿意干（Ⅰ） | | 过去曾经干过一次（Ⅱ） | | 去年（Ⅲ） | |
|---|---|---|---|---|---|---|
|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 E | | | | | | |
| 受过 7—9 年教育者 | 0.003 | 0.97 | 0.048 | 0.51 | 0.083 | 0.20 |
| 受过 10—12 年教育者 | 0.051 | 0.45 | 0.119 | 0.15 | 0.104 | 0.10 |
| 大学程度者 | -0.129 | 0.12 | -0.089 | 0.36 | -0.138 | 0.12 |
| F | | | | | | |
| 教　　师 | 0.103 | 0.32 | 0.279 | 0.04 | 0.122 | 0.23 |
| 官员、秘书 | 0.230 | 0.10 | | | 0.078 | 0.59 |
| 管理人员、推销员、会计 | 0.065 | 0.41 | 0.224 | 0.06 | | |
| 薪水阶层 | 0.101 | 0.37 | — | — | -0.088 | 0.47 |
| 保姆、房屋清洁工 | 0.198 | 0.48 | -0.024 | 0.94 | 0.213 | 0.49 |
| 制造业、建筑业工人 | 0.037 | 0.62 | 0.233 | 0.03 | 0.108 | 0.15 |
| 农　　业 | 0.087 | 0.55 | 0.272 | 0.14 | 0.344 | 0.03 |
| 公共关系、等 | -0.318 | 0.03 | -0.125 | 0.48 | -0.154 | 0.29 |
| 手艺人 | | | 0.285 | 0.01 | 0.300 | 0 |
| 司机 | -0.020 | 0.86 | 0.188 | 0.55 | 0.199 | 0.10 |
| 工程师、机械师 | 0.233 | 0.06 | 0.299 | 0.05 | 0.276 | 0.03 |
| 律师、医生 | -0.129 | 0.46 | 0.133 | 0.29 | 0.133 | 0.47 |
| 其他职业 | 0.006 | 0.95 | 0.193 | 0.10 | 0.147 | 0.09 |
| 学生、未成年者 | -0.196 | 0.22 | 0.172 | 0.39 | 0.049 | 0.78 |
| 没有正当职业者 | 0.644 | 0.61 | 0.291 | 0.20 | 0.022 | 0.91 |

表 11.3　调查结果，女性倾向性

| | 有机会就愿意干（Ⅰ） | | 过去曾干过一次（Ⅱ） | | 去年（Ⅲ） | |
|---|---|---|---|---|---|---|
|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 A | | | | | | |
| 固定期限 | 0.481 | 0.02 | -0.064 | 0.78 | -0.354 | 0.02 |
| 边际税后合法工资率 | 0.007 | 0.08 | 0.002 | 0.69 | 0.006 | 0.04 |
| 非法工资率 | -0.001 | 0.56 | 0.001 | 0.66 | 0.002 | 0.07 |
| 缴纳罚金后的非法工资率 | -0.003 | 0.31 | 0.001 | 0.77 | 0.001 | 0.85 |
| 稽查的可能性(概率) | -0.767 | 0 | -0.286 | 0.04 | -0.110 | 0.23 |
| 投机系数 | 0.090 | 0.01 | 0.081 | 0.02 | 0.042 | 0.07 |
| B | | | | | | |
| 40 岁之下，未婚无子女 | 0.146 | 0.40 | 0.261 | 0.15 | 0.311 | 0.01 |
| 40 岁之下，未婚有子女 | 0.141 | 0.46 | 0.355 | 0.06 | 0.358 | 0 |
| 40 岁之下，已婚无子女 | 0.079 | 0.60 | 0.153 | 0.34 | 0.109 | 0.28 |
| 40 岁之下，已婚有一小孩 | 0.222 | 0.12 | 0.183 | 0.23 | 0.019 | 0.85 |
| 40 岁之下，已婚有一个以上小孩 | 0.097 | 0.45 | 0.209 | 0.11 | 0.133 | 0.12 |
| 40 岁以上，未婚 | -0.010 | 0.60 | 0.561 | 0.05 | 0.055 | 0.65 |
| 40 岁以上，已婚有子女 | 0.025 | 0.80 | 0.041 | 0.80 | 0.120 | 0.23 |
| C | | | | | | |
| 城市 | -0.053 | 0.50 | -0.026 | 0.75 | 0.018 | 0.73 |
| 乡村 | 0.057 | 0.56 | 0.008 | 0.93 | 0.126 | 0.06 |

(续表 11.3)

| | 有机会就愿意干 (Ⅰ) | | 过去曾经过一次 (Ⅱ) | | 去年 | |
|---|---|---|---|---|---|---|
|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测估到的参数 | 显著程度 |
| D | | | | | | |
| 农场住户 | -0.523 | 0.01 | -0.330 | 0.09 | -0.146 | 0.27 |
| [illegible]住户 | -0.011 | 0.93 | -0.042 | 0.72 | 0.044 | 0.56 |
| 公寓住户 | 0.111 | 0.36 | -0.033 | 0.79 | 0.074 | 0.37 |
| 临时住户 | 0.033 | 0.90 | -0.279 | 0.31 | -0.143 | 0.44 |
| 其他居民 | 0.217 | 0.57 | 0.048 | 0.90 | 0.116 | 0.65 |
| E | | | | | | |
| —9年教育程度者 | 0.056 | -0.54 | 0.037 | 0.69 | 0.020 | 0.74 |
| 0—12年教育程度者 | 0.001 | 0.99 | -0.025 | 0.81 | -0.011 | 0.87 |
| 大学教育程度者 | -0.055 | 0.69 | -0.050 | 0.72 | -0.086 | 0.35 |
| F | | | | | | |
| 教师 | -0.076 | 0.63 | 0.152 | 0.33 | -0.019 | 0.87 |
| 官员、秘书 | 0.118 | 0.31 | Reference group | Reference group | -0.020 | 0.80 |
| 管理人员、推销员、会计 | 0.343 | 0.02 | 0.153 | 0.46 | 0.127 | 0.37 |
| 薪水阶层 | 0.068 | 0.55 | 0.125 | 0.30 | Reference group | Reference group |
| 家庭清洁工、保姆 | 0.248 | 0.05 | 0.241 | 0.05 | 0.158 | 0.06 |
| 制造业工人 | 0.014 | 0.94 | 0.208 | 0.26 | | |
| 清洁工 | 0.222 | 0.18 | -0.010 | 0.95 | -0.030 | 0.79 |
| 护士 | Reference group | Reference group | 0.014 | 0.90 | 0.014 | 0.86 |
| 其他职业者 | 0.144 | 0.33 | 0.262 | 0.08 | 0.053 | 0.59 |
| 学生、未成年者 | 0.391 | 0.42 | 0.650 | 0.19 | 0.659 | 0.05 |

量的存在表明，逻辑（logit）方法是一种合理的估计方法。然而，人们未采用这种方法，而应用更粗糙、更简单的线性回归方法和虚构变量来表示2—7这几个绝对变量。I—Ⅲ类自变量的估计值在0和1之间变动，也可视为参与不同种类地下经济的频率测估值。为了说明应怎样解释阐述表11.2和11.3，现兹举一例。如果可探明的主观概率从0.1上升为0.2，变量值I就从0.5下降为0.46。因此，"如果有机会就逃税"的频率估计会下降4个百分点，从0.5降至0.46。

回归结果由表11.2和11.3所示。我们将男性（表11.2）和女性（表11.3）分别列表，因为他们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明显不同。

在B类，以40岁以上无子女的已婚者作参考系；

在C类，以人烟稀少区作参考系；

在D类，以单一套房作参考系；

在E类，以7—9年教育作参考系；

在F类，参考系因情形不同而各异。

很显然，发现概率对男性的所有三种频率，对女性的前两种频率都有强烈影响。因此，对（违背税法的）经济活动加强监督，给人留下发现概率很高的印象，是抑制地下劳动市场扩张的有效途径。

对男性而言，工资率、边际税率以及罚金等具有直观期望的迹象，甚至其中一些偏离0达到（可接受的有效水平（0.05—0.1）。必须强调指出，只有极少几种同零偏差较大的系数与允许劳动力供给变动的理论相一致。如前所述，理论并不能像描述局部派生现象那样给我们以肯定的回答。

40岁以下，尤其未婚者的人口统计因素似乎对男性从事

地下劳动的偏好具有强烈影响。当达到根据经验得出的频率时（Ⅱ 和 Ⅲ），就进一步证实了对男性工匠和技师过度描述的期望值。对女性来说，赌博投机系数在希望参与地下劳动市场（Ⅰ）和曾经参与地下劳动市场（Ⅱ）两方面都具有显著影响。对描述妇女照顾小孩的期望值也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对妇女而言，40 岁以下，尤其是未婚有子女的人口统计因素似乎对过去参与地下劳动市场有着决定性影响。

## 劳动供给函数

除了上述三类问题以外，应询者还回答了他们在上年参加地下劳动的时数。这些回答可视为对第四个自变量的观察值。

4．上年参与地下劳动的时数。

下面是假定的地下劳动供给函数：

$$\ln(N_B+1)=a_0+a_1W_R(1-t)+a_2W_B+a_3W_B(1-\tau)+a_4p+a_5z+u$$

其中：$N$ = 每年参与地下市场劳动的时数；

$W_R$ = 正当市场的小时工资率；

$t$ = 边际税率，$t\geqslant 0$；

$W_B$ = 地下市场的小时工资率；

$\tau$ = 罚金率，$\tau\geqslant 0$

$p$ = 百分比表示的可稽查率（%）；

$z$ = 社会经济变数向量，其内含在此不论；

$u$ = 标准误差。

其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为有效程度。男性：

$$\ln(N_B+1)=\underset{(0.0)}{2.060}-\underset{(0.14)}{0.016}W_R(1-t)-\underset{(0.82)}{0.001}W_B$$
$$+\underset{(0.13)}{0.100}W_B(1-\tau)-\underset{(0.0)}{0.020}p+aZ$$

女性：

$$\ln(N_B+1)=\underset{(0.63)}{-0.170}+\underset{(0.19)}{0.150}W_R(1-t)+\underset{(0.26)}{0.005}W_B$$
$$+\underset{(0.73)}{0.003}W_B(1-\tau)-\underset{(0.20)}{0.004}p+a_5Z$$

除了与$W_B$有关的系数之外，男性回归方程式中的其他所有系数都有可能的Sign；尽管我们一再告诫读者说，一般的逃税理论并不提供预期情况。然而在不确定情况下，如果行为受到经济决策的引导，有些经济变量就会明显地影响这种行为。与工资率和税率有关的系数在5%的水平时并不有效(有作用)。在5%的水平上，只有主观发现概率会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倘若发现概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比如从10%上升到11%，那么参与地下市场的平均劳动时数就减少2%，比如，从每年100小时下降到98小时。

对女性来说，没有一个与经济因素有关的变量，在可接受的有效水平上偏离0，因此，这似乎表明，女性参加地下市场不是源于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正如男性那样。从表11.2和11.3和一般观察可见，女性参与地下劳动是因为缺少有正当的劳动机会。

另一种解释是，参与地下劳动对男性来讲是作为副业来看待的。男性对第二职业(地下劳动)所持的态度不置可否，

他们将此作为对合法劳动市场的补充或者替代一些合法劳动时数。更为详尽阐述的逃税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决策。另一方面，女性则没有处在这种情况中。因此，她们在地下市场找工作的决策不是出于不确定情况下的精明决策，而是求职的唯一方式。

**注　释：**

① 尽管两次调查问题并不在字面上完全一致，但差别很少，完全可以忽略。

② 理论探讨情况请见艾萨克森和斯托姆（1980）。

# 12

# 加拿大的地下经济

对加拿大地下经济活动的衡量证明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任务。本章将阐释关于地下经济的两个概念，概述涉及加拿大范围内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对无法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新估价。

## 现象的说明

尽管人们同意地下经济活动是法律、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国与国之间不同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显然，地下经济活动没有一个一致接受的定义。因此，开始时先澄清一下地下经济活动合理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把总的经济活动分解为以货币为基础和以非货币为基础两部分(法洛伊，1970)是有益的。非货币经济活动由市场活动(如交换)与合法或非法的非市场活动所构成。属于此类活动的实际上是以实物计算的消费

和合作性有组织的专业性服务的交换。由于经济活动的这一类成分实在难以测定，因而形成习惯上把大部分的非货币交易排除在国民生产总值之外。由于转移发生在从可观察到的货币部门到观察不到的非货币部门，使得国民收入和产值呈现不正确的经济增长图象。虽然非货币经济活动具有鲜明的重要性和深远的影响（肯德里克，1979；艾斯纳，1978），本文将集中讨论地下经济活动的货币交易方面。

我们可以将地下货币经济的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第一个概念是，存在未申报的应纳税的货币收入总量，它形成逃税的基础。第二个概念是，存在应该习惯地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但仍是没有登记的经济活动的货币价值。这两个明确的定义分别包括地下经济的各方面，它们一贯是某些研究者调查研究的主题。例如，灰色劳务市场既是逃税又是看不见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这种未申报的劳务收入可征税的程度。地下经济的逃税概念也包括所有的未申报的但可征税的来自财产转让的资本收益。然而，看不见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包括没有登记的由这种收入产生的支出。

## 过去加拿大的研究

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最早对加拿大地下经济进行了研究。哈斯（Haas）（1978）和黄（Wong）与罗斯（Rose）（1980）的研究成果，是未出版的内部研究备忘录，因而未得到广泛的传播。以上这些研究，都以作为地下经济交易媒介

的货币的作用为主题。哈斯研究人均实际货币持有量，期望随着信用卡及其他金融革新手段的采用，货币持有量将下降。他观察到60年代和70年代货币量的增加，他的结论是，这个情况必然由于不断增长的地下经济活动。哈斯以1953—1955年(作为基准期)为基础，并采用$M_1$流转速率，他估计，到1977年底，有额外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1.1%隐而未报。

尽管哈斯所采用的方法受人反对，说他忽略了人口的变化，也未能调整$M_1$流转速率以反映地下经济活动，而且他假定实际人均货币持有量的收入弹性为零，① 但该方法还是有前途的，因为它避开了古特曼(Gutman,1977)和坦齐(Tanzi,1982)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对与活期存款有关的货币运动或者更为广泛的货币总额的研究，引出关于增加的货币持有量的推论。

黄和罗斯(1980)表示，古特曼方法在加拿大经济环境里遭遇困难。他们将活期存款总量划分为两部分，发现整个70年代，与个人支票帐户余额有关的货币总量下降，因而货币——活期存款比率的明显上升必然由于往来帐户余额迅速增长的缘故。而且，当银行钞票信誉以及在总的交易中货币调拨额度假定不变时，他们表示与活期存款调拨有关的货币调拨额度从50年代到70年代晚期都是下降的。这种下降表明货币总量增长的速度还不足支持迅速增长的地下交易。因此，黄和罗斯对古特曼在加拿大使用的方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赞美法伊格的交易量方法为货币方法中理论性最强的，不过在货币成份研究之外他们不使用它。

米拉斯和史密斯(Mirus and Smith, 1981)试图把交易量方法用于加拿大数据，但在为纯金融业务作调整中遇到困

难，没有此种调整，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在略去主要金融中心的支票结算业务之后，以及假定每张银行钞票使用寿命为125次交易，他们得到结论是，以1939年数据为基准，1976年地下经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8.1%。他们还使用坦齐的方法，提出了逃税收入的估计数。表明货币——活期存款之比为平均个人赋税负担的一个函数。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计算出：由于纳税负担的加重而导致的货币持有量的增加可能意味着1976年属于逃税的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7.8%。

伊塞尔（Ethier，1980）在逃税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证据，说明了在国家所统计的收入量和个人及公司向税收部门申报的收入量之间有差距。在本世纪70年代的十年间，这种差距从30%左右降到了14%。很难解释清楚这种下降趋势及为何仍然存在差距。下降的原因是因为货币收入转向实物收入了呢？还是因为可征税收入范围由于包括了根据税收发放的社会保险金（1972年）和家庭救济金（1974）而扩大了呢？测估到的依法纳税的增加，可能也是由于增加了强制性措施的结果。

伊塞尔同时又应用了坦齐的方法，她发现货币持有量对纳税负担的反应十分敏感，其数量就是纳税申报人的平均边际税率。伊塞尔的估计数字表明，1980年逃税数达到向个人和不具法人资格的企业征收的实际税收总额的8.8%。

## 方法上的考察

在研究地下经济时，根据采用地下货币活动的两个概念中的哪一个——以往加拿大学者的研究不总是把二者区分清楚——决定不同的方法中哪一个是合适的。基于这个理由，对加拿大过去的衡量方法进行回顾，为我们估价采用的诸种方法的优点和弱点提供了机会。

古特曼和坦齐所提倡的货币比率方法已被证明是不完善的。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金融革新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利率的变动。依赖货币比率法，不考虑纳税负担增加的后果，忽视了其他起作用的因素，如审计或然率和社会观念的变化等。并且，含蓄地假定逃税仅限于现金收入，导致这个方法低估逃税额，因为少报的资本所得收入未必与货币的使用有关。②

法伊格的交易量方法基本上克服了方法上的困难，从理论角度看，法伊格的方法能更好地达到其预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就是衡量地下货币经济活动的第二个概念：未记录的国民生产总值。把以支票为基础的交易包括在内，这种方法克服了过分狭隘地集中在货币上的缺点。通过调整纯金融交易，它在衡量未记录生产活动的目标时依旧是正确的。

如果说对法伊格的方法存在疑问的话，那么这些疑问主要属于实施该方法需要的经验数据的可用性。因为确定地下经济的存在及其增长取决于交易总量与最终交易量之比的增

长，还因为这种增长是可观察到的，我们在研究时必须表明它不是由于与最终商品有关的中间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不是由于需要更多最终产出每元的中间交易的纵向一体化的减小。尽管法伊格的方法（1979）明显地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但在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明确证据时往往有经验上的困难。交易总量与最终交易量之比的提高也可能是更纯粹的金融业务的结果，如在支票和储蓄帐户之间的转移，财产转让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要获得有关纯金融流量的精确数据又是很困难的，因此使用该方法得出的结论，必须根据作必要的概念上调整所需要的经验数据的有效性及精确度来判断。在缺乏加拿大官方全面的研究税收交纳情况资料的情况下，法伊格的方法仍不愧为唯一全面的宏观方法，超过了理论上可接受的基本要求。

其他一些方法，如根据调查数据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往往会受到“无反应”或“不真实反应”的困扰。尽管如此，它们仍能提供重要而确切的或理由不充分的论据。其他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所提供的间接的证据，也证明对初步评估地下经济存在的前提是有益的。

## 简单的指示物

在一般的讨论中，往往会遇到有人提到大面额钞票的增加、可供从事第二职业支配的时间和纳税负担的加重是地下经济存在的指示物。然而，这些指示物与地下经济现象的规

模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则是无力的，如果只对加拿大的制度环境进行某些描述，这种性质的印象主义证据可能证明是有益的。

**大面额钞票**

假若货币为地下经济交易中通用的媒介，假若从事地下经济活动获得的财富，特别是非法的部分，主要是以大额钞票形式保存，以免于受到追查，那么，可以期望日益增长的地下经济会反映在越来越多的大面额钞票上。实际上，在1969年到1979年间，当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26%时，面额为100元和1000元的钞票分别增长288%和641%。尽管如此，正如奥希金斯(1981)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增长并不能被认为是表明地下经济活动增长的确凿证据。它也许仅仅反映了面对通货膨胀时国家试图用大面额钞票取代小面额钞票。事实上，1960年到1980年间，钞票平均面额上升了241.7%，同期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了283.8%，这一事实与这种观点是一致的。

**加拿大消费税指数**

为了回答若干年来普通加拿大家庭的纳税负担怎样变化的问题，弗雷泽学院（Fraser Institute）两年一次发表加拿大的消费税指数。这一指数显示普通家庭所缴纳的各种税收在其总收入中的比例。这些税有：个人的联邦及地方所税、销售税、财产税、利润税、社会保险税、酒税、以及其他许多税。表12.1表明了该指数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增长以及个人所得税与交税后个人净收入之比。

表 12.1 普通加拿大家庭的赋税负担

| 年份 | 普通家庭的总收入 | 纳税额 | 名义增长(%)(与1961相比) | 实际增长(%)(与1961相比) | 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收入之比 |
|---|---|---|---|---|---|
| 1961 | $ 7,582 | $ 1,675 | — | — | 0.078 |
| 1969 | 11,323 | 3,117 | 86.1 | 48.3 | 0.134 |
| 1972 | 14,154 | 4,203 | 150.9 | 79.6 | 0.154 |
| 1976 | 21,872 | 5,979 | 257.9 | 79.8 | 0.155 |
| 1980 | 33,685 | 10,306 | 515.3 | 119.1 | 0.155 |

* 资料来源：派普和沃克（1982，第 44—45 页），平均所得税负担是根据卡塞姆级数计算的。

由于这个指数反映的仅仅是政府的收入不反映居民由此得到的收益，因而是不全面的。尽管如此，二十年间实际税收额超过二倍可以看作是产生地下经济部门的一种诱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发现他们总收入中的一大部分都被各种税收吞掉了，这种认识加上人们普遍地感到这种制度的不公平和复杂性，可以充分地说明人们决定向那种可避免纳税的市场提供或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原因。

## 地下经济活动中潜在的劳动力供给

伊塞尔（1982）不赞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方法，其根据是：与意大利和西德相反，加拿大的劳动参与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呈上升状态。且不管这种增长，单就人口增长、平均工作周的缩短、以及失业的增加就足以使得地下经济活动中充溢潜在劳动力供给。以 1970 年为基期，表 12.2 提出

证据表明，在过去的12年(1970—1982年)中，加拿大地下经济活动的潜在劳动力供给有相当稳定的增加。这些潜在劳动力供给由已被雇佣但每周工作很少时间的那些人以及未报告自己正在找工作或正处于失业状态的那些人构成。[3]

综上所述，根据这些简单指示物的读数显然不能作出有力的结论。但是它们是很有启发性的，在加拿大，使经济活动转入地下部门的刺激和有效时间有重大的增加。大面额钞票没有不相称增长这一事实与地下经济领域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不相容的。情况很可能这样，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支票的增加、人们不乐意接受大面额钞票，以及对美元的依赖可以解释面值结构改变的原因。

表12.2　地下经济中潜在劳动的供给(1970年＝100)

| 年份 | 每周潜在供给的钟点(比1970年增长%) | 年份 | 每周潜在供给的钟点(比1970年增长%) |
|---|---|---|---|
| 1971 | 5.6 | 1977 | 20.1 |
| 1972 | 5.8 | 1978 | 19.6 |
| 1973 | 6.1 | 1979 | 18.3 |
| 1974 | 9.3 | 1980 | 20.1 |
| 1975 | 14.3 | 1981 | 20.4 |
| 1976 | 16.8 | 1982 | 34.2 |

注：计算根据《人口中劳动力状况》和发表在《加拿大银行评论》(1983年4月号第118,119,126页)上的《制造业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一文。级数＝[(1－就业率)×15岁以上的公民人口数＋失业数]×39.7＋(39.7－制造业每周平均工作小时)×劳动数量。1970年制造业中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9.7小时。

## 现金需求

回顾加拿大学者在测量地下经济时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使人们相信，地下经济的规模及其增长可以从货币总量及其组成部分的状态中探测出来。鉴于货币比率方法的无效，单独地集中考察货币需求看来是有用的。货币独特是由需求决定的，并且不像活期存款那样，它不内含利率。它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因而被存货模型所决定，这种模型表明，最理想的库存现金是成本最小化的结果。④

以现金为基础的地下经济部门有与公开的经济部门相似的支付做法，这个事实表明有十分可观的实际现金存量。假如这一部门相对地增长，当作为总产出一小部分的观察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时候，人们将看到，已计量的收入对实际货币存量的弹性是增加了。尽管如此，1968年信用卡传入了加拿大以及随后消费者对信用卡使用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货币需求。尽管它们对活期存款的影响有点模糊不清，因而借方余额最后总是通过活期存款来解决。但是有理由认为信用卡的使用减少了现金交易的需要。凭经验的研究者因此难免碰到下面这种并不美妙的情形，当人们把偏斜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当作一个独立的变量来使用时，要确认不断增长的地下经济就要求证明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弹性是上升的。与此同时，金融部门的革新，以及公众对现金余额的处置方式越来越老练，使人想到这种收入弹性在近几年里应该

是下降的。

为了研究货币需求结构，实际人均货币持有量的需求函数如下所示：

$$C(t)=a_1+a_2D(t)+a_3y(t)+a_4D(t^*)y(t)$$
$$+a_5r(t)+a_6T(t)+e(t) \quad (\cdots\cdots 12.1)$$

其中，

$C(t)=t$ 年实际人均货币持有量（使用CPI）的自然对数。

$y(t)=t$ 年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使用 CPI）的自然对数。

$D(t^*)=$ 虚变量，当 $t>t^*$ 时为 0

当 $t\leqslant t^*$ 时为 1

$r(t)=$ 利率

$T(t)=t$ 年内个人赋税负担的自然对数

$e(t)=$ 误差额

事实上，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虚变量 $D$ 的重要系数 $a_4$，以表明从时间 $t^*$ 开始人均实际收入弹性 $a_3$ 的变化。利用每年货币的平均数据，1968 年、1970 年和 1972 年是最值得考察的年份。1968 年，信用卡初次传入以及个人赋税负担大幅度增加。在随后的五年里，平均赋税负担增长了 25% 强，而且使用信用卡变得普及了。表 12.3 显示了这种回归结果。

在表 12.3 中，方程 (1)—(3) 表明实际收入弹性的虚移转变量没有重大的变化；因此，可以确定这三年里没有纯结构上的变化。我们可能解释不存在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就是存在地下经济活动的间接确证。在地下经济活动中，由信用卡使用引起的、较低的人均货币持有量被为支持不包含在已测定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内的种种交易而外加货币持有量

**表 12.3 人均实际现金需求(1960—1982 年)**

| 方程编号 | $C$ 的特征 | $a_1$ | $a_2$ | $a_3$ | $a_4$ |
|---|---|---|---|---|---|
| 1 | 1960－82, $t^*$＝196 | －4.86(4.97) | 1.19(1.26) | 0.55(1.69) | 0.36(1.24) |
| 2 | 1960－82, $t^*$＝1970 | －4.29(3.77) | 0.52(0.50) | 0.70(1.86) | 0.16(0.50) |
| 3 | 1960－82, $t^*$＝1972 | －4.34(5.05) | 0.45(0.43) | 0.70(2.32) | 0.13(0.40) |
| 4 | 1960－82 | －4.07(8.27) | — | 0.72(4.64) | — |
| 5 | 1960－72 | －4.08(7.69) | — | 0.72(4.34) | — |
| 6 | 1971－82 | －2.34(2.08) | — | 1.21(3.36) | — |
| 7 | 1960－82, $t^*$＝1970 | －3.79(6.39) | — | 0.857(4.27) | －0.0002(0.02) |

| 方程编号 | $C$ 的特征 | $a_5$ | $a_6$ | $Q$ | 调整的 $R^2$, $DW$ |
|---|---|---|---|---|---|
| 1 | 1960－82, $t^*$＝196 | －0.054(2.21) | — | 0.95 | 0.47, 1.70 |
| 2 | 1960－82, $t^*$＝1970 | －0.051(1.94) | — | 0.93 | 0.40, 1.32 |
| 3 | 1960－82, $t^*$＝1972 | －0.051(1.95) | — | 0.94 | 0.47, 1.20 |
| 4 | 1960－82 | －0.600(2.24) | 0.000(1.34) | 0.82 | 0.50, 0.92 |
| 5 | 1960－72 | －0.037(1.19) | — | 0.76 | 0.62, 1.06 |
| 6 | 1971－82 | －0.187(4.10) | — | 0.49 | 0.61, 1.43 |
| 7 | 1960－82, $t^*$＝1970 | 0.054(2.12) | — | 0.92 | 0.42, 1.24 |

注：括号中的数为 $T$ 值。(T—Values)。

$\rho$＝系列联合系数。

所抵消。这显然等于迫使假设符合数据。但是，方程（5）和（6）尽管是以很少的观察结果为基础的，仍然表明实际收入弹性是上升的。而方程（4）表明个人赋税负担对货币持有量有正面的但并非重大的影响。

最后，有必要指出，对实际收入弹性的估算值是与地下经济的增长相一致的，因为它们超过了理论上0.5的理想值。

尽管没有从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当数据的拥有程度容许进一步试验结构变化时，这种方法对今后的研究可能证明是有效的。方程（5）和（6）的结果暗示，货币需求常有某些不变稳定的特性。这些不稳定的原因还未被充分地认识，但或许与地下经济有关。

## 用总交易量方法估计

由于人们对交易量方法非常熟悉，⑤因此，这里对它不作细节性的讨论，需要强调的是交易量方法依赖这样的假设，即总非金融交易与总最终产出的比率是相对稳定的。由于总最终产出几乎就是可观察到的产出与不可观察到的产出的总数，了解交易与收入比率、非金融交易的总量和可观察到的产出水平，使得我们有可能对总收入中观察不到的那部分作出余值估算。

### 完全使用支票的交易量

虽然现在可得到所有加拿大票据结算中心的各种数据，

但要排除纯金融交易量则需要作特别的实验。为了说明纯金融性交易量，制订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度量交易量的方法。

① 除了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以外，对所有的结算中心都估计了使用支票的交易量。这些非金融中心的交易量的增长率嗣后运用于1949年金融中心的交易量，以便获得总的调整后的使用支票的交易量的最初计数测估。

② 调整后使用支票的总交易额被估算为(除了多伦多之外的)所有结算中心的交易总额减去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股票市场价值和全部新发行及回笼的面额为加拿大元的债券价值。

正如法伊格所述，整个联邦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及雇主雇员对社会保险的缴款都从这些总的支票交易额中去掉。由于交易数据不包括联邦政府的交易量，可观察到的产出只计算政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净支出。

表 12.4　总交易量与最终交易量之比

| 年份 | (a) | (b) | (c) |
|---|---|---|---|
| 1949 | 13.32 | 10.41 | 11.78 |
| 1950 | 12.61 | 9.74 | 11.23 |
| 1951 | 12.03 | 9.17 | 10.63 |
| 1952 | 11.77 | 8.94 | 10.36 |
| 1953 | 11.89 | 9.04 | 10.22 |
| 1954 | 11.70 | 8.99 | 10.15 |
| 1955 | 11.12 | 8.57 | 9.91 |
| 1956 | 10.94 | 8.39 | 9.85 |
| 1957 | 10.72 | 8.23 | 9.67 |
| 1958 | 10.94 | 8.26 | 9.38 |
| 1959 | 10.91 | 8.11 | 9.67 |

（续表）

| 年份 | (a) | (b) | (c) |
|---|---|---|---|
| 1960 | 10.93 | 8.04 | 9.33 |
| 1961 | 11.38 | 8.34 | 10.12 |
| 1962 | 11.25 | 8.18 | 10.08 |
| 1963 | 11.40 | 8.13 | 10.12 |
| 1964 | 11.14 | 7.89 | 10.04 |
| 1965 | 11.13 | 7.81 | 10.06 |
| 1966 | 10.99 | 7.67 | 9.94 |
| 1967 | 11.26 | 7.80 | 10.06 |
| 1968 | 11.10 | 7.76 | 9.81 |
| 1969 | 10.97 | 7.65 | 9.65 |
| 1970 | 10.83 | 7.50 | 9.59 |
| 1971 | 10.95 | 7.54 | 9.60 |
| 1972 | 10.99 | 7.69 | 9.86 |
| 1973 | 11.25 | 7.79 | 10.03 |
| 1974 | 11.66 | 7.93 | 10.40 |
| 1975 | 12.56 | 8.38 | 11.13 |
| 1976 | 12.25 | 8.16 | 11.04 |
| 1977 | 12.01 | 8.07 | 10.98 |
| 1978 | 11.73 | 7.86 | 10.31 |
| 1979 | 11.80 | 7.90 | 10.15 |
| 1980 | 12.44 | 8.35 | 10.72 |
| 1981 | 11.98 | 8.76 | 11.20 |
| 1982 | 12.36 | 8.73 | 10.96 |

表 12.5 国民生产总值中隐含的地下经济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年份 | 调整程序 | | |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
|---|---|---|---|---|
| | (a) | (b) | (c) | |
| 1973 | 2.25 | 1.26 | 1.62 | 7.54 |
| 1974 | 5.80 | 3.10 | 5.17 | 3.59 |
| 1975 | 13.50 | 8.53 | 12.26 | 1.19 |
| 1976 | 10.81 | 5.82 | 11.31 | 5.52 |
| 1977 | 8.75 | 4.62 | 10.75 | 2.10 |
| 1978 | 6.33 | 2.12 | 4.35 | 3.71 |
| 1979 | 6.98 | 2.53 | 2.76 | 3.03 |
| 1980 | 12.53 | 8.13 | 8.26 | 0.03 |
| 1981 | 8.52 | 13.20 | 12.93 | 2.02 |
| 1982 | 11.81 | 12.84 | 10.53 | -5.00 |

**现金交易量**

有关加拿大钞票使用寿命的试验⑥有助于支持钞票的使用寿命为200次交易的假设。把这一假设和各种钞票估计的平均使用周期联系起来，有可能计算出一系列货币周转量。⑦有关国民生产总值（联邦政府净商品与服务支出）的现金及支票交易量计算出来的估计总数，根据上述每一种情况列入表12.4。对这些比率的观察显示，60年代比率的下降是轻微的，但却是稳定的，而在其后却呈现时有时无的上升趋势。这一观察结果或许反映了纵向一体化的缓慢增长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之后或者没有起色，或者被"脱颖而出"的地下经济领域的影响所压倒。

认定这一结论有点儿保守色彩，因而选择1972年的比率

(不选择 1970 年的比率)作为计算属于官方测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小部分的隐含的地下经济的基准。表 12.5 显示,不考虑为金融方面的失误而采取调整的方法,地下经济的发展出现十分相似的模式。到 70 年代中期一直呈现迅速的增长,只有 1982 年出现严重萧条时例外。由于 1974 年生效的反通货膨胀联邦收入税指标的制定,平均赋税负担有所下降,与此相一致,70 年代后半期地下经济呈下降趋势。1975 年至 1978 年实施的工资——价格控制计划影响可观察到的产出与隐蔽的产出的相对价格,从而对地下经济的规模也有影响。但是还不很清楚,这个影响是否导致规模的净下降。

虽然就数量级而言这一结果似乎是可信的,但提出几点忠告是必要的。1972 年前地下经济业已存在,根据这一点来说这一估计数显得保守。所估计的地下经济领域中的波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令人困惑的。巨大的供给弹性和需求的波动也隐含地下经济领域。鉴于这些情况也许是有道理的,在给定地下经济的特性之后,搞清楚估计数中一贯的顺经济周期和逆经济周期运动是很困难的。表 12.5 中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显示,1974 年至 1975 年的萧条年份,却伴随着地下经济活动估计数的激剧增长,但在 1982 年的萧条中,地下经济领域的三个估计数中有二个缩小。70 年代中期的衰退伴有加剧的通货膨胀,然而 1982 年剧烈衰退时,通货膨胀却是减速的。不过,这种差异将如何影响地下经济领域的增长并不是很清楚的。最后,看得出,这一结果对于为体现纯金融性交易作用而采取的调整类型非常敏感。由于提取现金和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之间的转移,任何调速都不是为了借方的原因。由于非金融中心里这些流动有长时期的增加,在

估计的支票交易系列中仍有依然包括某些金融失误在内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这一结果间接地表明，在1972年到1982年期间内，地下经济领域已经显示出值得注意的波动，目前它可能达到了可观察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些估计数远远不是精确的，而且也难以知道它们的置信区间。

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加拿大地下经济的增长原因作系统的研究。流行的假说是，促使地下经济显著增长的促进因素有：边际税率的提高，税收结构不断复杂化以及纳税人感觉到制度公平性的下降。尽管对逃税的公开讨论有很大的增加，在最近几年内，加拿大税务局专门调查逃税的人员一直只有530人，而且所完成的调查和起诉案件呈现下降的趋势。⑩ 地下经济的发展的确表明，非正规的市场可能在限制政府借助于课税和控制干预自由市场中起到重要作用。

注　释：

① 黄和罗斯（Wong and Rose）(1980年)作出这些批评。
② 兰菲尔特（Lang feldt）(1982年)指出这些缺陷。
③ 参见派普斯和沃克（Pipes and Walker）(1982年)。
④ 关于存货模型，最佳现金持有量暗含了实际货币需求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弹性为0.05（鲍莫尔，1966)。
⑤ 这一方法的详细描述见法伊格（1979年)；更精练的见解见法伊格（1980年)
⑥ 应该感谢德鲁·麦肯齐(Drew Mackenzie)对30张新钞票所做的这个试验，并且模拟了14,000多例有褶痕钞票的交易，

当出现了扯裂、有洞，或穿孔的时候，钞票被认为“坏了”。假定每次交易有二个褶痕，平均每张钞票可供进行240次交易，我们使用略为保守的数字即钞票的寿命为200次交易。

⑦ 关于1978—1982年，我们使用发表于《加拿大银行评论》(1982年1月号，第18页)上的钞票的平均寿命。关于1964年—1977年，我们则使用自己的计算，这一计算以1968年破损钞票的寿命为基础。这两组钞票之间只存在微小的差别。

⑧ 国家税务部，《税收内情》(1980—1982年)。



# 法国的地下经济

本章对法国地下经济作了四个方面的研究。在简略地回顾这个课题的历史意义和讨论最常用的专用名词之后，为了洞察"秘密劳动"问题的性质，进行过几次地区性的调查，我将报告它们的结果。在这之后是使用坦齐(1980)的估计方法，检查法国偷税漏税经验性的估计数字以及对法国地下经济的增长和规模作了宏观经济的估计。

## 专 有 名 词

法国有关秘密劳动的立法始于 1936 年。紧接着马蒂农 (Matignom) 建立有偿假日协议之后，1936 年 6 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有偿假日里做有报酬的工作。 1940 年 10 月通过了一项兼职法："如果不在商业登记处登记或在行业登记处登记，如果不缴纳按这种职业应征收的社会性的费用和税，任何人都不容许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一种工业、商业

或其他专业性的工作。"昂托尼(Antoni)先生对这些法律的恰当性极表怀疑。昂托尼先生在代表经济委员会草拟的一份反对秘密劳动的报告(1950年3月)中，他特别重视"秘密劳动市场令人不安的扩展"。关于秘密劳动的现行立法是1972年7月通过的，它主要是由那些经常抨击不公平竞争的各种专业组织施加压力的结果。这项法律规定：如果劳动涉及非偶然的有报酬的生产、改制、修理或提供劳务等实际活动，就必须在商业登记处和行业名册上登记，如不履行登记或者由没有在行业名单或商业登记处登记的个人进行的商业活动而又不执行该活动固有的社会和财政义务，这些劳动都应认为秘密劳动。①

自从这项法律通过以后，雇主组织和工会一直在不断地要求对秘密劳动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默通(Meton)在论制止秘密劳动措施的报告中，提议加重对秘密劳动的处罚，并提出要扩大秘密劳动这个概念的范围——包括偶尔活动在内。②这种扩大的非法活动的概念被称为"黑市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对秘密劳动的法律概念的两个方面，这个概念或多或少被其他一些国家效仿。③第一，有一些加紧反对隐蔽劳动的建议，但把一种可以接受的家务劳动排除在隐蔽劳动之外。其次，根据各种黑市劳动背后的动机，对不同类型的黑市劳动加以区别。因此，我们能够把谋生的黑市劳动(饥饿使这种谋生方式合理化)、寄生的黑市劳动(这是不可接受的类型)和"乐生劳动"(Convivial Labor)区别开来，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把乐生劳动解释为有选择地在公开市场部门和秘密市场部门进行的劳动。于是乐生劳动就以人们叫做第三种类型的劳动方式进行。

不管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观点来看，黑市劳动是由增加金钱收入这种惯常的经济考虑驱动的。然而，这种像公社或协会生产自主形式是由不同的刺激指引的。它们的动机不是寻找利益而是希望及时生产某种重要的东西。第三种类型劳动的特征是强调劳动的创造性而不强调劳动的报酬。

第三种劳动的理论基础在时间利用的新观念上也有其根源，这种新观念摒弃了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传统两分法。相反，第三类劳动深信：“既要更好地掌握时间，又要能够利用由此解放出来的时间去改进非市场劳动生产的非市场产品”。他们采用了三分法：市场劳动、非市场劳动、非劳动。④德洛斯和戈丹（Delòrs and Gaudin）(1979）对第三种经济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强调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它的组织方式以及它的财政方面。第三类：经济与市场经济和行政部门共存。第三类经济以小型的、主要以分散的经济单位为基础，在最初阶段，它的财政来源于政府津贴，随后依靠会费的收入和在特定市场上出售劳务和货物。第三类经济在法国论非正规经济的作品中得到不断增加的关注。有两位法国作者，巴泰莱米和罗桑瓦隆（Brthelemy and Rosanvallon）曾分别提出过地下经济的定义。尽管他们的定义不完全对立，他们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

巴泰莱米（1980）把地下经济包括在他称为社会总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社会经济活动 = 正式私人经济 + 正式公有经济 + 地下经济

这位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地下经济看来（对于许多人）是一种正式的虚假经济，它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即某种地下

经济活动(如家庭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重新结合在传统经济之中。但是把地下经济看作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并在传统经济更大范围内去研究它是同等重要的。作为地下经济的特有标准，罗桑瓦隆连续反对如下三类特征包括在特有标准之中：

1．规模(包括小规模和大规模活动)。

2．合理性(家庭内提供帮助不是秘密活动)。

3．市场特征(销售某些商品，而另一些商品则不然)。

他接受的标准就是地下经济与政府之间发生联系的标准。地下交易在政府控制的边界线上进行，实现这种地下交易有二种方式：(a)隐蔽的(看不见的)经济和(b)自主的经济。所以，他对地下经济作了如下定义：

地下经济＝看不见经济＋自主经济

看不见经济对于政府规定来说是一种非法活动。它与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有机关系，它的存在被看作是正式经济的社会严格性的产物。自主经济不违背政府规定，"它是建立在不必纳税的社会组织形式上(邻里和广泛意义上的家庭)，或者建立在产生赋税活动的基础上，因为它们是自由的或互惠的(家庭劳动)"。⑤

巴泰莱米(1981)把隐蔽活动分为四部分：即秘密劳动、黑市劳动、狭义的地下经济、广义的地下经济。秘密劳动根据法国法律是指那种在现行社会和课税规范以外的正规工作，黑市劳动(包括秘密劳动)由带偶然性的隐秘活动组成，它包括学生、退休人员、兼职工作者和失业者的劳动，它们是小规模和偶然性的。而黑市劳动与秘密劳动的区别就在于黑市劳动是低强度的以欺诈手段获取薪金的活动。狭义的地下经济

包括不公开劳动、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被禁止的活动。后者包括偷税、漏税、物物交换、盗窃、腐化、贿赂、走私、贪污、贩毒和卖淫。广义的地下经济包括以上一切活动以及一系列家庭服务和公社、慈善和集体的经济活动。

## 报告与实证

在法国，可资利用的有关地下经济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尽管这些文献常常会因为主观色彩太重而无法无保留地使用。我们可以把主要资料来源分为两类，即来自民间团体的报告和官方的报告。以上两者都把黑市劳动问题作为它们的主题。属于第一类报告的特征是对非法劳动者的全面谴责。这种态度所持的论据因发表报告的组织机构的性质不同而不同。第二类官方报告的特征是意见一致。法布勒(Fabre)(1979)、瑟坎(Sequin)(1979)、德洛罗祖瓦(Delorozoy)(1980)、福(Fau)(1980)、迪佩鲁克斯(Dupeyroux)(1983)和拉戈特(Rogot)(1983)都认为，黑市劳动是普遍的，尽管它们无法精确计量。同时他们又主张要把大规模的欺诈者和偶尔的地下劳动者区别开来，并且他们都认为，强化对黑市劳动的控制方法是必要的。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适合用于黑市劳动的分析。任何对黑市劳动的批评与指责都需要详细地考察非法活动参与者的动机。而从前的研究中就是缺乏这种考察。另外，黑市劳动和

地下经济的界线并不总是可以明确划分的，因此，许多法国研究者只对它的规模提出了一些经验性的估计而未对在衡量的现象提出明确而可供使用的定义。此外，黑市劳动也曾是几次直接调查的主题已经取得了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如塔阿尔(Tahar)(1980)有关塔尔纳地区皮革行业的专题著作追踪了从鞣皮起到街上小贩叫卖皮革制品止地下劳动的经济连锁。

勒伯尔(Le Bars)(1980)曾研究过巴黎地区建筑行业的黑市劳动，富迪(Foudi)(1981)曾调查了里尔地区失业者中的黑市劳动。

在1980年勒伯尔斯的研究中，抽取的样本是24—43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2岁。每个人都在某一特定地区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彼此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全都受过专门训练。被调查的黑市劳动者有一半是拿薪金的雇员，20%为体力劳动者，10%是中层管理职员，10%为失业者，他们声称的月平均净薪金(不包括那些失业者)是法定最低工资的两倍。在全部调查的事例中只有20%是有迫切经济需要的黑市劳动。而在被访问者中，60%的人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尽管对黑市劳动收入不是十分迫切的；20%的男人没有经济动机，他们有的希望取得职业资格，有的希望参与社会。黑市劳动收入每个人不同，每年在2500—36,000法郎之间。平均收人为每年17,000法郎。平均从事黑市劳动市场的时间为每周12小时——重要性不大。一部分人每周工作1—3小时，另一部分人每周工作6—15小时之间。所有被询问的参与者都知道黑市劳动是非法的。然而，即使意识到黑市劳动的风险及其可能受到的处罚，也不能劝阻他们，相反，风险更促使他们参与黑市劳动。

从需求方面来看，他们的地位较不易分类，他们分属于所有的社会职业，他们的收入从每月3,000法郎到11,000法郎不等，他们的年龄从27到82岁。共同性方面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中有90%是由于经济需要第一次进入不公开劳动的，而其余10%是因为帮助别人解决难题而卷入非法活动。

这次对巴黎地区黑市劳动的研究，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令人感到兴趣。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为现在其他地区和在其他行业进行这种调查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用这种方法，可使法国黑市劳动的全貌更加突出显眼。从分析的角度看，这项研究使人们能够考查黑市劳动的供求基础，在这方面，吉朗（Giran）(1981）最近发表一篇论文，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劳动市场的理论联系。

富迪（1981）研究了失业者面临黑市劳动的抉择时表现的行为。他的研究是在与里尔地区的壮年男性失业者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工作，并在国家就业部登记了三个月以上。这项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否定了这种普遍性的看法，即"职业性"的地下劳动力是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组成的。在94人的抽样调查中，只发现40宗从事黑市劳动。而且，在其中25例中，由黑市劳动得到的收入在家庭开支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只有三人黑市劳动的收入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半数。除此以外，他还发现，失业前从事地下劳动的31人中，只有11人一旦正式失业就在他从事部门增加他的劳动。然而，这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失业者从事黑市劳动的人数方面，而且深入了解那些被调查者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⑥那些黑市劳动收入大的人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过着真正苦难生活的地下劳动者（贫穷迫使他们从事黑市劳动）。

2．包工头（建筑部门的专业地下劳动人员）。

3．接受再训练的失业者（做很快将成为他们正式职业的工作）。

从地下劳动收入甚微的个人来说，这是由于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由于提供职业的那些人的购买力下降因而劳动力需求也下降，以及家务事情自己动手做的增加。其他的因素则每个被调查者各不相同（健康状况的恶化、不能从雇主那里借用必要的设备以及被抓住的担心）。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巴黎和里尔所做的研究是互补的。这些研究揭示了兼职者以及面临"每天地下劳动"选择的正式失业者的动机和困难。这些研究作出的贡献在于它们对地下活动作出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描述，但由于这些研究受到地区性的局限，所以难以使用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全国性地下活动规模的估计数。

## 对法国偷税漏税的估计

法国国家税务委员会总收入局对法国偷税、漏税的情况作过估计。⑦它的第一次研究报告发表于1972年，自从1978年以来，有规律地公布这类报告，其目的是为了估价收入申报的可靠性。第一次研究包括对40，000个纳税人的调查，抽样决定于二个标准：(1) 可征税申报收入的水平；(2) 现有收

入的种类。

根据这两项标准，初步审查的纳税人中有86.3%（即34，500人）是不应包括在内的，因为他们的现有收入是由薪水、工资、退休金和终身年金组成。因而，为了决定对法国偷税、漏税的总估计数，对4163个抽样单位进行了仔细审计。这次调查的主要结果概括地列入表13.1和表13.2中。

在研究这些结果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a. 抽样调查只涉及到那些承认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因此，这个估计数不包括没有填过纳税申报表的人，也不包括声称没有纳税义务的申报人。

b. 登记偷税漏税只是被税收检查员已经发现的，因此不可能根据它估计未发现的逃税数量。

表13.1 根据收入类型对偷税漏税的测估

| 现有收入类型 | 纳税人百分比 | 校正后纳税人百分比 | 校正后纳税的平均增长率 | 未纳税的平均值（以1971年法郎计） |
|---|---|---|---|---|
| 薪金、工资、退休金及终身年金 | 86.3 | 18.2 | 10.3 | 790 |
| 工商利润（根据总数法征税） | 7.2 | 43.1 | 43.8 | 3875 |
| 工商业利润（根据实际利润法征税） | 1.3 | 78.5 | 21.9 | 6510 |
| 非商业活动利润（根据政府估价法征税） | 1.1 | 45.2 | 21.9 | 4，415 |
| 非商业活动利润（根据核实申报法征税） | 0.3 | 85.2 | 16.1 | 10，160 |

（续表）

| 现有收入类型 | 纳税人百分比 | 校正后纳税人百分比 | 校正后纳税的平均增长率 | 未纳税的平均值（以1971年法郎计） |
|---|---|---|---|---|
| 土地和房产收入 | 1.1 | 50.6 | 32.1 | 4,630 |
| 股票和债券收入 | 0.7 | 32.5 | 14.6 | 5,830 |
| 其他收入 | 2.0 | 34.8 | 12.3 | 1,270 |
| 总数或平均数 | 100 | 22.0 | 17.4 | 1,848 |

资料来源：税务委员会，"共和国总统有关所保税的报告"《官方新闻》1979年，第161页。

从表13.1看来，现有收入薪金、工资、退休金、终身年金组成的那些纳税人占全部纳税人的86.3%，如有系统证据将予纠正的那些人占全体纳税人的比例只达到18.2%。相反，人数较少的种类（包括从非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的那种人，他们根据核实申报法纳税）应受较高程度的纠正，即85.2%。我们从表中看到，人数较多种类未纳税的平均数是低的，而人数较小种类的未纳税平均数是高的。经过校正后纳税人的平均增加率按照其现有收入也显示出很大的差异。主要收入来自工商业利润的纳税人（根据总数法征税）以43.8%比率纠正，而那些主要靠获取薪金、工资、退休金、终身年金的纳税人，以10.3%的比率纠正。非常令人注意的是，那些以非商业性利润为其现有收入并根据核实申报法纳税的纳税人的平均增加率为16.1%（即低于平均数的17.4%）。当根据纠正前，总净收入研究逃税时（见表13.2），我们观察到（有一个例子例外），纠正的纳税人的比例越高，未纳税的平均值就越大。然而，纠正的纳税人的平均增加率随着申报收

入的上升而下降，只有 30100—50，000 法郎的收入等级例外。因此，大纳税人似乎比小纳税人逃更多的税。虽然他的逃税额从比例上说是较小的。根据这些数字，在法国，逃避所得税的金额估计可达到 44 亿法郎，这个数字大约为申报所得税的 14%。

**表 13.2　逃税的估计规模**

| 纠正前的总净收入 | 纳税人百分比 | 纠正后纳税人百分比 | 纠正后纳税人平均增加率 | 未纳税的平均值(以1971年法郎计) |
|---|---|---|---|---|
| 小于 15，000 | 43.9 | 16.4 | 29.0 | 638 |
| 15，100—20，000 | 19.1 | 14.8 | 17.2 | 847 |
| 20，100—30，000 | 19.9 | 27.7 | 16.5 | 1，125 |
| 30，100—50，000 | 11.9 | 35.8 | 20.3 | 3，054 |
| 50，100—10，000 | 4.1 | 38.3 | 13.0 | 4，045 |
| 大于 100，000 | 1.1 | 61.7 | 10.6 | 9，262 |
| 平均数 | 100 | 22.0 | 17.4 | 1，848 |

资料来源：税务委员会，"共和国总统有关所得税的报告"，《官方新闻》，1979 年，第 162—4.167 页(摘录)。

总关税局和总税务局⑧最近对增值税偷税漏税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在税务委员会的第六次报告中(1983)已经公布了。在其税务控制政策的指导下，总税务局集中全力检查申报最可能发生的不真实的地区。由于简单推断每个人都要缴增税，其结果就很可能导致对逃税规模作过高的估计。如果对象和地区的选择纯粹是随机的话，就应明确限定过高估计的标准为那些考查结果得到的比率。有了达到指数和税务控制单位提供的结果的帮助，就有可能估计增值税偷税漏税的数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增值税偷漏的数量 1979 年估算为 64，340 亿法郎。然而偷漏的数字很可能是低估了。因

为：

1．这个估计数只涉及被揭露的偷漏，我们必须加上全部未被检查员揭发的偷税漏税的情况。

2．这研究不包括营业额低于150，000法郎的工商企业，和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价值低于50，000法郎的企业，不把这些企业包括在内看来很不妥当，因为营业额较低的企业逃税的倾向更大。的确，当企业与最终的消费者直接接触时，比这卖给中间企业转手，更容易偷漏增值税，因为中间企业有权扣除它们交易应付的增值税。

3．几种需要承担增值税的活动没有包括在估计数之内（如农业、非商业活动、土木建筑协会）。

为了估计增值税逃税总量，有必要包括总关税局的估计数。这个估计数是从有关总关税局管辖范围内三个领域抽样调查得到的：（1）商业交易结关证，（2）过境运输，（3）旅游者。就总税务局发表的估计数而言，总海关局得到的结果低估了真实情况，原因如下：

1．逃脱所有估价努力的最严重的逃税企图，迄今要算走私者不结关的货物。走私活动自动地不落调查范围之内。

2．抽样调查只涉及到总海关局三种检查方法的一种。这三种检查方法是：直接检查（海关办公室或过境运输点）、推迟检查（在下个月期间检查）和事后检查（有密告某人被怀疑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调查仅涉及到直接检查程序，因而往往低估增值税偷漏的真实程度。

3．样本只代表每年货运量的一小部分（报关货物的1.32％，许可过境货物的0.02％，以及旅游者的0.018％）。

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发现来推断所有要缴增值税的纳税

人，那么偷税漏税将会达到14亿法郎(1979)或占全部已收增值税的1.8%。然而，税务委员会估计的总增税的偷漏达到78,340亿法郎(总税务局估计为64,340亿法郎和总海关局估计为14亿法郎)。连同这些调查，税务委员会还试图找到增值税数量的估计数(如果不低估的话，在理论上这个估计数是可以收集到的)。这个工作遵循下列方法进行：首先，政府有效地征收的增值税收益用国民核算帐户上发现的数字加以计算。然后，计算理论上可以征收的增值税，考虑以国民核算帐户投入产出表上不同项目衡量的所有经济活动。理论上的增值税

**表13.3　增值税偷漏的估计**

| 年份 | 增值税差距(以十亿法郎计) | 属于减免税的合法延期的比例 | 余值差距(增值税偷漏)(以十亿法郎计) | 增值税的收益百分数 | 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
|---|---|---|---|---|---|
| 1970 | 9.1 | 1.8 | 7.3 | 10.3 | 0.9 |
| 1971 | 10.3 | 2.2 | 8.1 | 10.2 | 0.9 |
| 1972 | 10.2 | 2.2 | 8.0 | 8.9 | 0.8 |
| 1973 | 10.5 | 2.0 | 8.5 | 8.8 | 0.8 |
| 1974 | 12.2 | 2.8 | 9.4 | 8.2 | 0.7 |
| 1975* | 13.2 | 3.0 | 10.2 | 7.5 | 0.7 |
| 1976* | — | — | — | — | — |
| 1977 | 19.5 | 5.7 | 13.8 | 8.9 | 0.7 |
| 1978 | 17.3 | 4.4 | 12.9 | 7.1 | 0.7 |
| 1979 | 14.5 | 2.5 | 12.0 | 5.6 | 0.6 |
| 1980 | 20.3 | 5.2 | 15.1 | 6.2 | 0.6 |
| 1981 | 24.0 | 5.9 | 18.1 | 6.6 | 0.7 |

* 1975和1976两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税务委员会，"共和国总统有关增值税的第六次报告"《官方新闻》1983年，第181页。

和实际上的增值税之间的差异就称为增值税差距，为了推断增值税偷漏情况，只需通过考虑合法的免税、减税和延期来校正增值税的差距，（减税、免税和延期都是根据增值税支付和减免的法律规定）。这个调查的结果如表 13.3 所示，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增值税的偷漏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根据货币比率法估计法国未申报收入

目前，法国还没有未申报收入的宏观经济估计数，这主要是由于用于其他国家的几个估算方法难以适用于法国的具体情况。由于法国国民核算帐户不提供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和支出方面修正前的数字，因此，应用 IRD 法（即初始剩余差异法，1980 年麦卡菲将此方法应用于对英国的研究）证明是不可能的。

不过，一些货币数量方法经过一定修正，可能应用于法国，但是与古特曼（1977）在美国的发现相反，法国的 $C/D$值（货币数量与活期存款数量的比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古特曼（1977）所使用的简单的货币比率法不能有效地使用。费热（1979）建立在费希尔交易方程式基础上的交易量方法，因为得不到货币的交易速度数据，也很难在法国应用。唯一能得到的数据是收入速度的数据。但是将来调查交易速度的决定因素（像费热于1979年和1981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那样）会带来有趣的结果。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使用了坦齐（1982）用于美国的货币

比率法。在法国,应用这种方法来处理1959—79年期间的数据是可能的。法国的国民核算体系于1976年改变以适应欧洲其他国家的核算帐户。然而,1959年可利用。因此,1959年是我们研究的基期年份。这一限制不应成为妨碍,因1959年是法国经济从重建、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时期向自由化、政治稳定以及建立共同市场打开贸易新天地时期的转折点。

至于因变量,我们必须在$C/D$、$C/M_1$或$C/M_2$三个比率中选择。虽然坦齐使用了$C/M_2$,由于下述原因,我们没有坚持这个选择。首先,存款的较宽广定义并不与交易余额相符合,它包含储蓄存款,这种存款要用作支付手段必须先转换成现金或活期存款,因此,使用存款这个较宽广的定义必须知道持有货币的成本,而此种合适的利率系列,法国是得不到的。而且,自1967年以来,法国的活期存款帐户没有利息。$C/M_1$按理是可以使用的,但由此导致的经济计量学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们选择了检查现金与活期存款比率的方法。虽然这一比率在作为地下经济活动指标也有一些缺陷。货币并不是秘密交易唯一的媒介,还有可能,出现$C/D$的变化是由于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之间转移的结果,而不是正式和未申报部门间转移的结果。因此,$C/D$既受完全合法因素的影响,也受有关秘密活动因素的影响,两方面因素通过长期和短期的作用影响。比率由于我们使用每年的数据,短期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长期作用需要加以密切考察。如表13.4所示,$C/D$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迅速下降。这种趋势可以用二组重要因素加以解释。

第一组因素包括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信用卡的引入和大量使用、支票簿免费、银行为增加存款帐户数量所做的努

**表 13.4 货币比率(%)**

| | 1945 | 1950 | 1955 | 1960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
| $C/M_1$ | 57 | 51.1 | 48.8 | 41.7 | 36.9 | 32.2 | 24.8 | 20.8 |
| $D/M_1$ | 43 | 48.9 | 51.2 | 58.3 | 63.1 | 67.8 | 75.2 | 79.2 |
| $C/D$ | 133 | 104 | 95 | 71 | 58 | 47 | 33 | 26 |

力，以及相当程度的城市化进程。为了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我们使用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为代表性变量。第二组因素有：采取支票和转帐方式支付薪金和工资的趋势越来越强，按月付薪金做法的增多，劳动大军中挣工资者人数的上升。用来表示后一组因素变量的是工资和薪金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总值的比例。由于我们不能够限定一个代表性变量来代表诸如贩毒、走私、卖淫⑨这样名目繁多的活动，因此，我们特别重视偷税漏税对 $C/D$ 的影响。

虽然，直接确定非法活动的规模是不可能的，鉴于从事非法活动所需资金部分可能来自逃税，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活动还是部分地描述到了。为了估计逃税的刺激因素，有必要为法国的情况确定一个合适的税率变量。鉴于增值税与几乎45%的税收收入，我们选择个人所得税收入加上增值税对税前居民收入的比率代表平均税率。少报收入的决定不仅根据直接税也根据间接税。⑩ 使用以上述方式解释的变量，我们根据经验估计下面的方程式：

$$\ln\frac{C}{D}=a_0+a_1\ln W+a_2\ln T+a_3\ln y \qquad (13.1)$$

这里 $C/D$ = 货币－活期存款比率。

$W$ = 工资和薪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比率。

$T$ = 个人所得税加上增值税对税前家庭收入的比率。

$y$ =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计算 1959—79 年间的数据，我们得到以下结果：

$$\ln\frac{C}{D} = \underset{(0.09)}{9.82031} - \underset{(-0.17)}{0.086\ln W} + \underset{(2.99)}{0.917\ln T} - \underset{(-12.92)}{1.636\ln Y}$$

$$R^2 = 0.976 \qquad F = 236.436 \qquad DW = 1.282$$

为了计算出法国 1979 年未申报收入的估计数，我们根据坦齐 (1980) 的方法，先计算由于税率从最初的 1959 年水平到1979年数值的变动而导致增加的货币数量，计算结果表明，约有 369 亿法郎货币可以归结为从初期 1959 年水平到 1979 年水平间的税率变量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方法接着需要第二个假设，即由这种估计的税收导致的货币持有量，所产生的收入量，可以用估计的税收导致的货币量简单地乘以正式经济中可观察到的收入速率而得到。国家信贷委员会 (NCC) 估计，国内生产总值与 $M_1$（收入速度）的比为 4.188。利用这一速率数据，连同估计的税收导致的货币量，可得出未申报收入估计数为 1.545亿法郎，或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6.3%。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方法，由于我们估计数表明，有 369 亿法郎事实上是用来产生未申报收入的，所以必须将这一部分从 $M_1$ 中减去，以便估计修正后的合法经济的收入速度。用后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们发现合法经济部门的收入速度为 4.472，把这个数字应用于税收导致的货币量，得出未申报收入估计数为 1650 亿法郎，或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7%。

我们对法国未申报收入大小的估计数有若干缺陷。其中之一是所用资料的局限性阻碍了我们采用其他估计方法和对估计结果进行比较。这些对法国经济初步测估结果完全依赖

包含在坦齐方法中含蓄的假设，这样就忽略了除税收变动以外影响未申报活动的所有其他因素。因此，这些估计结果也许应该看作下限估计数。

注　释：

① 关于该法律的详细分析及其应用参见 C. 肖安 (1982)。
② 《关于反对秘密劳动的方法的报告》，全国建筑协会，巴黎，1979 年 2 月份。
③ 比利时，1976 年 7 月 6 日，卢森堡，1977 年 8 月 3 日。
④ 勒夫与戈丹 (Greffe and Gandin)1980 年，第 92 页。
⑤ 见罗桑旺隆，1980 年，第 19 页。
⑥ 这项研究还扩展到被询问的失业者家庭经济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未因失业的来临而有明显的增加。
⑦ 税务委员会。(1979年)。
⑧ 在法国，增值税是由总税务局(71%)和总关税局(29%)征税的。
⑨ 没有任何人对法国进行过与西蒙和威特同样的研究。
⑩ 其他税收变量已经检验，所得的结果均不如此变量。

# 14

#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研究苏联的第二经济

苏联官方资料使人们看到一幅完全由中央控制的经济图像：中央计划无所不包，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之间的法律上区别，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看都不重要，这里不予考虑）。这种图像并不因苏联官方容忍有限的私人部门而有多大改变。西方观察家都知道，官方经济并不总像设想的那样运行。刑法中包含对付破坏国家经济制度的几个条款，苏联报纸经常报道对这类破坏和其他攻击制度的起诉。然而，这类事件对苏联经济的整个形象不会有严重损害。这个结论只是在近十五年来开通两条新的信息渠道后，才开始改变：出现了大量来自苏联的非官方（Samizdal）资料，以及许多苏联移民到达西方，他们中许多人带来关于苏联经济体制运行的广泛而熟知的消息。由于这些发展，认为苏联经济是由中央计划、拥有控制的制度的传统看法必须修正。就此而言，谈论苏联的“第二经济”这个假定为与官方（第一）经济共存并成为它的补充的制度就成为惯常的了。本章的目的

是考察这种第二经济与苏联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 定义和专有名词

对主题的进一步沉思揭示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关注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称呼它？换言之，就是定义和专有名词问题。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为复杂现象下定义的大家熟悉的难题，我们怀疑这个复杂现象就隐藏在我们看得见的具体现象后面。这类定义不可避免地包括武断的成分；它们可能会把某些不必要的成分包括进来而又排除了某些必要的成分。然而，定义是一种工具，要是定义不中用，就可以扔了它。最低的要求是它必须包括我们认为有关的核心成分。拿苏联的第二经济（我此刻暂用这个术语）来说，鉴别最近资料中描述的一些这样的核心成分并不难：例如，兴旺的某些货物与商品的秘密市场，范围广大的秘密的个人与团体的生产活动，贪污和行贿受贿成风，打着官方经济的幌子从事私人企业活动，以上只提到几种最惹人注目的。

格罗斯曼在他论苏联第二经济所作的开创性论文[①]中，最先尝试把这些不同因素纳入一个总的定义之中。他提出，生产和交易活动至少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才属于第二经济：(a) 直接以私利为目的，(b) 在一些重要方面明知违反现行法律。[②] 尽管这个定义证明无疑是有用的，但是，它把私利和非法这两个根本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内在的不如人意的地方。一个以私利为目的的合法行动与一个不以私利为

目的的违法行为有何共同之处呢？

金斯伯格和波莫尔斯基提出两个定义，一个范围较广，一个范围较窄，经过再三考虑，选择了前者。范围较广的定义描写第二经济是“不受中央计划直接控制的任何私人的自发经济活动”；范围较窄的定义把上一个概念缩减为“被官方指责为有害，因此被法律禁止的自发性私人活动”。③尽管作者在原则上赞成范围较宽的那个定义，但较窄的定义事实上也是可以使用的。正如他们指出，因为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第二经济的反应上，（从而）依照刑法认为犯罪行为的重要类型来组织讨论似乎是自然的”。顺便提一句，这也说明了我给予定义工具性质的观点：由于使用“自发的”这个词，对金斯伯格和波莫尔斯基的定义，人们可能感到有些不安；至少对本文作者来说，这个词看来不寻常地含糊。

怀尔斯在他研究平行经济的德文版著作中，对定义问题费了不少心血。④他对平行经济所下定义的中心思想是反制度行为，“指与所研究的国家实际经济制度不相符合的一切事情。（我的译文——E. 菲尔德布鲁格）其反面就是遵守制度的行为，也称官方的行为。我并不觉得这个专有名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它令人疑惑，实际经济制度从这个词的任何正规意义上说是否应该包含平行（或第二）经济在内。反制度行为也叫不正当行为，而与此同时，后一限定条件正好与不合法形成对照。这就意味着，在怀尔斯看来，反制度行为不能断定它本身是非法的（违法的），而是不公正的，与自然公正相反的，或者一句话，违背现行制度。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怀尔斯提出了一个列举性定义，把反制度行为等同于违法分配或生产、逃税、逃避价格管制、盗窃，以及行贿受贿。后

四个因素涉及违法交易；前两个因素涉及非法增值。

卡采涅林鲍伊根又一次使法律标准成为决定性的，他试图阐述苏联的各种市场。在他的有关"有色市场"的研究中，他采用了两组特征：根据它们的合法性（分为合法、半合法及非法的市场）；根据他们同中央计划制度的关系（分为固有的、社会主义的和发展不完全的市场）。⑤ 后一方面说，主要根据成员活动的非法性来为第二经济下定义，就要招来质问：立法者为什么偏要禁止那些活动。这一点引导我们作如下的思考：对第二经济的最合适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察者的观点。他也许主要对现象的经济或法律方面的具体细节感兴趣。如果人们想把第二经济放到苏联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背景中考察，那么，定义应该重视这一制度的本质特点。正如本章第一句就说过，它显示是由中央全盘控制的经济制度。既然政治和社会制度由严格的无所不包的中央控制，它们与经济密切协调是不可能怀疑的。

在经济上，中央控制主要表现为两项制度：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显然，这两项制度密切相关；很久以前，它们就已经被描述为苏联经济制度的动态方面和静态方面。⑥ 苏联的多种多样的综合计划只有在中央政府对生产资料保持不受挑战的控制下才能实现。实现这种控制靠种种法律手段；苏联政权选择这样的制度，在这个制度里大部分生产资料直接完整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余的分配给许多合作社所有（主要是集体农庄所有）。一个合作社在经济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与一个国家企业差不多，因此，除了法律形式外，合作社所有制可以看成是一种间接国有制的形式。为了完整起见，必须补充的是，还有法律认可的（否则会受到严厉限制）

从总体上看没多大意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

相反，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按马列主义政治思想的要求，自然需要全面的中央计划。先把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单一的所有者手中，然后，允许他们不协调地运用。

一旦掌握了苏联经济制度的这些基本特征，发现法律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和理解为什么第二经济的定义很容易牵涉法律标准就不困难了。苏联类型经济制度在许多方面是高度人为的，因而是脆弱易损的制度。要不是用许多法律和禁令来支撑它的虚弱部分的话，这一制度会迅速地全面崩溃。这一制度越是全面和完整，单一功能失调的后果就越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只要取消几个关键性禁令中的一个，苏联的整个经济制度就会受到致命的影响。禁令最重要的是刑法中反对投机的条款(第 154 条)，禁止从事某些职业的条款(第162条)，禁止中间商的条款(第153条)，以及禁止外贸与外汇投机的条款(第88条)。"投机"这个词在这里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刑法规定投机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买卖活动。在刑法中还有许多别的条款反对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但是，前面提到的一些违法活动(以及其他一些违法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所包括的活动普遍存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而且只要不受到明确的禁止，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自发地从事这些活动。其结果是，如果人们这种期望证明是正确的话，公民们会大量进入合法的和公开的经济活动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因此将不再是社会化和受控制的。这将粉碎想要由社会掌握生产资料那种经济的主张。正是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国家和苏联经济的组织体制

和法律制度。一旦没有法律禁止和保护，它们就将不再存在。

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着手给第二经济下一个定义。这样的一个定义以如下的考虑为出发点，即苏联经济自命是，实际上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部受中央控制的经济，也就是以全面的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的中央(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如果把这部分经济看成是第一(官方)经济的话，那么，第二经济就可以定义为它的补充。它们加起来就构成苏联经济生活的全貌。因此，第二经济就是指不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不包括在生产资料国有制中从而逃脱中央控制的那些经济活动。

刚才所下的定义有一些重点与金斯伯格和波莫尔斯基那个范围较广的定义——认为第二经济就是"不受中央计划直接控制的经济活动"——有很大相同之处。这个定义同样接近伯尔曼(Birman)在关于"第二和第一经济与经济改革"的论文中阐述的观点。伯尔曼认为，最合适的专有名词能指明"内在地属于社会主义形式的经济"为第一经济，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为第二经济。⑦但就在他谈了这方面的选择后，他却声明他采用格罗斯曼的方法，尽管有某些修正。结果，伯尔曼第二经济的定义又是由列举各种活动组成，根据两个标准归类(两个都是有关法律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如何？(合法、半合法、非法)以及牵涉到的产权关系如何？在研究定义问题的下一节中，我们将再讨论伯尔曼的分类法。

这里提出的第二经济定义的最重要的后果或就是它的全面性质引导它把完全合法的特别是苏联农业中重要的私人部门包括进去了。我觉得，从这里所取的研究角度看，这样的

后果既合乎想望又有优点。它进一步突出了波莫尔斯基（和其他作者）在其他地方构思的，苏联经济机器模型[8]。

苏联经济（事实上整个苏联社会）都是按照机器模型组织的：一个政治经济处理中心，提供最大量的有关数据资料，配备"绝对正确的"解释资料的工具，作出一切重要决策。决策传达到系统的各个部门并被忠实执行；它们的执行情况迅速而准确地反馈到控制中心。这个机器模型的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假设，那就是存在理想的合作。

根据这种观点，发生在中央控制经济机器之外或有损于中央控制机器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第二经济部分。这个定义就这样允许许多不同的经济活动集合在一个公式之下，但这些活动之间的关联性不会是一目了然的。

这一定义也受到它的某些成分不清晰这样一种通病的影响。我们提到用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中央（国家）所有制这对孪生概念来解释中央控制经济的内涵。即使像在本章中那样没有采用其严格的法律意义，生产资料中央（国家）所有制的概念还是很清晰的。国有制在苏联宪法第11条有规定，在苏联民法中解释得更详细。在本章中，假定国家所有制也包括苏联宪法和民法中规定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那样的合法类型，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国家所有制的含义就是苏联法律上所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对立）。然而中央计划包括什么，这点更加不清晰。例如，人们不能说私人农业生产完全处于苏联中央计划控制之外。在起草农业生产计划时，国家肯定考虑到私人生产。目前，国家甚至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改善私人农业某些方面的条件。[9] 为了不陷入细节末端，我建议把中央计划的概念限于那些正式包括在计划

中的经济活动。

有关提出的定义的最后一个观察结果涉及"经济活动"这个词。也清楚地显示出某些固有的含糊性。尽管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可能会有某些帮助。在苏联，专职司机经常偷窃液体燃料在黑市上倒手出售给私人汽车主，这是尽人皆知累有记载的现象。[⑩] 它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活动，它构成第二经济的一部分。旁观者偶尔窃取一听燃料油不是经济活动，尽管所有这些盗窃活动的总计对经济产生一种可以预测和计量的影响。

最后，留待我们解决的就是名称问题。应该给暂时称作第二经济的现象以什么名称呢？我们可能又要提出这么一点，即不同作者选择的不同观点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合理变异。当研究的目光集中在非法经济活动上时，那里就整个地讲述非法市场和非法经济。就本章框架而论，中央控制经济的概念是关键思想，采用主要涉及有关活动的法律性质的术语就没有多大帮助。换句话说，"黑市"、"非法经济活动"，以及类似名称都不合适。"私人经济"这个用法也不行，因为我们将知道，中央控制经济与我们想要说的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为后者所渗透，所以第二经济就不只是私人经济了。把我们的主题叫做"观察不到的经济"也是矛盾的，因为现在研究的关键就是要观察、分析和解释这个经济。摆脱这种专有名词困境的最现实的途径就是找一个本身没有什么准确含义的中性词。显而易见的在手头的词是"平行"，"第二"和"非官方"的经济。"平行经济"和"第二经济"已经被几个作者所用，而且"第二经济"似乎是谈到苏联经济时用得最广的词，因此，我准备采用后一个名词。

## 信息来源

收集苏联第二经济信息出现几个特殊的问题。许多基本的信息收集技术在这里不能为西方学者所采用。而且，阅读苏联的经济统计材料通常得具有特殊的才能，同样重要的犯罪统计数却被当作国家机密看待。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了对这一现象进行令人满意的数量分析，我们在下一节中再讨论这个问题。

当我们开始较一般地深入探讨苏联第二经济的结构形态、它的社会意义以及它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等问题时，情形就要好得多了。令人吃惊的或许是，对各种各样的第二经济活动的详细描述是苏联报刊本身提供的。苏联报刊经常报道各方面不正当的经济活动。在《当代苏联报刊文摘》年鉴的有限篇幅里(它包括所有苏联出版物)，1981 年就有五十多个条目涉及第二经济。⑪这意味着在最近二三十年里，这类报道在整个苏联报刊里一定不下数万次。苏联报纸的杂志偶尔也登载比较全面的文章，讨论第二经济现象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这样的一些文章通常限于措施激烈地批评有关活动，并呼吁加强警惕和压制。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作者提出了比较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建议。⑫从官方报刊收集到的资料通常可以通过阅读非官方作品得到补充。⑬非官方作品自六十年代出现起就很注意经济问题，因之，对第二经济活动有许多报道和分析。

这些非官方作品很自然地在西方出版的苏联流亡者的著作中找到扩展的机会。其中对我们当前的课题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有瓦列里·恰利泽论苏联犯罪的著作，⑭ 符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的自传，⑮ 澳斯兰斯基对专有名词的研究，⑯ 泽姆佐夫的“党还是政治恐怖集团？⑰”以及这些作者和其他人的一批更简短的研究作品。

许多去过苏联的访问者把对第二经济现象的讨论和有关的轶闻证据写进有关苏联的更一般的著作中。⑱

所有这些著作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供了有关苏联第二经济的第一手资料。这批大量的原始资料现在已经使西方所做的第二手研究获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其中，格雷戈里·格罗斯曼1977年发表在《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的开创性研究论文，上文已经提到。⑲ 其他重要文章可以在《苏联研究》和《概览》中找到。

## 苏联第二经济的规模

估计苏联第二经济的规模要被西方国家承担同样工作，遇到的同一障碍所包围，还要遇到不少由于苏联相应资料的缺乏和难得而产生的外加困难。初步碰到的困难是本章开端谈到的定义问题引起的。没有必要指出，如果人们想从数量角度谈论苏联的第二经济，例如，是否把有关私人自留地的合法农业生产的数据包括进去，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一旦研究者头脑中清楚了给予“第二经济”的含义，他就

得选择搜集和分析数量资料的方法。一些西方学者曾提出这个特别的方法论问题。⑳

前苏联公民发表过具有初步水平的有根据的猜测，他们提到第二经济占第一（官方）经济的百分比为10—50%。奥弗和维若库尔对同一资料作了较大规模的有条理的利用，他们以对现在居住在以色列的约一千个苏联移民家庭的家庭预算调查为基础作出估算。㉑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城市私人经济部门占总家庭收入的10～12%，全部消费支出中约18%用于私人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然而，城市消费部门中的全部私人活动不超过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数的3—4%。

根据奥弗和维诺库尔的数据以及类似的资料、苏联官方统计数字和一定量的猜测，怀尔斯估计人均个人收入中约有12—13%来源于第二经济。㉒

当把第二经济的合法部门也包括进去时，情况会有很大改变。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可靠的数据，尽管有些陈旧。根据中央情报局1968年的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10%来自合法的私人部门，其中76%产生于农业，22%产生于住宅建筑业，而2%产生于服务业。格罗斯曼认为，自1968年以来，合法的私人部门的份额减少了。㉓

就数量方面谈苏联第二经济的全面影响，最明智的态度肯定就是赞同大多数学者们的意见，他们称这个影响相当大或者“很重要”。但当注意力转向特殊部门或特殊地区时，情况就不同了。在那种情况下，各种方法有时可以说得更加精确，因为苏联资料本身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苏联报刊报导中偶尔也引用有关某个特定城市或省份中具体违法活动的准确数字。这些数字通常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对某个特

定经济单位(某个商店、加油站等)的表现，作一天或一周的严密监督，然后对照“正常的”表现。奥赫恩收集了大量的这类新闻报道资料，然后用它们来确定苏联第二经济中消费部门的重要部分的数量。[24] 这些资料表明，在许多地区第二经济超过了官方经济，这一事实已得到其他苏联新闻报道以及一些观察家报道的充分证实。例如，在哈萨克共和国，汽油和润滑剂产品的第二经济市场份额为80%；莫斯科，房屋修理和装饰的第二经济市场份额为70%；格鲁吉亚共和国，房屋修理中第二经济占98—99%。有关非法获得私人小汽车燃料的新闻报道可能为力图得出第二经济某一具体活动更准确数字而遇到的种种困难提供一个极好例子。另外的资料提到苏联库尔斯克的10个加油站收入273，000卢布，而未受监督的前一年同期只收入88，000卢布；鄂术斯克1971年消费的石油中只有13.5%是向国家合法购得的；奥廖尔加油站的收入在监察时期上升了200—1000%。[25] 所有这些都与一家报纸的报道一致，这篇报道说，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私人摩托车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用非法获得的燃料驾驶的。然而，可以用合理的信心说，实际数字可能在40—90%之间。

对生产部门没有作过类似研究，尽管也有一些零散的同样资料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例如，据报纸报道，在库尔干省，由正规的一批建筑人员从事的私人建筑活动完成的工程项目价值达到7000万卢布，而同期官方的国家建筑企业完成量只占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二。[26]

范诺斯对东欧和苏联的私人(非法的)外汇市场作了专门研究。以他对其他东欧国家的计算为基础，1977年流入苏联黑市的硬通货量的一个谨慎的估计数达到五亿美元。[27]

特雷姆尔对苏联酒类消费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也论述了非法酿酒问题。在 1957—1972 年整个期间，非法酿酒的生产和消费数字至少占烈性酒生产和消费总量的 40% 左右。[㉒]

研究第二经济规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地域差别，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在对第二经济对许多一般性讨论中，它是格特鲁德·施罗德·格林斯莱德的专门研究对象。[㉓] 怀尔斯在其对苏联"平行经济"的研究中，试图把他对第二经济活动在个人收入构成中所占份额的估计数作一个地理上（城市/农村）的分解。这些研究中始终看出这么一点就是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特殊地位。后一个共和国由于它在这方面的显著领先地位，得到研究苏联第二经济学者的特别重视。这一地位可能根源于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气候特点，以及它的居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国民性。怀尔斯的估计，格鲁吉亚农村得自第二经济的个人收入高于其他高加索共和国32%。

作为总结，要说的第一件事是，还不能得出有关第二经济全面影响合理地可靠而准确的数字有两个原因。首先，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个第二经济的定义，它可以在第二经济和第一经济之间划出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的（即不是任意的）界线。其次，就算有可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也没有充分的数据库用以得出需要的数字。

就更专门的水平而言，也就是说，就具体的经济部门或地理区域而言，偶尔能够提供可靠的数字。它们证实从各个方面研究的已经知道结果，那就是第二经济在生产消费商品和服务中是相当重要，有时是压倒性重要的。在资本货物生产中第一和第二经济交织在一起，是使其本身不易计量的一

个问题。

## 第二经济的形式

在说明和划分第二经济的表现形式时，这又是观察者所采取的观点和由这个观点所下的定义来决定要选择的方法。根据法律观点看第二经济，最自然的程序就是根据它们可以归属的各种犯罪行为：投机、计划欺骗、行贿受贿、欺骗顾客、从事被禁止的交易活动等等来排列各种第二经济活动。这可以理解的是金斯伯格和波尔斯基在他们对法律实施与第二经济的研究中遵循的程序。

伯尔曼根据他对整个苏联经济的分类，提出更详细的说明。[30]他把苏联经济分成九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又由几个分支组成：

1．国有部门（由国家预算拨款的机构以及自负盈亏的机构——经济核算制组织）；

2．合作社部门（集体农庄、渔业、商业、建筑及其他合作社）；

3．准资本主义部门（有某些特定法律特性的国家控制企业，如 InTurisT 和苏联外贸银行）；

4．中间部门社会主义经济中（合法性含糊的各种辅助性活动，如私人建筑队为集体农庄从事的经济活动，国营企业使用的私人代理人，工业企业为工作人员利益从事的农业生产等）；

5. 私人合法商业活动(农贸市场、集体农庄市场贸易、出租私人公寓、某些允许的私人就业形式);

6. 私人合法的生产活动(私人自留地农业、狩猎、捕鱼、建筑以及修理私人住宅);

7. 半合法的私人部门(允许不付规定税金的私人活动、接受小费、集体农庄工业生产等);

8. 非法的私人经济活动(盗窃公共财产、未经授权使用公共财产、受禁止的生产活动、行贿受贿等);

9. 非法的私人贸易(出卖非法获得的产品、投机、外币交易)。

这些活动中，伯尔曼认为后三项全部以及五、六项部分构成第二经济。

阐述各种形式的第二经济一开始这方面，我遵照格罗斯曼的例子，就有理由承认苏联经济不像官方自称的那样是通盘由中央控制的。生产的完全社会化当然是官方欢呼的理想，而且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还存在不是完全不重要的私人部门，这一点也得到官方的承认。对此承认的最有权威的最近表示是1977年苏联宪法的十七条：[31]

在苏联，根据法律允许为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服务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领域里的个体劳动活动，以及完全以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活动。国家管理个体劳动活动，保证其利用符合社会利益。

这一条款使许多活动得到宪法的尊重。这些活动中，最重要和最有名的是私人农业。[32]尽管土地国有化和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完全社会化，集体农民的个人家庭还是正式获得了小块自留地，(最多为0.5公顷，不过通常要少些)以供自需。

这种私人自留地上生产的剩余产品可以在集体农庄市场出售。但是理论上只是对国内现实生活的有节制的让步，却产生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食物产量来源。根据1979年官方资料，全国农业生产中，自留地生产占如下百分比：土豆，59%；蔬菜，31%；肉类，30%；奶，29%；蛋，33%。㉝

私人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住宅建筑。在农村，房屋通常都是由业主居住，就整个苏联来说，约有一半人口住在私有的住宅和公寓内。㉞

在其他一些私人生产和服务部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某些职业和商业不可能合法地从事，因为它们受刑法公布的总的禁令的影响。例如，法律禁止投机，把投机规定为以盈利为目的商品买卖活动。这一条款虽然使得合法从事的许多职业和商业成为不可能，而这些职业本身不可能彻底禁止，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某些活动受明确禁止，这方面最重要的根据是1976年5月3日公布的"手工业和商业法令"。㉟它列出了一些禁止从事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食品加工（自用或用自产原料生产除外）化学制品和皮革制品的生产以及客运和货运。没有受一般的或特别的禁令禁止的活动，原则上是允许从事的，但是要受相当严格的登记和批准制度的约束。提一提最重要的限制是，这些得到许可的活动，可能只允许执照持有者一年期内在居住区域内的固定地点进行，所有合法私人经济活动的规模受到宪法禁止一切形式私人雇工规定的进一步限制（家庭成员例外）。这意味着合法私人企业的规模被限制在家庭规模之内。

总结苏联经济中合法私人部门的重要性，可以说它被限制在特别规定的活动内，尽管它在小小的生产单位内经营，

但在其许可的经营领域内，它具有相当可观的重要性。

有关苏联合法私人部门的另一个观察结果，通常可以插入这样一点，即有关消费自由问题。今天苏联社会早已不是严格的军事模型，也就是不再是食品、衣服、住宅都由中央统一分配、消费者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社会。当然，苏联政权以某种消极方式通过使人们得不到某些商品来控制消费者的行为。这就常常迫使苏联公民只能买一些正在出卖的别的商品(或服务)。反之，如果可以选择商品，供给超过需要，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消费者并不认为某种商品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实际上就有自由不使用国家提供的商品。这一点，在苏联官方生产的大量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通常因为明显的质量低劣实际上不受消费者欢迎。

综览合法私人部门，经济的法律方面，为说明整个第二经济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入门，那就是合法、半合法和非法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错综复杂相互缠绕的网络。从合法向非法的过渡，用私人农业的例子很容易说明。私人农业本身是合法的，只要生产是在正常的劳动时间以外，在指定给他耕种的那块土地上进行。但是，因为农民常常想从自留地上获得较高的收入，这种安排往往促使他在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中劳动纪律散漫。更严重的是，鉴于用于自留地生产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都普遍而且长期地短缺，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拿走必要的工具、肥料、建筑材料等等东西。私人自留地上的剩余产品可以在所谓集体农庄市场上合法出售，这些市场通常设在城镇附近。最易获得的运输工具通常是向集体农庄“借来的”卡车。就销售农产品而言，对生产者非法卖给有比较可靠和固定销路的中间商。

而且，绝大多数交易的违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在于至少需要第三方的默许或积极合作，这个第三方将期待有一定报酬（农场经理、监督人员、卡车司机等）。[36] 在大多数合法私人活动中，这种格局反过来形成一种经济特性，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在此，应该对“半合法的”（参照伯尔曼的“中间经济”，卡采涅林鲍伊根的“灰色市场”等等），这个自相矛盾的术语说几句话。一般说来，这个术语可以用于这类活动和交易：它们包含不合法的成分，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受到政府压制。违法的原因和官方不采取行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只提几种可能性：交易可能代表和符合某家国营企业的利益，它可能是私人的和合法的活动，但是没有在管理部门登记，因此逃避税收；或者它可能受到官方鼓励但却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属于第一类的著名例子是有长久历史的国家企业的非正式代理商的活动，通过非正式的协商（不排除行贿）确保企业能够得到必要的供给、许可、专业人才以及一般地能使企业完成计划所需要的一切。[37] 第二类包括公寓和假日别墅的出租，私人教授、医生、牙医、护士、律师（尽管这些服务原则上讲可以免费得到），以及许多其他私人提供的有偿服务。[38] 缺乏强有力法律依据而受官方鼓励活动的一个重要例子是近来发动的鼓励的工商企业、其他国家机关和军事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运动。[39] 对这个问题有关的相当健全的法律把这样的活动看作极端行动，因此是不容许的。但是，这一点已经完成了学术上的空谈了，因为现行做法在1978年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决议中受到现政权的高度赞扬。[40]

西方有关苏联第二经济的文献为后者描绘了一幅丰富而详尽的图景，这里无须重复其他地方已做的工作。相反，我建议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分类问题上。当选定有力的强法律焦点时，这项工作不是太复杂的。那时各种各样的第二经济活动可能归属于刑法规定的有限几个违法行为。表14.1提出一些与本章主题直接相关的观察结果。

**表14.1 苏联刑法中的第二经济活动**

| 苏联刑法条款 | 犯法种类 | 对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的最高处罚 | 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正常态度 |
|---|---|---|---|
| 78 | 走私 | 10年 | 刑罚较轻 |
| 88 | 违反外汇交易规则 | 15年或死刑 | 刑罚较轻 |
| 87 | 制造或运送假钞或假证券 | 15年或死刑 | 刑法较轻 |
| 89—97 | 盗窃或其他挪用社会主义财产 | 15年或死刑 | 刑法较轻 |
| 152 | 出售低质量、不合标准或未完成产品 | 3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2—1 | 歪曲计划完成情况 | 3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3 | 私人企业和中间商活动 | 5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4 | 投机 | 7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4—1 | 囤积作牛饲料的谷类产品 | 1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5 | 非法使用商标 | 6个月 | 相似处罚 |
| 156 | 商店、餐馆等场所欺骗公众 | 7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6—1 | 违反酒类交易法规 | 1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6—2 | 向顾客收取非法报酬 | 3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续表）

| 苏联刑法条款 | 犯法种类 | 对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的最高处罚 | 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正常态度 |
|---|---|---|---|
| 156—3 | 商店职员违反商业法规 | 3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7 | 出售劣质、不合标准完成的商品 | 2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8 | 非法生产储存销售酒精饮料 | 5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59 | 伪造邮票及运输票证 | 3年 | 相似处罚 |
| 162 | 从事被禁止的行业 | 4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63 | 非法捕鱼 | 4年 | 相似处罚 |
| 164 | 非法捕猎海豹海狸 | 1年 | 相似处罚 |
| 166 | 在保护区以偷猎偷渔 | 1年 | 相似处罚 |
| 166—1 | 交易未盖许可印记的毛皮衣 | 1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67 | 私人采矿或探矿 | 5年 | 无直接对应法律 |
| 169 | 非法伐木 | 3年 | 相似处罚 |
| 170 | 滥用职权 | 8年 | 无相应法律 |
| 171 | 越权 | 10年 | 无相应法律 |
| 172 | 玩忽职守 | 3年 | 无相应法律 |
| 173 | 受贿 | 15年或死刑 | 刑罚较轻 |
| 174 | 行贿 | 5年 | 刑法较轻 |
| 174—1 | 作行贿受贿中间人 | 15年 | 刑罚较轻 |
| 175 | 官员伪造文书 | 2年 | 相似处罚 |
| 196 | 制造销售或使用伪造证件图章等 | 5年 | 相似处罚 |
| 199 | 未经授权占用土地或建筑物 | 1年 | 相似处罚 |

（续表）

| 苏联刑法条款 | 犯法种类 | 对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的最高处罚 | 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正常态度 |
| --- | --- | --- | --- |
| 208 | 获得或转让非法获得的财产 | 7年 | 相似处罚 |
| 212—1 | 未经授权使用摩托车 | 3年 | 相似处罚 |
| 224 | 生产和拥有麻醉剂 | 15年 | 相似处罚 |
| 224—1 | 盗窃麻醉品 | 15年 | 相似处罚 |
| 224—2 | 怂恿吸毒 | 10年 | 相似处罚 |
| 225 | 种植含麻醉物质的植物 | 8年 | 相似处罚 |
| 226 | 卖淫或赌博窝主，拉皮条 | 5年 | 相似处罚 |
| 226—1 | 吸毒窝主 | 10年 | 相似处罚 |
| 228 | 生产和从事色情品交易 | 3年 | 相似处罚 |

## 与西方法律制度相比较

比较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西方非常缺乏一致性。西方国家里许多经济犯罪只在几个法律制度中才有规定。就是在西方刑法中相当普遍地包括的法律行为，刑法允许伸缩范围以及法院和执行机关的实际做法有巨大的不同。更糟糕的是，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犯罪，实际上在苏联与西方相比其结果大不一样。例如，外汇交易（或如苏联法律所称的外汇投机）在某些仍然实行外汇管制的西方国家或多或少的严重犯

罪；但是在苏联，它被视同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几乎与叛国、间谍等罪相提并论。

**苏联经济的不同性质**

试图与西方法律制度作一次有成果的比较遇到前面讨论过的严重障碍，那就是反映在法律制度中的苏联经济的根本不同性质。例如，众所周知的盗窃罪，在苏联的法律中被分成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个人财产两种，各有自己不同的量刑范围。被称为“官员犯罪”的种种罪行（刑法170—175条），因为在苏联，经济、教育、服务等方面没有私人部门的事实使它们具有特别的苏联色彩。因此，在苏联社会中，几乎在任何工作岗位上的任何人都是官员。

**不把逃税作为犯罪**

特别对于西方观察者来说，不把逃税作为特定的罪行，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其理由对于整个苏联第二经济的整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苏联国家拥有和控制着几乎整个经济，国民的巨大收入直接从国有经济中获得。绝大部分人口直接或间接为国家雇佣，从而根本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以很低的所得税率预扣工资较高雇员的所得税。此外，少数公民或者做个体户（宪法禁止私人雇工）或者被允许私下获得额外收入。第一类主要是手艺人，后一类主要是教师和各种类型的医务人员。根据一定标准估价前者的每年收入征税；后者有义务根据精确规定的簿记制度申报自己的额外收入。理论上，这一制度使得要求个人收入者支持汇总他们收入总数以便财政估计税额已无必要。他们的任何不正当行为都有刑法的专门条

款如第175条(官员利用伪造文书)或第196条(伪造证件)以及其他条款加以制裁。不过,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由于苏联国家收入制度的性质,公民个人支付的所得税和类似税收并不重要,从而,个人逃税几乎无足轻重。

表14.1所列举犯罪行为所反映的许多活动,根据本研究的定义,它们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第二经济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例如第153条,私人企业)肯定属于第二经济,然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通常与第二经济无关。而且,各种与第二经济相关的犯罪活动的相对重要性并不一样,例如,非法使用商标几乎无法与行贿受贿这样的重要犯罪相比。这样的考虑(在我们看来)使得以刑法作为研究起点来比较全面地说明第二经济是不大合适的。然而,这方面最重要的考虑是大多数第二经济活动都包含有几种性质各异的犯罪,而根据刑法应该怎样确定某些活动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个偶然性问题了。按这种思路,根据刑法对第二经济活动进行分类可能要把那些本应合到一起的种类分开来。

前面提到的私下经营农业的例子可能引起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例如化肥、未经授权占用土地、商业中间人的服务、投机、滥用权力)在几个阶段还有行贿。

在这方面较有前途的是应用以经济职能作用为基础进行分类。伯尔曼和采温林鲍根等人选择了这种方法,他们考虑这样一些项目,如代理人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国营企业或机关、集体农庄、单个雇员或企业家),有关的商品或服务的类型(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服务的生产者和接受者),有关活动在经济系统(工业、农业、贸易等)中的分布。我不想重复进行他们的系统分析工作,也不想装模作样地进行全面综合,

我打算通过把最常见的或者最重要的活动归并成一组相似行为来描绘出一个第二经济合理平衡的图景。

**侵蚀国有财产**

在苏联模式国家控制经济的情况下，国家财产无所不在，每个工作者在其岗位上都直接与之接触。最可靠资料同意盗窃社会主义（国家）财产的行为已经普遍到了哪里有国有财产哪里就有盗窃的程度。相比之下不那么严重但却普遍存在的盗窃形式就是把少量产品（价值小的产品，比方说工具或材料）拿回家里去。㊶有位作者提到有一群莫斯科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到哪里买文具，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买过，都是用公家的。㊷当然，这种现象在西方也尽人皆知。

比较严重的是，有这么一些人，尤其是店员和运输工人，他们往往乘工作之便大量盗窃建筑材料。这类盗窃是非法建筑行业也是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半合法建筑工程的主要供应来源。㊸

官方消息来源承认，私人汽车主的燃料需求中至少有1/3是靠非法转移的国有燃料来满足的。㊹其他消息来源指出，它那个地区这个比例要高得多，达到80%。㊺这个例子说明这种活动的制度化特性：它不是个别预期的消费者偶尔在加油站攫取一罐汽油的问题，而是正规性的普遍做法，卡车驾驶员有计划地谎报耗油量报表，从而通过经常性渠道卖掉多出来的油。㊻

一个相关的领域就是仓库保管员和运输职工盗窃运输中的商品。㊼这类商品正规地通过黑市处理掉。店员，特别是卖服装和食品的店员，传统上都是低工资。他们往往拿走

店里的部分供应品，再通过“后门”出卖来补充他们的收入。[48] 许多商品长期短缺和供应不足有力地助长了此类做法。这类行为不仅难以察觉，而且往往与一个广大的保护、行贿、回扣的网络连在一起，把当地警察和党政官员牵连进去。[49]

侵蚀国有财产的一种稍为不同的方式就是有些企业经理把部分企业产品从官方渠道和出口转入非法交易的做法。[50] 这种做法也可能稍微变化一下，如转移官方供应品使之用于假官方实际是私人的生产中。后一种做法甚至列有专门对付的刑法条款，第 153 条第一节：“使用国家、合作社或其他公共企业的生产资料从事私人企业活动。”[51]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收入可能由参加的个人私下装入腰包或作为企业收入，但不反映在帐簿上。这种做法又一次使人明白，就是一种第二经济活动也可能包括若干不同的犯罪行为。

在所有这些侵蚀国家财产的现象中，盗窃是常见的，但並不是主要的犯罪。侵蚀国家财产的最具特征的做法是，属于国家的产品被那些对它们有一定管理权的人从国有部门转移出去，他们根据经常的做法改变这些商品的渠道进入其他经济部门，当然，普通的盗窃在苏联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把非主要的寻常盗窃活动当作第二经济的一种没有多少启发意义。

**国有财产被用于私人目的**

把国有财产用于私人目的的显然与前面几段描写的活动有关。详细地考察一下有关做法，将说明二者的差异。一定级别的官员利用属于他们控制的设备这种现象是再普通不过了。企业经理和其他高级职员可以用企业建材和人员为自己

建住宅或别墅。㉜这样的工作或者也可以由关系好的企业伙伴来做。另一个例子就是以企业的支出给自己家里做维修工作。在这点上，汽车的修理是相当重要的。公家的汽车可以由私人使用或由亲戚关系户安排。要员的汽车司机一般都允许于夜间兼做出租车司机，甚至外国观光者都经常注意到这种情况。

虽然这类行为可以列入盗窃国家财产，但是强调的应是"不正当地使用国家财产"，而且，主要受益者的活动（夜间司机例外），其目的在于直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第二经济的下一阶段提供资源。

**作为收入来源的行政权力**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里，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处不及的地步，从而，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的批准和合作。对于公民个人也跟对于国营经济中任何活动一样，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官员超出严格职责以外的合作行为或拒绝行为，可能受一些考虑的驱使，对申请者的个人感情，想改善与更高级官员的关系等等。在这种行为全部或部分朝向经济后果的地方，它就进入第二经济的范围。关于后一种行为，要划清的最有用的界线就是以其目的为根据：给予或拒绝合作是出于私人利益还是出于某个国家经济部门利益？附带地再一次强调，像人们在说明第二经济时所作的大多数区分一样，不存在明确的界线。在这一段中所设想的活动通常都既可以为个人利益服务又可以为雇佣当事人的组织的利益服务。而且，受到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部门越小，公私利益的界线越分不清楚。

最通常为人引述的利用(或滥用)行政权力作为获得私人收入来源的例子，自然来自公民个人与政府机关密切接触的领域，在那里，前者通常为了获得某种许可而讨好后者。在获取驾驶执照、购买汽车配额、分配分房、居住许可、入学等方面，接受现金或商品形式贿赂的现象有广泛的报道。[33]在违反交通规则事例中，官吏为要求报酬而拖延处理的情形十分普遍，甚至在行政机关与第二经济勾结形成的更大更制度化犯罪水平上，官吏也采取这种态度。[34]事实上，许多第二经济活动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那些应该制止它们的大批官员们出于本身的利益宁愿不干预它们。

使用行政权力或公职来增加国营经济部门的利益有可能比为私利而采取同样手段更加普遍。并非国营经济系统的每个环节都与公民个人有接触，但是，总存在与其他国家组织接触的情况。后一种交往主要具有经济性质，因为整个经济原则上是由国家经营的。就国营经济的经理一级或较低级的官员来说，存在许多机会利用行政处理权来增加自己经济单位或行政单位的利益。事实上，说这就是官方经济运行的方式是不算夸张的。企业经理部门有自由处理的合法范围和更大的实际可由个人决定的自由区域。在这些界限内，企业可以从事有关供应品备件、使用的材料、建筑物、劳动力、信贷和资金的交易。这些交易中有一些可能完全合法，但有许多只能认为是半合法：也就是它们得到直接有关监督部门容忍或不顾(它们的按兵不动，当换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时，其本身就成为第二经济活动)。在另一些交易中，非法性占优势，例如，在交易的一方得到未批准的现金支付，这实际上构成了贿赂罪。

## 投 机

投机是苏联法律给予在其他社会属于基本商业交易活动（旨在盈利的买卖活动）的称谓。法律并没有在公民私人与社会主义经济实体之间划分明确的界线。大概是认为被单独允许从事合法交易的后者不会为利润而进行交易（尽管一般都要求它们要有盈利：经济核算原则），而只会为公益或类似目的而交易。很显然，法律并未绝对禁止私人订立销售合同。在苏联人看来，要反对的是从事买卖活动作为固定收入来源。什么合法什么该禁止两者间的界线又模糊了，苏联刑法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特色，一方面，它使当局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另一方面，使公民永远处于说不准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境地。

投机常常作为第二经济活动链中的一个最终环节出现，如前面引述过的私人农业生产的例子，但是，它也是作为或多或少独立活动发生的。它是在官方引起的或容忍的大量消费品短缺的总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商品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可能要通过第二经济生产或通过国外进口来满足。国内第二经济（直接生产或侵蚀官方经济生产）生产的最重要种类的商品是农产品和其他食品、酒、饮料和啤酒、汽车、汽车及国产机械的备件、服装、书籍[55]和磁带。[56]外国商品通过外国旅游者和有机会到国外旅行的苏联公民带进国内的。最重要的商品是服装，任何人只要在苏联大城市逛一逛，都会看到西方生产的服装十分流行。说在苏联国营店里看不到这些产品恐怕不会错。带回西方的纺织品，表面上称供自用，实际上私下以高价销售，这样的机会是苏联公民寻找的最有物质价值的特权之一。其他进口的物品是手表、书籍、家用电器

以及类似的不太大的物品。

繁荣的西方进口品市场的附属品的外币交易。[65] 促成外币交易的原因不仅因为打算出国旅游的苏联公民的需要，和苏联政府采用的不现实的官方汇率，也因为持有外币在各种第二经济交易中能够很方便地使用。在官方的评价等级中，外币交易几乎属于最严重的非法行为，它们在刑法中是放在国家的罪行一章论述的，职业性的外币投机者通常要被处以极刑。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思想上的曲解，而其他东欧诸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灵活得多的态度，它们已经学会了让这种交易存在，甚至懂得了从它们公民进行的非法外币交易中获得好处。[66]

## 被禁止的行业和活动

一般说来，在向私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劳务方面，官方经济的成绩都不佳。食品和纺织品的生产以及住宅建设就是令人瞩目的例子。第二经济填补了这一空缺，成为市场的一个重要部门，最著名的是私人农业的贡献，不过，实际上，其他一些部门第二经济所占的份额甚至还要大些。例如，有资料表明在家庭维修方面，官方指定的机构只承担了需要完成工作的极小部分。[59] 修理汽车、搬家以及其他形式的运输工作和住宅建设等通常都是官方提供的服务网以外的其他职业进行的。这方面的紧要任务往往是由休假日的工人，能干多种工作，尤其擅长建筑工作并到处流动的工匠队完成的。

与为私人消费提供产品和劳务有关的许多活动都是非法的，[60]或者因为它们从事受禁止的职业，或者因为它们违反了刑法的另一项条款。这方面，与西方流行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活动可能意味着触犯财政法令的事实，不论是当局还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个人都没有考虑到。

在被禁止行业这个总标签所包括的许多各种各样活动中，值得特别提起的两个，一个是那些拥有或控制运输工具的人为获得报酬而提供运输服务，前面业已提到。另一个行业是非法酿酒。在沙俄时代，酿酒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自那时以来，情况似乎更加恶化。而且，饮酒是大部分人最普通最方便的花钱方式。大部分人除此以外很少花钱。在这些情况下，酒起到了一种替代货币的功能，这种现象在第二经济中显得相当重要，在那里，支付一般用酒进行。考虑到从庞大的酒类销售征收高额税收取得的大量收入，苏联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结果，是如一个观察者描写的状况，即浮在酒上面的经济。所有这一切加起来为非法酿酒创造了最合适的气候。据报道，家酿酒占全部酒类产量的1/4(20亿升纯酒)。[61]

那些受到禁止的行业和手艺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个人的需求，也补充了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不足。尤其是建筑业通常利用私人建筑队的活动来满足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的需要。[62]

像许多别的第二经济活动一样，受禁止的行业和手艺的成功运行产生螺旋状效应：第二经济补充了官方经济的令人不满的表现——随着不满程度的下降，政府改善官方经济表现的动力也下降了——对第二经济的需求上升，结果是官方

经济的潜力不断萎缩。

**私人企业**

大量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指出，第二经济活动有时是如此复杂，组织得如此牢固和井井有条，以致完全有根据说在完全由国家所有或控制的企业这一官方系统之外存在私人企业。我们特别考虑的是生产部门的企业。在商业部门确实存在复杂而永久性的第二经济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一般不需巨大的物质基础。它们基本上是由个人关系网构成。生产部门则出现不同情况，在那里一般都要求有正规的材料、机器和工作场所。私人生产企业主要表现为完全地下的私人工厂和打着国营企业招牌的私人工厂。后一种形式最普遍，前面在涉及其他第二经济活动时已经提到过。[63]经营规模可能相当大：有一则资料提到过一家制造电视机的私人工厂。[64]

**行贿受贿**

行贿受贿在复杂多样的第二经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通常出现在比较复杂的交易中。行贿，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行贿物的转移价值为整个第二经济运行起着万能的润滑剂的作用。想说明行贿可能发生的无数种情形是没有意义的。[65]根据苏联法律，可能作为贿赂的物品不仅是金钱，也包括具有货币价值的别的物件，以及具有物质价值的任何要素、服务、行动和不行动。[66]格罗斯曼注意到普通的或特别的行贿受贿与属于"一种讨好当权者的普遍正常方式"传统的送礼习惯间的区别。[67]后一种做法又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第二经济之中。例如，向官吏支付固定的保护金或免费供给吃

喝以换取这些官员不干涉他们从事某种活动。[68] 在这些情况下，刑法的行贿受贿的定义无疑要包括送礼在内。

行贿受贿从上段采取的观点来看，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看法，即仅仅根据法律标准来对第二经济活动分类可能妨碍更一般的理解：行贿受贿几乎在经济活动的每时每地都会发生，它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从售票员接受旅客一包烟从而允许他在车厢内抽烟到实际上出售一个加盟共和国部长的职位。[69] 法律角度的分类法只关心第二经济活动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容。

## 第一经济与第二经济共生现象

前面概述的种种第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见解之一是，许多第二经济活动就发生在官方经济内。把第二经济描写为主要是个别企业家的活动，他们远离表面上由中央控制的官方经济，构成一个与官方经济并肩运行的平行网络。当然这种想象从那些活动能补充和替代成绩很差的官方经济机构而言，大部分是正确的。在前一节提出的概述中，这类活动特别可在“受到禁止的行业与事业”中找到。正如报道的官方部门糟糕的成绩和它适合第二经济服务加以替代，彼此相互加强。

然而，在许多其他领域，不是官方经济与第二经济平行和分开运行的问题，而是有密切关系相互渗透的问题。大量日常经济活动部分发生在官方部门，部分发生在非官方部门，

这对于发生在国家经济系统单位之间的非常巨大的经营计划是正确的，就是对于个别消费者的小型交易也是正确的。就后者而言，指出食品生产中有相当大的第二经济投入，食品行业充斥着第二经济活动就够了。至于国营经济系统内第二经济活动的影响，情况不再是两个领域存在广泛而重要的联系，而是第二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国营经济系统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据官方和非官方的报道的情形，如果没有保证补给品、原材料、劳动力等供应的私人网络的运行，没有私人代理商的活动，国家企业没有从未纳入计划和核算中的生产中获得的额外收入，至少有一些经济部门将崩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⑳ 就此而论，"平行"经济这个词甚至会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好像提到的活动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独立的范围内，而现在是已经同官方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可分开。当然，苏联的资料往往不承认在两个部门经济之间存在制度和结构上的联系，由于同样原因，它加给平行经济一种形象好像它是个别犯罪分子分散的无足轻重的活动领域。

如果人们接受关于官方经济与第二经济意义深远的结合，那么接着要考虑的是：对官方经济和第二经济各方面相对力量作数量方面的评价变得没有意义了。即使在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例如估计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内生产的家庭酿酒量，谁能担保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官方酿酒数量中没有第二经济的投入呢？㉑ 事实上，经常有报道说，官方的非法的酿酒形成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而且酒类交易更是如此）。

官方经济与第二经济广泛结合的另一后果是，它严重地破坏了官方设计的自上而下的整个经济控制的形象。如果官方经济真的是部分求助于第二经济的努力来运行的话，那末，

中央计划机关不仅缺乏实行这种控制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资料，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志与力量。

## 第二经济与政治组织

要现实地评价第二经济对苏联的经济意义必然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例如：为什么允许它有现在那么大的比重？什么是它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功能？如此等等。

苏联官方对待第二经济重要性的方针就是低估它：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运行得很好，而且终究会胜过资本主义制度；偶尔某些部门会发生困难，可能引起某些不安定的或犯罪的分子企图利用这种局面；然而，这类行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个灿烂图景的影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作用都很有限。由于苏联第二经济的情报不足，这一声称仍然为大部分西方人毫不怀疑地接受。

甚至在能得到苏联经济景象的更详细资料的地方，如何调和这种认识与西方对苏联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僵硬的中央控制的几乎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个问题。如果党和政府确实万能，那么，它们为什么不消灭这种看来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思想教义背道而驰而且通常是非法的第二经济活动呢？答案只能是，在第二经济与现行政治制度之间一定存在着更加复杂的联系。

在格罗斯曼对苏联第二经济最初所作的研究中，他实际就已经顺带地提到过这种关联性，当时他写下“以政治行政当

局为一方与高度发达的非法经济活动为另一方之间很可能存在密切的有机联系。”[72] 就一个较具体的问题——计划方面的弄虚作假来说，波莫尔斯基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类欺骗代表着中央执行机关与下属工作单位间固有的官僚冲突。[73]

同时，最近移居国外的苏联人所作的研究和报告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种联系的理解。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联，在上层官僚机构工作；他们带来关于苏联经济制度实际运行熟悉而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加上可以得到的累积知识，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总的图像，从而对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

认识到政治制度、官方经济和第二经济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目前的情况，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保持中央权力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苏联经济管理制度的许多令人费解的方面就变得清晰了。苏联经济管理的目的不是想使国家变富，不想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者甚至也不是为了迎合精英阶层的愿望，而是为了保持和扩大那些掌权者的权力。苏联最著名的律师、苏联民法的主要起草人伊奥夫到达西方后对这一点作了强有力的权威性的阐述：[74]

一旦掌握了这点，关注苏联制度的西方观察家提出的寻常问题似乎就显得很天真了，领导为什么不能让经济有效运行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一个的经济失败呢？为什么采取的经济措施一个比一个糟呢？实际上，从把经济当作其独裁的基础来看，苏联领导层的经济工作很出色。就这点看，苏联经济政策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失败，每项新经济措施都像前一个那样有效。只是从作为物质幸福的基础来看，苏联经济

是无效的。然而，这一标准与现实的苏联经济效率毫无关系。物质幸福（福利）的尺度与苏联制度的目的格格不入。

苏联经济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它几乎完全由国家掌握，它为国家所有，尽管不是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的。国家转过来为党所有，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和国家与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宪法第6条）。党最终又由高层领导通过民主集中制控制着，表现为按严格等级排列组织的金字塔结构。一个人在党内地位越高，他对国家从而对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就越大。根据官方宣扬的马列主义思想使整个制度合理化和合法化：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宪法的同一条款（第6条）说：“苏联共产党为人民而存在，因而为人民谋福利。”党的意志（即所有苏联人民的意志）由党的领导宣布。由于领导们通过党和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传播媒介，他们就能够以得到全体人民一致支持而自豪，这又加强了他们占据国家政治最高地位的权利。

党的机器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它对人事选择的垄断权。这主要是凭借任命来进行的，一系列职位只有事先经有权力的党的机关检审而后批准才能确定人选。在各级各地都实行任命，就是在中央委员会一级的高层领导也采用任命方式，人事选择和控制的完全一体化制度就以这种方式实行。

获得了任免官员的职权意味着进入了统治精英集团。各级的任命包括所有党、政府、经济和一般公共生活方面的所有领导职位。这些职位除了授予任职者官员权力外，任命的职位也使人享受其他优厚条件和特权。⑦其中最重要的特权，

如马修斯在他对这一主题所作著名研究中提到的，并不是直接的货币性质(除“第十三个月”工资，即也称为“医院津贴”部分外，Lechposobie, bol'nichnaia zarplata)。⑯ 几十年来，党的高级官员常常收到另一份秘密的工资袋，克里姆林宫的配给，这是用专门的“证券卢布”支付的，它只能在专门商店使用，在那种商店里，有低价稀缺商品，因此，这种卢布的实际价值数倍于它的名义价值。证券卢布看来现在不再继续发给了，但是拿不准克里姆林宫的配给是否仍在发放。

与苏联经济的主要特征——(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短缺与质量低劣)相一致，特权系统内并不把重点放在货币价值而是放在供应短缺的商品和服务上。精英阶层的成员有获得食品供应、医疗、住宅和休假方面的特殊便利。这种方便通常是用为一定级别的官员设置专门商店、诊所、医院、住宅单元、假日别墅等等方式给予的。其他一些特权是出国旅行的机会，使用公车的权利，成为选举出来的机关(如苏维埃)成员的权利，而这成员身份本身又是声望和特权的外加源泉。在任免制度中占一席职位得到的最无形而最普遍的优势就是建立起个人关系网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苏联社会中取得“既得成就”的安全。⑰

特权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它本身反映了统治阶级中的等级结构。给这个阶级的特殊便利和特权的本身又是根据受益者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来分等和分配。这样，特权制度不仅鉴定和奖赏精英阶层的成员，而且也维持精英阶层内部的纪律和等级结构。

无须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理解，第二经济和特权精英阶层孳生网络并不会导致它们彼此完全独立。给予统治成员的某

些特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由于它们的第二经济价值。到国外旅行，使有幸的旅行者能够采购国内市场买不到的商品；有进专门商店的特权也有同样效果。就更一般的情况而言，精英阶层有机会利用官职和权力谋取进一步升官、受宠，当然还可以从第二经济中以直接受贿、接受礼物、提供保护，以及参予有利交易等等获得金钱报酬。

第二经济与特权精英两个网络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被观察家们称为盗窃政体的政治制度⑱；成为党的权力机关的一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得到他的一份收益为回报。值得花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这样一个论点——苏联政治制度的内聚力的主要因素不是它的思想信仰，而是它的成员利用职位在第二经济市场中获得的物质利益。

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上层领导坚决取缔第二经济（像官方赞扬的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就是不合情理的了，因为这样做就恰恰破坏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赫鲁晓夫倒台至今具有警告讯号的价值，它告诫人们，领导人既想保全自己又与中高级党的官僚对抗的可能性是受严格限制的。

对苏联的官方资料作肤浅的考察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以为苏联当局确实在坚定地从事消灭第二经济活动的工作。然而，深入的考察告诉我们，官方的运动不论对活动类型，还是对从事活动的人，都有许多细微的差别。最严厉的措施，直至死刑，通常专门对付那些在政府官员控制范围外活动的私人企业家。最明显的例子是职业性外币交易人以及其他纯黑市交易者。根据过去经验做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人与党的机关联系越密切，个人在党的机关中的

职位越高，从事第二经济活动的处罚越轻。特别是在边远的高加索和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出现了一些牵连许多人的遐迩皆知经济丑闻，在那里，有关人员的一端，私人黑市交易者被处决，而另一端有牵连的加盟共和国部长只是调到另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上。[29]

值得指出的是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个人卷入第二经济的问题。如果接受前面所述的盗窃政体的论点，人们可能会料想到各级党政机关参与第二经济牟取暴利，尽管党的高级领导仍不大可能会让其成员从事这些活动。相对党内其他级别的官员而言，公开承认最高领导层成员自己从事官方谴责的第二经济活动可能破坏他们集体的合法性，从而削弱他们对最高权力的控制。苏联报纸曝光的类型是与盗窃政体的论点一致的。除了偶尔例外情况，曝光刚好到最高一级——即政治局——之前，但涉及联邦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及较小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些曝光涉及到苏联部长的有1980年的伊什科夫(苏联渔业部长)；1974年的富尔特谢娃(苏联文化部长)；涉及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的，如姆扎瓦纳泽(格鲁吉亚，1972年)和阿托多夫(阿塞拜疆，1969年)；加盟共和国其他高级领导人，涉及的如乌兹别克的总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尔巴诺夫和纳斯丽季诺娃(1974年)。这些官员后来的命运符合上述模式：通常不予起诉，犯罪的官员悄悄地调到不惹人注目的优越的位置上。揭发较低级官员卷入第二经济活动的比较多，处罚也比较严重。[30]

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些活动会被起诉和惩罚，而另一些活动看起来免予受处分呢？按照盗窃政体理论找到答案并不困难。获得第二经济提供的利益是党政机关

成员的一个基本诱惑物和报酬。那些在权力机关之外的个人黑市交易者无权得到这些好处，因此可能无保留地受到起诉，只要不危及权力机关成员的利益。党的精英集团中的某个成员，甚至最高官员也同样可能受到起诉，如果已经决定把他开除出权力机关的话。否则，处罚参与第二经济活动的精英集团中某个成员的决定将要仔细权衡。与其默认这样的参与本身是精英成员的一种正常情形，宁可接受惩办特定的个人的众人愿望。这种愿望可能受到开展针对某些经济活动的新政策的激发，或由此人自身的行为惹起。腐败、第二经济网络等已成习惯的制度总有它们自己的非正规的规则，那些超越由这些规则、规定界线的人必须受到制裁。苏联报纸揭露的许多知名官员从事第二经济的典型事例，有过分贪婪、过分显眼的腐化，炫耀财富以及犯罪官员破坏了特权制度本身的平稳和谨慎的行为。当然，某个官员也会因为运气不好而被抓住：例如，一次集体活动可能偶然被揭露出来，或者，他也可能成为更高级的党的官员间长期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刑法对第二经济所下定义的含糊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使得运用刑法作为制裁手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既然几乎每个党的领导成员，实际每个公民都卷入了第二经济的活动，任何人都要受当局摆布，因为当局掌握了拘捕任何人的拘票。

苏联政权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这要求有活力的国内政策，肯定需要采取最有力措施反对第二经济。然而，证据表明，这种坚持完全是口头上的，而实行的国内政策则更节制，更保守：保持现行的分配权力与特权的制度，而第二经济是这个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

## 从比较的角度看苏联的第二经济

如同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苏联第二经济与官方经济共处于奇特的共生现象中。这种关系受内在于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许多国内因素的影响。对它有影响的外部因素中，东欧其他国家的种种经验也施加了显著的压力。在东欧某些国家中，国家对经济控制没有那么广泛全面，它们或者允许存在较大的私人部门，或者放松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始终有迹象表明，这些试验受到苏联领导的密切注视，对他们来讲，如何在经济成绩和政治控制之间取得最佳平衡，是长期存在的两难处境。在苏联集团内部不断增加（尽管目前还不大）的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匈牙利和波兰这样一些国家的经验可能为苏联领导人未来的政策变化提供重要启示。这些变化转过来很可能改变苏联第二经济与官方经济间的现有关系。在这方面，值得提一提当前给予私人农业有利的待遇。⑩许多年来，苏联领导人对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庄的农民没有表示过这么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这确实有可能是苏联领导有初步意向要稍稍放松全面中央控制严格程度的迹象。

如果把苏联的第二经济与西方同类现象作比较，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别在于它们各自的法律背景。苏联的第二经济活动典型地与刑法相抵触，而西方的类似活动则常常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两个社会的根本不同的性质。一个几乎完全由国家控制生产和贸易的苏联类型经

济，只有实施刑法禁止一切侵犯国家垄断地位的全部活动才能保持运行。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并不像苏联政府那样拥有经济，只得从别处寻找财政和其他物质手段来实现它的意图。有些依赖主导政治思想的政府，打算占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以便使政府获得充足的收入。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向居民和私人企业收税，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样看来，东西方第二经济的共同特征似乎是一种民众、基层反对国家强加的征收政府收入的制度的行为。当然，只要有国家这类制度存在，就会存在诱导人民为其付钱的计划，从而人民就反对这种计划。就这个意义上讲，第二经济是公众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使它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范围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加。这无疑完全是现代国家主导作用增长的反映。东西方官员对第二经济比重不断增加作出明显类似的反应不是一个稀奇的巧合。重点总是放在压制方面——派更多的检查员，实行更严厉的处罚，更严密的监视——而政府减少干预就几乎会自动地减少公众反抗的论点很少引起重视。这或许只是一种期望，因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让它自己的权力和影响缩小似乎是不合理的。

在产业革命开始以前，政府一般都满足于维持国内外的和平和安全。它们一般说来不相信它们具有全面改造社会的潜能，从而也就不怀有这种抱负。当工业革命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产生了公认的无法接受的社会条件时，情况就改变了。同时，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突飞猛进似乎为改造社会提供工具，使之沿着人们认为合适的路线发展。西方世界的

答案是福利国家。在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的一种制度被采纳或被强加，其中，苏联国家是原型。尽管东西方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的特点都是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每一方，国家的作用促使活跃的第二经济的出现。

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国家对第二经济通常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尽管第二经济受到官方指责而且官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反对第二经济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些方面则被允许不受惩罚地进行，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后者的全面效果有益于官方政策，或者至少是有效地压制它们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然而，这种看来比较务实的态度存在严重的缺陷。现代国家更积极地干预经济生活所根据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公益的思想，利益共同性的思想和社会团结的思想。人们可能会说，我们社会的一致性最终取决于这些思想的有效性。一个活跃的第二经济表明民众方面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抗增加了，结果至少是部分放弃，使这种干预合法化的社会理想，由于同样原因退却为追求私利目标。在许多公民眼中，一个政府把手伸得太长，企图控制整个经济，就破坏了那些社会理想的作用(而政府正是以这些理想的名义行动的)，结果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内聚力。㉖

现代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管是采取福利国家形式还是采取苏联类型，都在传统的理性主义中有它的根源。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利用推动人们有这种认识，即社会可以按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路线构建。第二经济的兴起以及随后它被勉强容许存在，使这种认识显得荒谬，因为国家力图完成的未来经济蓝图越具体，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越明显。

计划表面上合理性产生第二经济表面上不合理性。是否是这样，即不是第二经济太大了而是现代国家承担的作用太大了？要节制的仅仅是个人的品德吗？

注　释：

① G·格罗斯曼：《苏联的"第二经济"》，载《共产主义问题》，1977年第5期，第25～40页。

② 出处同上，第25页；格罗斯曼在"第二经济与苏联的计划化经济"，（载《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1981年第2期，第5～24页）一文中持同样定义，见第6页。

③ 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见注释18），G·金斯伯格和S·波莫尔斯基，"法律的实施与第二经济"。

④ P·怀尔斯，《平行经济，对反制度行为的一个评价，特别关注苏联的地下经济情况》，联邦德国东方科学与国际研究科隆研究所，1981年，第8—10页。

⑤ A·卡采涅林鲍伊根，"苏联的有色市场"，载于《苏联研究》，1977年第1期，第62—85页。

⑥ R·毛拉赫对苏联1936年宪法第4条的评论，见他的《苏联宪法手册》一书，伊萨尔河，慕尼黑，1955年，第55页。

⑦ I·伯尔曼，"第二与第一经济和经济改革"，高级俄国研究凯能研究所第108号论文，俄文本，第7页。

⑧ S·波莫尔斯基，"反对中央计划的犯罪：'Ochkovtivatel'—stvo'"，载于D·巴里，G·金斯伯格和P·马格斯编《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法律》第二部分："借助法律的社会工程"，Sijtohoff，Alphen aan den Rijn，1978年，第291—317页，此处引文见第306—307页。

⑨ 参照B·鲁麦，"苏联的'第二'农业"，载《苏联研究》1981年第

4期，第560—572页。

⑩ 奥赫恩，“消费者第二经济：规模与影响”，载《苏联研究》，1980年，第2期，第218—234页，此处引文见第221页。

⑪ 为了说明苏联报纸提供的各种类型第二经济活动信息丰富这点，本章所给的例子都引自最新出版的《当代苏联报刊文摘》杂志。

⑫ 在一篇揭露“地下百万富翁”的文章中，A. 鲁比诺夫建议对那些购买贵重物品的人征收所得税；1981年7月1日《文学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0期，第17页。F. 库兹涅佐夫也提出同样建议，1981年11月9日《真理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5期，第19页。通过对第二经济的种种表现所作的更广泛而公正的考察，经济学家V. 鲁特盖泽(见1981年11月16日《真理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6期，第18—19页)承认许多这类活动暂时无法避免，甚至鼓吹学习匈牙利和东德的经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他主张在这样做的同时，实行全体人民交纳个人所得税制度。

⑬ 一些论述苏联经济的较旧的重要的非官方文献在我的《苏联非官方文献与持不同政见者》中作了简单讨论，Siithoff Leyden(莱顿)，1975年，第213—214页。比较近期的新文献见C. 艾伦，“非官方经济文献概要”，无线电自由研究公司阅读书目编号268/79(1979年9月12日)。

⑭ V. 恰利泽，《苏联犯罪》，兰德公司，纽约，1977年。

⑮ V. 布科夫斯基，《建一座城堡》，瓦伊金，伦敦，1978年。

⑯ M. 沃斯兰斯基，《命名——苏联的统治阶级》，弗利兹·莫尔顿，维也纳，1980年。

⑰ I. 兹姆佐夫，《党还是政治恐怖团体？Razvorouannaia respublika》，Editeurs Reunis，巴黎，1976年。

⑱ H. 史密斯，《俄国人》，Ballantine巴兰坦，纽约，1976年，第81—101页。

⑲ 1980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由格罗斯曼教授组织召开了有关苏联第二经济的研讨会，经作者同意，我被允许使用下面的会议论文：S. 波莫尔斯基和G. 金斯伯格，“法律的实施与第二经济”；G.S. 格林斯莱特，“苏联‘地下经济’的地区差异”（凯能高级苏俄研究所重要论文，编号为115）；J. 范诺斯，“东欧和苏联的秘密外汇市场”（同上所，编号为114）；I. 伯尔曼，“第二和第一经济与经济改革”（同上所，编号为108）；D. 奥赫思，“消费品与服务业方面的第二经济”（同上所，编号为113）；G. 奥弗和A. 维诺库尔，“苏联城市居民私人收入来源”，兰德公司报告，编号R—2359—Na，Santa Monica，1980年；K. 布什，“苏联第二经济中的书籍”，无线电自由研究公司，档案编号468/81（1981年11月23日）；怀尔斯论文的扩充本由联邦德国东方科学与国际研究所以德文出版；P. 怀尔斯，“平行经济：对反制度行为的一个评价，特别关注苏联的地下经济情况”，科隆，1981年。

⑳ G. 施罗德和R. 格林施莱德，“论测量苏联的第二经济”，比较经济研究学会会刊总第21期，1979年第1期，第3～22页；D. 奥赫思，上面引述过的著作，“消费品”注释⑩，第219—221页；P. 怀尔斯，“平行经济”（注释⑲），第20～22页；G. 格罗斯曼，“对非法私人经济和腐化的几点说明”，载《变动时代的苏联经济》（递交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论文简编），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9年，第847—852页。

㉑ 奥弗和维诺库尔，上面引述著作注释⑲，特别是第70页。

㉒ 怀尔斯；“平行经济”，注释⑲，第65页。

㉓ 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①，第35页。

㉔ 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⑩，第219—229页。

㉕ 出处同上，第221页。

㉖ 见《共产主义青年真理报》上的三篇文章，日期分别为1981年4月14、15、17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17期，第6～8页），报道了西西伯利亚建筑工人夜间集体活动。

㉗ 参照范诺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42—43页。

㉘ V.特雷姆，“苏联的饮酒：财政上的两难境地”，载《苏联研究》第27卷，1975年，第161—177页。

㉙ 格林施莱德，上引著作注释⑲。

㉚ 伯尔曼，上引著作注释⑦，第3～4页。

㉛ 引自F.菲尔德布鲁格编《苏联的宪法与加盟共和国》，Sijhoff and Noordhoff，Alphen ann den Rijn 1979年，第85页。

㉜ 参照K.魏达金，《苏联农业中的私人部门》，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3年。

㉝ Narodnoe Khoziaistvo，1979年，莫斯科，1981年，第222页。

㉞ 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①，第26页。

㉟ 官方出版的Sobranie Postanovlenii Pravitel'stva-SSSP法规，1976年，第7号第39条，也见E.德戎，“关于手工业的法令”，《社会主义法学评论》1976年，第4期，第266—267页。

㊱ 参照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①，第26页；K.西米斯，“苏联的腐化机构”，《概览》，1977年，第4期，第35—55页，此处在第36页。

㊲ 参照J.伯利纳，《苏联的工厂与经理》，剑桥，马萨诸塞州，1957年。

㊳ D.赛姆斯，“苏联的平行市场”，《概览》，1975年第3期，第42—52页，此处在第46—48页。

㊴ 见鲁默，上引著作注释⑨。

㊵ “关于企业团体和机关的附属农业家庭”，1978年12月4日的决议，Resheniia partiii pravitel'stva pokhoziaistvennym voprosam，（总第12卷，1977—1979年），莫斯科，1979年，第594—597页。

㊶ 1981年12月15日《真理报》报道，1981年共逮捕了几百名从乌克兰南部肉类包装厂偷肉的盗窃犯（《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50期，第20页）；1981年11月11日《真理报》报道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5期第18页)，敖德萨省警察局长抱怨说"在该省工厂中，工人偷偷摸摸的现象十分普遍"；1981年6月20日的《苏俄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31期，第15页)有一篇由许多通讯员的集体报道，谈到俄罗斯共和国许多城市工人下班后"顺手牵羊"成风，最成功的偷摸行为实践家(直到被逮捕)是一个马加丹的推土机操作工，他在工作单位偷走了总计达3万卢布的金粉，《消息报》1981年6月14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24期第19页)。

㊷ 伯尔曼，上引著作注释⑦，第16页。

㊸ 参照恰利泽，《苏联犯罪》(注释⑭)，第166页，1981年第43期第19页)报道一桩涉及价值达40万卢布的建材丑闻。在这桩案子中，一个亚美尼亚工人向国家木材产品供应委员会的一些官员行贿，让他们把几千立方圆木运到撒马尔罕省，到那里转卖给私人营造商。

㊹ 见注释⑨。1981年11月24日《消息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7期第26页)刊登了一篇解释加油员是怎样积累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财产。

㊺ 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⑩，第226页。

㊻ 奥赫思，上引著作同注，第221页。

㊼ 1981年7月20日《莫斯科晚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36期第15页)；24个铁路工人及其同伙28人被宣判为列车盗窃犯，1981年1月6日《农村生活报》上一篇报道(《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35期第11～12页)抱怨格鲁吉亚的果农和茶农因运输途中频繁遭窃而遭受巨大损失。

㊽ 在一家莫斯科水果和蔬菜仓库工作的4个职员以各种方式把产品运到黑市出售积累了10万卢布；1981年7月17日《劳工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38期第20页)。

㊾ 西米斯，上引著作注释㉘；也见S．斯塔茨，"苏联制度中的腐化"，载《共产主义问题》，1972年第1期，第40—46页。

㊿ 1981年3月25日的《文学报》上有篇报道(《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15期第13页)说明了这种做法，这个报纸记者去过北高加索克拉斯诺达尔的省城；他在国营店里买不到肥皂、牙刷以及其他盥洗用品，但是却在黑市上发现用高价都能买到，而莫斯科贸易部的官员向他保证说供给品已经运到克拉斯诺达尔了。也见注释㊹中引的例子。

㊿一 小撮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地方工业部长和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部代理部长有勾结的投机商人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拥有一些企业，生产无数产品，然后在整个俄罗斯共和国非法出售。1981年4月9日《劳工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91第年19期第14页)和1981年10月22日《真理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2期第21页)报道了整个苏联集体农庄非法附属企业的活动。

⑤② 1981年11月4日《消息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4期第17页)，该报记者从巴尔瑙尔报道说，几个官员用他们领导的企业的钱为自己修建和装饰豪华的乡间别墅。

⑤③ 1981年5月22日《消息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21期第18页)报道说，伏龙芝工学院的一群教员受控犯了受贿罪，因为他们在改考卷时包庇每个不及格升及格收费25卢布。1981年7月1日《文学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0期第17页)报道说，巴库一个负责向残废人分配汽车的福利机关的头头把执照卖给其他人；当他被捕时，他有两套公寓、一栋带游泳池的夏天别墅、古画、古文物、34公斤黄金。1981年12月1日《消息报》说(《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8期第21页)，马加丹的一个医生给那些不想上班的人开病假证明，开一天收费10卢布。

⑤④ 西米斯，上引著作注释㊳，第52—55页。

⑤⑤ K. 布什，“苏联第二经济中的图书”，无线电自由研究所，1981年11月23日，阅读书目编号RL468/81。也见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⑪，第223—224页。

(56) 这类市场上一个不起眼但又很重要的项目是戏院和音乐会的票子。几个记者报道说，要想在票房买到精采演出的票子几乎不可能，尽管很容易从倒爷那里买来；1981年10月13日《苏俄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50期第21页)。

(57) 见J. 范诺斯，“东欧和苏联的秘密外汇市场”(未发表的会议论文，见注释⑲)；也见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⑩，第227—229页，及怀尔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74—76页。

(58) 出处同上。

(59) 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⑩，第225页。

(60) 人们可能提到的许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活动中有一群巴库企业家大量向公众买进镀金饰品，然后熔化得到纯金卖给牙医和黑市投机者，1981年11月26日《消息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7期第23～24页》，而且在许多城市，大口果酱瓶盖子的交易很繁荣(1981年9月7日和13日的《消息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36期第18页)。

(61) V. 特雷姆尔，“苏联的饮酒：财政上的两难困境”，载《苏联研究》，1975年第2期，第161—177页，此处见第163页；也见怀尔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73、97、98页。

(62) 见注释㉙。

(63) 1981年3月22日《真理报》上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12期，第20—21页)：一家非法印刷广告的企业用莫斯科一些报社的印刷厂印制广告，而所用的纸张则是从省级机关偷来的。

(64) 奥赫思上引著作注释⑩，第220页。

(65) 斯塔茨，上引著作注释㊵，以及西米斯，上引著作注释㉚。

(66) 参照 Kommentariik Vgolovnomu Kodeksa RSFSR，莫斯科，1971年，第374页。这一观点的稀奇推理之一就是女人以卖身来换得官员放弃职责，不构成贿赂，因为苏联法律认为这种礼物没有物质价值。

(67) 参照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①，第32页。

⑱ 参见西米斯，上引著作注释㉘，第50—52页。在注释㉛提到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贸易丑闻中，当地的地方工业部长每月收贿1,500卢布，而他在莫斯科的同僚每月得到贿金400卢布。

⑲ 西米斯，出处同上，第42页，提到保证任命为外高加索共和国的某个部长所需贿金从10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长）到25万卢布（贸易部长）不等。西米斯从阿塞拜疆得到的资料是依据I. 泽姆佐夫的信息。后者补充的有趣资料说，在购买党政官职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价格不应超过该职位产生的年收入；I. 泽姆佐夫，"苏联的统治阶级"，《十字路口》，1979年第2期，第5—60页，此处引证见第35页。

⑳ 参照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②，第6—7页；也见怀尔斯的"轻微的违反计划"一节，上引著作注释⑲，第31—32，88—89页。

㉑ 1981年10月28日《消息报》有一消息（《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81年第43期第19页）讲到合法生产的伏特加酒是如何利用装瓶厂有2.1%的溢出和破碎容差而流入非法的零售网的。鄂木斯克一家伏特加酒厂的两名职工用这种方式转移出去365箱伏特加酒。

㉒ 格罗斯曼，上引著作同注释①，第32—33页。

㉓ 波莫尔斯基，上引著作注释⑧，第306页。

㉔ O.S 伊奥夫，"苏联的法律与经济"，《哈佛法学评论》1982年，第1591—1625页，此处引证见1625页。

㉕ 特别见泽姆佐夫，上引著作注释⑲，沃斯兰斯基，上引著作注释⑯，第304—308页（"术语汇编——贿赂金"）。

㉖ M. 马修斯，《苏联的特权——共产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研究》，特别是第二章第36—58页，"精英的特殊利益"。艾伦和昂温，伦敦，1978年。

㉗ 参照怀尔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19页。

㉘ 格罗斯曼，上引著作注释①，第33页；西米斯上引著作注

释㊳，第55页；怀尔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5—6页。

㊾ 几个例子见西米斯的上引著作，注释㊳。

㊿ 我认为这一解释比怀尔斯的论述更合情理，怀尔斯认为党提拔最诚实最有才干的人到最高位置上；怀尔斯上引著作注释⑲，第5、36页。

51 见鲁默，上引著作注释⑧。

52 这种形式的研究中可用的篇幅不允许其他试图从更高尚的角度来观察第二经济的认真讨论。在这方面，怀尔斯从这个问题的宗教和民族领域来论述第二经济是很有价值的；上引著作注释⑲，第47—55页。

# 15 第二经济与社会主义：匈牙利的经验

本章考察匈牙利普遍存在的第二经济问题。研究第二经济在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中在造成经济体制的种种局限，政府调解的各方面困难等问题中的影响和导致的后果。①另外，还要研究为什么人们认为第二经济是匈牙利体制较为成功的基本原因。

我们把第二经济定义为：不在社会主义部门工作的人们——合法或非法地——通过经济活动而获得收入的行为。②家庭从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收入的活动属于第二经济。③因此，我们对第二经济所下的定义与格罗斯曼（Grossman）(1977）的定义基本上相同，他把旨在直接获得私利或在某一重要方面违法的活动归入第二经济范畴。

然而，我们对此定义作了3个较小的修正：

1. 人们努力经济合理地使用其收入的节约活动不纳入第二经济中。④

2. 第一经济中的职工通过同雇主讨价还价增加合法收入所进行的活动——尽管这些行动旨在增加私利——不纳入第二经济而

是作为第一经济。

3．第一经济中的职工（主要是管理人员）为本单位的利益所从事的各种违法活动也不纳入第二经济中。这里不考虑他们一般也想借此提高自身职位的事实。由于这种违法行为是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故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一经济中一种特殊的运行形式。

## 经济背景

匈牙利社会化经济和第二经济的共同存在说明了整个国家经济行为具有不可思议的二重性的原因。这两种经济各按不同的规则运行，各受不同方式调节。就资金流动和经济组织的运行而言，它们彼此分离。⑤但通过消费品和人力的流动它们又相互联系。尽管第一经济由隶属于经济指导机构的大型生产单位构成，而第二经济是小型生产单位，由企业家经营，在私人基础上运行，但最终导致二者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两种经济中市场（货币和价格）作用的差异。⑥

虽然劳动者的收入严格地限制了家庭的消费能力，但货币和价格在第一经济中只起核算功能。这一部门的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必须与中央当局调节的市场相适应。能否实现其扩张欲望（一般讲是这类组织的特点）取决于经济指导机关采取的资源配置决策。但私人占有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有关产品和劳务价格调节的市场制度的基础是私人占有，家庭的经济安排目标是力争在所得收入与

购买能力之间保持平衡。但在第一经济中运行的单位的行为，与其市场敏感性低、成本敏感性低等特点相对应的，却是对资源欲壑难填的特点。除了利润激励无效外，它们不断努力地支付更多更高的工资，反映了对人力资源近乎无限的渴求。

因此，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应该限制企业收入外流，并考核企业对追加资源的需求正当与否。但是，由于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产成本价格系统的人为性，因而从微观这一层次是无法评价经营的盈利能力的。这样，经济计划机关也就无法妥善执行这一任务了。

与需求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短缺始终存在。因此，企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持久短缺不仅存在于生产要素市场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原因是，企业不仅挤占了部分私人消费品(如家庭消费品)的供应，也挤走了从事消费品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所需的资本和人力。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对此无法实行有效管制的原因在于，消费品行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潜力以及用于这些目的的资源形成潜力取决于满足生产企业尤其是生产资本品企业的投资和人力需求程度。

在技术水平和设备利用程度一定的情况下，短缺使生产的成本比正常情况下高出许多。生产要素通常被迫闲置。生产的连续性常常中断，投资项目的实施往往会拖延很长时间。然而，为了对付供货方违约拖延甚至不交货，为了准备将来扩大生产所需增加人力物力，短缺也迫使企业留有储备。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短缺程度。

在持久短缺的环境中，卖方相对买方显然处于优势。卖方可以轻易地把成本转嫁给买方。因此，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家庭，要获得他们想要的产品，只能付出比他们的收入和第一经济技术水平高得多的代价。

第一经济对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的无限需求以及消费品市场的持久短缺恶化了消费者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使民众支持挪用工厂材料。从而，就导致了第一经济内所谓的平行市场的出现。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尽管不可思议，但人们业余从事自给的生产性活动肯定还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它缓解了第一经济资源的负担。也由于短缺经济的性质，人们在第二经济中劳动的收入比在第一经济中劳动获得的工资和薪金要高些。结果，作为创收活动领域，第二经济对人力产生了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第二经济中经营的组织必然会不断成长壮大，不断深化分工。随着它们成长壮大，第二经济中的这些单位变得越来越严重地依赖第一经济，以此来确保它们经营的客观条件(例如，原材料,工具，机械和服务)。这样就要求国家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把两个经济部门间必要的交易合法化。然而，当利用非法渠道在第一经济工厂中获得材料已经变得不受任何指责时，会造成第一经济产品价格上涨，这反过来改善了第二经济活动的盈利能力。短缺经济实际上排除了第二经济产品充斥市场的可能性。实际上，第一经济甚至从它经营亏损的那些活动领域退了出来，把它们留给第二经济的企业家们去做。它也在不断地为第二经济活动开辟新的市场，例如，生产越来越多的设备，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维修服务需求。最终越来越需要消费第二经济的产品和劳务。显然，从一定程度上讲，第二经济活动的增加以

及生产率的提高是符合国家旨在减轻第一经济负担，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产品供应的意图的。不过，这一态度恰恰与国家宣称的控制公民收入分配的指导原则相悖。这会打击正在同人力短缺作斗争的第一经济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从而使第一经济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而第二经济活动的盈利能力却进一步增强。

因此，国家始终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国家要么接受前面概括的消极后果，要么采用较高的累进税率，实行收入的再分配。然而，就最好的情况而言，坚决执行这种税率只会导致非法活动增加以及纳税人与征税机关间关系的腐化。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它会导致第二经济活动的萎缩，从而导致物价上涨，产品供应状况恶化，使第二经济产生格外高的收入。这会加重已经遭遇短缺之苦的第一经济的负担。然而，如果国家完全放弃对纯收入的调节，那么就会进一步鼓励人们加入第二经济，从而导致其规模扩大。结果，国家只能暂时性地运用这种方法。

第二经济收入上升以及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冲突的一个根源。这就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因为第二经济中有些单位迟早总有一天要达到国家为保证第一经济占主导以及防止公民成为资本家而规定的发展极限。一些已经达到发展极限的企业家只好抑制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欲望，除了维持企业稳定所需花费的成本外，其余收入都用于消费。一些人购买昂贵的金银制品或从事艺术品及其他贵重财产投资。另一些人通过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又秘密地超越了发展极限。

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在第二经济中经营的单位的发展极限

来控制所有这些后果。但这只会推迟第一二经济关系冲突的发生，因为整个经济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二重性已经排除了有关单位平和转入第一经济的可能性。这样，鉴于第一二经济关系的这种性质，国家只好通过不断地变换规范及放宽约束来调节第二经济。但是，这种不断改变应对措施的做法本身会产生异常结果。首先，它助长了商业道德的退化，因为政策不稳定，第二经济中的企业家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迅速致富。其次，它会造成行贿受贿成风，因为用行贿方式同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能够使第二经济中的企业免受国家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尽管存在用法律引导第二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但是，政府法律规范的不断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第二经济企业家的自我防范策略使得局外人要进入第二经济最有利可图的领域越来越难。少数企业家的垄断活动使完全投身于第二经济中的小型家庭企业收入仅敷支出，结果是增加的小型单位往往资本短缺，生产率低下，对国家调节特别敏感。获得格外高收入的企业家经受国家约束的能力很强，而小企业却易受国家限制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第二经济正在分化，等级结构正在形成。

不断改变调节规范的消极后果是国家试图寻求一种与第二经济介入者妥协的途径来确定第二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然而，整个经济不可思议的二重性使公民的态度和欲望同样具有二重性，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达到这一目标。个人和家庭，作为第一经济的收入获得者和产品消费者，对于改善第一经济的生产率是关心的，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又是第二经济的积极参加者，这样，他们又希望第一经济生产率低下。在他们看来，第二经济在原始生产条件下能够获得高收入的

事实理所当然是第一经济的经理们低效率利用资本和人力的直接后果，是他们不让人们挣更多钱的后果。他们对工资政策原则产生怀疑，同时又普遍认为工厂的失误和马虎是可以容忍的。

然而，在第一经济的企业经理看来，两类经济间收入的差距是管制程度不同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有限的结果。他们把经营状况不佳主要归因于两类经济间的收入差别，相反，并不认为是他们自身的管理不善造成了两类经济间的这些收入差距。一方面，他们呼吁限制第二经济和其它非国家组织，有时甚至呼吁限制第一经济中的小企业。另一方面，他们力争成为某个部门小型生产者和企业家的垄断供应商或采购商。通过这种途径，他们将能够影响后者的经营，使之符合他们自己组织的利益。然而，这种权力地位的不对称必然会带来小生产者和企业家一方与第一经济组织代表另一方之间非法的交易。结果，由于小生产者和企业家被纳入更大组织中，从而使他们同市场割裂开来，这就使得它们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至关重要，但为个人创造力提供广阔天地的灵活性、市场敏感性和经营自主性消失了。

## 第二经济的合法性与政府调控之间的矛盾

前面分析的意图在于阐明国家对第二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就合法性而言产生的后果。从这些后果来看，要在所谓合法的私人部门与其他第二经济活动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是不

恰当的，因为，属于后一类的创收活动倒可能导致国家调节的失败。不过，在匈牙利和西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文献中，人们仍然做了这种划分。

例如，在匈牙利，最近对第二经济的创收活动（使得第二经济包括的范围比以前更广）进行的测估产生了"辅助的附属经济"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在政治文件中用以指社会主义部门以外的就业人口所做的创收活动，这些活动符合法律，虽以私利为目标，却服务于公益。采用这个词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类创收活动与非法活动区别开来，以免泛泛使用"第二经济"这一名词，混淆了这种区别。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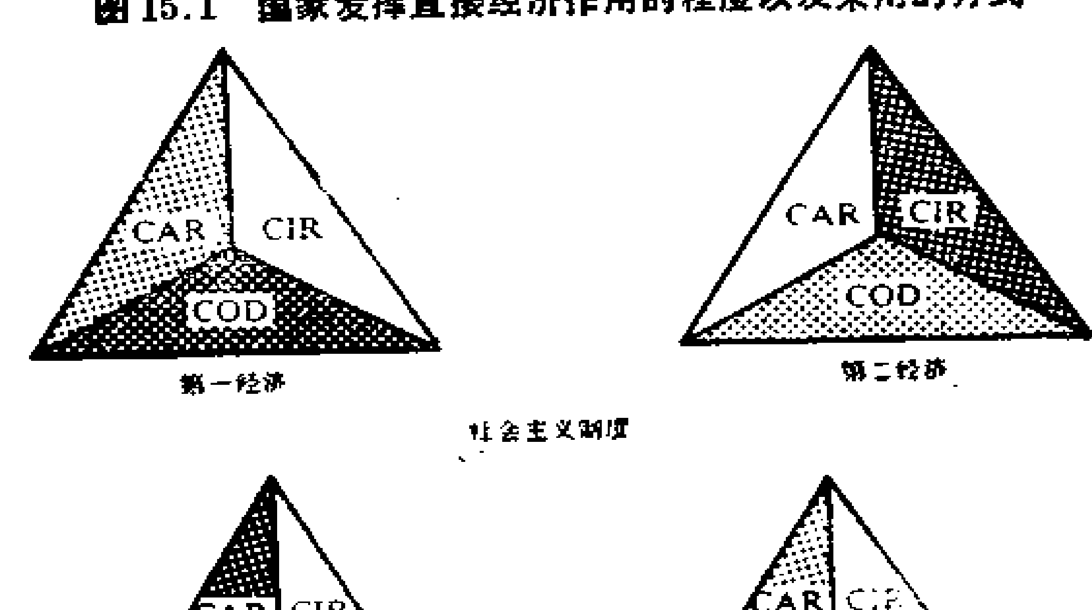
把农村家庭业余从事的小型农业生产说成是第二经济活动，就是在出现这个新名词之前，也不能认为是恰当的。⑧官方统计实际上是把这类产品价值计入社会主义部门统计栏内的。匈牙利的农业政策相对其他东欧国家获得显著的成功（主要因为承认小规模生产的重要性），也是通常提出反对国家调节失败论点的根据。作者目前对第二经济的解释也受到一个研究匈牙利经济的美国专家马里斯(Marrese，1980)的挑战。他认为，合法的私人部门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协调，实际上有助于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他并不否认也存在违法方面。但是，马里斯认为，违法现象在哪种经济制度下都存在，因此没有理由在第二经济中把合法的私人部门单列为一类。

凭借巧妙的演绎推理，霍尔兹曼(Holzman，1981)说，如果国有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被当作第二经济，同样，也就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合法的私人活动看成第二经济，从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匈牙利作者的观点，可能因为

担心我强调合法私人部门的违法方面导致政府实行限制政策而受影响，然而这种顾虑并不会是他们失误的主要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合法的私人部门与资本主义合法的私人部门是一样的。他们落入了一种按合法性定名的圈套之中，以为世界上的经济现象基本上与法律制度的理想类型相符。⑨ 结果，社会主义私人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第二经济的合法性及其宏观调节的效率之间的矛盾关系没有得到考虑。社会主义私人经济本身并未表明其运行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受到国家的控制。

为了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我们必须回头看看国民经济不可思议的二重性的后果，它使得对合法经济参与者从事

**图 15.1 国家发挥直接经济作用的程度以及采用的方式**







CAR＝运用法规管理　　CIR＝违反法规管理

COD＝根据指令管理

的活动施加限制成为国家控制第二经济经营的唯一可行选择。这是利用我称之为“违规管理”(Control Based on Infringement of the Rules)实现的。把这种调节形式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经济调节方面起重大作用的所谓运用法规管理相比，我们有可能获得比较透彻的理解。

运用法规管理，是由国家确立一个法规体系，来规范参与国民经济的独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法规管理运用的成功取决于国家强制机关的效力，这也要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使调节主体认识到规定的法规体系是合理的。为了获得这种广泛的共识，在决定国家依靠法规体系要获得什么目标时，调节主体广泛而公开参与讨论决策就成为必然要求。

然而，违规管理作为一种来自于国家的外部力量，对于第二经济的参与者来讲，总存在风险和受罚的可能性。这样一个法规体系，在理论上排除了作为参与国民经济独立主体的企业或个人同时在各方面从事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有选择性地强制实行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体系，必然是同时通过系统地违反既定法规来实现国家的目标的。能否成功，取决于国家强制机关的效力，取决于在此期间内法规的执行情况与国家的目标之间配合得如何。然而，国家管理机构在与各利益主体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其能力远逊于为自身利益在探索和利用法规漏洞和矛盾方面显示出来的创造力。这种类型的调节的成功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举人”。因此，尽管规范管理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对公布的国家目标的合法性的破坏，而违规管理的主要敌人则是调节主体的暗中串通。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是，违规管理的成功不能根据定义简单地依据违反法规的程度来衡量。

尽管国家对第二经济的调节必须是违规管理，但对于我们已经熟知的与第二经济紧密相关的第一经济的调节，依然以指令管理为主。就纯理论形式而言，这种管理方式为了控制国民经济参与者的活动，由国家向他们颁布理论上合适的指令。执行这些指令取决于政府所依靠的力量，即可以运用的奖罚手段的效力。但是，由于上级无法彻底地把握和监督下列三个方面：(1)指令的适用性，(2)应用指令的调节主体努力程度，以及(3)结果。因而，这种类型调节方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确保被调节主体忠诚的程度。[10]这种忠诚可以通过一种国家与被调节主体间不正规的讨价还价的方法获得，被调节主体对有关的决策施加影响，力争使自己的利益被作为国家利益承认，这种调节方式很有可能遭到各种非法交易和行贿受贿的破坏。考虑到匈牙利经济不可思议的二重性，国家如何成功地掌握违规管理(作为控制第二经济的唯一合适手段)的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已经指出，对第二经济的违规管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经济参与者是相互检举还是相互暗中串通。显然，参与者们竞争越激烈，他们对于国家在第一经济中代理人的无条件忠诚越发深信不疑，他们实现自己私利的风险就越小。不过，我们明白，第二经济所处的环境是，对产品和劳务存在全球性过度需求。因此，不存在参与者之间相互检举的基础。同时，短缺使第二经济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它不得不依赖第一经济的产品和服务，以致于如果不从事非法交易，它就不会繁荣。这就助长了一个有顾客支持的行贿受贿网的出现，从而削弱了第二经济参与者对国家机关和官员的道德清白的信任。这种信任度的降低，以及如果拒绝行贿就会给第二经济

带来严重的商业后果现象，最终会使暗中串通成为一般规则。因此，暗中串通和行贿受贿相互支持相互掩盖，妨害了国家在第二经济方面有限目标的实现。不过，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国家对待第二经济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也不可取。宣布和实行这样的政策会削弱第一经济中国家代理人的忠诚，这种忠诚是国家维持其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指令管理在该经济中占主导地位。⑪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霍尔兹曼提出的对称原则(实质就是几乎同样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部门与国有部门间的关系)，图 15.1 说明了这种方法的陷阱，如调节三角形所示。

图 15.1 中的三角形说明不同经济部门在追求私利时所受限制程度以及指令性调节的运用范围。这由三角形中各小三角形面积表示。而且，这些三角形还说明这些调节形式是怎样组合的。每个三角形中，最黑的小三角代表占主导的调节形式，稍浅一点颜色的代表补充的调节形式，白色的代表弃置不理的调节形式。

三角形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与国有部门都运用法规管理和指令管理这两种调节形式，只是何为主何为辅的不同而已。在社会主义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由于国民经济不可思议的二重性——国家不得不采用法规管理和违规管理两种矛盾的调节形式。同时，就通过这些调节手段的实施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动控制来维持国家直接经济作用的范围来讲，两类经济制度的差别甚至更大。

## 两类经济为获取收入在竞争中共处

在前面部分，我们集中研究国家对第二经济的调节过程所存在的体制局限和两难处境。我们把国家看成是积极的发起者。我们指出国家的意图受到被调节主体的双重反对，即第二经济的参与者和基本上无法从中获利的第一经济的企业管理阶层。然而，企业管理阶层与国家之间不仅仅存在等级关系，对于第二经济的参与者，他们个人或家庭成员同时又是第一经济组织的成员，企业管理阶层也是雇主的化身。作为雇主的企业管理阶层和作为雇员的受雇佣阶层力争最好地利用两个领域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劳动大众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二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既然有职业选择自由的人们必然会这样安排其劳动，以便能为他们自己和家庭提高消费水平，能够跟上社会消费水平，那么，社会主义工资差别在影响职工行为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相对工资差别的面更广，如果这些差别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更显著，则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自然会有效得多。

让我们设想一个不存在第二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家庭只能通过在第一经济中劳动取得收入。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呈普遍而长期的过度需求特征。对于非技术工人来讲，更是如此。人力的长期短缺意味着工厂的绩效标准往往很低，劳动力市场对非技术工作（较之技术工作）往往出高价，这样，

就缩小了工资收入差距。人们获得物质改善的途径不是追求专业水平和经验，而是在等级内提拔，这会使人们可能获得特权性质的物质利益。但是，这种提升实际上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运行之外，直接由国家来调节。

另外，在短缺经济环境中，企业之间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很低，因此常常导致延期生产，这就使雇主难以始终如一地大规模地利用工资收入差别化作为激励手段，因为只有在组织良好并遵守标准的劳动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由于短缺经济往往伴随着储备劳动力的做法，劳动者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结果，工资收入差别化所固有的激励机制几乎不起作用。对雇主来说，工资收入主要用作吸引追加劳动力和稳定劳动力队伍的手段。只是偶尔才把它们用作鼓励工人更有效工作的手段。在高水平就业的情况下，雇主实行的工资幅度差相对于低水平就业状况其差别程度要小得多。一定时期的最低工资必须满足一定消费水平上的现代生活需要，但是，在平均工资的情况下，就业水平越高，平均消费水平越高，最低工资水平也就越高。另外，就业水平越高，同样收入差距的激励力越弱。因此，随着就业水平上升，可实现的收入差距在影响工人行为方面的作用就越来越小。⑫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近乎于均等化的收入（其依据是工人们的行为）与不同类型的工人讨价还价形成的大幅度收入差别并存。特别是后者，主要取决于这些工人在处理生产长期紊乱和解决瓶颈问题时所起的作用。

第二经济在什么程度上与前面所讲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相关呢？既然从第二经济获得收入的人基本上又是第一经济的工资收入者，那么，第二经济收入的增加就进

一步削弱了第一经济中工资收入者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因为它扩大了平均工资收入与平均消费间的差距。这使得用拉开工资差距手段来影响工人行为甚至变得更难。加之，第二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比第一经济厉害得多。所以，为了保证生产的相对顺利进行，为了维持和加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吸引力，雇主在决定工资与效率时不得不考虑工人获取第二经济收入的不平等机会。

对于那些从资历和经验来说都是企业不可缺少的人员，要使他们不致被第二经济的高收入机会吸引过去，必须保证他们在企业内获得额外的收入和提拔。但是，一般说来，要实现这点，对其他工人在成绩和纪律要求方面就要作出让步。因此，对于这些工人参与第二经济活动只得认可甚至给予方便。对于那些有机会通过实际工作获得第二收入的工人来讲，处境又不一样了，雇主会把这样的工作岗位视为确定工资和成绩要求时讨价还价的砝码。

除了这些因素，如果我们考虑到工厂对工人的成绩要求和工人对收入可能性的看法很不相同(取决于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他们挣钱的战略)，那么，显然，两大领域间既竞争又共处的关系使第二经济中极不稳定和极其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关系持久化，从而使第一经济无法解脱劳动力短缺的困窘。雇主只好采取临时的自卫性雇佣战略，而工人则只求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个有利地位，并参与第二经济。在匈牙利，工会不限制雇主和雇员在确定成绩与工资比率方面讨价还价，这种现实无疑有助于使现状永久化。简而言之，把这种现状视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后果，而非原因，那才把握到了问题的本质。

匈牙利第二经济的规模(1970—1983):

有关匈牙利第二经济方面较为可信的资料十分不足。偶尔出现的那些资料,其可靠度也无法确定,因为既没有提供相应的基本定义也没有解释用以得出这些相关估计数的方法。即使是那个被广泛引用的认为第二经济创造了16—18%国民总产值的估计数，其可靠性也仅仅出于作出这一估计的经济学家的声望。⑬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估计数当作起点接受下来，而且加上被列入第一经济中的"半私人"组织的活动，那么,至少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5是第二经济完成的。

通过对第二经济活动进行总体考察来获得有价值的数量资料，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小规模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相当于80万人的全年劳动时间。这比第一经济农业生产单位的劳动时间还多出10%。⑭私人建筑业⑮及合法的私人手工艺活动的相应数字均为15万左右。⑯非法手工业活动劳动投入估计相当于10万人的全年劳动时间。⑰私人小商业和私人脑力劳动服务活动合计相当于5万人全年工作时间。⑱最后，各种半私人活动加起来大约相当于同样的数字。第二经济总的时间投入约相当于第一经济所用时间的1/4。

小规模农业生产是由占匈牙利居民总户数一半的170万户居民完成的。其中，独立的农场数只有3万，而且还在减少。他们生产了这个国家农业总产值的1/3、净产值的1/2以上。他们消费了他们自己的一半产品，卖掉了另一半。住户从小规模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的86%是这样分布的:30%归工人家庭，23%归农业合作社家庭,18%归农民与工资收入者组合的家庭。其余15%平均地分布在白领家庭与从事专业性小生产的家庭。

在官方注册的15，000人中，在合法行业的只有5,000人。10万生意人中职业商人只占60%(1970年，这个数字高达80%)，10%的人是退休者，另外30%是兼职，他们参与第一经济活动。依靠小生意生活的家庭数量合计还不到独立的私有商人的一半。合法的私人商业活动所形成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5%。⑲人数只有15000人的合法私人零售商，其营业额占零售贸易总额的5%。每年，所建房屋中约有一半(即4—5万)，以及4/5以上的农村住房是第二经济建造的，这个比例近几年一直在增长，预计会进一步增长(达到85%)。第二经济完成的住宅建设额中，合法私人营业额占不到1/3。房屋修理部门，合法与非法活动比例差不多。但在这一领域中第二经济的总体规模是第一经济的5倍多。在其他修理业，人们从事非法活动的价值估计是合法活动价值的5倍，接近第一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的价值。⑳1/5以上非农业技术工人经常从事这类活动。

属于私人智力性服务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完全当作职业去做。既可以兼职零星地进行也可以退休后进行(例如，允许私人行医、干兽医或建筑设计工作。现在从事这些业务的人数约1万人)，或者在半私人组织(像律师，语言教师或音乐教师协会)中去做。在这些组织中，个人收入受税收法规约束，这些法规与后面将要讨论的适用于新型集体企业的法规相同。非法的私人职业性活动的规模至少不会亚于工业与建筑业中的非法私人活动。要结束对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讨论，也应该意识到公寓和房间出租是第二经济的一个收入源泉。公开报道的转租人就达到11万人，3万户家庭公开出租房屋、公寓和供旅游者用假日客房。另外，为旅游者提供非法住宿

的就更多了，因为国外游客4/5的时间（入境处登记的数量）是花在未经官方登记的住宿处住宿的。

居民从前面列举的私人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至少相当于第一经济工资型收入的1/3。

第二经济产生的其他收入包括服务小费，医生得到的"感激费"，商业受贿收入以及来自官方政府机关的收入，私吞的第一经济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及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用于私人目的产生的收入，工作时间为个人利益完成的私人工作产生的收入。这里还没有包括土地和房产的投机收入，向私人放高利贷的收入，私自违禁酿酒卖酒的收入和卖淫收入。因此，当只考虑直接与第一经济就业相关的交易时，这些第二经济收入总额在量上与第二经济完成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产生的总收入相同。这个总数中，约30%的总收入要在居民中间进行再分配，而70%是社会所有权的代价。② 至此为止，第二经济的收入合计占第一经济工资型收入的2/3。鉴于估计值是保守的，第二经济的许多收入来源不能得到数量资料的证实而无法考虑进去，实际数字一定会比这高得多。它也意味着对于实证研究所证实的获得第二经济收入的75%的人口来说，第二经济一定与第一经济一样是同样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第二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许多征兆中，应该提到：(1)最近几年统计的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在慢慢下降，(2)70年代末第一经济农业收入者的数量由下降变为缓慢增加，(3)从事合法私人商业活动的劳动力数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事实表明，除了第二经济中的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迅速增长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之外，别无他故。第二经济参与者的专业化水平可以通过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

和合法小商业的一系列资料得到具体证明。资料表明：专业化的程度提高了，某些为中间承包商的活动留有更大活动舞台的部门的就业比例增长了。㉒

1981—1982年，许多新办的小型私有制企业得到法律认可。与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预料相反，最普遍的状况是，小私有企业的参与者与第一经济的雇主仍有密切联系，或者至少在参与过程中不需本人大量投资。㉓这就是说，在这类所谓的“合伙企业”之中，其工人首先为他们的第一经济雇主工作，之后，又在第二经济中领取报酬。在1982年，这种合伙成员为6000人，到年底，这一数字增加到20000人。为了获得比通常低10—15%价格的业主报酬，个体协会成员花相当于上班时间1/3的时间为第二经济中的雇主工作。迅速发展的其他企业形式是租赁或说支付一笔承包费后经营第一经济的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到1982年底，20000人已经在这样一类企业中工作，而此前已经有5000人按一定承包价从雇主那儿接管了服务单位的经营权。最后，15000人组成了独立的经济共同体，主要限于专业服务性质和要求经营资本少的活动。所谓小合作社型企业，由于要求较多的资本投入，后来证明没有多少吸引力，从而，只形成少数几个这样的合作社。

私人和半私人企业的出现为第二经济增添了新的色彩，但并未改变第二经济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这种状况倒是扩大了第二经济的范围。因为，新型企业被证明只是在很有限的领域内能够替代第二经济的其他形式。它们不仅没有构成对“传统的”私人商业及小型私有商业企业的威胁，而且也没有导致非法活动的任何减少。组建这些企业的主要目的，或者是为了接管原先由第一经济组织承担的活动，或者是为

了完成第一经济组织的合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为一批新工人在第一经济中获得辅助收入提供了可能性，而不必通过加班兼职或偶尔寻找工作来赚取收入，并使企业能够通过预算外收入来源来稳定他们所需要的工人，并鼓励他们留在重要岗位上。

因此，新型企业也可能利用原先从事第二经济活动的部分过剩人力。然而，假定人们对这样一些工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下降，那么，预期会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服务的"自由市场价格"会上升。这反过来会吸走新企业使用的部分人力，诱使他们离开第一经济中的新企业，而去寻找第二经济中的新的获取收入的机会。在匈牙利，花在第二经济创收活动方面的时间不是由人们的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对这类工作的需求以及获得额外收入的可能性决定的。

因此，1981—82 年采取的措施没有达到如下三个预期目标：(1)导致全天经营的小企业的发展，(2)调动公众的大量财力资源，(3)使更大比重的第二经济活动遵循国家的法律。所造成的唯一变化是作为创收活动的一个替代领域的第二经济通过合法渠道在第一经济内有组织地发展了。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人们在这两个领域中的竞争会导向二者的和平共处，从而结束国民经济不可思议的二重性。

## 总　结

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同时存在两种"生产方式"。

第一种是受国家指导的大规模生产型的第一经济。在这些组织中，工人作为工资劳动者自由进入就业以获得工资。第二种生产方式是第二经济。它受市场调节，在私人经济基础上经营，由个人小规模生产和企业家经营单位构成。这两种经济不可避免地既在国民经济含义上又在社会学的含义上相互交错。尽管它们的经营原则根本不同，两者关系具有冲突性质，但它们仍然相互依存。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第二经济既不等同于未观察到的经济，也不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小型商品生产和业主部门。因为经济的不可思议的二重性，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调节采取的形式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违规管理的范围(税收舞弊和非法雇佣)不确定而且国家调节的效力也不清楚。

最后，基于理论思考，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国家调节的范围和效果而言，可以认为整个第二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实质上像未观察到的经济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重要。像资本主义未观察到的经济一样，第二经济的自发发展会造成对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严重破坏。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的劳动能力不是一种可以纳入国家所有制中去的生产要素，从而，消费品的市场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对消费者和职工的行为以及家庭系统内劳动力的功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仍然有可能看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工人与居民经济行为方面的差别的话，那么，这一定是由于他们能够坚持他们不同的消费观和就业欲望。

第一经济的短缺经济性质和排除任何人成为资本家的可

能性使这样一种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永久化，使得单靠小型生产生活的人口比例与单靠第一经济收入生活的人口比例减至边际水平。个人和家庭的二重经济地位是一种自然结果。人们的谋生战略(包括人们作为第一经济职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一经济全球性人力需求过剩的影响，受到能够在家庭中完成的生产活动有可能比在第一经济中付出同等劳动获得更高收入的事实的影响。

匈牙利对第二经济的研究结果表明，要解决因第二经济的出现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经济冲突，要解决国家调节私人经济活动必然遇到的两难处境，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改革第一经济。改革的企业模式是利润导向(或自治)的社会主义企业——对市场和成本变化能作出敏锐的反应。③同时，尽量使两个部门经济的经营原则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为小型生产和小型业主的私人活动最终被纳入法规控制国民经济系统开辟道路。

**注　释：**

① 作者感谢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本文写作时为作者提供了慷慨的物质帮助。

② 人们从事的经济活动定义为个人和住户从事的活动。限定为(a)自觉自愿的行动；以及(b)没有别人的物质或道德强制，而且还要符合下面的条件：投入(货币，时间，辛劳等)；(c)被活动主体看成是一种牺牲；(d)对活动主体来说，投入品使用的数量很重要；(e)希望获得满意的结果(至少希望投入生利，这要么是活动的唯一目的，要么是追求其他目标的约束条

件)，(f)这结果或是金钱或是只有花钱才能得到的东西，或是租金，或是对活动主体有用的使用价值，它们都得花钱才能得到；(g)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期限内；(h)在合乎情理的风险范围内。因此，非经济活动定义为与上面列举的标准不符的活动。根据这一定义，个人和住户的经济活动并不同时都是生产收入的活动(把"资本"换成租金收入；企业家的活动；小规模的生产；工资劳动者)。经济活动也包括那些旨在合理经济地使用和花费收入的活动。这种节约活动的特点是，与生产收入活动相反，活动主体并不考虑劳动投入，而只是考虑实际支出作为代价。

③ 按照注释②的定义，自给活动可以归并到经济活动的某一类中去——因此，不是归属创收活动就是归属节约活动——究竟属哪类，取决于(1)一方面，活动主体的既定需求是否能够通过购买来满足；(2)在创收活动方面，其人力是否存在替代用途。如果(1)是否定选择，那么此种活动不是经济活动，而(2)是否定选择，则这一活动不是创收活动(不管它会给活动主体产生多大的收入)。

④ 我们也不认为这些活动属于第一经济，因为根据定义，第一二经济被认为是人们获得收入的可供选择的领域。我们认为它们是第一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在第一经济中，经济赋予住户(劳动力供应和消费的基本单位)的双重功能被联系起来从而借此完成了。

⑤ 对这种"分割"的广泛分析，参见格拉希(1982)。

⑥ 下面关于两类经济的区分及其对第一经济意义的讨论，我要感谢科尔纳(1980)。

⑦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用"附属辅助经济"这个词所隐藏的宣传目的，比较赫斯(1980)和赫斯(1983)。

⑧ 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冲突通过比较加布尔(1979a)，加布尔(1979b)，雷达尼奥蒂(1979)和瓦加(1980)可以发现。

⑨ 关于这种程序的陷阱，看韦帕(1964a，第233—235页)。

⑩ 在这里对指令控制机制所作讨论的某些思想得益于克罗兹尔(1963)的启示。

⑪ 过去30年中，经互会成员国中，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成功地把重点转到按法规管理的机制上来。匈牙利的情形见安达尔(1979)。

⑫ 与工资差距相关的问题的细节见加布尔的研究(1979c)。

⑬ 雷热·涅尔什的估计被朱哈兹和普鲁伯格(1980)引用。

⑭ 这里给出的小型农业生产资料取材于几个有代表性的全国调查资料。所用的时间数字是根据人口普查得出的。产品价值和收入资料是根据每年二次代表性调查获得的自然生产资料——并借助于对市场价格和工厂管理的成本标准作的经常性观察得出的估计数。

⑮ 一栋自建住宅所需工时据称相当于3个人一年的合法工作天。

⑯ 官方有关从事合法私人贸易活动的人数资料不包括家庭辅助成员，临时工，季节工和兼职者的人数。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私人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要比合法的工作时间要长些，我们考虑把官方数字乘以1.5倍。在个体户家庭中，作为受赡养者登记的身强体壮的妇女比例很高，这说明家庭成员的帮助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比例(28%)几乎跟农业合作社家庭中比例(30%)一样高，相对照的是蓝领工人家庭这一比例为14%，白领家庭这一比例为4%。据部里一个负责指导私人活动的官员说，1975—1980年间，这一数字约增加了1.5倍(科瓦克斯，1981)。

⑰ 根据对称地运用各种方法作出的估计。所谓备件考核法是以零售备件流通数为根据计算的方法。所用的私人贸易估计数就是据此推导出来的。随后，对剩余部分备件的性能价值就可以根据估计的技术标准计算。所谓修理需求法是利用技术上估计的故障标准再借助于对人们拥有的各种耐用消费品(公寓和家用电器)每年平均的修理需要作的估计数来计算的

方法。合法的服务组织的数据就可以从此法计算中推演出来。这里所给的劳动投入数的计算依据的假设是，非法的手艺人在相同时间内比在合法服务机构工作的人的服务成绩高出2/3。有关估计方法的进一步细节见雷朱苏(1975)，德雷克斯勒(1977)，贝尔耶(1981)以及德雷克斯勒等(1981)。

⑱ 合法与非法合计，两部分比例为$\frac{2}{3}:\frac{1}{3}$。

⑲ 合法的私人行业生产价值是靠县议会的帮助，通过先估计每个行业中每个经营单位的平均服务价值，然后，用这个数字乘以一定年份的平均经营单位个数得出的。用这个方法所得数字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各县议会也是各地区有权向私人征税的税务机关，它们只能通过批准或确定一个很低的税基来抵销不现实的高税率的影响(私人部门的萎缩)。

⑳ 数字源于一次问卷调查(德雷克斯勒，1977)。

㉑ 估计的数字出处(卢卡斯，1980)并不说明所用的方法。我们只能证实上面所引的数字是根据国家贸易部所作的检查结果及本人的估计计算得来的。

㉒ 要指出这些趋势的迹象，下面的资料是有用的。1970—1980年间，40岁以下私人手艺人的比例从35%升到54%。根据一项代表性调查(朱哈兹，1978)，农业合作社成员家庭自留地上诞生的生产单位数1972—1977年间，从30%上升到57%，其中，以此为业的人所占比例由10%上升到30%。在私人行业中，企业家活动很强的工程和建筑行业，个体户数量1970—1978年间分别增加了21%和44%，形成对比的是，传统行业中，个人服务只增加了3%，而手工性质的轻工业部门则下降了20%。

㉓ 见拉基(1983)。

㉔ 有关现行的主要概念，见巴松尼(1981)，安达尔(1982)，鲍尔(1982)和科尔纳(1982)。

# 附　　录

Acharya, S. 1984.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ent on Tanzi," *Staff Papers*, Vol.31. Internat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December, pp. 742-6.

Alden, J. 1978. "Nature and Extent of Moonlighting in Britai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Labour Studies Group, London.

198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cond Jobs in the USA and Great Britain." UWSIT Papers in Planning Research 17, University of Wales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meo.

Alden, J. and S. Saha. 1978. "Analysis of Second Job Holding in the EEC." *Regional Studies* 12:639-50.

Algera, S. B. P. A.H. M. Mantelaers, and H. K. Van Tuinen. 1982. "Problems in the Compilation of Input-Output Tables in the Netherlands." *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 Vol. 203. Springer-Verlag, Berlin.

Allen, C. 1979. "A Survey of Economic *Samizdat*," *Radio Liberty Research* RL 268/79, September 12.

Allingham, M. G. and A. Sandmo. 1972.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23-38.

Alvaro, G. 1979. "L'Italia sommersa che non paga le tasse." *Mondo*

*Operaio* 32:62-5.

Antal, L. 1979. "Development with Some Digression: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Seventies." *Acta Oeconomica* 3-4: 257-73.

1982"Gondolatok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továbbfejlesztéséről." *Gazdaság* 3:36-58.

Arrow, K.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 Wiley, New York.

Avery, R. B., G. E. Elliehausen, A.B. Kennickell, and P. A. Spindt. 1986. "The Use of Cash and Transaction Accounts by American Famili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February.

Baldry, J. C. 1979."Tax Evasion and Labor Supply."*Economic Letters* 3, No. 1, 53-6.

Bank Deutscher Lander. 1951. *Geschäftsbericht für das Jahr* 1950. Bank Deutscher Lander, Frankfurt.

Bank of Canada. 1982. *Bank of Canada Review.* January, pp. 17-18.

Barro, R. J. and C. Sahasakul."Measuring the Average Marginal Tax Rate from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Journal of Business (Chicago)*56:419-52.

Barry, D., G. Ginsburgs, and P.Maggs(Eds.).1978. *Soviet Law after Stalin:Social Engineering through Law,* Law in Eastern Europe 20 (II).Alphen aan den Rijn:Sijthoff and Noordhoff, Netherlands.

Bars, J. J. le, G. Gamus, A. Cosset, and Y. Nottola. 1980. *Essai d'Analyse des Causes Socio-économiques du Développement du Travail Noir dans les Métiers du Batiment.* Societé d'Etud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Social, Etude pour le CORDES. SEDES, Paris.

Bársony,J. 1981."Liska Tibor koncepcióoja, a szocialista Vállalkozas" *Valóság* 12:22-44.

Barthelemy, P. 1981. "L'économie souterraine: concepts et mesures."

Centre d'Analyse Economique, FEA, Aix-en-Provence, December.

Bauer, T. 1982."A második gazdasági reform és a tulajdonviszonyok: szempontok az éuj gazdasági mechanizmus továbbfejlesziéséhez." *Mozgéo Világ* 10:57–82.

Baumol, W. J. 1952."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545–56.

Becker, G.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Economic Journal* 75:493–517.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Basic Books New York.

Belyéo, P. 1981. "A lakosság szolgáltatási igényei és kielégitésük lehetséges méodjai."Mimeo.

Bergonzini, L. 1973. "Professinalità femminile e lavoro a domicilio. Questioni generali ed esti di un'indagine statistica in alcuni communi dell'Emilia Romagna." *Statistica* 33:323–39.

Berliner, J.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Birman, I. 1980."Second and Fir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Reforms." Occasional Paper No. 108,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Washington, DC(in Russian).

Black, D. 1958.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Blades, D 1982. "The Hidden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Accounts." *OECD Economic Outlook*, Occasional Studies, June, pp. 28–45.

Bleekland, J. 1982. "Het officieuze circuit, een nadere begripsbepaling." *Statistisch Magazine* 2, No. 2.

Board of Inland Revenue. 1981. 123*rd Report-Year Ended 31March* 1980.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Boulding, K. E. 1971. *Collected Papers*(F. Glahe, Ed.).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Boulder.

Bradford, D. and H. Rosen. 1976. "The Optimal Tax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6: 94-101.

Brayton, F. and E. Mauskopf. 1985.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HPS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S. Economy." *Economic Modelling* July:170-292.

Brennan, G. and J. M. Buchanan. 1980. *The Power to Tax.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Press, Cambridge.

Brusco, S. 1979. *Agricolutre Ricca e Classi Sociali.* Feltrinelli, Milan.

Buchanan, J. M. 1975. "A Contraclarian Paradigm for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5:225-30.

1976. "Taxation in Fiscal Exchang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 17-29.

1977.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Perspectives of a Political Economist.*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and London.

Buchanan, J. M. and D. R. Lee 1982. "Politics, Time and the Laffer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816-19.

Bukovskii, V. 1978. *To Build a Castle* Deutsch, London.

Bush, K. 1981. "Books in the Soviet Second Economy." *Radio Liberty Research* RL 468/81. November 23.

Cagan, P. 1958.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Total Money Supp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August): 303-28.

Cameron, D. R. 1978.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243-61.

Campbell, D. T. 1974."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Dartmouth/OECD Seminar on Social Research Public Policies. September.

Campbell, D.T., et al 1965. *Unobtrusive Measures.* Rand McNally, Chicago.

Canullo, G. and M. G. Montanari. 1978. "Lavore regolare e lavoro nero in alcuni Comuni delle Marche." *Lavoro Regolare e Lavoro Nero*(P. Alessandrini, Ed.).Edigraf, Rome.

Carlson, J. 1982. "Methods of Cash Management." *Economic Commentar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April 5.

Carson, C. S. 1984. "The Underground Economy:An Introduction." *Survey of Currency Busines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Vol. 64, Number 5 (May 1984), pp. 21-37.

CBS. 1974. *Standaard Bedrijfsindeling.* CBS. The Hague.

CBS. 1983. *De produktiestructuur van de Nederlanse volkshuishouding*, deel XL. CBS, The Hague.

CERES. 1978. "Il lavoro nero nel 1977 in Italia." *Tendenze della Occupazione* 3:

Chadeau, A. 1985. "Measuring Household Activities: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1(3) (1985): 237-53.

Chadeau, A. and A. Fourquet. 1981. "Peut-on mesurer le travail domestique?"*Economie et Statistiques* 136:29-42.

Chalidze, V. 1977. *Criminal Russia.* Random House, New York.

Choain, C, 1982."Application jurisprudentielle de la loi de 1972 sur le travailclandestin."(Ed.).F.Stankiewicz, *Travail Noir Productions Domestiques et Entraide.* CNRS et LAST, Lille.

Colombino, U. 1978. *Il Potenziale Aggiuntivo del Lavoro in Italia:un' Esplorazione Econometrica.* Giappichelli, Torino.

Commune di Modena. 1978. *Il Lavoro a Domicilio nel Quartiere Madonnina* Modena.

Connolly, W. 1981. *Appearance and Reality in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onseil des Impôts. 1979. *Le Rappor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elatif à l'Impôt sur le Reven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Paris.

1983.*Le Rappor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elatif á la TVA.*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Paris.

Contini, B. 1979. *Lo Sviluppo di un'Economia Parallela.* Edizioni di Communità, Milan.

1981."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llel Economy:The Italian Experienc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401-12.

Copeland, M. A. 1952. *A Study of Money Flow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Cramer, J. 1983."Currency by Denomination." *Economic Letters* 12: 299-303.

Crozier, M. 1963.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Deaglio. M. 1974. "L'ocupazione invisible: il caso di un comune piemontese." *Biblioteca della Libertà* 52-3: 69-108.

Del Boca, A. 1980. "Segmentazione e mercati del lavoro dualistici. *Rivista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a Sociali* July-December:384-401.

Delorozoy,R.1980. *Le Travail Clandestin.* Rappor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Paris, Paris.

Delors, J. and J. Gaudin. 1979."Pour la création d'un troisième secteur." *Problèmes Economiques* 1616: 20-4.

Deutsch, K. W. 1966.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Free Press, New York.

Deutsche Bundesbank. 1977. *Geschäftsbericht für das Jahr* 1977. Deutsche Bundesbank Frankfurt.

Dilnot, A. and N. Morris. 1981. What Do We Do About the Black Economy?" *Fiscal Studies* 2: 58-73.

Dixit A. and A. Sandmo. 1977. "Some Simplified Formulae for Optimal Income Taxation." *Scandih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417-23.

Drexler, B. 1977. *A másodlagos gazdaságban végzett szolgáltatasok helyzete és perspektivája.*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Budapest.

Drexler, B., A. Halfár, T. Sebestyén, and Gy. Maliga. 1981. *Épitöipari lakossági javitéo-karbantartéo szolgaltatás fejlesztése.*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Budapest.

Du Rietz, C. 1980. "Marginalskatter, moms och arbestsgivaravgifter bakom växande svart sektor." *SAF-Tidningen* 32:8-9.

Dupeyroux, J. 1983. "Note sur les Activitiés Professionnelles Occultes." Rapport Rémis à Jean Auroux, Minstre Delegue aux Affaires Sociales, Charge du Travail, Paris, Mimeo.

Ehrlich, I. 1973. "Participation in Illegitimate Activi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521-65.

Eisner, R. 1978. "Total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9 and 1969."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24, No. 1, March: 41-70.

Enzler, J, L. Johnson, and J. Paulus. 1976. "Some Problems of Money Dem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61-80.

Ethier, M. 1982. "L'Economie Souterraine: Revue de la Littérature et Nouvelles Estimations pour le Canada." Department of Fina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abre, R. 1979. *Une Politique de l'Emploi au Service de l'Homme.* Rapport Présenté à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ission pour l'Emploi, Paris.

Fase, M. M. G. and M.van Nieuwkert. 1977."The Demand for Bank Notes in Four Countries." *De Nederlandsche Bank N. V., Quarterly Statistics* 1(June):84–98.

Fau, J. 1980. *"Le Travail illégal."* Rapport Rémis à Lionel Stoleru, Secretaire d'Etat auprés de Jean Matteoli,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 la Participation, Paris, mimeo.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Batiment. 1979. "Rapport sur les Moyens a Mettre en Oeuvre pour Lutter contre le Travail Clandestin." Paris,mimeo.

Feige, E. L. 1975. "The Consequences of Journal Editorial Policies and a Suggestion for Rev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1291-5.

1979."How Big is the Irregular Economy?"*Challenge* 22(November-December):5–13.

1980. "A New Perspective on Macroeconomic Phenomena.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Unobserved S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80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p. 1–63.

1981."The U. K.'s Unobserved Econom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Journal of Economic Affairs* 1:205–12.

1982a. "A New Perspective on Macroeconomic Phenomena.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Unobser ed Econom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Taxati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 Walker, Ed., Internationa Burden of Government. Fraser Institute Vancouver.

1982b. *Observer–Subject Feedback:The Dynamics of the Unobserved Economy.* E. J. Brill, Leiden.

1985a. "The Meaning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and the Full

Compliance Deficit." *The Economics of the Shadow Economy.* (W. Gaertner and A. Wenig Eds.)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85b.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 and National Acounting Systems: Does MV = PT? A Pilot Study of the Swedish Economy."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come and Wealth, Nordwijk, The Netherlands, pp. 1–106.

1986a.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Estimates of Unreported Incom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86b. "The Role of Cash Payments in the U. S. Economy: The Currency Eningm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86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ment on Tanzi"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33(4):768–81.

Feige, E. L. and R. T. McGee 1982. "Tax Revenue Losses and the Unobserved Eonomy in the UK." *Journal of Economic Affairs* 2:164–172.

1983. "Sweden's Laffer Curve: Taxation and the Unobserved Econom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5:499–519.

Feldbrugge, F. 1975. *Samizdat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Soviet Union*. Sijthoff, Leiden.

Feldbrugge, F. (Ed). 1979.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SSR and the Union Republics*. Sijthoff and Noordhoff, Alphen aan den Rijn.

Fiorina. M. 1981. "Short-and Long-term Effect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Indivdual Voting Decisi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D. A. Hibbs and H. Fassbinder, Eds.). North-Holland, Amsterdam.

Fisher, I. 1911.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Macmillan, New York.

Fisher, S. 1979. "Anticipation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553–79.

Flora, P. 1981. "Solution or Source of Crises?The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W. Mommsen, Ed.). Croom Helm, London, p. 379.

Forte, F. 1979, "Lo scandalo fiscale:i costi dell'economia sommersa." *Mondo Operaio* 32: 67–8.

Foudi, R., F. Stankiewicz, and N. Vaneecloo. 1981. *Les Chomeurs et l'Économie Informelle.* Laboratoire d'Analyse des Systèmes et du Travail(LAST), Lille.

Frey, B. S. 1978.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81. "Wie gross ist die Schattenwirtschaft." *Wirtschaft u. Recht,* H. 3/4, Jg. 33, pp. 143-52.

1983.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 A Theoretical Approach.*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Frey, B. S. and F. Schneider. 1978a.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174–83.

1978b. "A Politico-Economic Model of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ic Journal* 88: 243–53.

1981. "Recent Research on Empirical Politico-economic Models." *Contemporary Politcal Economy*(D. A. Hibbs and F. Fassbinder, Eds.). North-Holland, Amsterdam.

Frey, B. S. and W. W. Pommerehne. 1982. "Measuring the Hidden Economy: Though this be Madness, There is Method in it."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V. Tanzi, V. Ed.). Heath, Lexington.

Frey, L. 1975a. "Stato e prospecttive delle ricerche sul mercato del lavoro in Italia di fronte ai problemi di disoccupazione e sottoccupazione." *Quaderni di Economia del Lavoro,* pp. 1-28.

1975b. *Lavoro a Domicilio, Decentrmento e Attività Produttiva*. Angeli, Milan.

1979. "Dal lavero nero alla misurazione del reddito sommerso." *Economia del Lavoro* 10:120-36.

Frey, L., G. de Santis, and L. Livraghi, R.(Eds.).1975. *Lavoro a Domicilio e Decentramento dell'Attività Produttva nei Settori Tessile e dell' Abbigliamento in Italia*. Angeli, Milan.

Gábor, R. I. 1979a. "A második (másodlagos) gazdaság." *Valóság* 1:22-36. English translation, Gábor, R. I. 1979. "The Second (Secondary)Economy." *Acta Oeconomica* 3-4:291-311.

1979b. "Második gazdaság és a háztáji gazdlákodás." *Valóság* 7: 101-3.

1979c. "Relativ bérszinvonal-ösztönzés-munkaerökinalat." *Pénzugyi Szemle* 8-9, 11:663-74, 856-72.

Galasi, P. 1982. "Second Economy and Utilization of Labor Power in Hung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Hidden Economy: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y, Rome-Frascati, Italy, November 25-28.

Gallino, L. 1975. "Politiche dell' occupazione e seconda professione." *Economia e Lavoro* 1:81-95.

1980. *Lavorare due Volte*. Stamppatori, Torino.

Garcia, G. 1978. "The Currency Ratio and the Subterranean Economy."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November-December, pp. 64-9.

Garcia, G. and S. Pak. 1979. "Some Clues in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Mone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2):330-4.

Gershuny, J. I. 1979. "The Informal Economy: Its Rol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Futures*, February, pp. 3-15.

Gershuny, J. I. and R. E. Pahl. 1980. "Britain in the Decade of the Three Economies." *New Society* 51:7-9.

Gibbs, J. C. 1979. "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ly Oriented Inquiry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2):127–40.

Ginsburgs, G. and S. Pomorski. 1980. "Enforcement of the Law and the Secon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Research Conference on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January, Washington, DC.

Giran, 1981. "Complémentarité et Concurrence entre Marché du Travail Officel et Marché du Travail Officieun." G. R. I. F. E., F. E. A., Aix-en-Provence, mimeo.

Gordon, R. J. 1981.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Measuring Inflation and Causing It." *The Public Interest*, No. 63, Spring.

Gourlay, J. L. 1980. "Tax Abuse-A View from Revenue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Summer, pp. 82–7.

Greenslade, G. 1980 "Regional Dimensions of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Occasional Paper No. 115,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Greffe, X. and J. Gaudin. 1980. "Partage du travail et mode de développement." *Droit Social*, 33:86–99.

Gronau, R. 1977. "Leisure Home Production and Work, the Allocation of Time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1099–1123.

Grossmann, G. 1977.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6(5): 25–40.

1981. "La seconde économie et la planification économique soviétique." *Revue d'É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12(2):5–24.

Gutmann, P. M. 1977. "The Subterranean Economy."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33:24–7, 34.

Haas, R. D. 1978. "Short Note on the Recent Behavior of Currency." Bank of Canada, mimeo.

Hamer, E. 1978. "Schwarzarbeit und Marktwirtschaf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ovember 27, 1978.

1979. *Das Handwerk und sein Markt: Probleme mit Industrie, Heimwerk, Schwarzarbeit*. Hannover, Schlüter.

Hansson, I.1980. "Beräkning av totala marginaleffekter." Nationalekonomiska Institutionen, Lunds Universitet, Sweden, mimeo.

1981. "Beräkning av skatteundandragandet i Sverige." Riksskatteverket, Stockholm, mimeo.

Hansson, I. and C. Stuart. 1982. "Laffer Curves and 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 in Swed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und.

Heckmann, J.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53–69.

Heertje, A. and H. Cohen. 1980. *Het officieuze circuit: een witboek over zwart en grijs geld*. Het Spectrum, Utrecht, Antwerpen.

Heertje, A., M., Allen, and H. Cohen. 1982. *The Black Economy*. Pan Books, London.

Henry, S. 1978. *The Hidden Economy*. Martin Robinson, Oxford.

Henry, S. (Ed). 1981. *Can I Have It in Cash?* Astragal, London.

Héthy, L. 1980. "A 'második gazdaság'-a gazdaság és a társadalom." *Társadalmi Szemle* 11:40–7.

1983. *Gazdaságpolitika és erdekeltség*. Kossuth, Budapest.

Hibbs, D. A. and H. Fassbinder (Eds.). 1981.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North-Holland, Amsterdam.

Holzman, F. D. 1981. "The Second Economy in CMEA: A Terminological Note." *The ACES Bulletin* 1:22–35.

Hood, C. and A. Dunsire. 1982. *Bureaumetrics. The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British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Gower, London, pp. 28-3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3. 1982.

House of Commons. 1979. *Evidence of Sir Willam Pile to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26 March 1979*.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80.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Nineteenth Report, Session 1979/ 80, House of Commons Paper 778.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81.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Twelfth Report, Session 1980/81, House of Commons Paper 318.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1982.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Twenty-Second Report, Session 1981/82, House of Commons Paper 339.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Institute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Etudes Economiques 1981a. *Le Mouvement Economique en France* 1949-1979. INSEE, Paris.

1981b.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81. INSEE, Pari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1979. *Estimates of Income Unreported on Individual Tax Return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Publication 1104(9-79). IRS, Washington, DC.

1983. *Income Tax Complianc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Washington, DC, July.

Ioffe, O. S. 1982. "Law and Economy in the USSR." *Harvard Law Review* 95:1591-1625.

Isachsen, A. J. and S. Strom. 1980a. "Den skjulte ekonomi og det svarte arbeidsmarked." Oslo Universitet, Sweden, mimeo.

(1980b). "The Hidden Economy: The Labor Market and Tax Evas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2:304-11.

1981. *Skattefritt:Svart Sektor i Vekst*.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Jong, E. de 1976. "Statute on Handicraft-Artisan Trade." *Review of Socialist Law* 4:266-7.

Judd, J. and J. Scadding, 1982. "The Search for a Stable Money Demand Function: A Survey of the Post-1973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3):993-1023.

Juhász, P. 1978. "A mezogazdasági szövetkezetek ès a falu társadalmai

négy esszé." Mimeo.

Juhász, P. and T. Prugberger. 1980. "Szocialista kisvállalatok létrehozása - egyéni kezdeményezés alapjá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338-47.

Juster, F. T. 1966. *Household Capital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1877-1962*. NBER, New York.

Katsenelinboigen, A. 1977. "Coloured Markets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Studies* 29:62-85.

Kendrick, J. W. 1979. "Expanding Imputed Values in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25, No. 4, December, pp. 349-63.

Key, V. O., Jr. 1961.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Knopf, New York.

Klovland, J. T. 1980. "In Search of the Hidden Economy: Tax Evasion and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in Norway and Sweden." Discussion Paper 18/80,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rgen.

Kolm, S.-C. 1973 "A Note on Optimum Tax Eva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265-70.

Kornai, J.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82. "A magyar gazdasági reform jelenlegi helyzetéről és kilátásairéol." *Gazdaság* 3:5-34.

Kovács, G. 1981. "A magánkisipar szabályozásának közgazdasági eszközei,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 penzugyi szabályozásra." Mimeo.

Kramer, G. H. 1973. "On a Class of Equilibrium Conditions for Majority Rule." *Econometrica* 41:285-97.

Laki, T. 1983. *Vállalkozások és a társadalmi-gazdasági környezet*. In stitute of Labour Affairs, Budapest.

Langfeldt, E. 1982. "The Unobserved Econom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e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observed Sector. NIAS, Wassenaar, June 3-6, 1982.

Langfeldt, E. and H. Lehment. 1980. "Welche Bedeutung haben Sonderfaktoren für die Erklärung der Geldnachfrag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16, Heft 4, pp. 669-84.

Laurent, R. 1970. "Currency Transfers by Denomination."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ndbeck, 1980. "Tax Effects versus Budget Effects on Labor Supply." Seminar Paper No. 148,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Lipset, S. M. and W. Schneider. 1983. *The Confidence Gap.* Free Press, New York, pp 402, 407.

Lowery, D. and L. Sigelmann. 1981 "Understanding the Tax Revolt: Eight Expla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963-74.

Lukács, O. 1980, "A kiegészitö gazdaságréol." Mimeo.

Macafee, K. 1980. "A Glimpse of the Hidden Economy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Economic Trends (London)*, February, No. 316, pp. 81-7.

McCracken, P. W. 1973.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68-171.

McCrohan, K. F. 1982. "The Use of Survey Research to Estimate Trends in Non-Compliance with Federal Income Tax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2): 231-40.

McGee, R. 1983.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 and Employment Rates: Tobin and Taxation Effect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4: 215-23.

McGee, R. and E. L. Feige 1982a. "Policy Illusion,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the Unobserved Economy."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pril 1982. See also Chapter 3, this volume.

McGee, R. and E. L. Feige. 1982b. "The Unobserved Economy and the UK Laffer Curve." *Journal of Economic Affairs* 2: 36-43.

Magnusson, D. 1980. "Omfattningen av den ekonomiska brottsligheten." *Brottsutvecklingen* (L. Johansson, Ed.). Brotsförebygande Rådet. Stockholm.

Majone, G. 1981/82. "Modes of Control and Institu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Group on Guidance,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Discussion Paper No. 17, Bielefeld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Marrese, M. 1980. "The Role of the Second Economy: Lessons from Hung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Meeting of American and Hungarian Economists, Cambridge, MA, May 7-9.

Martino, A. 1980. "Another Italian Economic Miracle." Mont Pelerin Society, Stanford Conference, mimeo.

Matthews, K. 1981.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and the Rise of the Black Economy: 1973-1979." Liverpool Research Group Economic Bulletin 25,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mineo.

Matthews, M. 1978. *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Elite-Life-Style under Communism*.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Maurach, R. 1955. *Handbuch der Sowjetverfassung*. Isar Verlag, Munich.

Mirus, R. and R. S. Smith. 1981. "Canada's Irregular Economy." *Canadian Public Policy*, pp.444-53. Also reprinted in V. Tanzi (Ed.).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ad*, D. C. Heath, Lexington, MA, 1982.

Morgenstern, O. 1963. *On the Accuracy of Economic Observations*,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Mueller, D. C. 1979. *Public Choice*. Cambridge Univepsity Press, Cambridge.

Murphy, M. 1978. "The Value of Non-Market Household Production: Opportunity Cost Versus Market Cost Estimat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24, 3 September, pp. 243–55.

1982 "Comparative Estimates of the Value of Househol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1976."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28, 1 March, pp. 29–43.

Myrdal, G. 1978. "Dags för ett bättre skattesystem." *Ekonomisk Debatt* 7:403–506.

Myrsten, K. 1980. "Det illegala bygghantverket." *Brottsutvecklingen* (L. Johansson, Ed.), Brottsförebyggande Rådet, Stockholm.

Neldner, M. 1977.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urrency Ratio, the Time Deposit Ratio, and the Savings Ratio: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for the West-German Economy."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13, Heft. 4.

Niskanen, W.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ldine-Atherton, Chicago.

Nordhaus, W. and I. Tobin. 1973. "Is Growth Obsolete?" *Economic Growth, Fiftieth Anniversary Colloquium V*. NBER, New York, pp. 343–7.

O'Hearn, D. 1980. "The Consumer Second Economy: Size and Effects." *Soviet Studies* 32:218–34.

O'Higgins, M. 1980. *Measuring the Hidden Economy: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Methodologies*. Outer Circle Policy Unit, London.

1981a. "Aggregate Measures of Tax Evasion: An Assessment." *British Tax Review* 26:286–302.

1981b. "Tax Evasion and the Self-Employ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British Tax Review* 26:367–78.

Ofer, G. and A. Vinokur. 1980. "Private Sources of Income in the Soviet Urban Househol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search Conference on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C, January.

Outer Circle Policy Unit. 1979. *Policing the Hidden Economy*. Outer Circle Policy Unit, London.

Parker, R. P. 1984. "Improved Adjustments for Misreporting of Tax Return Information Used to Estimate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1977."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64(6):17-2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Peacock, A. and G. Shaw. 1982. "Is Tax Revenue Loss Overstated?" *Journal of Economic Affairs* 2:161-3.

Pencavel, J. 1979. "A Note on Income Tax Evasion, Labor Supply and Nonlinear Tax Schedul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 115-24.

Persson, L. 1979. "Myter om ekonomiska brott." *Ekonomisk Brottslighet* (L. Johansson, Ed.) Brottsförebyggande Rådet, Stockholm.

Petersen, H.-G. 1981. "Size of the Public Secto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eventeen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Gouvieux. Frankreich, June 1981,

Pipes, S. and M. Walker (with. D. Gill). 1982. *Tax Facts 3: The Canadian Consumer Tax Index and You*. Fraser Institute, Vancouver.

Plott, C. R. 1976. "A Notion of Equilibrium and its Possibilty Under Majority Ru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787-806.

Pomorski, S. 1978. "Crimes against the Central Planner: 'Ochkovtiratel'stvo'." *Soviet Law after Stalin: Social Engineering through Law*, (D. Barry, G. Ginsburgs and P. Maggs, Eds.), *Law in Eastern Europe* 20(II). Sijthoff and Noordhoff, Alphen aan den Rijn.

Porter, P., T. Simpson and E. Mauskopf, 1979.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213–29.

Porter, R. and E. Offenbacher. 1984.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Measurement of Monetary Aggregates." *Financial Innovatio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Kluwer-Nijhoff, St. Louis, MO, pp. 49–98.

Porter R. and S. Thurman. 1979. "The Currency Ratio and the Subterranean Economy: Additional Comment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processed, January 26, 1979.

Radnéoti, H. 1979. "Ház'áji gazdálkodás és a második gazdaság." *Valéoság* 4:9–24.

Ragot, M. 1983. *Le Travail Clandestin.* Avis Adopté par le Conseil Economique et Social. Conseil Economique et Social, Paris.

Ramsay. F.R. 1927.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 *Economic Journal* 37·47–61.

Rázus, Cs. 1975. "A lakosság részére térítésért vagy ellenszo'gáltatásért engedély nélkul végzett szolgáltatási tevékenység, illetve a barkacs je munkák volumenének megállapitása." Mimeo.

Rikspolisstyrelsen. 1977. "Organiserad och ekonomisk brottslighet i Sverige: ett åtgärsförslag." Report from Arbetsgruppen mot organiserad brottslighet. Rikspolisstyrelsen, Stockholm, mimeo.

Rosanvallon, P. 1980.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souterraine et l'avenir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Le Débat* 2:15–27.

Ross, I. 1978. "Why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s Booming." *Fortune* 9:92–8.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1979. *Report No. 8–Fourth Report on the Standing Reference.*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Table 10.16.

Rumer, B. 1981. "The 'Second' Agriculture in the USSR. " *Soviet Studies* 33:560–72

Saba, A. 1980. *L'Industria Sommersa. Il Nuovo Modello di Sviluppo*. Marsilio, Padua.

*Sachverständigenrat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Jahresgutachten 1980/81*, 1981/82, Bonn.

Sandmo, A. 1976. "Optimal Tax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37–54.

1981. "Income Tax Evasion, Labour Supply, and 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265–88.

Schoemaker, P. J. H. 1982. "The Expected Utility Model: Its Variants, Purposes, Evidence and Limi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529–63.

Scott, W. and H. Grasnick. 1981. "Deterrence and Income Tax Cheating: Testing Interaction Hypotheses in Utilitarian Theori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 17:395–408.

Seguin, Ph. 1979. *Rapport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nquete sur la Situation de l'Emploi et le Chomage*. Document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No. 1180.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Paris.

Sen.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Holden, San Francisco.

Sen, A. and B. Williams. 1982. "Introduction."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A. Sen and B. William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hankland G.1980.*Our Secret Economy -The Respon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to the Rise of Mass Unemployment*. London,

SIFO. 1966 "Deklarationsfuskarna. "SIFO, Stockholm. mimeo.

1978. "Den sjunkande deklarationsmoralen." SIFO, Stockholm, mimeo.

1979. "En nation av fifflare." SIFO,Stockholm. mimeo.

1980a. "Svartbetalare och svartjobbare." SIFO, Stockholm, mimeo.

1980b. "Småforetagarna och svartjobben." SIFO, Stockholm, mimeo.

1981 "Få uppger för låga inkomster i självdeklarationen." SIFO, Stockholm, mimeo.

Simes, D. 1975. "The Soviet Parallel Market." *Survey* 21(3):42–52.

Simis, K. 1977. "The Machinery of Corrup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Survey* 23(4):35–55.

Simon, C. P. and A. D. Witte. 1981.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What Is It and What Should We Do?* The Osprey Company, Tallahassee, FL.

Simon, H. A. 1978. "Rationality as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hought." *Amer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8:1–16.

Simpson, T. and R. Porter, 1980 "Some Issues Involving the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Controlling Monetary Aggregates III*,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Conference Series No. 22.

Singh, B. 1973. "Making Honesty the Best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257–63.

Skolka, J. 1985. "The Parallel Economy in Austria." *The Economics of the Shadow Economy* (W. Gaertner and A. Wenig, Eds.). Springer-Verlag, Berlin, pp. 60–75.

Skolnick, J. H. 1966. *Justice without Trial: Law Enforcement in Democratic Society*. Wiley, New York, Chapter 8.

Smith, A. 1981a. "A Review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onomic Papers* 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1981b. "The Informal Economy." *Lloyds Bank Review* 141: 45–61.

Smith, H. 1976. *The Russians*. Quadrangle. New York.

Smith, J. D., T. E. Moyer, and E. Trzcinski, 1982. "The Measure-

ment of Selected Income Flows in Informal Markets."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December 1982.

SOU. 1970. *Aspirationer, Möjligheter och Skattemoral.* Liber, Stockholm.

Spicer, M. and S. Lundstedt. 1976. "Understanding Tax Evasion." *Public Finance* 2:295–305.

Srinivasan, T. N. 1973. "Tax Evasion: A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339–46.

Stuart, C. E. 1981. "Swedish Tax Rates, Labor Supply and Tax Revenu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1020–38.

SSRC Working Group. 1981.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Hidden Economy and the Tax Ba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London, mimeo.

Staats, S. 1972. "Corruption in the Soviet System." *Problems of Communism* 21(1): 40–6.

Tahar, G. 1980. "Le marche du travail marginal et clandestin en France, au Royaume-Uni et en Italie," Study No. 79/4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Tanzi, V. 1980.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Banco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135:427–53.

1982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Tax Eva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V. Tanzi, Ed.). DC Heath, Lexington, pp. 69–92.

1983.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Estimates, 1930–80." *Interna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pp. 283–305.

Theil, H.1968. *Optimal Decision Rules for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North-Holland, Amsterdam.

Thomas, J. J. 1986.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ment on Tanzi."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ol. 33, No. 4, December 1986, pp. 782–8.

Tinbergen, J. 1952.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North-Holland, Amsterdam.

Tittle, C. and A. Rowe, 1973. "Moral Appeal, Sanction Threat, and Deviance: An Experimental Test." *Social Problems* 20. 488–98.

Treml, V. 1975. "Alcohol in the USSR: a Fiscal Dilemma." *Soviet Stucies* 27:161–77.

United Nations, Depar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tatistical Office. 1953. *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Supporting Tables*.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No. 2.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ourcebook 1952–7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Ann Arbor, MI.

Van Eck, R. 1983. "Secundaire activiteiten en de Nationale rekeningen." *CBS-Select II*, CBS, The Hague.

Vanous, J. 1980. "Privat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search Confer ence on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Washington DC. January.

Van Tuinen, H. K. 1980. "Veawarring over officieuze geldcircuits nog groter." NRC/Handelsblad, December 1, 1980.

1981.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Union of Public Finance (Vereniging voor Openbare Financien), *Openbare Uitgaven*, August 1981.

Varga, Gy. 1980. "A mezögazdasagi kistermelés jelentösége, szabályozottsâge és a fejlezlés föbb kérdései." *Közgazdasági Szemle* 7–8:908–22.

Volensky, M. 1980. *Nomenklatura: Die Herschende Klasse in der Sowjetunion*. Fritz Molden, Munich.

Wadekin, K. 1973.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Soviet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Warneryd, K. E. and B. Walerud. 1981. "Tax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Some Interview Data on Tax Evasion in Sweden."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mimeo.

Weber, M. 1964.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Kiepenhauer und Witsch, Cologne-Berlin.

Weck, H. and B. S. Frey. 1982. "Tax Finance and the Shadow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Copenhagen Congress, mimeo, August.

Weiss, L. 1976. "The Desirability of Cheating Incentives and Randomness in the Optimal Income Ta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1343–52.

Wicksell, K. 1896. *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Gustav Fischer, Jena.

Wildavsky, A. 1964. *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Little Brown, Boston.

Wilensky, H. L. 1981. "Family Life Cycle, Work,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Reflections on the Roots of Happiness, Despair and Indifference in Modern Society." *Working Life: A Social Science Contribution to Work Reform* (B. Gardell and G. Johansson, Eds.), Wiley, London.

Wiles, P. 1981. *Die Parallelwirtschaft: Eine Einschatzung des systemwidrigen Verhaltens (SWV) im Bereich der Wirtschaft unter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der USSR*. 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Cologne.

Wong, F. and D. Rose, 1980. "The Subterranean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Canadian Economy." RM-80-107, Bank of Canada, unpublished research memorandum.

Zemtsov, I. 1976. *Partiia ili Mafiia? Resvorovannaia Respublika*. Les Editeurs Réunies, Paris.

— 1979.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Crossroads* 2:5–60.